

2023年11月
总第三期

Journal of Chinese Mission

中国宣教学刊



中国宣教学刊

二〇二三年 总第三期

本刊由宣能集（Synergy China）于2022年创办。本刊登载之文章，不代表宣能集或编委之立场。

主 办：宣能集（Synergy China）

出 版：《中国宣教学刊》编辑部

主 编：铭贤

编 委：牧宣 铭贤 约翰 但以理 王再来 秋风 晓望 雅歌

特约撰稿：刘明德 提摩太 威尔逊 大卫 金但以理

美术编辑：末了

文字编辑：Holly

联络发行：刘明德

顾 问：何俊明 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创始人之一

翁兢华 香港保罗文化中心董事会主席

陈维思 Radius Asia 宣教训练中心总干事

黄彼得 KMAC 宣教士团契会长

David Ro ASIA2020 CONGRESS 主席

Todd Johnson 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Steven Hawthorne 贺思德《宣教新视野》作者

Finny Philip 印度 Christian Trends 杂志主编

金但以理 宣教中国2030推动者

版权所有 宣能集（Synergy China）

除经联络申请批准外，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转摘或翻印本刊文章
惟于课堂及课程作业使用则免受此限制

来稿或表达意见，请寄：

synergycbulletin@protonmail.com

目录

编者语

主题文章

中国教会的宣教动员现状与展望 / 王再来	001
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 / 牧宣	015
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与展望——一个跨文化宣教士的简析 / 亚伯拉罕	027
从海外华人差会角度观察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与冀望 / 守道	039
宣教中国2030运动的发展、挑战与展望 / 金但以理	061
反思当代中国教会宣教的得与失 / 铭贤	076

普世宣教

影响中国跨文化工人文化调整和留任工场的因素 / 泰伯·劳克林 (Tabor Laughlin) 刘明德译	111
中国宣教士在中东的跨文化挑战与突破 / Joshua Sun.....	176

差传研究

从《路加福音》的 καθέξης 和 αποστειλλω 探讨古今宣教策略 / 保罗 (Paul)	192
教会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亚非拉世界 / 华勇 (Hwa Yung)	215
教会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亚非拉世界: 回应 / 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 刘明德译	238
《中国宣教学刊》征稿启事	250

编者语

在很多主内肢体与读者的认可与鼓励之下，本刊继续靠赖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预备制作第三期。本期主题为“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与展望”。“当前”主要是指影响困扰我们三年之久的新冠疫情终于过去，国际旅行逐渐并大大地开放。疫情三年期间中国教会宣教运动通过网络全力推动普世宣教（特别是宣教祷告、宣教动员、宣教训练和宣教会议等）。在疫情即将结束之际，中国迎来二十大会议，新的国策，包括宗教政策，再一次将中国教会带入新的处境与挑战之中。同时，末后世代普世宣教之需要，以及世界各地之“马其顿的呼声”愈加强烈。如此种种现象与处境，提醒我们应该适时地检讨思考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的具体状况与展望，以期更好地迎对普世宣教之需。

感恩的是，在“主题文章”栏目，我们邀请到多位比较资深的同工，分别从宣教动员者、教会牧者、跨文化宣教士、海外华人差会，及2030宣教中国运动等不同角度与层面，多方位地观察、思考当前中国教会宣教之具体现状，并提出前瞻性的鼓励意见。这其中有宣教动员者再来同工的经验和建议；再有教会资深牧者牧宣的调查与“提摩太式宣教”策略之提议；也有身处跨文化宣教工场之中国教会宣教士亚伯拉罕对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之观察思考，以及展望建议；还有海外华人宣教前辈

守道站在华人国际差会领袖之角度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教会所面对的诸多挑战，并谆谆地对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指出重要献议与冀望；更有中国教会宣教运动之亲历与推动领袖金但以理对“2030 宣教中国”运动的发展、现状反省与思考，并提出“突破局限，凭信差传”的展望。

最后，本栏目特别刊登“当代中国教会宣教之得与失”一文，这是该文作者在多年亲身经历与践行，持续观察与跟进，不断检讨与反省中著写的文章。该文横跨当代中国教会发展 40 年之历史，强调宏观与大局，分析建议力求客观平衡与积极鼓励态度。期盼大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地更多了解当代中国教会宣教的得着与失去，经验与教训，并倍受激励，奋勇前行。尽管如此，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仍然显出我们的有限与局限，属灵深度、高度与广度的短浅，学养与学术水准有待提升，研究与写作的功力亟需提高等。

在“普世宣教”专栏，我们重点刊出由刘明德同工翻译，泰伯·劳克林（Tabor Laughlin）所著“影响中国跨文化工人文化调整和留任工场的因素”博士论文中对 25 位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士之重要的访谈，调查与研究，总结与思考之主要内容。盼望本文作者之宝贵心血研究，以及他的热心能够激动许多人（参看林后 9:2）。作为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士，也是年轻的宣教研究学者，Joshua Sun 同工在宣教工场上，根据其自身经历与经验，观察与思考，撰写“中国宣教士在中东的跨文化挑战与突破”一文。作者在文中提出很多切实的建议，深具参考价值。我们也期盼神在中国教会兴起更多委身且持守普世宣教工场，并且更多反省与思考，通过文字写作的年轻宣教工人。

“差传研究”栏目为本刊长期关注并倾力投入的重点。从本期开始，本刊希望通过此栏目，邀请国内圣经研究学者、圣经原文专家、差传研究学者，以及资深经验宣教同工，策划系列宣教释经之圣经研究专文。期盼填补当前中国教会宣教释经之严重不足的状况，并为中国教会更加健康地委身普世宣教事业奠立更加坚实的宣教神学理论基础。

“从《路加福音》的 kaqexhj 和 apostellw 探讨古今宣教策略”一文之作者保罗（Paul）为当今中国教会神学教育领域具代表性之希腊文专家学者，资深的神学教育工作者。他带领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神学、宣教和原文三个角度，以一个新的视角，选择其中两个关键字词，从 kaqexhj 和 apostellw 进行研究和思考，探讨古今之宣教策略。

华勇主教撰写之“教会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亚非拉世界”一文，帮助我们了解基督教在全世界的转变，以及它对全球教会，特别是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以便我们能更有成效地在亚洲地区为福音的发展而努力。前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IFES）秘书长林赛·布朗（Lindsay Brown）博士之回应文章更是锦上添花，为此文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主要从西方教会的角度，引导我们回到初期教会、宗教改革时期与近代宣教浪潮三个重要的教会历史时期，帮助我们认识西方教会的发展与式微过程，以及当今亚洲教会可以从西方教会汲取的经验与教训。

就在本期学刊即将完工出刊之前，巴以战争爆发，战事不断蔓延，世界局势进入更加混乱，令人堪忧的境况。俄乌战争和苏丹内战还在持续；非洲几内亚、加蓬、尼日尔政变导致的混乱仍在继续；摩洛哥地震、阿富汗地震、利比亚飓风洪水的影响与灾后重建工程浩大时长。此时，一段经文涌入主仆的脑海中。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惟有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4-14）

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预兆，都在现时世界持续不断地应验着。但同时，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务必要警醒与谨慎，有爱灵魂的心，要防备迷惑，要赶快传福音，加快速度传福音，要准备好为基督受苦，并且要忍耐到底，直到主来。求主帮助我们为基督，为灵魂，为福音，为神国，为神的荣耀！兴起！火热！吃苦！忠心！

中国宣教学刊编委会

铭贤

2023年10月18日

中国教会的 宣教动员现状与展望

文 / 王再来

撮要：新冠疫情无疑是一场全球灾难，灾难本身并不是什么祝福，但是上帝因着祂对自己的国度扩展到万族的热情，依然使用祂在中国的子民拓展着祂的国度。本文就三年疫情期间的宣教动员状况，疫情结束并开放国际旅行初期的挑战和需要，重点来展望中国教会宣教动员的未来。

关键词：宣教动员 中国教会 宣教现状 宣教展望 全民宣教

一、澄清定义

动员

动员就是要唤醒、刺激、鼓舞、驱使、促进、激励、支持人们朝着某个特殊的行动努力。动员这个词来源于英文的“Mobilize”，“动员”这个词在英文中是个传统的军事用语，它指的是资源、士兵、武器及供应品向战场调动的整个过程。没有战时的调动工作，士兵们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战役打不响，战争就不会胜利。动员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部分军队中，每一个在前线征战的士兵背后，都有 10 多个人在物资供应、策略、技术、通讯、医疗等方面支持。动员不仅仅是鼓励士兵上战场，更是要全副武装准备他们在执行战斗计划中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成千上万在战士们背后默默提供支持和资源的人。¹

宣教动员

不同的宣教动员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义，以下是一些不同的例子：

宣教前线 (Mission Frontiers, missionfrontiers.org)：宣教动员是一个运动，可以指圣灵将大使命的信息、异象和策略逐步推广到所有不同的事工实体（不管是本地事工、宗派、机构、教会网络、国家级福音派网络或宣教协会）。然后，作为全心全意献身于耶稣的自然流露，祂激活每一位成员，让他们在分配的宣教角色中发挥作用，以一种可传递的方式将宣教动员传播到其他地方事工。²

海外基督使团 (OMF, omf.org)：宣教动员是邀请大家使用上帝赐予的恩赐，参与上帝正在做的事情。³

全球宣教动员行动 (GMMI, globalmmi.net)：如果把握得当，宣教动员自身就是一项事工实体，是宣教运动中的一个重点学科（或领域）。它需要通过深入思考、神学化，产生圣灵引导的、合乎圣经的培训、工具和策略⁴。

1 引自《起来，动员吧》第一课“动员是什么？”，wanzuwanmin.com，2014年第一版。

2 引自：<https://www.missionfrontiers.org/issue/article/developing-mission-mobilization-movements-in-local-ministries#:~:text=Mission%20Mobilization%20Movements%20can%20be, strategies%20of%20the%20Great%20Commission.>

3 引自：[https://omf.org/us/what-is-missions-mobilization-anyway/.](https://omf.org/us/what-is-missions-mobilization-anyway/)

4 引自：<https://www.globalmmi.net/what-we-mean-by-mission-mobilization.>

国际动员力量 (SMI, simplymobilizing.com) : 创始人麦斯 (Max Chismon) 把动员分为先知性动员和使徒性动员, 先知性动员也被称为一阶动员或总动员, 是为了帮助神子民认识上帝的使命和自己的使命, 建立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 使徒性动员包括二阶动员或具体动员, 指的是具体的参与宣教事奉的一些培训和途径, 例如加入某宣教机构等, 同时使徒性动员也包括三阶动员或实地动员, 是指将受过培训的人战略性地部署在实地宣教禾场中, 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和关怀等。⁵

大使命动员中心 (CMM), 2023 年改名为“通过” (VIA, vianations.org) : 基督的教会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征战。宣教动员, 简言之, 是指认识耶稣的人将福音带给所有不认识基督的人。宣教动员的目标, 是帮助全世界的基督徒看到耶稣“去, 使万民做门徒”的命令是对每一个人而发的。作为“动员者”, 我们想打开信徒们的眼睛, 使他们能够看到, 除了成为“战士”或者全时间的宣教工人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方法能够参与到大使命的工作中去。⁶

综合以上的定义, 本文提到宣教动员时, 意思包含了呼唤神的子民回到神对万族的心意当中的所有行动。

传统和非传统的宣教士

传统宣教士指的是教会直接差派或通过差会差派到禾场的专职宣教士, 一般在禾场继续使用宣教士的头衔; 非传统宣教士包含那些被“有形”和“无形”教会或差会差派, 在禾场上通过不同的职业、营商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的宣教士。

CPM 微型教会倍增浪潮 /DMM 门徒倍增浪潮

通过学习并顺从神的话, 倍增“门徒造就门徒”和“领袖发展领袖”, 使当地人带领的本色化教会不断快速地倍增新的教会在自己的群体中, 这些新的门徒和教会作为基督的新肢体不断活出神国的原则, 以转化他们的社区。

当这些具再生力的教会不断建立新的教会, 以致产生第四代的教会时, 这时候一个浪潮就开始形成。第一代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 但是一旦开始, 我

5 总结自: <https://simplymobilizing.com/the-three-levels-of-mobilization/>.

6 引自《起来, 动员吧》第一课“动员是什么?”, wanzuwanmin.com, 2014 年第一版。

们常常看到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年会出现第四代的教会。往往这些浪潮会继续在其他地方产生新的浪潮。

二、现状

本来阻断大家互相见面并“暂停”各项宣教工作的疫情，却促成了全民线上见面的局面，“加速”了线上的连接和各项宣教事工的发展。

宣教动员课程在疫情期间“上线”以后，大大倍增了受众群体，越来越多的宣教动员者被兴起，越来越多的教会认识到神对万族的心意，以致于一场宣教动员的浪潮史无前例地在中华大地开展起来。

各地的线上联祷祭坛也不断建立起来，尤其是为宣教祷告的定期线上祷告会也不断增加，有的是每周一次，多数甚至是每天一个小时的祷告，各地的动员者和宣教士们得以在不同的祷告会分享宣教信息，拉近了人们与普世宣教的距离，并加深了宣教动员的力度。

不同的宣教动员大会也得以在这样的情形中大规模地、更频繁地开展起来。人们在自己的卧室就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宣教专家和实践者的分享，许多人被动员起来，也有许多被动员起来的教会在疫情期间仿佛接受了一个全方位的、密集型的宣教教育。

线上的跨文化宣教训练、宣教资源的共享和宣教学学位线上获取等方面也不断地增加，使许多有心参与宣教的人士感受到了什么是资源的触手可得。

宣教专家和宣教领袖们也自发组织起来，开始线上的研讨会、宣教策略会议和伙伴关系会议等，线上的联合宣教行动也广泛开展起来，理论提升和疫情间歇期间的实际行动都得以加速进行。虽然疫情期间多数人不能出境，但是国内的族群工人进入的速度和数量比疫情前加倍不少。

随着疫情的结束，国际旅行逐渐开放，线下活动增多，许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模式逐渐发展起来，许多不同的宣教事工创意性地开展起来，疫情期间预备的许多宣教策略，在疫情后也开始实践起来。

以上是从笔者有限的视角对疫情期间中国教会宣教动员和后续事工的总结，因为安全等原因，无法一一列出事工的名称和具体的案例，但是有目共睹的是，神在疫情中加速了祂使用中国教会进行的国度拓展事工。

三、挑战

疫情期间宣教动员的加速固然是好的，但是有时候过快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对关系的忽略；对疫情封锁对心理造成的创伤的忽略；快速放大了一些人的恩赐，但忽略了全人发展；过快地开展一方面的工作，而忽略了整全的宣教生态系统的建设等等。

随着疫情的结束，人们想快速回到疫情前的常态，但是我们却面对着一个变化了的世界：

——宣教资讯的快速传递，让人们从“资源有限”的时代进入了“时间有限”的时代。

——接踵而至的线上活动的“红红火火”对比着线下行动的“冷冷清清”。

——有的人在不可开交的线上活动中忙的忘乎所以，有的人则无所事事地天天刷着短视频。

——国内信仰环境恶化，人们本来在线上找到了出路，但是很快又面对线上的打压，许多人也不再参加线下聚会，中国教会的有形表达形式是什么？宣教动员的空间在哪里？

——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模糊着像“教会”、“差会”、“宣教士”、“神学院”、“未得之民”这样的概念，宣教动员到底要动员谁？动员去哪里？线上可以宣教吗？

——神把宣教使命给了祂的全球教会去合一完成，但国内教会联结全球教会属于“涉外”，如何避免？

——教会本该是支持宣教最稳固的后盾，但是为什么中国宣教士持续面对教会解散、供应被停止的风险？

——宣教动员作为一项在中国时代性的事工和浪潮，何以对诸多的教会带来的竟是破坏作用？

——为何许多宣教机构和禾场依旧在面对着工人荒？……

挑战是不胜枚举的，一时也无法全部找到对策，但是我们需要一些行动，“开始”反思和评估过去的宣教动员行动，展望并建立一个相对健康的、整全的宣教生态系统。

四、展望

借着梳理过去的宣教动员路径，从宣教士主导的动员，到宣教机构主导的动员，发展到教会主导的动员，我们可以展望中国教会未来的动员方向和路径，笔者无意做出一个宏大的架构，来指引中国教会的宣教动员，只是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帮助大家一起来探索新局面下中国教会宣教动员的应有模样。

1、宣教士主导的动员

大多数教会弟兄姐妹听到宣教动员的时候，就会想到历史上或现代一些去到遥远的地方的宣教士们，过去的宣教动员的主导者确实也是这些英雄宣教士们，或者一些禾场端的专业差会通过宣教大会招募工人，许多工人都是离开了自己的母国，去到了遥远的异国异族，当时的时代，地理障碍还是形成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其实主要不是中国宣教士进行动员，多数是以美国、韩国的宣教士进行的动员，所以过去这样的动员模式给大家留下了“必须出国才是宣教”的印象。当前随着中国宣教士越来越多进入国内和国外禾场，相信更整全的宣教画面会逐渐传回到中国教会中，这些传统或非传统的宣教士的动员也会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宣教机构主导的动员

“宣教机构”是那些信仰自由的国家发展出来的词汇，在信仰自由的国家，可以合法地注册一个有自己的场地和银行账户的组织，有别于已注册的也有自己的场地和银行账户的教会组织。宣教机构是为了外展而存在的，所以必须不断扩张，这样就需要教会不断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但是很多教会也是机构化运作的，所以宣教机构和教会之间常常出现张力。

中国的“宣教机构”形态就很不一样，首先不能有自己注册的合法的场地和银行账户，虽然有一些自由国家“引进”过来的宣教机构，包括宣教动员机构，原本可以勉强在中国维持其“中心化”运作形态，但是疫情和政策的原因，大部分也都被清理，其事工正在逐渐融入中国教会的生态当中。

另外一些本土“宣教机构”大都是传统中国教会或教会网络发展出来的具有外展功能的组织，本质上还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但也是因为其独特的名称和

有形的组织，容易导致教会把外展责任全部加到这些组织身上，影响教会整体的宣教参与，所以这些组织的形态还需逐渐更多地进行转变，例如组织的同工成为“动员者”或“协调员”，而不是“办事员”，把原本自己担当的宣教责任“协调”给教会整体来参与。也要调适自己的行政和财务架构，使其更加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以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特殊的处境中。这样也就促成了宣教机构对教会的助力和动员作用，而不是竞争关系，宣教机构主导的动员也可以更切合中国教会的土壤，以渐进地、整全地、健康地陪伴和引导中国教会，而不是带来不良竞争、拔苗助长或良莠不齐的发展。

3、传统教会为本的动员

近年来，许多神学家和宣教学家提出“教会为本的宣教”，或称“宣教型教会”或“大使命教会”的动员，因为“教会”才是神在这个时代做工的首要管道。但是实际落实的时候，大家还是把“教会”理解为了西方传统的那种机构化运作的教会，所以，在教会为本的宣教动员过程中，宣教成为了教会事工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教会整体的参与。例如，中国某知名宣教动员团队的异象过去是“全教会总动员，在全球福音化工程中，做意义深远的参与”，后来修订为“看到所有神的子民，过与神同负使命的生活”，虽然从“参与工程”转为了“过生活”，但是其动员框架还是借着鼓励参与传统的“宣教事工”来参与宣教，而不是动员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动员，往往增加了传统教会的事工数量，而不是把宣教整合在全教会之中，也难以形成长期、健康、整全的宣教生态。

4、动员“全民宣教”

“全民宣教”是一个谈了许多年的话题，但是能够深入理解并应用出来的不多，这里列举两种很有见地的理解和应用。

1) 安平牧师，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的执行主任与宣教牧师，在《举目》的一篇文章中⁷，从互联网 WEB1.0、WEB2.0 向 WEB3.0 的发展，延伸出了教会和宣教的三个阶段，下面从原文章整理一些主要定义给大家做对比。

互联网 WEB1.0: 内容创造者很少，绝大多数使用者只是作为内容的消费者。其主要特点是网站提供内容，使用者阅读内容。

7 引自《举目》“與其被動升級，不如主動更新——迎向宣教 3.0”，<https://behold.oc.org/?p=57014>。

互联网 WEB2.0：允许使用者自主生成内容，与网站和他人进行交互。

互联网 WEB3.0：主要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并且每个人在数位世界都有权拥有并控制自己的身份，以及承担责任。

教会 1.0：为初代教会在被逼迫中形成的小教会模式。

教会 2.0：是指有架构，有组织，有堂点的教会形态。

教会 3.0：就是经历对超大教会的反思后，对“小教会”模式的主动回归，也符合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呈现了重关系、重真实、重多元、重过程等特征。

中国教会 1.0：指在逼迫的大环境中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聚集的时代和模式。

中国教会 2.0：随着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教会进入写字楼的半公开聚会。

中国教会 3.0：是指疫情中发展出来的线上线下融合，多点分散聚会的“小教会”模式。

宣教 1.0：宣教主要由教会领袖和神职人员进行的时代。

宣教 2.0：当教会经过成长，开始差派职业宣教士进行宣教，到今天，宣教 2.0 的模式，仍然是大部分教会宣教的主要模式。不管是宣教 1.0 还是 2.0，宣教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宣教代表制。绝大多数信徒能够参与实际宣教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很低。他们只能用金钱、祷告在后方支援。宣教作为信徒的基本使命，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地实践。

宣教 3.0：人人宣教，具有以下特征和趋势

- 宣教成为每位信徒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人可参与的。教会对信徒的教导也不只局限于教义、神学，需要更加重视宣教。
- 在宣教的教导中，要特别注重合宜的信仰公共性表达，即公共神学的反思。信仰要避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 教会和信徒要重视对新媒体和媒体特质的认识，以及相应的传播伦理。避免成为假消息乃至阴谋论的传播者，挑动对立拉仇恨，伤害基督徒作为“美好真实”“和平之子”的见证。
- 虚实融合不仅是未来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新常态，同样也是宣教的新模式。实体短宣与虚拟长宣的有机融合，将弥补短宣和长宣各自的诸多缺点，提高宣教工作的效率和果效。

- 在虚实融合方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促使资讯的传递更具体验化，对信仰的见证和传播在艺术性和技术性上，带来更深的挑战。这需要在内容、传播、技术和文化上，有符合“高度处境化”的传播。
-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会给宣教（特别是创启地区的宣教）带来革命性的发展，但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伦理规范，基督徒在这方面应该积极参与。这是使用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职场宣教。

2) 宣教动员专业机构“大使命动员中心”(CMM), 2023年更名为“VIA”(“通过”的意思), 以下是此机构“前线动员”的一个新范式的介绍：⁸

多年来，动员者被描述为那些想去未得之民，但“愿意留在自己的文化中动员他人”的人。但在2010年，我们组织的一位新领袖开始根据全球宣教差派的不平衡重新定义动员。虽然现在80%的福音派教会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但75%的宣教士仍然来自西方。考虑到这些数字，我们西方教会必须像对待我们的宣教士一样，对我们的动员者采取战略性的态度。如果我们要求宣教士去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未得之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求动员者去最需要动员的地方（未差之民）。这一理念将CMM转变为一个差派机构——不是差派宣教士，而是差派动员者。2011年，CMM向中东地区派出了第一支前沿动员团队，此后又继续向世界各地福音派人口众多的战略地区派出动员团队。

我们在开创“前线动员”概念的同时，也开始了解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动员的必要性。“大规模动员”工作的重点是宣教教育、异象塑造和号召基督徒参与普世福音化事业；但通过门徒训练进行的动员是以小组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的，重点是共同活出普世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并将自己倍增为动员者。在CMM，我们认识到这两种动员方式的价值。虽然我们继续实行大规模的动员和异象传递，以便广泛撒种，为我们的禾场动员者打下基础，但我们也觉得神呼召我们专门从事以门徒训练为基础的动员。我们的主要重点是倍增普世基督徒、动员者和前往者。

8 引自《我们的故事》<https://www.mobilization.org/about/our-story/>。

五、总结

笔者从事宣教动员 7 年后，也意识到自己逐渐成为了宣教动员的“办事员”，所以就慢慢调整角色成为“国度策略协调员”，主要找寻并弥补宣教大图画中缺失的部分。协调过程中，认识并了解了全球的宣教现状、突破和瓶颈。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全球一个崭新的宣教植堂的景象，过去在中国八十年代产生的教会繁殖运动，如今已经席卷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今被称为“CPM 微型教会倍增浪潮”或“DMM 门徒倍增浪潮”，这些草根运动兴起的教会，从一开始就是秉持着“门徒倍增门徒”、“教会倍增教会”的使命观，并一直找寻神的国还没有临在的地方，以在其中掀起浪潮。所以，此模式基本不需要专门的宣教动员工作。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全球组织“2414”总结了许多在全球的 CPM 浪潮情况⁹，该组织近几年看到了数以千计的这样的浪潮在全球兴起，并计划 2025 年前在全球剩余的未得族群中全部“启动”CPM。虽然这些 CPM 浪潮中时有“数字导向”或“反智”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其发展很像初代教会的样式，教会历史学家沙夫这样描述那个时代：¹⁰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使徒时代之后，直到中世纪才开始提到伟大的宣教士的名字……在中世纪之前，没有任何宣教团体，没有任何宣教机构，没有任何有组织性的行为；然而在约翰死后不到 300 年的时间里，当代表文明世界的罗马帝国名义上整个都是基督教化的……虽然没有专业的宣教士毕生致力于这项具体工作，但每一个会众群体都是一个宣教社群，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宣教士，他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引领他们的同胞来认识并接受基督。”

自君士坦丁于公元 313 年颁布米兰诏书之后，以希罗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教会模式成为主流，虽然经过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但是直到威廉克理掀起更正教宣教浪潮之后，新教徒在一些福音未及之族群宣教过程中，随着“自治、自养、自传”的植堂原则的强调，这种初代教会的模式才再次展现给世人，也挑战着原来机构化、官僚化、内卷化的西方范式的教会，促其进行转型。宣教动员就是在

9 更多资讯参见 <https://2414now.net/>。
10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hilip Schaff, 2006.

这个过程中出现，也就意味着宣教动员就是为了这些西式教会存在的，鼓励其从圣经、历史、文化和策略的角度重新调整自己的“教会论”，并将“救恩论”和“宣教学”进行整合，帮助其中自我中心的“典型基督徒”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从“上帝服侍我”到“我事奉上帝”，活出与神同负使命的生活方式。

另外，当代一位宣教植堂者著作的一本书¹¹中，详细介绍了西方范式到门徒倍增浪潮范式需要的范式转换，总结在下表中，可以作为我们现今宣教动员的评估工具。

领域	西式传统	DMM
1.组织认同	地点	人
2.进入世界	来	去
3.组织原则	关注差异	关注合一
4.组织结构	上下层阶	复合网络
5.自我认知	信徒	门徒造就者
6.事工目标	个人得救	倍增门徒
7.主要方法	教授	教练
8.成长策略	由快到慢	由慢到快
9.关键指标	信徒出勤率	门训的质与量
10.事工载体	教学项目	人际关系
11.聚集方式	会众堂点仪式	随处可见小组
12.领袖特点	专职为主	带职居多
13.成熟指标	知识全备	基督形象
14.恩赐装备	教师牧师	五重执事
15.管理方法	控制	释放
16.动力来源	外部吸引	内在激励
17.入会过程	层层筛选	筛选门徒
18.文化影响	进入教会文化	教会进入文化
19.成员要求	守组织规矩	顺服神的要求
20.达至成熟	他人喂养	自我喂养
21.信仰模范	少数教导	人人教练
22.互动模式	知识互动	督导顺服
23.接触新人	延迟	立即
24.信仰错误	隐藏	暴露

11 *In The Way-Church as We Know It Can Be a Discipleship Movement*, Damian Gerke,2020.

南非著名的宣教学家和神学家大卫·博许 (David Jacobus Bosch), 在他的主要著作¹² 最后的部分, 阐述了如何建立一套落实相关的宣教学, 列出了今天正在进行的宣教典范转移中当具备的元素, 详细论述了宣教即是: 教会与人的相交、神的宣教、传达神的救恩、寻求正义、布道、处境化、解放、进入文化、共同见证、神所有子民的服事、向别种信仰的人作见证、神学、在盼望中行动。个人感觉, 按照作者观点, 宣教基本上就是圣经中神吩咐他的子民所作的一切事情的总和。这样的话, 虽然跨文化的宣教士还是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度和筛选机制, 但门徒和宣教士、教会和机构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了。

当然, 历史的事实是, 初代教会没有停留在草根运动阶段, 后来的国教化等一系列的发展有其历史意义, 更重要的是有神的主权干预——神允许了西式教会上千年的存在, 证明西式教会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知道没有一种植堂模式是完美的, 中国家庭教会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了初代教会模式到西式教会的转变, 当初也是因为看到了初代教会模式的诸多问题才接受了这样的转变, 但如今, 我们也同时意识到了转为西方范式后的诸多弊病。神在过去十年在中国教会开始了宣教动员浪潮, 纠正着西方范式带来的诸多问题, 也随着外部宗教政策的恶化, 似乎在强逼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或许是神在促使我们走出一条新的路, 既不是初代教会的样子, 也不是西方范式的模样, 是否如安平牧师所述的“教会 3.0+ 宣教 3.0”的样式?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神在这个世代, 如何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 2: 14),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 9: 7) 🌐

六、参考文献及作者介绍

1、参考文献

《起来, 动员吧》, 大使命动员中心, 2014。

《與其被動升級, 不如主動更新——迎向宣教 3.0》, 安平, 2022。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hilip Schaff, 2006.

12 《更新变化的宣教: 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David J. Bosch, 1996。

In The Way-Church as We Know It Can Be a Discipleship Movement, Damian Gerke, 2020.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David J.Bosch, 2011.

2、文章引用作者介绍

安平牧师：美国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宣教牧师。2001年开始在媒体机构服事，2013年加入普世佳音，专注于新媒体事工的开展、推动和研究，着有多篇专文。安平牧师为“话语论坛”发起人，北美网络宣教论坛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也是基督徒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游子新歌”丛书的出版人。

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 1819年1月1日-1893年10月20日），是一位出生于瑞士、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新教神学家和教会历史学家。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教学。

达米安·格尔克，是一位作家、领导力教练和学习/发展实践者，帮助领袖超越领导活动，实现卓越领导力。他还是教会门徒倍增浪潮战略和实施的领导者。他是国际教练联合会（ICF）和人才发展协会（ATD）的认证会员。

大卫·博许（南非语：David Jacobus Bosch，英语：David Jacobus Bosch；1929年12月13日-1992年4月15日），是南非著名的宣教学家和神学家。《更新变化的宣教：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此书于1991年出版，讲述后殖民基督教宣教。他是南非荷兰裔正宗（Dutch Reformed Church in South Africa）的成员之一。他在2013年4月27日的自由日中取得由南非总统颁发的猴面包树勋章（Order of the Baobab），以表扬他“无私地争取平等权益……和他对改善群体的贡献。”他的社运行动也反映了他与主流价值观对立的“非种族歧视”主义。

3、网络资源

CMM, <https://www.mobilization.org/about/our-story/>.

Mission Frontiers, <https://www.missionfrontiers.org/issue/article/developing-mission-mobilization-movements-in-local-ministries#:~:text=Mission%20>

Mobilization%20Movements%20can%20be, strategies%20of%20the%20Great%20Commission.

SMI, <https://simplymobilizing.com/the-three-levels-of-mobilization/>.

OMF, <https://omf.org/us/what-is-missions-mobilization-anyway/>.

GMMI, <https://www.globalmmi.net/what-we-mean-by-mission-mobilization>.

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

文 / 牧宣

撮要：差传在跨文化宣教事工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差传时，主要集中在像保罗、巴拿巴这样既成熟又有清楚呼召的宣教士的差派。另一种的差传方式却被现今的教会和宣教界普遍忽略，那便是《使徒行传》记述的提摩太的差派。提摩太不是以保罗那样的宣教士身份差派的，而是作为宣教领袖保罗的学徒及帮手差派的。提摩太这样的角色符合旧约的律法所揭示的神工人的成长。提摩太在宣教工场中的实际成长，见证了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的确有助于培养将来的宣教士，因为教会中能够差派的既成熟又有清楚呼召的宣教士（如保罗）是少的，但很多教会都有不少年轻的宣教志向者——提摩太。本文基于圣经分享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以及教会当为此采取的实际步骤。

关键词：差派 培育 宣教士成长 宣教参与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徒 16：1-3）

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教会拓展是透过成熟的工人完成的。同样，历来普世的跨文化宣教事工主要也是透过被召的宣教士来开展的。这意味着差传在宣教中的重要性。而我们谈到教会的差传时，更多提及和考虑的是像保罗、巴拿巴这样既成熟又有清楚呼召的宣教士的差派。教会也期待并非常为这样的宣教士能够兴起祷告。不过，另一种的差传方式却被现今的教会和宣教界普遍忽略，那便是《使徒行传》记述的提摩太的差派，就是本文要重点介绍的“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

1、教会举荐提摩太跟随保罗侍奉

当保罗来到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建立的路司得、以哥念的教会时，两间教会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们中间的一位年轻弟兄，他的名字叫提摩太。从“保罗要带他同去”的记述来看，路司得和以哥念弟兄们的称赞，不只是见证提摩太的美好生命，显然还有向保罗举荐提摩太之意，就是希望保罗将他带在身边服侍。保罗接受了他们的举荐，这样提摩太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跟随保罗服侍。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前 1：2）“我儿提摩太啊”（提前 1：8）“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后 1：2）——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像不分先后的保罗和巴拿巴同工关系（在安提阿教会中被描述为“巴拿巴和保罗”，这样的次序后来到宣教工场很快就变成“保罗和巴拿巴”），而更像属灵上的父子、事工上的师徒关系，尤其是提摩太加入保罗团队的早期。保罗和提摩太的师徒关系模式，主要体现在提摩太是在保罗的带领和教导下，边跟随、边学习、边服侍、边成长，后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保罗的同工，正如保罗说的“与我同工的提摩太”（罗 16：21）。像提摩太这样的宣教工人在宣教工场师徒关系中成长，正符合旧约的律法所揭示的神工人的成长模式。

2、利未人的侍奉年龄变化之启迪

旧约时代利未人到会幕侍奉的年龄，在《民数记》第四章中神明确要求为三十岁——“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民 4:46-49）。但到了第八章神的要求却为二十五岁——“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民 8:24-25）难道律法的要求更改了吗？显然不是（太 5:18）。那么，我们当如何理解神对进入会幕的利未人的年龄从三十降到二十五岁的这一变化呢？犹太拉比对此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解释——“利未人有为期五年的学徒期。”也就是说，利未人三十岁这一正式事奉年龄是不变的，但必须从二十五岁开始前来会幕，作为学徒跟着年长有经验的利未人学习侍奉，直到他们满了三十岁才正式任职，一直到五十岁退任。这样，在律法中神揭示的神工人的成长模式，就是作为学徒跟随成熟工人学习服侍和成长。这正是工人成长的普遍模式。（其实，从古至今从事技术性工种的工匠，几乎也都从学徒开始。）

利未人的侍奉年龄后来有了变化。大卫王临终吩咐，将利未人办理耶和神殿事务的年龄降到二十岁（代上 23:27）——“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代上 23:27），即利未人二十岁进入圣殿。大卫王的这一举措显然有它的理由。一是，跟圣殿规模有关。大卫既从神领受了圣殿的设计图（代上 28:11-19），就清楚知道将建成的圣殿规模，而如此规模的圣殿比起过去的会幕显然需要更多的侍奉人手。二是，跟大卫年代以色列的人口有关。到了大卫年代以色列人口大大增多，我们从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以及其他经文中可以知道这一点（撒下 24:2-3、8-9/撒下 11:8）。百姓的明显增多则意味着献祭人数的增多，这也带来圣殿需要更多的侍奉人手。神既在律法中明确规定除利未人之外的其他支派的人不可以进入神的殿侍奉，那么，解决侍奉人手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更多的利未人前来圣殿服侍。这也是大卫将利未人 25 岁进入会幕的年龄降到 20 岁的原因。当然，大卫深知 20 岁的人进入圣殿，不能像 25 岁的人那样成为法定学徒，更不可以像 30 岁的人那样正式任职，因为那会违反律法。为此，大卫为进入圣殿的 20 岁的利未人给出了新的定位——“他们的职任是服事亚伦的子孙”（代上 23:28）。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正式的侍奉者，也不是法定的受训者（学徒），而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大祭司。这里的“服

侍”一词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以利沙……服侍以利亚”（王下 3:11）。旧约圣经自己解释这“服侍以利亚”的“服侍”之意——“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王下 3:11）由此，大卫说的“服侍”与中文中的“伺候”类似。当然，20 岁利未人的“服侍”大祭司的职责还包括为大祭司做协助性的服侍（代上 23:28-23）。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希西家王的时代（代下 31:17、20），还是被掳归回后的以斯拉时期（拉 3:8），利未人都是从二十岁开始被数点进入圣殿，其服侍大祭司的职责也没有改变。

3、提摩太在宣教工场的成长历程

精通旧约的律法及历史的保罗（徒 22:3），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带领年轻提摩太的含义。显然他们是师徒关系，只是保罗没有直接用学徒或学生来称呼提摩太，而是用了更亲密的父子关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林前 4:7）保罗说的在主里的父子关系，在师徒关系基础上，还赋予了亲密的生命连接，就像父亲教导儿子、训练儿子一样。如此，保罗一路带领提摩太并且帮助他成长。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很好地反映了提摩太在宣教工场跟着保罗的成长历程。

首先，《使徒行传》中介绍提摩太为保罗的帮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徒 19:22）。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帮手”，最典型的就是跟随摩西服侍的约书亚：“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出 24:13）“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惟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出 33:11）“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出 11:28）“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书 1:1）就如经上所述，约书亚就是跟随摩西、并且在摩西的带领下服侍、成长的。这跟新约时代的提摩太在保罗的带领下服侍、成长是一脉相通的。有意思的是，新约圣经记述的第一个“帮手”，正好也是在宣教工场上，那人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一次传道旅程带上的称呼马可的约翰——“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徒 13:4-5/12:25）帮手，通俗地说是助手同工。这样，

提摩太既是作为学徒，也似乎作为帮手（助手）在跟随保罗的实际服侍中学习侍奉的。

其次，提摩太是在保罗的带领和教导下服侍的。圣经用了“打发”“领命”等词来描述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事工上的带领关系——“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记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林前 4：17）“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腓 2：19）“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徒 17：15 中）保罗对提摩太的带领，包含在实际事工上的教导，就如保罗所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前 3：14-15 上）可以这样说，提摩太在宣教工场中的成长和服侍离不开保罗的带领和教导。

再其次，保罗向众教会介绍提摩太时称他为他的同工、是与他同工同劳的——“与我同工的提摩太”（罗 16:21）“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腓 2：22）“同工同劳的人。”（林前 16：16）保罗对提摩太的以上称呼，表明在保罗的带领下提摩太已经成熟，经多年的成长如今成了与保罗同工同劳的人。

此外，保罗还用兄弟来描述提摩太。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称提摩太为他的兄弟，而且在他写的三封书信的署名中加上了“兄弟提摩太”——“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林后 1：1）“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门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西 1:1）用兄弟称呼的共同署名，以及在他书信中对同工兄弟称呼来看，保罗称呼的兄弟不应只是主内弟兄姊妹意义上的兄弟，而应该含有在宣教工场这艰难和满有危险的属灵战场中一同摸爬滚打、经历考验而成为彼此交命的属灵战友之意，正如保罗描述他的同工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时说的那样——“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罗 16：3-4 上）

最后，提摩太成为了保罗的属灵传承者。这传承不是事工职位上的传承，而是信仰、真理和见证上的传承，正如保罗说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 3：14-15）“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后 1：13）“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1-2）由此看来，承接普世宣教大业的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来自于现在的年轻提摩太，正如摩西死后他的帮手约书亚承接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职责一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书 1：1-2）

4、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

无论是律法揭示的工人成长模式，还是在宣教工场的提摩太的成长实例，都表明：无论是教会还是宣教团队，应该有策略地培养那些尚未成熟的年轻提摩太，越是成熟的事工团队更应该如此。而那些被教会推荐的提摩太们，作为学徒和助手，跟随成熟的宣教士学习服侍，即“**边跟随、边学习、边服侍、边成长**”。如此说来，将来的宣教士的成长应在宣教工场。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下面简单分享提摩太式的教会差传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1) 教会甄选有生命见证，在教会中积极参与服侍，且有跨文化宣教心志的年轻同工或弟兄姊妹（单身 / 夫妇）。他们不一定已经有长期宣教的清楚呼召，因为他们不是以宣教士身份差派，而是作为宣教士的学徒和帮手差派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很强的恩赐也不要紧，因为提摩太的传道恩赐就是在弟兄们举荐提摩太之后，教会差派他，保罗和众长老为他按手时获得的，正如保罗说的——“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提前 4:14）“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后 1：6）这段经文描述的保罗和众长老的按手，我们可以理解为教会对提摩太的差派礼。

2) 教会是提摩太的差派方的话，那么，宣教工场团队就是提摩太的接收方。在提摩太式的教会差派中，必不可少的是要有接收提摩太的工场团队，特别是能够带领提摩太的保罗——成熟的宣教领袖。而带领提摩太的宣教领袖必须是生命

成熟且已在宣教工场有多年服侍经验的宣教士，而且还要具备带领团队或同工的经验及能力。这样的宣教领袖才可以带领提摩太，并且在实际的服侍过程中手把手地教提摩太、帮助提摩太成长。初到宣教工场的提摩太作为学徒和助手，若是能够在位生命成熟、经验丰富且有领导力的领袖的栽培和带领下谦卑受教，“边跟随、边学习、边服侍、边成长”两三年时间，这对他将来无论是作为宣教士还是参与宣教服侍的同工，都大有造就，甚至终身受益。

3) 教会正式差派提摩太之先，应了解提摩太个人的心中负担，还有宣教工场及宣教领袖情况。经多方的交通和祷告，教会、提摩太、工场团队（宣教领袖）三方约定提摩太的学徒期。这学徒期是提摩太在宣教工场的受训期，也是教会的差派期。提摩太的受训期定2-3年为宜。当提摩太的受训期满时，教会在听取提摩太和宣教领袖的意见后，与提摩太一同决定：提摩太要继续留在本宣教工场中作长期宣教士，还是差到另一宣教地或工场团队，或是回到教会专职或带职服侍。至于提摩太，在宣教学徒期实际的服侍及学习中，可以明确自己的宣教呼召或将来侍奉方向。

4) 一间教会差派提摩太，有时会有难处，经济上的支持不足是通常遇到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和其他与本教会有连接或具相同宣教负担的兄弟教会的支持；若是可以，还可以一同差派。《使徒行传》记载的提摩太的差派就给我们这样的榜样事例。由“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段经文来看，差派提摩太的不只是提摩太所在的城路司得的教会，还有以哥念教会的参与。因此，在提摩太的差派上多间教会联合参与，这是可行的策略，差派教会应积极考虑。这种差传上的联合参与，带来教会间的宣教联动。而这样的联动，不应局限在提摩太的差派上，还可以包括差派宣教士，以及各样宣教事工的参与上。●

附文：教会宣教参与度的调查及简析

当前中国教会的宣教参与度如何？这几年《把握时机》课程开展得非常红火，疫情期间跨地区线上的祷告祭坛也兴起来，其中一直持续下来的更多的就是为宣教的祷告祭坛。不仅如此，很多地区的教会联合开宣教年会。很明显，宣教事工在中国教会中兴起。那么，中国教会的宣教参与真的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普遍的吗？实际的宣教参与究竟如何？带着这样的目的，笔者针对教会牧者做了教会的宣教参与的简单调查，整理调查结果并做出了简析。

1、关于接受调查的教会

1) 调查对象

填写调查表的牧者基本上是随机选的，并没有针对特定的牧者或教会群。收集到的调查表共25份，接受调查的教会遍布在中国将近十个城市。

2) 教会建立时间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接受调查的教会，88%的教会其建立时间在5年以上，可以说大多数教会是经成长相对稳定的教会。

教会建立时间	不到5年	5-9年	10-14年	15年及以上
所占百分比	12%	36%	28%	36%

3) 教会牧者的年龄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接受调查的教会的牧者（主任牧师），其年龄全部在30岁以上，其中30-39岁的牧者占88%，60岁以上只占12%，这表明接受调查的教会牧者普遍是中青年牧者，其中中年居多（40-59岁占64%）。

教会牧者年龄	30岁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所占百分比	0%	24%	28%	36%	12%

2、关于教会的宣教动员

1) 教会有没有定期的宣教主题的讲道?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 不定期占48%, 一个月至一年的周期中都没有者超过20%, 这说明教会普遍没有在主日讲道中规划出宣教主题的分量极低, 这是教会宣教动员的严重缺欠, 教会应当重视的。

宣教主题讲道周期	无	一个月	一季度	半年	一年	不定期
所占百分比	12%	8%	16%	12%	4%	48%

2) 教会有没有参加过《把握时机》等宣教动员课程的学习?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 只有牧者参加的教会占12%, 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的教会占48%, 教会鼓励会众参加《把握时机》等宣教动员课程的占60%。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 一半以上的教会鼓励会众参加宣教动员课程, 将近一半的教会其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 这些说明宣教动员课程已经普遍“渗透”到教会之中。

宣教动员课程	无	只有牧者参加	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	教会鼓励会众参加
所占百分比	0%	12%	48%	60%

3) 在教会的聚会中有没有为宣教士及宣教事工(包括未得之民群体)代祷?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 每月为宣教祷告的教会占60%, 这里包括每天或每周祷告的教会, 而一季度、半年或一年为宣教祷告的教会都不超过4%, 不定期的占24%。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 若不是教会至少每月一次为宣教祷告, 就基本没有专为宣教的祷告。

为宣教祷告	无	一个月	一季度	半年	一年	不定期
所占百分比	8%	60%	4%	0%	4%	24%

4) 教会有没有参加过宣教大会（包括宣教年会）？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参加宣教大会或宣教年会等，只有牧者参加占36%，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32%、教会鼓励会众参加占28%，没有参加占16%。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参加宣教大会或宣教年会最多的还是教会的牧者层面。

参加宣教大会	无	只有牧者参加	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	教会鼓励会众参加
所占百分比	16%	36%	32%	28%

3、关于教会的宣教参与

1) 教会有没有认识或支持的宣教士？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被调查的所有教会的牧者都认识宣教士，其中牧者个人性认识宣教士但没有与教会连接的只占24%，半数以上的教会“有教会定期或不定期祷告的宣教士”（占56%），“定期或不定期地经济上支持宣教士”的教会高达84%，教会请宣教士分享过的占76%。这样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的教会与宣教士是保持连接的。

教会有认识或支持的宣教士	无	有牧者个人性认识的，但没有特别联系	有牧者认识的，保持一定的联系	有教会定期或不定期祷告的宣教士	有教会定期或不定期经济支持的宣教士	教会请宣教士分享过（线上或线下）
所占百分比	0%	12%	12%	56%	84%	76%

2) 教会有没有到跨文化宣教地访宣或短宣？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被调查的每间教会都参与过跨文化的访宣或短宣，其中牧者去过跨文化宣教地和教会组织过跨文化宣教的教会占60%以上，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的占36%，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到跨文化宣教地访宣或短宣在教会中已经相当普遍，不仅牧者自己参与，也组织信徒参与，教会的同工及会友在跨文化访宣或短宣方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且与这方面的事工有多方连接。

教会参与访宣或短宣	无	牧者去过	同工及会友自行参加	教会组织过
所占百分比	0%	60%	36%	68%

3) 教会有没有差派跨文化宣教士?

宣教事工主要是透过宣教士开展，所以差派宣教士是跨文化宣教的重中之重。调查结果表明（如下图）：60%的教会没有差派宣教士，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占40%，其中一半是只差派一位宣教士（占总教会20%），差派两人和三人及以上的教会分别占教会的12%和8%。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教会的宣教事工不只停留在普遍的献祷、献金层面，开始走向献人层面，而且差派宣教士已经不是少数教会。

教会差派跨文化宣教士	无	1人	2人	3人及以上
所占百分比	60%	20%	12%	8%

4) 教会有没有在培育宣教志向者（提摩太）?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没有培养宣教志向者的教会占40%；但挑选宣教志向者（提摩太）并培育的教会占56%，这个比例高于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比例（占40%），这表明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意识和努力普遍在提升。

教会培育宣教志向者 （提摩太）	无	已挑选提摩太， 但不知道如何培育	已挑选提摩太， 正在培育中
所占百分比	36%	16%	56%

5) 教会的宣教奉献占奉献中的比例。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每一间教会都参与宣教奉献，其中宣教奉献在教会总奉献中所占的比重为“5%以上、20%以下”占68%（“5%以上、10%以下”占36%、“10%以上、20%以下”占32%），最为普遍；比重超过20%的占8%，这也表明不少教会大力参与宣教奉献。另外，对比上面的“有教会定期或不定期经济支持的宣教士”占84%，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所有宣教奉献用于支持宣教士，有些教会的宣教奉献是支持宣教事工的，可能包括支持本教会的短宣、访宣等。

宣教奉献的比重	无	5%以下	5%以上、10%以下	10%以上、20%以下	20%以上
所占百分比	0%	24%	36%	32%	8%

6) 教会有没有与宣教士互动?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所有教会都与宣教士有互动,但经常互动的占32%,不定期互动占52%,很少互动占16%。这样的统计结果也提醒教会,教会应将不定期互动转为定期互动,这样大多数的教会就能与宣教士及宣教工场连接更为密切,这也会促进教会宣教更为积极的参与。

教会与宣教士的互动	无	很少有互动	不定期地互动	经常互动
所占百分比	0%	16%	52%	32%

7) 在宣教上教会有没有和其他教会或机构配搭及合作(联动)?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在宣教上教会与其他教会的配搭(联动)非常活跃积极占84%,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中国教会宣教上的一个特色。另外,与其他机构有配搭占48%,这表示教会有待提高与宣教专业机构的连接和配搭。

教会在宣教上的配搭	无	与其他教会有配搭	与其他机构有配搭
所占百分比	12%	84%	48%

4、关于教会宣教参与时间

1) 教会的跨文化宣教参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图):教会参与跨文化宣教的时间,新冠疫情前高达80%,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前,教会在宣教上已经普遍迈步。尽管新冠疫情后,《把握时机》等宣教动员课程普及到众多教会,跨教会的宣教祷告祭坛也兴起,宣教大会、年会不断,但统计结果表明,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教会宣教分水岭。

教会参与跨文化宣教时间	还没有参与	新冠疫情前	新冠疫情后
所占百分比	8%	80%	12%

当前中国教会 宣教现状与展望

——一个跨文化宣教士的简析

文 / 亚伯拉罕

撮要：该文作者是一位长期驻守跨文化宣教工场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他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也始终保持与国内教会联结，参加诸多会议、研讨和具体事工。重要的是，他长期坚持跟踪观察当代中国教会之参与普世宣教圣工的发展进程，坚持跟进国内一些宣教团队和差会的事奉与事工，持续关注一些身在各国各族群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之成长与成熟。此文即是在作者长期观察与思考的前提下，对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与展望作出的简要分析与展望思考。

中国教会之大，宣教现状之复杂，使得此主题难以不足万字之文章，能以阐明。但是本文作者之对中国教会的感情，宣教经验的丰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属灵的前瞻性建议，都成为文章的焦点。盼望本文引发共鸣，使各位读者满有收获。

关键词：宣教动员 差传机制 宣教释经 伪专家危机 差传机遇

席卷全球，震动普世，为期三年的新冠疫情终于过去，而善于忘记的人类重新开始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国内开始报复式消费、旅游，国际旅行大大开放。包括坚持封锁日久的北非小国突尼斯，亦于10月7日宣布中国公民免签政策重新开启。

进入2023年，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超过一年仍在持续，4月15日，我抵达埃及的当天，邻国苏丹又爆发内战，而刚刚过去的10月7日安息日，以色列民众还在住棚节的节日中，巴勒斯坦“哈马斯”突然发起大规模袭击以色列的战争，非洲大陆之尼日尔和加蓬也相继发生政变。

土耳其于2月6日发生7.8级大地震，9月8日，摩洛哥发生7级大地震，10月7日，阿富汗连续发生两次6.2级强烈地震。受连续不断的台风影响，中国华北、华东、华南，包括香港，都相继出现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水灾害。今年可谓多事之秋。

在这些情势、环境与背景之下，当前之中国教会又开始面对新一届政府带来之愈加严厉的处境挑战，疫情三年期间中国教会在宣教方面，排除各种难处与障碍，竭力推动宣教祷告祭坛、各种宣教动员、宣教训练、研讨会议等等。普世宣教之需要，仍为当前中国教会之重要挑战。那么，当前中国教会之宣教现状如何呢？身在跨文化宣教工场的笔者，愿意尝试从一个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士的角度，将自己的些许观察与思考，与大家共飨。

一、宣教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的状况如何？关注中国教会宣教的明眼人都能看到，甚至一览无余。笔者在此不会详细缕述，只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力求客观与平衡，采鼓励之态度，简略总结如下。

1、积极层面

1) 愿意参与，全力推动

众所周知，中国教会在大疫三年的受限环境中，突破局限，凭信差传。尤其在推动宣教祷告祭坛事工，其中以全国性之“百年祷告、百年宣教”联祷祭坛

为主要代表。而宣教训练方面,也进入到空前的热潮之中。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把握时机”学习的浪潮,据统计,已经有超过十数万计之热心宣教的肢体受过训练。

在宣教奉献方面,宗教政策的压力,使得教会在租赁物业方面节省出大笔的开支,教会硬件投入减少幅度很大,于是就有更多的经济转向支持宣教事业。虽然三年疫情,中国教会的肢体们生活也都相当不易,但是在宣教奉献上却形成基本共识,都愿意在差传事工上有份参与,从献祷与献金开始,积极投入。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教会愈来愈多的教会领袖和广大的肢体们,开始更多关注关怀到宣教士的需要,以及宣教士的子女和父母的实际关顾事工中。这使身在前线的宣教工人大得安慰,也能促进他们更加专心尽心竭力地服事。

2) 尝试突破, 累积经验

据笔者持续多年的观察与跟进,可以看到中国教会一直在努力地摸索尝试着参与宣教,而且也在不断地延伸并突破着。特别是在访宣与短宣的学习与体验中,从汉族同文化地区,逐步延伸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再跨越到青藏高原地区和穆斯林地区,甚至更进入到中国周边国家短宣实践。多年来,中国教会投入了大量经济,差派了大量人力,同时也积累起相当的差传经验与教训,这些都成为宝贵的差传财富。

再有,随着中国教会差派长期宣教工人的事工开始愈加广泛起来,宣教士的职前训练也被中国教会日益广泛关注与看重。这是当前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正在日趋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两年,身处海外的“亚洲半径”(Radius Asia)宣教士职前训练事工,多与中国教会合作配搭服侍。疫情之后,为刺激经济复苏,新一届泰国政府再次对中国广开免签政策,使得位于泰国的多个短期职前训练的机构,重新活跃起来。这些都有助于中国教会在委身普世宣教圣工中继续成长成熟,更新与进深,延伸与跨越。

3) 差传机制, 趋于规范

对于积极投身普世宣教的中国教会来说,差传机制系统之建立、完善与规范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笔者多年来不断强调并呼吁的。只有规范的差传机制系统建立起来,才能使中国教会宣教可以稳扎稳打,有根有基,有章可循,有策可参,有经验可借鉴,有榜样可效法之。

宣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是一日可成之功，故不能急近功利，寻求捷径，造成欲速则不达之况。当代中国教会在摸索尝试投身宣教的过程中，已经吸取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教训。所以，转而开始重视差传机制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实乃可喜可贺之事。关于这个主题，大家可以更多参考，于2021年出版的，由一位多年委身跨文化宣教的中国教会宣教士所著写的《环环相扣——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差传系统机制》一书。

国际华夏人橄榄山福音使团和国际加利利差会是目前可知的中国教会国际性差会中差传机制比较规范完善的。国际加利利在宣教士福利和子女教育方面开始全面顾及起来。华夏人橄榄山福音使团在与其他国际差会合作方面已经走出一大步，特别是在宣教士训练与关顾，以及宣教士危机管理方面，为中国教会进深参与普世差传提供出不少可以参考的经验。

4) 人力增加，工场广泛

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如果从信徒数量而言，中国教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这些年来，中国教会在承担宣教使命，投身普世差传事工方面，从觉醒认同到全力参与；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跌跌撞撞一路走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外，普世宣教的工场上，开始或多或少，或短期或长期，或个人或团队，出现中国宣教工人的服事的身影。而且人力仍在继续不断地增加，宣教工场所覆盖的范围，也随之更加广泛。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中亚穆斯林国家、东欧、东非、北非，甚至远到太平洋上的小岛国瓦努阿图群岛、南美洲的古巴，与北美洲的墨西哥，都有中国教会宣教工人在服事。

4500万人口的韩国之神的教会，可以差派超过27000位宣教工人，散布于世界各地。超过14亿人口的中国之神的教会，应该差派更多的宣教工人分布于全球各国各族中，藉着中国教会宣教工人让“认识耶和華榮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2:14）偌大的中国教会，蒙恩甚多的中国教会，打发再多的宣教工人也不算多。笔者也鼓励散布于全世界各国求学、工作、经商、度假、养老、国际婚姻、大量移民等之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都能明白耶稣基督颁布给中国教会的大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承担起福音责任来，使基督的福音早日传遍天下，迎接耶稣基督荣耀再来。

2、消极层面

1) 前线孤单无力

在宣教工场驻守的时间愈久，去到的宣教工场愈多，就越发现坚持在宣教工场的中国教会宣教工人们，更多是没有母会支持，或者没有固定支持，没有教会或差会接纳差派，而照着神的带领自行选择踏上工场的，多是单打独斗，独自奋战，自然也就谈不上督导与关顾了。

另外一部分中国教会宣教工人，虽然有后方教会支持，或者团队差派，甚至也有宏大长远之宣教目标与管理机制，但也是形同虚设，根本无暇顾及远在天边的宣教工人。笔者认识的一个宣教单位，身后是庞大的中国教会某个教会系统，但是他们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上到工场去看望过宣教士，也没有给宣教士安排过安息年。如今还要求这个宣教单位自谋生存，不再经济支持，甚至要求他们反过来反哺后方基地教会的需要。虽然这个宣教单位还在工场上继续坚持，但也深受伤害，倍感无奈，出现疲累无力，精疲力竭，不知明天如何的境况。

此种情况，已经不是个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前线宣教工人被涉及到。作为一个中国教会宣教工人，笔者也是惊掉下巴，无言以对。盼望竭力推动中国教会宣教的教会领袖们，能够重视此种情况，悬崖勒马，承担起与宣教工人们同心同工的责任来，各尽其职，彼此成全。毕竟抛弃宣教工人，陷前线工人于不顾，致使他们成为孤儿的做法是神所不喜悦的。

2) 后方行动乏力

上述所讲前线工场宣教工人出现孤单无力的情况，其实与后方教会或团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从积极的层面看，中国教会的宣教不是才刚刚开始，势头正猛吗？宣教导员和宣教训练不正在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吗？宣教会议和差派事工不正方兴未艾吗？为什么还要说行动乏力，无以为继呢？这不纯粹是给中国教会宣教泼冷水吗？

笔者以为，一个属灵的教会领袖，一定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敏锐洞察力，一定要养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越是在宣教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当中，越要保持“众人独醉我独醒”的警醒头脑，在危机中能够看到机会，在机会中也能看到危机。表面上当前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势头，确实不容小觑，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之差传事工参与、投入与运作时，就能看出有

的是不知所踪，有的是不知所措，有的是偃旗息鼓，有的是担心怯场，有的是瞻前顾后，有的是精于计算，有的是摸着脑袋不知如何下手等等状况。

有的教会已经参与宣教多年；有的团队已经差派很多宣教工人；有的团契差传架构健全；有的教会人多势众；有的系统号称资源充足，恩典丰富；有的系统目标清晰，规划长远；但是为何出现造势多，会议多，研究多，专家多，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呢？而且此种情况长期存在，始终得不到改善呢？求神怜悯中国的教会，能够回到神面前谦卑对付，更新变化，重新得力，以致能驰骋在普世宣教的道路上，永不乏力，刚强有力，得胜有余。

3) 宣教释经不足

笔者今年有机会多次参加“宣教中国 2030”在每个月末组织的宣教特会。特会每次安排两位同工分享，一位从祷告的角度讲解《圣经》中的某卷书，一位从宣教的角度诠释《圣经》中的某卷书。半年下来，笔者也有机会聆听到中国教会 10 多位教会领袖的分享，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有长老牧师，也有宣教同工等等。总体给人的印象都是精彩纷呈，铿锵有力。但是，笔者在安静下来，更多反思的时候，总有一个看见，就是中国教会的领袖们释经的功夫不够，尤其是宣教释经方面严重缺乏与严重不足。即使是有一些联系，也显得有些牵强附会，这使得笔者陷入到深深的忧虑之中，

如果当前中国教会愿意持续并全力地投身到普世宣教大工之中，但是却没有足够并且深入的圣经理论基础作为支持，实在是令人堪忧。就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教导之后所总结：“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 7:24-27）

当前，中国教会之系列解经著作，可以说是已经汗牛充栋，非常之丰富了。丁道尔系列，约翰麦克阿瑟系列，活泉系列，天道系列，陈终道系列等等，专门研究之单卷圣经的属灵注释书籍就更多了，包括旧约之《雅歌》、《路得记》，新约之《雅各书》和《启示录》，就有很多本注释。但是专门从宣教释经的角度诠释圣经的参考书，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过一本。这是一大缺憾，势必对中国教会宣教造成阻力与动力不足的情况。深盼中国教会的牧者领袖们，能潜心研究圣经

的启示，尤其看重从宣教释经的角度研究、研讨、著述等，为中国教会在末后世代更加有力地投身普世宣教建立起更加坚实的圣经理论根基。

4) 伪专家的危机

在讲到这一点时，笔者可能会冒犯到很多人，甚至得罪到很多人。但是笔者不会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当前中国教会出现的此种现象，作出分析，让我们彼此提醒。

在当前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之运动浪潮中，大量的会议，大量的研讨，大量的论坛，需要大量的讲员。如此，如果一位同工，被邀请作为讲员，那就代表他的资格。或者是懂得宣教，或者是有宣教经验，或者是有宣教学位，或者是影响力，或者是某个地区公认的代表性领袖，必须给他机会。而此种情形的出现，积极的方面来看，促使更多的教会领袖，开始了解、学习宣教。因为不懂宣教，就说明你已经落伍了，被淘汰了。另一方面，为了能进入并在或大或小的宣教会议中有机会发言，成为此宣教领域被称为资格的同工。于是乎，很多教会同工开始热衷于谋求宣教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神学硕士或教牧学博士也可以。

近几年来，笔者观察到中国教会涌现出一大批博士、专家来。那不是好事吗？这对中国教会更好地委身宣教事业不是更有推动、指导、研究等意义吗？你为什么又要挑战呢？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会大大鼓励中国教会的同工们，尤其是愿意参与宣教的同工们，要坚持学习，不能停止进修装备。因为对于传道人来说，我们走上这条事奉的道路，就必须一直进修下去，一旦哪天我们停止下来，那么，我们带领的同工，弟兄姊妹们也会停滞不前的。但是，为单纯谋求学位，或者为进入某个要求资格的领域，甚至以此为荣。笔者是不赞成的。

笔者在聆听不少已经获得学位和资格，被誉为学者、博士、理论家、策略家，或某方面专家之同工的宣讲时，却发现他们是伪专家。再看他们从讲台上走下来的具体行动时，却发现他们仅仅是个理论家。而且是东搬西抄，拿来主义的理论家；是没有经过验证，或者根本不想付诸实践，具体践行宣教的空谈家和理论家。这才是令笔者真正担忧的地方。如果空前复兴，全力委身普世宣教使命的中国教会，被一大批闭门造车的空谈理论家，策略专家，抑或研究学者主导，

那将是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甚至普世宣教事工的一大灾难。坐言起行——才是硬道理。

二、宣教展望思考

要对当前中国教会宣教作出展望，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教会之大，普世宣教工场之广，宣教事工之复杂，开展事工之难等等，都使得以下之观察显出局限来。笔者只能根据非常有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些许建议并与大家彼此激励，以共同迎接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新局面和新恩典。

1、形成工场团队现象

多年来的普世宣教工场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们，有点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之说。而很多同工之所以中途退出，大都是因为单打独斗，没有系统的后援支持，以及事工开展艰难，且没有固定的经费供应等等，实在难以为继。再加上孩子教育的高昂费用，家中父母年纪愈来愈高，自身身体出现状况，捉襟见肘的财政使生活压力剧增，不得已之下，渐渐退出宣教工场。

但是，也有不少宣教工人们坚持下来，始终持守在神呼召他们所到之宣教工场。最重要的是，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持守着神的呼召与使命，胜过各样的艰难与处境，摸爬滚打地一路走来，他们的身心灵，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工关系都相对健康，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正所谓使徒保罗的宣教经验：“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后 12:9）

而且，这些在工场上各自孤军奋战的宣教工人，渐渐认识、联结，并在基督里不断相交、团契，最后形成了在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团队。这是当前中国教会宣教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气象。按前线工人们的话说，其实大家是抱团取暖。

今年，笔者有机会去到青藏高原地区，中越边境地区，和非洲北部地区宣教工场，都看到此种在宣教工场上形成宣教团队的现象。这对处于宣教大后方的中国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2、前方成熟，后方倒退

在宣教工场上自发形成宣教团队的现象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即前方宣教士正在日趋成熟，后方教会虽在继续坚持，却出现后继乏力，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

前方宣教工场成熟，是指各个独立宣教单位，在多年的孤军奋战，势单力孤，督导关顾，以及资源匮乏等情况下，开始突破自己的有限与局限，寻找能够与其合作之其他同样处境的宣教工人，一起团契、磨合，整合资源，组成团队，分工合作，各尽其职。如此既可以彼此牧养，互相关怀，共同勉励；又可以集中各自资源，发挥各自恩赐，共同推动并开展宣教事工。这样，即使长期得不到后方的支持与督导，也可以抱团取暖，生存下来，继续持守在宣教工场上。

后方基地教会出现宣教乏力、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是当前中国教会需要看见并亟需面对的重大挑战。国内很多地区的教会，虽然宣教动员仍在继续，宣教训练仍然如火如荼，访宣短宣人力财力投入更多，宣教研讨会议仍是此起彼伏等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此之多的宣教投入，带出的实际性行动与事工，却是风闻不多，有些甚至还出现倒退现象。

据笔者观察，在华东、华中、东南沿海等不同省市地区，参与宣教多年的，甚至是比较大型的团队，号称多少个牧区，多少万信徒的团队，在经济奉献、督导关怀、事工开展等方面都出现紧张、停滞，甚至开始往后倒退的情况。不仅如此，后方教会甚至还提出，前线的宣教士应该自己谋求独立生存与事工，还要反哺后方的教会，顾及并支持国内家乡教会的需要与事工。在末后世代之普世宣教的大业中，愿意参与普世宣教的中国教会实在需要神的怜悯与恩典。

3、东方不亮西方亮

自二十大以来，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更趋严紧，宗教事务条例更加苛刻，各级政府，直至社区对教会的监管、干扰、冲击和打压更是成为平常之事。全国范围各地区教会都在夹缝中生存，往细胞化方向发展。同样，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生等不同领域，包括城市、乡镇和农村等不同层面，也都因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和政治至上的要求，均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戾气愈加严重，民众看不到前面的光亮。

当前中国教会正处于非常受限、被压的艰困时期，而且这种处境有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教会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并寻找自身之生存与继续投身参与普世宣教大工的足够准备。

在当前此种大环境之下，我想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句话来。它出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中。原文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这句话给当前的中国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既然国内环境和情势愈加紧张，不易开展事工，为何不学效初期教会历史之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呢？！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徒 8:1-2）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徒 11:19-21）

或者，这正是神在未后世代给中国教会的重大提醒！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东方中国不断关锁的情况下，西方反而不断地敞开大门大亮了。全球新冠疫情过去，经济需要快速复苏，民生状况需要更多提升。于是，更多国家国门大开，国际旅行再次趋热起来。亚洲的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非洲加蓬、贝宁、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莫桑比克，欧洲的塞尔维亚、波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南美的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国，都实行对中国公民免签证的礼遇，还有更多国家可以非常方便地办理落地签证或者电子签证，正如许多同胞所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世界在向中国打开，许多国门，包括封闭的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开放，包括以严紧闻名的沙特阿拉伯也开始对中国公民开放了，这不正是神给当前中国教会的宣教大好机遇吗！盼望在疫情三年中持续祷告、动员、训练装备，会议研讨，酝酿准备更好地参与普世宣教的教会能够像当年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抓住神给予我们的大好机会。蒙受上帝极大恩典的中国教会，“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参斯 4:14）

4、国际差会主动联结

据笔者的跟踪观察，在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的路上，一直有，甚至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差会，包括海外华人差会，愿意主动服侍联结中国教会，愿意携手中国教会一起共赴普世宣教。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国际宣教会（前身为远东宣教会）、学园传道会、海外基督使团、青年使命团和韩国众多差会为代表的国际差会都力求在中国发展宣教事工，征召培养本土同工。时至今日，已经看到明显的果效，有不少的中国同工成长成熟起来，并开始担当更多更大的责任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美国大使命中心、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中华神州、基督徒互援会、美南浸信会和北美、香港众多教会差传事工等为代表的海外北美、港澳台华人差会，以及西方差会之中国事工部，都以扶助扶持中国教会，并与中国教会协作合作的态度，全力服侍正在兴起开始参与普世宣教的当代中国教会。

近年来，西方差会百年老店，比如国际事工差会、非洲内地会等都开始向中国教会敞开，组成中国事工部，开始在中国教会甄选、训练并差派宣教工人走上跨文化宣教工场，并形成愈演愈烈之势。

海外华人教会与差会，西方教会与差会之主动联结服侍，并与中国教会长期配搭协作的谦卑态度，以及培养成熟的国际性宣教领袖之目标，成为当前中国教会进深参与普世宣教的巨大助力。据观察，目前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宣教工人，在海外，从国内分别加入到不同的国际差会中，并且进入到普世跨文化宣教工场中。

如此，一大批的中国教会宣教领袖与宣教工人们可以进入更加宽广的属灵视野，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更加成熟地在国际团队的同工们中间服事。笔者盼望，中国教会能够将最有负担的，心志和装备最好的，愿意终身委身宣教大工的弟兄姊妹们推荐给国际差会。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普世宣教的工场上，国际宣教会议的现场中，就会出现能够代表中国教会的国际性宣教领袖、讲员和专家来。愿主旨意成全！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当前的中国教会也愈来愈国际化，更多地进入国际视野，这是中国教会走向成熟，更多担当的证明。当前，中国教会之本土差会，亦趋于规范，有的也走向国际性，这也为中国教会之国际性差会与海外中西方国

际差会合作，提供出更好的环境。从此一方面，也能培养更多、差派更多，并且不断成熟的中国教会国际性宣教工人与宣教领袖来，以致能更好地与普世教会合作，共谋神的宣教大事，成全神的宣教大工。

结语

就在本月初的10月4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30年第24届世界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共同举办。为纪念2030年是足球世界杯一百周年。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三国将举办该届世界杯的3场揭幕战，以作为对百年世界杯的致敬。2030年世界杯赛将在三大洲的六个国家举办，这是对世界杯传统举办形式的一次意外而复杂的改变。

2030年，也是检验非洲北部地区福音与属灵大复兴的一年。截止到2030年，是北非各国神的教会盼望10年属灵大复兴之到来之年。神正在广大的穆世林世界行新事奇事大事。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未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徒2:16-21）

2030年，也是中国教会2030宣教运动的关键一年，应该是达成运动目标与规划的一年。普世教会都在拭目以待。纵观当前中国教会之宣教现状与展望，我们有忧虑，也有期待；有压力，也有动力；有局限，更有信心。看似一切都在正常进行，甚至充满更多机遇和发展机会，但是如何使后继之宣教事业成为金银宝石的工程，经得住考验的工程，吾等需要如使徒保罗般：“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8-29）

求神带领中国教会在普世宣教的路上，更加有力地往前直奔，奋勇向前，直到主来！🌀

从海外华人差会角度观察中国教会宣教现状与冀望

文 / 守道

撮要：最近四十年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渐渐茁壮起来，顺着这趋势，中国教会也纷纷派出宣教士到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引起一个“中国会变成下一个宣教大国”的遐思。本文从海外华人差会角度对中国教会宣教现况作观察，先简略回顾中国教会参与宣教的历史，进而探讨导致当代宣教兴旺的因素。继而探讨中国教会的宣教现况，如宣教士类别，参与宣教的动机，所拥有的优势，和采用的策略。再讨论中国宣教所面对的七个挑战，最后提出四个对中国宣教的四个冀望和献议。

关键词：中国宣教历史 宣教优势 宣教策略 差传机制
宣教关怀 差会合作

中国教会在过去四十多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改变。自 80 年代开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在世界舞台上有着积极的参与，因而也渐渐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教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渐渐茁壮起来。不但教会内部越见强壮，也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国内偏远的地方去，在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中宣教；更有教会差派工人到国外宣教。笔者曾在中东、南亚、东南亚等不同国家都遇过从中国差派出来的工人。笔者退休后，也有幸被邀请去辅导身在不同国家的中国宣教士。

有这么多人分布在全球不同地方，确实是可喜现象。我们可能会问，中国教会有可能成为在美国、韩国和巴西等差派出大量宣教士的国家之后，另一个差派宣教士的大国吗？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在“宣教中国 2030”运动的鼓吹之下，中国教会也在努力和热烈响应，准备在 2030 年差派 20,000 名宣教士出去。如果单从数字这层面来看，中国教会确实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差派大量宣教士的国家。

可是，从笔者过去接触过从中国派去的工人，和现在辅导宣教士的经验来衡量，老实说，笔者一方面为着神在兴起中国教会参与宣教而兴奋，却在另一方面为着中国宣教士的缺乏而担忧。笔者曾先后在不同海外华人差会服侍多年，蒙神恩待走过不少国家；也曾在四个不同国家作过宣教士多年。笔者有幸被邀从海外华人差会角度评论中国教会的宣教现况，和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宣教人，对中国教会未来的宣教寄予什么期望。本文先回顾中国教会近年的宣教参与背景，再探讨中国宣教士在跨文化宣教方面的现况，从中讨论中国宣教士的类别、他们参与宣教的动机、所拥有的优势和采用的策略，最后探讨中国宣教士所面对的挑战，和提出一些献议。文中的内容仅属笔者的片面观察和理解，谈不上全面，只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期待日后会引起更多讨论，能提供给中国教会参考。

一、中国教会近年的宣教参与背景

中国教会并非凭空就开始参与跨文化宣教，其实，中国教会于二十世纪初期就有跨文化宣教参与。因此，在谈论当代的跨文化宣教参与之前，需要简略交待一下早期的跨文化宣教历史。

1、早期跨文化宣教

陈剑光将祖籍是福建福清的循道会牧师黄乃棠定为最早“福音出中国”的宣教士。¹他于1900年通过他的女婿林文庆的介绍，到砂拉越拉让江流域考察。后得古晋闽南籍华人王长水引见当时统治今日东马来西亚的白人拉者查尔斯布鲁克，并订立条约，将中国人移居到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垦耕。1901年，黄乃棠将约1000名福清地区的信徒移居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垦耕，他和跟从的人在当地成立了教会和以基督徒为主的小区，成为向华人和当地其他族群宣教的据点。

朱醒魂是从中国差派到越南的宣教士。他是广西建道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在当时广西宣道会差会主任翟辅民的邀请和鼓励下，朱醒魂到越南的堤岸开荒。由于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反对，在翟辅民与法国方面谈判后，朱醒魂获准在当地华侨当中开荒，建立了第一间华人宣道会。七年后，教会开始有根基后，朱醒魂被差派到印度尼西亚开荒。

1929年，因翟辅民的发起，得到中国同工如黄原素、赵柳唐、王戟等的响应，中华国外布道团得以成立，也就是中国的第一间差会。在差会成立当年，就差派建道圣经学院毕业生林证耶夫妇到今日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佰斯南端的孟加锡，在当地华侨当中开荒。三年后，林证耶夫妇转到内地在半开化的达雅人当中工作。经过十五年的辛劳，带领了超过3000多山族人民归主，建立了十多间教会。

这段时期还有其他中国教会参与宣教的例子，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数说。

2、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

四十年代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年代。当时的中国教会看见“还福音债”的必要，认为中国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在马可和张谷泉的带领下，“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成立。这两个组织都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目标。遍传福音团差派宣教士往中国西北，甚至新疆，准备朝耶路撒冷方向进发。西北灵工团也差派宣教士到新疆的北疆、南疆，目标是往耶路撒冷。因为大环境的转变，当时出不了国门，事工也因而停顿下来。然而，他们没有忘掉当时所领受的异象，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都纷纷回到新疆去，设立教会，传递异象，准备日后可完成使命。

1 Kim-kwong Chan,《本土宣教运动历史回顾》(The Indigenous Mission Movement in China: A Historic Overview). *China Source*, January 29, 2014.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articles/ben-tu-hua-xuan-jiao-yun-dong-li-shi-de-hui-gu/>.

3、国外教会的投入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教会在宣教方面整体停顿下来。当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便利，国外教会包括西方、韩国和海外华人纷纷趁机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中国，以协助中国教会。当时大部分都以圣经培训和领袖培训居多，对于宣教方面的培训，相对并不太多。

4、当代的宣教参与

中国教会在当代的宣教参与方面非常兴旺，原因很多，笔者只谈以下五个与这课题有极大的关系的因素。

1) 差传教育

《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 (Kairos) 是一个在教会中推动差传教育的课程。从该课程中文版的官方网站得知这课程于 1994 年由菲律宾 Living Spring International 编辑出版。该课程的原名是《浓缩的普世宣教课程》(Condensed World Mission Course)。内容来自 Dr. Johnathan Lewis 的著作《普世宣教》(World Mission) 和温德教授 (Dr. Ralph Winter) 所编的《普世宣教面面观》(Perspectives on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编成。课程内容从圣经、历史、文化、策略四方面探讨如何作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学员们在统筹导师的带领下，通过聚焦祷告、课文修读、灵修专题、分享小组讨论、录像教学和特别设计的跨文化活动等活动，学员得到启发和挑战，基督徒将生命和宣教融合起来。

《把握时机》课程后来发展有中文版，因而这课程也被带进中国，结果带来极大的回响。曾受过这课程训练而且得到课程统筹资格的人都纷纷在中国各地开班，造成如“遍地开花”的现象。据笔者所接触到不同的群体，他们都表示知道甚至已参加过《把握时机》的训练。当笔者看到这现象时，曾自问这现象将带来中国教会的宣教参与一个怎样的趋向？

除了《把握时机》课程外，另外一个影响着中国教会宣教意识的是《展望》课程，也就是上文所言的《普世宣教面面观》课程。由于《把握时机》课程的内容有部分出自《普世宣教面面观》，而且内容也是从圣经、历史、文化和策略四方面作探讨，所带出来的结果自然有《把握时机》所带来的相同影响了；但《展望》课程相对来说比《把握时机》课程要求高，有意愿参加并能完成课程要求的人相对比较少。不论是《把握时机》或《展望》课程，都带给中国教会在跨文化宣教方面有很大的冲击。

2) 跨文化事工参与

曾受过《把握时机》训练的人，往往会问一个问题，《把握时机》的下一步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是有实际参与跨文化事工的经历和机会。当笔者还在负责差会每年的“跨文化宣教实习训练”课程时，也曾多次接待过中国教会的领袖参加训练，他们的参与一方面可让领袖们自己经历一些跨文化经验，同时也可观察教会参与宣教的可行性，甚至可鼓励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差会的“跨文化宣教实习训练”。

笔者退休后，也看到有中国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宣教工场，实际体验和参与跨文化事工。也有教会差派有宣教负担的弟兄到宣教工场实习两年。

3) 宣教中国的推动

“宣教中国”的概念在2013年6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亚洲教会领袖论坛”会议中首次被提出。当时有约300多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代表中有100位中国教会的领袖。会中有人提出“宣教中国”的概念。他的理论是中国教会于2030年要差派出20,000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宣教中国”。² 这理想的背后理念就是：自马理逊来中国宣教起，到目前这200年来，已有超过20,000名宣教士来中国宣教，现在是中国教会还福音债的时候，差派20,000名宣教士出去，使“宣教中国”成为事实。

这概念随即有人附和，“宣教中国2030”会议成了“首尔会议”的后续产品，成为一个宣教推动的平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Brandner教授在和在中国派出的工人的访谈中，发现在谈话中，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经常出现，就是中国教会欠了福音的债，因此，为了要还债，他们愿意离开中国到不同地方宣教。³

4) 祷告祭坛的激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教会兴起了一个专门为普世宣教需要祷告的祷告祭坛。祷告祭坛在线上举行，吸引了大量中国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参加。会中安排不同专题演讲和不同宣教工场需要的分享等，借此引发与会者对普世宣教的负担和祷告。这运动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普世宣教参与有极大的帮助。

2 李圣风,〈2030 宣教中国〉,原载于《今日宣教》第一期,2015。eats.ac/eats_plaza/news/?uid=18&mod=document.

3 Tobias Brandner,《中国宣教士在海外跨文化宣教：一个新宣教国家的出现?》(Chinese Missionaries in Cross-Cultural Overseas Mission: Emergence of a New Missionary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023, vol. 47(3), p. 362.

5) 一带一路的契机

中国于2015年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后,简称为“一带一路”的国家级发展战略随即展开。“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丝绸之路经济带指的是从中国西北出发,沿着古代丝绸之路,采用陆路往西,途经中亚和西亚直达欧洲。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营商路线,所指的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由南海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直达地中海。这两条路线所涵盖的五条经济路线或走廊,沿路涉及超过六十个国家和全球六成以上的人口。

“一带一路”原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却为宣教带来一个新的契机。“一带一路”沿途所经过的六十多个国家大部分都是非信仰基督的地区,也就是一般称为10/40之窗之内。中国教会有见这契机的出现,纷纷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宣教契机。

二、中国宣教在跨文化宣教的现况

目前有多少中国宣教士在全球不同国家事奉?可谓众说纷纭。从3,000到15,000的数字都有被提出,整体而言,因为中国宣教士的身分比较隐秘,这些数字都比较属于估计居多;加上对宣教士的定义没有共识,故数字的分野很大。笔者不打算在此作深入讨论。

笔者就基于上述中国宣教的宣教参与现况,探讨宣教士类别、参与宣教的动机、所拥有的优势和所采拥的策略。

1、宣教士类别

Brandner 将他接触到的二十五位宣教士归纳成五个类别。⁴在他所接触的宣教士中,绝大部分来自没登记的教会。

1) 农村家庭教会

在 Brandner 所接触的基础上,第一个宣教士类别是来自农村家庭教会背景的人。他们的背景多是教会的传道人,学历水平不高,对世界的认识甚少,却认定

4 Tobias Brandner, “Chinese Missionaries in Cross-Cultural Overseas Mission: Emergence of a New Mission Nat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47(3), 2023, p. 359-360.

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他们通过在不同地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有人视他们为“没文化”和“没准备好”的人,但这群人却在中国宣教士群中占大多数。他们虽然准备不足,有不少因而“回家”的例子,却也有不少成功长期留在工场的例子。

2) 城市教会

Brandner 的第二个类别是有城市教会背景的人。相对而言,这群人曾受高等教育,较明白跨文化的意思,专业,经济基础也比较稳固,他们对尝试新的宣教模式持开放态度。

3) 温州教会

第三个类别是温州教会的基督徒。这群人有经济实力,也有企业思维。他们将他们的企业与宣教接合,在他们的经商路线和脉络,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建立教会。

4) 海归者

第四个类别是海归者。这群人原本来自中国,曾在欧美留学和工作,累积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也有海外教会的经验。在国外教会的支持下,回中国宣教。他们拥有的是跨文化经验,经济支持不成问题,也有宣教的实干经验。

5) 少数民族

第五个类别是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他们包括朝鲜族、傈僳族、苗族蒙人等。朝鲜族虽住在中国,但族群却属朝鲜。这些人大部分由韩国人带领信主。在韩国人的栽培下,愿意利用他们能住中国的优势在中国各处宣教。其他族群的宣教士则到老挝、泰国和缅甸等地工作。

2、参与动机

1) 还福音债意识

最引起中国教会参与宣教的动机是:现在应该是中国教会起来,从西方宣教士手中接过棒来,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了。⁵因为这思维,宣教动员者就在中国教会中作广泛教导,因而不同教会和系统纷纷差派宣教士到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去。一位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工作的工程师表示,过去多年以来,世界不

5 Kevin Xiyi Yao,《中国教会:世界宣教的下一个超级大国?》(The Chinese Church: The Next Superpower in World Mission?) in *Evangelical Mission Quarterly* 50 (July, 2014), p. 297.

同国家的教会都在为中国祷告，现在最大的未得之民群体就是穆斯林，是轮到我们来接触他们的时候了。⁶

2) 海外差会鼓励

因为不少海外差会，包括西方、韩国和华人差会的鼓励，成了下一个参与宣教的动机。这些海外差会，不但鼓励，也提供训练和资源，让中国教会更有信心踏出国门。笔者所属的差会也曾参与宣教培训，甚至提供已有的资源给有接触到的中国教会。也有中国教会提出要差会的材料作为参考，再编写合乎自己处境的资料。笔者也观察到，有中国教会受过训练后，自行举办短期训练，然后进行差派。

3) 与海外差会合作

除了自行差派外，第三个动机是与海外华人差会合作。海外华人差会除了在差会所在地招募宣教士外，也同时向中国教会招募宣教士。这种模式造成了中国本土差会与海外华人差会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关系弥补了中国教会差派经验的不足，因而成为参与宣教的诱因。中国本土差会也可从联合差派的经验中学习经验。

4) 国外工作或营商

第四个动机是出国工作或营商的机会。因为国际旅行的便利，不少中国人往国外工作或营商。在所到的国家向散居各地的中国人和当地华人宣教变成另一个契机。

5) 未得之民的负担

未得之民是参与宣教的第五个动机。笔者曾接触过两个不同的团队，他们都对得着未得之民有极浓厚的负担。一个在东南亚一个封闭国家工作的团队向笔者表示，他们老家的差派机制对未得之民极有负担，所以差派宣教士到当地。当笔者问他们怎样定义未得之民，他们的回答是还没有能力自传和建立教会的群体。笔者也曾和另一个成员都有两年跨文化宣教经验的团队上“文化人类学”课时，曾谈到如何选定宣教的群体，他们认为笔者所引用的约书亚计划中的未得之民数据有点过时，他们的回应让笔者认识这团队对约书亚计划的熟识。

6 Brandner, "Chinese Missionaries in Cross-cultural Overseas Mission: Emergence of a New Missionary Nation?", p. 362.

6) 为主受苦心志

另一个参与宣教的动机是有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笔者在“跨文化宣教体验训练”课程期间，观察到参与恩赐测验的学员中，从中国来的学员的殉道分数都比其他地区的学员高，有人甚至得到最高的分数。如果能为了主的缘故，连性命都可以舍去，宣教士在异文化当中，过着经费相当拮据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3、优势

中国教会参与宣教，有不少存在的优势，以下列出六个。

1) 宣教意识浓厚

有不少研究证明中国教会对宣教的意识非常浓厚。在《把握时机》和《展望》课程的鼓动下，成就了对宣教的意识。韩国宣教学者朴和睦在调查了部分城市和农村教会有关宣教意识的议题后，发表了《中国教会的世界宣教意识和现状》报告。文中提到 90% 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的牧者都关心宣教。41.18% 城市教会的信徒筹备参与宣教事工。21.57% 的中小型城市教会牧者有参与海外宣教事工。17.65% 拥有专业背景的城市教会信徒有参与海外宣教事工。⁷

2) 没有殖民包袱

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历史的某段时间是殖民政权国，当从这些殖民主义国家派出来的宣教士到以前的殖民地宣教时，他们极有可能遇到负面的态度和情绪。⁸ 第三世界国家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则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中国刚好属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殖民历史，故中国宣教士比较受欢迎，这是非常大的潜力。

3) 外交关系

中国一直都保持与穆斯林和创启国家有良好的关系，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带动底下，加上中国人喜欢到国外谋生，造成第三个宣教潜力。

7 引自李圣风，〈中国教会与宣教事工〉，登载在《大使命》(第九十五期)，2011，页 12。Kevin Xiyi Yao, “The Chinese Church: The Next Superpower in World Mission” p.230. Mary Ho & Rudolph Mak,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46(2022:1)p.67.

8 连大理，《差传事工手册：教会、差会、宣教士》，刘如菁译。(台北：校园，1991)，页 17。

4) 忍受困苦的能力

中国教会多年来在极艰难的政治环境下生存，早已学会了怎样面对苦难，⁹ 这些背景都成为中国教会的宣教潜力。

5) 家庭教会的模式

家庭教会长期在极艰难的环境下生存，早已掌握了一套生存之道；当宣教士进入创启国家开展事工时，家庭教会的模式极有可能适用于当地。¹⁰

6) 双职背景

大部分农村教会都没有经济能力供应传道人的生活需要，故不少传道人也有世上的职业作为养活家庭和遮盖。这种双职的背景有助工人在创启国家中生存下去，也成了优势。

4、策略

1) 建立差派机制

既有大量潜在的宣教士可供差派，中国教会以建立本土差会作为差派机制。单在温州地区，就有不少差会成立起来，差派在不同宣教大会中蒙召，并回应了呼召的弟兄姐妹出去。他们也接受非温州牧区的人加入他们。笔者在其中一次温州地区的宣教大会中，就听到宣教士在少数民族和国外宣教的汇报。

2) 沿着经商之路和散居群体前进

宣教学者 Mary Ho 和 Rudolph Mak 指出中国宣教士其中一个策略是沿着经商路线和到散聚群体当中去。¹¹ 因为温州教会把经商和普世宣教连结，不少教会在温州商人所到之处建立起来。温州教会在国外建立的教会在欧洲如意大利和法国等都可见到。一位温州教会的领袖曾问笔者能否差派工人去牧养他们在罗马所建立的教会。

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中国宣教士就沿着经商的路线前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宣教。笔者在一个东欧国家就遇到温州团契，虽然还没成立为教会，但温州团契已在经商路线中建立并接触散居在彼帮的中国人，尤其温州人。

9 Mary Ho & Rudolph Mak,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s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67.

10 Mary Ho & Rudolph Mak,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s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67.

11 Mary Ho & Rudolph Mak,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s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63-64.

3) 关怀服务

中国宣教士视建立教会为首要宣教目标，这是绝对正确的定位。因为“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基督，以他为首”就是神要完成的计划（弗 1:10）。¹²自从汶川地震后，这看法有所改变。中国教会意识到公益事业是一个有用的平台，因为这平台可接触大量需要帮助的人们，因而可用生命传达耶稣的爱。为了要建立平台，不少中国宣教士在不同国家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笔者在中东曾接触到一个团队，他们就在当地帮助叙利亚难民。笔者也在东非某国接触到一个宣教士，以按摩服务为平台，接触当地人。教导中文是另一个好用的平台，特别今天不少国家都希望学中文，泰国的公立学校都设有中文课，对外汉语就成了一个非常吃香的平台。也有中国医生通过医疗服务打开宣教之门。¹³

三、挑战

纵然中国教会宣教拥有不少优势，也有大量人可差派，然而他们仍需面对很大的挑战。有关中国教会在宣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已有不少论说存在。笔者既被邀从海外华人差会角度观察中国教会的宣教状况，故笔者就从一些个人的观察做出发点去述说，其中极有可能已有人曾提出过相同的看见。

1、谨慎筛选的挑战

宣教中国 2030 大力鼓励中国教会于 2030 年派出 20,000 名宣教士，是非常伟大的抱负。正如有人说，有目标总比没目标好。为了达到目标，教会有可能会差派一些还不明白什么是宣教和缺乏装备的热心人出去，造成这些宣教士铩羽而归的情形。这种情况已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过。为减少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笔者认为在接纳宣教士的过程中，谨慎筛选实有必要。

对宣教士应该有哪些要求？这是筛选宣教士的重要基础。连大理提出十项要求。¹⁴

12 引自现代中文译本。

13 Mary Ho & Rudolph Mak,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64.

14 连大理,《差传事工手册：教会、差会、宣教士》，页 31-38。

1) 明白神的呼召

对于一个宣教士而言，神的呼召就是他深信神对他个人生命的旨意是从事宣教的工作。除非他在极严峻的环境下能说，我知道是神把我安置在这个地方，不然，当困苦来临时，他极有可能会撤退。呼召不应只是本人的主观经历，也应该有认识他的人如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者、神学院的老师印证才行。如有人申请加入差会，负责筛选的人根本不认识该申请人，若有这些认识申请人的长者诚实引证，对差会的筛选非常重要。

2) 灵命成熟

灵命成熟是指与神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一个宣教士进入工场的第一天，他的灵命成熟度就马上受到考验。包括他在新的处境下如何适应，他和当地宣教士及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他和差会的关系等，都显出他的灵命成熟度。当宣教士在异文化中常抱怨，脾气暴躁，又与其他宣教士和基督徒不和时，就显出他与神的关系。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虽有中国与别国的友好关系，并一带一路的优势，却因中国人以“大国”姿态对待比较弱小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自高的表现已在一些弱小国家中留下负面形象。教会在培育未来宣教士时，应观察他的属灵生命状况，了解他的灵修和祷告生活，他的人际关系。当推荐给差会时，也应诚实，切忌为了送走问题人物而推给差会。

3) 情绪稳定

稳定的情绪是最需要的资格之一，应该排列在灵命成熟之后。一个宣教士要懂得接纳自己的背景而不会在与人接触时有自卑感或不安全感。如果他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父亲酗酒或赌博而带来家庭不和，常遭父亲毒打、家境贫穷等环境中成长，这些家庭背景深深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在这样家庭成长的宣教士申请人若有自卑感或缺乏安全感，他会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寻找自己，而且在异文化中觉得很难适应。要知道申请人的情绪状况，心理测验是很有用的工具。

另一方面，目前在禾场上的工人大部分都在“一孩”政策下出生。在这政策下成长的人，比较容易自我中心。设想一下，若一群自我中心的人在一起同工，当情绪不稳定时，对团队的建立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4) 甘愿为仆

主耶稣在世时实现了以赛亚所说的受苦仆人的角色。祂在世时也曾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

10:45)。照样，宣教士也应当有甘愿为仆的心志。一个没有准备好作仆人的宣教士就会想治理人。想治理人的宣教士则不会受欢迎。一个新的宣教士有没有为仆的心志，就在接受差派的教会把他搁在不重要的地位上，却以此评估他的性格与贡献时，最能看得清楚。

5) 自律

宣教士一般都不会有上司在旁督导。他可以整天偷懒，等到要写报告时才努力工作一下，或胡乱写报告呈交。他也可以在大量需要下耗尽自己。懂得在没有上司在旁时仍然律己，对主尽忠，交出结果来；甚至在需要的催逼下懂得适可而止，至为重要。

6) 关心传福音

向宣教地还没认识耶稣的人传福音是宣教的首要任务，若还没有人信主，教导和辅导等服侍或许还派不上用场。即使一位宣教士自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他仍然必须关心福音是否在他周围的人中传扬开来。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 9:16）。他再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 9:22）

7) 愿意分享

除了传福音是与人分享外，宣教士若还拥有其他特别的恩赐和技能，若愿意与人分享，比较容易得到教会的接纳。保罗在去罗马探望教会之前，虽然他当时还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他在《罗马书》开头就提到他去是要把属灵的恩赐和他们分享，使他们得以建立（罗 1:11-12）。

8) 牧养经验

新的宣教士也必须拥有教会工作的经验。有些差会甚至要求宣教士申请人要有至少两年牧会经验，方会考虑接纳。虽然这样会延迟宣教士上工场的时间，但在教会工作的经历可以让他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会都可能产生问题，还需要懂得如何处理问题。当教会发生纪律问题时，宣教士需要知道如何处理。有差会要求申请人先有一年的短期宣教体验，这样，申请人更可在异文化教会中学习经验。这些要求对差会和申请人双方都有好处，因为申请人可以察看自己的跨文化能力，差会也可察看该申请人作宣教士的适合性。

9) 身体健康

宣教士长期居住在低品质和卫生恶劣的环境，很容易得病。而且可能因事工的需要而长途跋涉，容易疲累。饱受压力也容易变得压抑。若不懂得自我关怀，很容易演变为重病。宣教士须学会自我关怀，保持运动，保持身心健康，才不会因病而离开工场。

10) 学习语言

宣教士愿意学习当地语言，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对于学习语言，语言能力的高低不是关键，而是学习语言的动机。笔者曾遇见在语言学校成绩平平的学生，能用所学的语言流畅讲道。可见是学语言的决心，和敢于练习所学到的语言，是成功的因素。

单从以上十个对宣教士的要求来考虑，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观察，才会看得出来。因此，中国教会在差派宣教士这方面，不宜为达标而差派，宜审慎筛选，才会减低铩羽而归的重复再现。

2、装备的挑战

不少研究结果都指出中国教会最弱的一环就是缺少装备。笔者曾辅导一个在东南亚服侍的团队，他们的成员由教会直接差派，没有加入差会。当笔者和不同成员交谈时，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非常疲乏。其中有一对夫妻，原计划当年的年底才回国述职的，但考虑到他们的身心状况，工场领导要提早让他们回国。另一对刚回到工场的夫妻，因为刚有了孩子，照顾孩子已感身心疲惫，加上有事工的需求、还有学语言等种种压力，妻子觉得无力感。还有一对夫妇，丈夫除了要完成每天的工作以外，还承担了团队的一些额外事务，经常奔波，以致他冷落了妻子和孩子，每天都感到疲于奔命的感觉。如果当他们出国之前，有足够的装备如自我关怀，夫妻相处之道，时间运用等，相信情况会有不同。

笔者也曾为一个团队教导“文化人类学”的课。该团队的成员都有过两年的跨文化事奉经验。在他们出发前，曾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就在不同的穆斯林和佛教国家中工作。他们回国后，就在曾训练和差派他们的机构从事宣教推动、训练和宣教关怀的事工。因为过去所受的训练不多，机构特别为他们设立一个训练学院，以提升他们的能力。在上课期间，笔者给了一个“如果你在出去短期跨文化服侍之前学习过文化人类学，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问题给他们作个人反思，然

后在小组中分享。结果他们都认为如果当初有学习文化人类学，会减少很多过去所犯的错。

这两个团队的经验都说明了宣教士在出发前有装备的重要性。从圣经的例子也可看到装备的重要性。耶稣在差派十二门徒出去前，也给了门徒们训练，祂训练的内容都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停留了三个安息日，但他建立了教会。因为犹太人的诬告，他和他的团队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当他到了雅典后，心中还是记挂帖撒罗尼迦这些初信者的属灵情况，深恐他们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于是差派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坚固他们。保罗在帖前3:6说提摩太刚完成任务回来，把“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笔者相信保罗在打发提摩太出去之前，应有充分的指导提摩太要作些什么，毕竟提摩太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时才招募加入团队的，在宣教路上还是新丁。如果指引不充分，提摩太不一定能完成任务，带回好消息的。

中国教会要装备宣教士，会面对哪些挑战？

1) 加强宣教元素的挑战

虽说《把握时机》课程已有效提升了中国教会的宣教意识，但仍嫌不足，因为《把握时机》基本上是一个宣教课程的浓缩版。如果用作在教会中提升宣教意识，或是培训班中作宣教入门科目，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工具。但如果用作训练宣教士，内容就明显不足了。

笔者认为在神学院课程，甚至宣教训练中心等训练中，除了宣教学概论以外，应加上文化人类学、宣教历史、跨文化沟通、世界宗教、植堂、宣教策略等科目。在神学院课程中，宣教学概论、宣教历史、文化人类学属必修课程，其他科目可列为鼓励性的选修科。在宣教训练中心，所有科目都应列为必修。笔者的想法是：宣教历史除了提供学生们历史事实外，还可以从过去宣教士所采用的策略，其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启发。文化人类学可帮助学生明白文化差异，和如何理解别的文化，对宣教士进入文化大有裨益。对于日后牧会的学生，这门课也可以帮助他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会众。

对于上述建议的三个必修课，现在都已有可用的中文课本了，剩下的挑战就是找到能教这些课程的老师了。

2) 培植宣教培训者

中国教会渐渐已有一些从国外神学院拿到教牧学或宣教学博士学历的老师，这些受过训练的老师可以在上述不同科目做出贡献。目的是帮助解决中国宣教士严重装备不足的问题。挑战是怎样把这些老师的专长结合起来，成为一队坚强的训练团队了。

有学历固然重要，宣教培训老师如加上有宣教经验，他们的训练效果定必事半功倍。笔者冀望中国教会的宣教培训者不单是把知识传授而已，乃是有实际的成败经验可以与学生分享，甚至提出工场个案，让学生们讨论，让他们从中彼此学习。

3) 提高学生学历

笔者所接触到的工人比较多属初中或高中学历，有大学或大专程度学历的不多。如果神学生或准宣教士只有初中程度，对于培训老师所讲解的极可能出现理解不足，进而引起跟不上的情况。

笔者曾在不同神学院和培训班教导“文化人类学”课程，发现不同学生的领悟力有显然不同。在有大专程度的学生中讲课，不论是本科班或硕士班，学生的领悟力相对比较高，也能写出要求的作业；但同样科目在西北或西南地区讲，学生连理解内容都有困难，作业根本写不出来。尤其人类学对很多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本就有抗拒或学不来的态度，纵然有不少与文化有关的有趣例子可提高趣味，整体而言，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强，纵然有专业的老师，培训的果效还是事倍功半。

面对提高学生学历这方面的挑战，对农村教会而言，是重大挑战。如何因材施教，对培训者也是极大的挑战。

3、建立差派机制的挑战

要差派 20,000 名宣教士，需要有大量的差派机制才能应付，而挑战是如何建立健康的差派机制。曾有一位领袖问笔者，有何事工和同工是一个差会不可缺少的？基本上一个差会少不了一个管理工场的同工。他需要常到工场跑动，这样他才能够了解工场的需要和宣教士的情况。缺少一个这样愿意探访工场的同工，很难明白宣教士正面对的困难，和工场还需要增加什么人手，和很难关怀宣教士。

另外还需要有真心关怀宣教士的同工。负责管理工场的同工固然可以同时负责关顾，但毕竟这位同工是站在行政角度看事情。宣教士不一定愿意敞开心里话，因为他极可能会设防线，这样就达不到关怀的目的了。虽然有这个矛盾，如果工场管理者存有真正关怀的心，也可以弥补一些矛盾的问题。如果差会能有一位真心关怀宣教士的同工，他就可以成为宣教士与差会之间的桥樑。

宣教动员是宣教士的主要来源。差会不可缺少一个这方面的同工。他愿意在不同牧区奔跑，主领或参加宣教大会；在神学院或宣教培训中心讲课，对找到宣教士很有帮助。

差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筛选和差派宣教士，故甄选宣教士是免不了的。差会需要一个甄选委员会或小组。甄选委员会可由上述几位同工组成。宣教士申请人如由宣教动员同工所物色，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如果宣教关怀同工加入小组，不但可以为将来的关怀建立平台，也可以在申请过程中提供指导。工场管理同工是日后管理宣教士的人，他需要了解宣教士的个性、恩赐、人际关系等。

在设立机制时，不可缺少的守则，是差会和宣教士都共同遵守的规则，才不会生乱。

4、职前训练的挑战

差会接纳了宣教士后，在出发上禾场前，差会应提供职前训练给新加入的同工。训练导师就是几位差会同工了。训练时间的长短，要看差会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可由一个月到数月。在这段训练期，差会同工可观察新同工的灵命状况，人际关系，领导能力、语言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等不同方面。受训宣教士也可以彼此建立关系，就算日后在不同禾场事奉，也可以互相记念。差会也当趁机会深入介绍差会，解说守则，说明守则背后的理念等。

5、宣教关怀的挑战

宣教关怀在有历史的差会中，也只是近数十年才开始的事工。海外华人差会在这方面比西方差会发展得更晚，经验其实也不太多。这不但对中国差会是一个挑战，对海外华人差会亦然。可喜的是中国教会已开始认知宣教关怀的重要，并开始尝试。

宣教关怀属预防性而不是治疗性的，在问题还没出现之前，应已提供关怀，宣教士才会感到安慰和得到鼓励。宣教关怀应从甄召就开始，直到他见主面才算结束。宣教士在当中经历被差会接纳，筹款、差派，适应文化，与团队融合，开展事工，回国述职，再回工场，转换工场，面对婚姻关系，孩子教育，年老双亲需照顾，经济拮据，身体健康，退休后的安排，面对死亡等关顾需要，是极大的挑战。

6、道成肉身的挑战

道成肉身是耶稣的宣教模式。要道成肉身，耶稣成为一个犹太人，祂需要学习当时通用的亚兰语，要遵守犹太的传统，守割礼和守节期等，这样祂才能和当代的犹太人认同。同样地，今天的宣教士也离不开这种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而学习语言就是道成肉身的第一步。

几乎所有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宣教士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文化适应，原因与他们学语言有密切关系。不能掌握当地所用的语言，对于进入文化和道成肉身住在他们当中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宣教士在学语言时比较保守，若不确定绝对说得正确，绝不轻易尝试练习所学到的语言，突破自身的障碍，这样自然会影响到道成肉身的宣教。如果宣教士花在学语言的时间不够充分，对学好语言必有损害。

当笔者辅导一个团队的成员时，大部分的宣教士都问可以怎样学好语言。从这问题本身，就察觉到他们在学语言上感到压力。当笔者问他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学语言时，他们都说每天两个小时，由一个当地人担任老师。当笔者问他们上课后有没有出去练习所学的，他们说事工已经很忙了，没有机会出去练习。笔者再问他们的工作场所有没有当地人可成为他们的练习对象时，他们说那些同工都能说汉语。在这种情况下，学语言的进度一定很慢。

要学好语言，笔者认为需要专注和花时间，不宜在学语言的同时，仍兼顾事工。这样不但语言学不好，连事工都因为语言有限而打折扣。能沉得住气，暂不参与事工，专心学语言，勇于练习，是一个挑战。

7、急于求成的挑战

紧随着运用语言的能力之后，就是宣教士需向差派机制报告领人归主的数目。有宣教士觉得教会花了不少资源支持他们，他们若交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来，是对不起支持他们的教会，因而是一种挑战。从另一方面看，也有宣教士觉得教会

在要求成绩，造成他们要面对交帐的压力。其实，平心而论，一个正在努力学习语言的人，没有办法在领人归主方面交出好的成绩，并不是希奇的事，因为他仍未掌握好语言。要求急于求成的教会可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要他用一个他还不熟练的别省方言来传福音，他也会觉得不容易，很难得到期待的效果来。为何不能从一个高瞻远瞩的眼光思考，为了使事工更有效，先给宣教士空间，放下急于求成的想法，全心全意支持宣教士学好语言，让他们先掌握好语言，然后才期待成绩还不晚。

四、冀望和献议

上述提出中国教会宣教现况所面对的七项挑战，笔者在现在提出对中国教会的冀望，和如何进步的献议。

1、加强双职宣教的教导

因为宣教士身分比较敏感，不可能以这个身分领到护照；但另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中国人以出国谋生为由申请护照，比较容易。因此，越来越多宣教士以专业身份，到封闭和开放的国家 and 群体中来服侍。笔者知道近两年来，有两个家庭先后全家申请到护照，也成功获得签证到不同国家。如此看来，中国宣教士未来可能就是以双职宣教居多。所谓双职宣教，表示他不单是一个全职宣教士，而是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所以，笔者冀望持这种签证的人应忠于聘用他的公司，但在他的处境中，以生命或话语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次序不可倒转。同时，宣教士也应注意，是神差派他出国宣教，他也需要向神负责。不应只注重在工作上尽忠，而忘了更重要的是向神尽忠。

也有人以创业方式进到别国去，但不可只看营商光是一个平台，而忽视需要有营利。若不营利，不但无以为继，同时也会引起当地政府和当地人起疑。所以，笔者建议在往后在宣教培训的课程中，加强这些概念，让双职宣教可更具体和灵活应用。

2、本色化的运作

中国教会从西方、韩国与海外华人教会和差会的帮助，得到不少资源和训练。笔者冀望中国教会能发挥批判性思维，把所得的资源和训练消化过后，整理和

发展出合乎中国国情需要的守则、章程和训练，不要直接将手上所有的资源和所学过的训练应用在中国。别人所发展出来的守则、章程和训练背后有他们的文化因素存在，直接应用在中国不一定适合。曾有教会领袖将笔者所属差会的守则拿回去修改后再应用，因对某些条例背后的原因不明瞭，出了些状况。这种经过修改的守则应用起来还会出问题，如果没有经过批判性思维去判断，问题应相对更多。

3、本土性伙伴关系

中国已产生了不少差会，但彼此之间的联系仍属不太强。如果差会之间能产生互助，其力量和果效会更强大。如上文提到宣教培训老师团队的建立，绝不是单一差会可承担的事，极需各差会通力合作，不但课有老师教，不同差会都同得互助的益处。切忌互相猜忌，不愿合作。笔者冀望中国教会在互助互惠之下，在宣教路上更上一层楼。

如有宣教士有意去一个禾场，已有别的差会在那里发展得很兴旺，但自己差会还没有在该地发展过，可考虑合作差派。宣教士属本差会，经费支持和关怀都属本差会，事工督导师则由别的差会负责。这种双赢的关系值得思考。

各差会领袖宜有固定性会面，不管是每年一次或每半年一次，实体或线上见面，探讨宣教议题，交流经验，一同祷告，对个别差会的运作必会带来祝福。

4、全球性伙伴关系

除了本土性合作，笔者冀望中国教会也和国际接轨，从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是宣教路进步的途径。笔者记得开始在差会服侍时，虽然有过禾场经验，但对差会行政没什么了解。在参加过西差会为新兴差会同工而办的训练后，笔者对差会行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后来建立差会系统极有益处。因为参加了这次训练，认识了一些西差会的同工，建立起关系，日后出现问题时，可请教西差会如何处理问题。笔者发现西差会的同工都很乐意提供援助。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差会踏出第一步，可以和海外华人差会建立伙伴关系，相信一旦关系建立后，日后要求援助也比较容易。

结语

中国教会对宣教有一个美丽的愿景，既有宣教意识，又有可被差派的人，但宣教路不是天色常蓝，鸟语花香的。中国教会在宣教路上虽然有不少优势，然而仍须面对不少挑战。首先要建立健康的差派机制，谨慎筛选，加强培训装备和宣教关怀。其次，宣教士须学习掌握禾场的语言和适应文化。第三，因为日渐趋向的双职宣教模式，合乎圣经原则的双职宣教观须确立，培训过程就是确立的最佳平台。第四是建立本土性宣教伙伴关系，互助互补，使宣教模式越趋成熟，或可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五是建立国际伙伴关系，谦虚讨教和学习。祝福中国教会在建立神国度上成为祂所使用的器皿。☉

参考文献

- 连大理。《差传事工手册：教会、差会、宣教士》。台北：校园书房，1991。
- 李圣风。〈中国教会与宣教事工〉，原载在《大使命》，2011年第九十五期，页11-15。
- 李圣风。〈2030 宣教中国〉，原载载《今日宣教》，2015年第一期。eats.ac/eats_plaza/news/?uid=18&mod=document.
- 林大卫。〈中国教会现况与未来发展〉，原载在《大使命》，2013年第一百零五期，页22-26。
- 《普世佳音》。〈中国教会在宣教中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http://production.lifejiezou.com/node.php?nid=16396)
- Brandner, Tobias. “Chinese Missionaries in Cross-Cultural Overseas Mission: Emergence of a New Mission Nat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7, No. 3, 2023, pp. 356-369.
- Chan, Kim-kwong. 《本土宣教运动历史回顾》(The Indigenous Mission Movement in China: A Historic Overview). *China Source*, January 29, 2014. https://

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articles/ben-tu-hua-xuan-jiao-yun-dong-li-shi-de-hui-gu/.

Ho, Mary&Mak, Rudolph.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6, No. 1,2022, pp. 60-70.

Yao, Kevin Xiyi. “The Chinese Church: The Next Superpower in World Mission?” *Evangelical Mission Quarterly*, Vol. 50, July 2014, pp. 296-303.

宣教中国2030运动的发展、挑战与展望

文 / 金但以理¹

撮要：2022年11月1-4日，举行了以“突破局限·凭信差传”为主题的宣教中国大会，本文内容整理自笔者在大会中分享的主题信息“MC2030的局限突破与凭信前行”。中国教会在疫情时代，遭受了多方面的局限，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拦阻。但是在局限中也有很多凭信突破的经历与见证。笔者先回顾了MC2030运动发展的历程，接着分析了MC2030运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种种挑战，并指出突破的途径，最后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MC2030 发展历程 现状挑战 突破局限

¹ 金但以理牧师，宣教中国2030运动（简称MC2030）共同发起人，与神同行联祷祭坛共同发起人。宣教学博士。

中国教会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进入到宣教中国的时代。如果以百年为一个时间段来看中国教会，我们可以把中国教会分成三个阶段：1807年到1907年是第一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关键字是中国宣教（China mission）；第二个百年是1907年到2010年，第二个百年的关键字是中国教会（China church）；2010年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教会进入到第三个百年时代，第三个百年的关键字是宣教中国（mission China）。在宣教中国的时代，MC2030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运动，将神在中国教会当中的宣教浪潮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MC2030的发展历程

回顾过去这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看见中国教会从1970年代的恢复期到1980年代的发展期，到1990年代的复兴期，又到2000年代的装备期，在2010年之后中国教会就进入了宣教期。

在2013年“亚洲教会领导力论坛”当中，有中国教会的牧者提出了宣教中国2030的异象，于是从2015年开始全国各地众多牧者们联合起来推动的MC2030运动就开始了。2015年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动员大会，当时注册报名人数有851位，三分之一是牧者，67个教会作为主要的发起人教会，还有差不多132个教会，21个机构参与；整个大会是由9场信息，52个工作坊组成，在整个大会当中产生了将近200多位愿意奉献做跨文化宣教士的参会者。在香港动员大会当中也发布了宣教中国2030香港宣言及行动纲领。

2016年在济州岛举行了第二届MC2030大会。第二届的济州岛宣教动员大会参会人数将近有1034位，70%是牧者、机构、同工及宣教士，一共有122个教会及机构作为宣教合作伙伴。在那一次大会当中有8场主题信息，42个工作坊，以及5个分科的报告，也同样有200多位在呼召中回应上帝，愿意献身做跨文化宣教士。

2017年在泰国清迈举行了第三届MC2030大会。第三届的大会也是第一届的中国青宣大会，参会人数有1129位，合作的伙伴代表有38位，牧者及团契的同工有152位，参加的青年人包括在校生将近有600多位，来自41个城市和地区，参与的教会有110个教会，以及50个机构。在那一次的大会当中，也是同样有两百多位愿意献身做校园事工及跨文化宣教事工。

2018年的MC2030大会是在国内和海外同时进行的，包括有西北区的宣教会议，西南区的宣教会议，东北区的宣教会议，东南区的宣教会议，还有在海外的耶路撒冷先宣教会议，以及新加坡的宣教会议，在2018年让人看到宣教行动的蓬勃兴起。

2019年是一个回顾过去以及展望未来的时间。回顾过去这几年走过来的旅程，我们看见上帝的带领，每一年都举行了联合的宣教大会，并且在区域性的地方也开始有一些宣教大会。MC2030发展出了几个宣教分科，例如MC0、MC1、MC2、MC3、MC4、MCY，还有一些如《今日宣教》等宣教杂志的创刊及发行。这几年的时间一些新的宣教训练中心成立，也举办了几次策略性的宣教论坛，例如泛喜马拉雅藏宣策略会议、天山论坛穆宣策略会议等。也有一些新的差会在这几年被建立起来，开始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去往世界各地宣教。

2020年，因着疫情的原因，我们以为各样的宣教活动，各样推动事工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在疫情当中却借助网络使我们彼此联结，敞开了更多更大的大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随着疫情的发展，先是为国内祷告，但是后来疫情继续扩展到海外，中国教会的众多牧者一同为着世界各地祷告。特别是2020年的时候，因着摩拉维亚教会的激励，中国教会众同工提出从百日的24小时祷告链，展望百年的祷告链。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有四个方面的百年展望：第一，祷告中国，与神同行，百年祷告；第二，复兴中国，教会井喷，百年复兴；第三，平安中国，社会转化，百年更新；第四，宣教中国，祝福万族，百年宣教。

我们从2020年4月1号开始，每一天为一个国家祷告，一直到12月底为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祷告，这是我们没有想到过的。上帝很奇妙地扩展了中国教会牧者们普世的胸怀，借着疫情为世界各地祷告的过程中，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教会牧者们对整个普世宣教的视野以及负担。在联祷过程中，也发展了宣教的策略，建构了宣教的架构，踏上更加正确的宣教路线，并期待实践许许多多前辈们为我们留下来的美好的宣教方法。宣教中国2030带着以下的一些的策略，在一步一步地实践及推动，其策略一共有八个方面：第一是关注未得之民的普世宣教；第二是持守宣教形象的普世宣教；第三是具备宣教研究的普世宣教；第四是动员宣教人力的普世宣教；第五是做好宣教教育的普世宣教；第六是进行宣教差派的普世宣教；第七是搭建宣教网络的普世宣教；第八是强壮宣教基地的普世宣教。

2020年的“与神同行在疫情中”的联祷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奇妙地引导和带领中国教会，渐渐形成一个祷告运动与宣教运动并行的发展模式，即建立以祷告为根基的宣教运动，以宣教为导向的祷告运动。

在2021年，百位牧者连续25个小时进行了联祷，以此作为联祷一周年纪念特会。在十一月的时候，又有百位牧者一同聚集，共同为宣教中国2030运动起草了共识，并提出了“百年祷告百年宣教的倡议书”。

2022年，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中举行了线上的MC2030大会，以“突破局限·凭信差传”为主题，藉着4堂查经信息、8堂主题信息、4堂培灵信息、4个宣教见证、8堂敬拜赞美、12个视频回顾、以及25个工作坊，探讨当下中国教会宣教运动的局限及突破的途径。

二、MC2030的现况挑战

观察近十年的MC2030运动的发展，其中有很多神奇妙的带领与祝福，同时也有诸多的挑战与局限，需要委身宣教运动的工人们去突破。下面我们先看一下MC2030运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些挑战。

（一）MC2030面对的挑战

1、宣教理念参差不齐

在推动MC2030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宣教理念参差不齐。宣教到底是什么？宣教包含的范围应当有多宽？或者宣教在本地与外地之间如何同时并进？还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关于宣教理念方面参差不齐，有些人认为本地的宣教还没有做完，哪有精力、哪有那个能力去到外面去宣教。有些人认为我们教会这么小，没有什么体量，也没有什么资源，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能力来投身在普世宣教当中呢？对宣教的圣经基础，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方面，呈现出很多参差不齐的现象。

2、宣教异象模糊不清

其次的问题是宣教异象模糊不清。当教会被挑旺起来要去宣教的时候，到底应该往哪里去宣教？到底应该做怎样的宣教？这样的一个宣教究竟是从上帝

那里来的，还是从哪一个牧者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宣教的异象模糊不清的时候，如圣经里面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就随随便便随己意进行宣教事工。

3、宣教热情起伏不定

宣教的热情也是起伏不定。宣教的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所以开始充满热情地投身宣教运动，在中间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处，就容易打退堂鼓，就容易脱离宣教的队伍。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开始推动的阶段热情万丈，但是到了面临挑战的阶段，宣教浪潮就会下沉，就会走下坡，那时人的热心，也随之下降……一个能否持续长久的宣教运动，就成为中国教会眼下一个巨大的挑战。宣教热情的起伏不定也限制了一个长久性的宣教事工，一个有果效性的宣教事工。

4、宣教胸怀狭窄封闭

宣教胸怀狭窄封闭，更是宣教运动当中的局限与挑战。特别是一些牧者们，他们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其他地区的宣教使命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牧者的眼光 90% 以上的时间，都只关注墙内自己教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胸怀，势必会成为教会走向普世宣教的拦阻，会成为一个极大的限制。宣教的胸怀是宣教运动蓬勃发展的很实际的局限。

5、宣教策略莫衷一是

宣教策略莫衷一是，也成为 MC2030 运动向前发展时的局限。如果用好策略的时候，它会让一个事工非常有果效地发展，策略用得不好、或者是没有策略的时候，就会出现尽一切努力做了事工，结果却变成打水漂的结果的情形。缺乏宣教策略，会出现资源用错方向的结果，或者是很多资源重叠在一起、而浪费神国资源的行为。宣教策略需要在一个宏观性的视野当中，构思一个整全性的方案，例如从现今到未来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上帝带领我们走向的那些目标，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

6、宣教资源普遍匮乏

还有宣教资源普遍的匮乏，也是一个宣教运动发展的挑战。按理说，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经济发展已经是非比寻常，宣教资源应当丰

富才是。比起三十年前，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发展的阶段，但是当提到宣教的时候，当预备推动宣教事工的时候，当有宣教的人才愿意献身的时候，甚至出去真正进入长宣的时候，为什么支持那么少？为什么资源那么缺乏？为什么没有一个后方强有力的支持和力量，使他们在前方没有后顾之忧的去事奉呢？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宣教士还要依靠海外教会的支持才能在禾场生活及事奉呢？可见，也许外在的经济发展了，但是里边的慷慨之心却没有改变，里面的那种宣教方面的投入力度却没有提升，自然就会带来资源匮乏的局面。而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匮乏，成为 MC2030 发展的又一个局限。

7、宣教联结松散乏力

宣教运动发展的又一个挑战与局限就是宣教联结松散乏力。我们感谢神在联祷运动当中兴起了全国各地教会彼此的联结，这是一个神的恩典。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或者是现今仍然有很多地区的教会之间的联结是非常松散的。彼此之间有很多门槛和障碍，使得基督的身体不能够有效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兴起一个更大的中国教会合一复兴的浪潮。当彼此之间互不往来，山头主义蔓延各处，当各地的教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大公性教会、普世性教会、彼此在生命里联结的意义的时候，教会就很难建立国度性的联接，就不能形成合一宣教的浪潮。

（二）中国教会面对的挑战

上面从 MC2030 运动角度总结了七个方面的局限与挑战，在下面进一步分析一下当下中国教会普遍面对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在宏观层面对 MC2030 运动形成了诸多的限制。

1、政策环境越发紧缩

从 2018 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颁布之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宗教院校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之后上海、北京、重庆、天津等直辖市，以及甘肃省、江西省、山东

省等 21 个省份纷纷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予以跟进。政策环境越发紧缩，各地教会的发展受到全面的限制。

2、疫情扩散加强管制

三年多的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在疫情中采用健康码等科技手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管控实践。在清零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层面进入全面的管制局面。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其诉求是圣徒相聚，但是疫情管控制度却是要求全面隔离。中国教会在疫情中也面临了无法线下聚会的巨大挑战。

3、堂会模式遇到瓶颈

在疫情之前，各地堂会模式的教会已经开始被有关部门施压，要求解散或取缔。在疫情之中，更是无法以堂会聚众模式进行聚会。双重的挑战与压力之下，堂会模式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习惯于堂会模式聚会的信众，骤然不能线下实体聚会时，出现了很多流失的现象。

4、神学教育招生困难

这几年的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院，普遍存在招生困难的情况。虽然 2022 年大学毕业生超过一千万，有近 20% 的年轻人失业，但是仍找不到太多回应上帝呼召，愿意踏上全职事奉的年轻人。三年的疫情，显然还不够震醒这些人的思维，人们并没有因此看透今生的虚空，追求永恒的意义。

5、灵性光景普遍低沉

疫情之中因着缺乏实体聚会，以及来自社会管制等的压力，信徒们的灵性光景普遍低沉。就算是疫情后可以恢复线下聚会了，还是有很多信徒没有回来聚会。美国和韩国教会在疫情之后主日聚会人数下降了 30%，台湾教会主日聚会人数下降了 30-40%，而中国大陆的教会主日聚会人数下降的比率可能比这些还要高。

6、教会事工趋向内卷化

当灵性光景低沉，教会发展受挫，并呈现走下坡路的倾向的同时，教会的事工在各种限制打压、疫情管控当中渐趋内卷化。甚至有一些神学理念，为

教会的内卷化提供一个方向性的贡献。而内卷化的危机就是对神国度性使命的忽略，并带来教会更多的停滞与退步。这些都成为当前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局限与挑战。

7、社会影响空间缩小

在疫情管控政策之下，政府不断缩小民间团体的活动空间，教会在社会的影响空间也在不断缩小。本来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会最丰富的爱心资源，对人民的需要贡献出一份力量，但在诸般限制之下，教会对社会的影响空间在不断缩小。

三、MC2030 的局限突破

上面分析了 MC2030 发展过程中面对的诸般挑战以及当今中国教会面对的各种局限。面对这些局限与挑战，要如何突破与得胜？在下面先从中国教会层面进行探讨，之后再从 MC2030 层面提出突破局限的建议。

（一）中国教会如何突破局限

1、突破政策环境越发紧缩的局限——走十架道路

中国教会在面对一些政策环境越发紧缩的时候，我们突破局限的途径就是预备走十架道路，真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教会在这地上不是要建立一个乐园，教会在这地上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带着一个受苦的心志来迎接充满挑战的世代，是反而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局限的途径。

2、突破疫情扩散加强管制的局限——云聚会模式

疫情扩散加强管制怎么办？线上聚会的模式好好发展，就是一个突破局限的方式。在疫情期间，封控政策令教会突然不能够进行主日实体聚会。但圣经的教导是“不可停止聚会”，因此就出现通过 Zoom, Webex, YY, 腾讯视频, 微信视频等方式进行各种聚会的现象。通过这些科技产品的应用，令中国教会有效的突破了疫情管制带来的局限。

3、突破堂会模式遇到瓶颈的局限——微教会策略

堂会模式受到瓶颈，怎么办？这一瓶颈突破的方式就是微教会发展策略。小组教会、微型教会、籽粒教会、家庭教会等模式，成为这几年中国家庭教会积极探讨的课题。这些教会模式都是采用小型化发展的路线，尝试在网格化管理的时代，继续保存力量及倍增发展。微教会模式不只关注变小，同时发展其联络性、整体性、网络性等的特性，就可以有效突破堂会模式遇到的瓶颈局限。

4、突破神学教育招生困难的局限——延伸制教育

神学教育招生困难的局限怎么突破呢？神学院不要等人来神学院，要走进教会当中，多多地发展延伸制的教育模式。人们不来我们这里，我们就要进入到他们中间。当神学院走进各个教会的现场，走到一些需要的人群当中的时候，神学教育还可以继续发展，并装备大量的教会同工，使他们兴起成为时代的工人。

5、突破灵性光景普遍低沉的局限——联合培灵会

灵性光景普遍低沉的局面，怎么样来进行突破？我们可以组织联合性的培灵会，跨区域的培灵会，跨地区的培灵会，整合各地的资源，共同来推动培灵。特别是线上聚会，完全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人数的限制，进行联合性的培灵聚会。

6、突破教会事工趋向内卷的局限——国度性事工

教会事工趋向内卷的局限怎么样突破？要建立国度性的眼光与心胸，多多地发展国度性的事工，例如联合的祷告运动、以及宣教运动。从2020年2月1日以来，“与神同行”联祷运动一直持续至今。每天廿四小时祷告链及每天晚上的联祷祭坛，有效的扩大参加者的眼光，并真实的参与国度性的祷告运动之中。

7、突破社会影响空间缩小的局限——公益与慈善

那么，社会影响空间缩小的局限，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突破？教会要更多的思考，如何参与公益？如何参与慈善？我记得之前跟一些政府人员谈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是一个爱心资源很丰富的群体，那么在社区里边有需要的我们能否跟你们一起合作来参与，他们当时就说，你们是有注册登记的教会吗？我说我们

是家庭教会，但是如果没有法人身份的话我们很难合作，如果个人身份的话就可以，我们可以鼓励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个人身份参与在公益和慈善当中，这样的空间相信是很大的。

（二）MC2030 如何突破局限

1、突破宣教理念层次不齐的局限——宣教研究

那我们继续思想 MC2030 如何突破局限向前走。如何突破宣教理念参差不齐的局限？就是需要好好的发展宣教研究领域的事工。宣教研究也指各样宣教理论与策略的发展。通过定期的研讨会，在各样理论与策略的探讨中，形成共识。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文字事工。将宣教研讨的成果，藉着文字及各样新媒体进行普及，渐渐提升教会牧者与信徒们对宣教的认识。

2、突破宣教异象模糊不清的局限——宣教教育

如何突破宣教异象模糊不清的局限性？需要上把握时机、展望课程，需要接受一些普及型的宣教教育。这些经典的宣教教育课程，从圣经、历史、策略、文化等角度清晰地整理出跨文化宣教的理念与策略，可以让学习者在短时间内确立基于圣经的宣教异象。

3、突破宣教热情起伏不定的局限——宣教动员

那么如何突破宣教热情起伏不定的局限？我们持续地组织宣教动员会，包括像这一次的宣教大会，这就是一次让我们的热情重新被点燃的机会。我们在这样的大会当中，借着上帝众仆人所传递的信息，借着一线宣教士们的见证，借着过去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重新燃起我们心中的热忱，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把自己焚烧，献在神的祭坛之上，被上帝使用为一个时代性的工人。

4、突破宣教胸怀狭窄封闭的局限——短宣访宣

我们如何突破宣教胸怀狭窄封闭的局限性？我们抓住机会，若是能够参与短宣，参与访宣，当我们进入到禾场，就会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就可以看见各地的需要。求主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带领更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们，走进未得之民当

中——能够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在那偏僻的角落里有哭泣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而且是在禾场中去听见这样的呼声。

5、突破宣教策略莫衷一是的局限——宣教研讨

那么，如何突破宣教策略，莫衷一是的局限？就要举行一些宣教研讨会，一定有一些人，他们是走在前面的，那么当我们彼此在研讨会中分享经验的时候，就可以为宣教事工寻找出一个更好的策略、对应的策略、应时的策略，并且是有果效的策略。宣教研讨会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教会的牧者与宣教士，需要谦卑地跟走在前面的西方宣教士、韩国宣教士、海外华人宣教士多多地探讨、多多地学习。

6、突破宣教资源普遍匮乏的局限——宣教教会

那么如何突破宣教资源普遍匮乏的局限呢？就是需要兴起更多宣教教会。我曾经在韩国，采访过韩国的一间宣教型教会的牧者，我就问他韩国教会在过去宣教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教会这个层面上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介绍给中国教会？他就讲说韩国教会经历宣教的浪潮，除了差派了两万多名的宣教士，还有一个就是有三百间很重要的关键性的教会。我就问他，这三百间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他说这三百间教会是“五十/五十的教会”。什么叫“五十/五十的教会”？就是教会的所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及财力资源等），50%用于内部、50%用于外展，教会的宣教奉献占整个教会预算的一半，这就是“五十/五十的教会”。这样的三百间教会，就能够推动起差派两万多名宣教士的宣教浪潮。那么今天中国教会能否也兴起更多这样的宣教教会？能否有50%的预算是投入和支持宣教？能有300间吗？你的教会可以是其中的一间吗？

7、突破宣教联结松散乏力的局限——宣教联动

那么如何突破宣教联结松散乏力的局限？答案是宣教联动！我们不能成为关起门来、只顾自己眼前教会牧养需要的牧者，我们希望更多的牧者能够有一个国度性的眼光和心胸。我们不单单是地方教会的牧者，我们也是这世界的牧者，就如约翰卫斯理所宣讲的：“世界就是我的牧区”。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与心胸事奉的时候，就会知道彼此联合的宝贵性，彼此联结的重要性，合一宣教的必然性！

四、MC2030 的凭信前行

第四方面，我想展望一下 MC2030 如何凭信前行。《以弗所书》三章 20 节，想送给与会的每一位牧者、同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一）信心传承

过去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局限中的突破，我们已经观看了上帝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教会中所成就的许多荣耀的作为。但是祂的工作结束了吗？没有，还有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大的工作，还有更加精彩的上帝的作为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主的脚踪，参与上帝在这个时代所兴起的宣教运动里面。我们要凭信而行，而且在过去已经有许许多多蒙上帝的呼召，踏上神救恩计划的先贤们、信心的前辈们，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使我们能跟随他们的脚踪凭信而行。

亚伯拉罕蒙上帝的呼召踏上信心之路时，经历到人生一个极大的考验，就是把自己最宝贵的孩子献上。在这样的考验面前，他选择了凭信前行。摩西在八十岁，觉得自己完全不行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此时摩西需要凭信前行。当法老王一次又一次阻拦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必须凭信前行。大卫在面对歌利亚这个常胜将军的时候，毫无畏惧、凭信前行。但以理在巴比伦这个宗教政策极其严厉的国度里，仍然持守他的敬虔、凭信前行，结果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使徒们也同样是凭信前行，他们原本只不过是巴勒斯坦地区一个小小民族当中的少数不起眼的存在，结果一个个却变成像瘟疫一样，最终感染了整个世界。当年在巴勒斯坦地区所传开的福音，如今传遍了世界六大洲，传遍了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并在各个地方带来福音的果实，起因就是这一批使徒们的凭信前行。保罗一生不违背起初的异象，凭信前行。虽然在他事奉的道路当中，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以及各种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仍凭信前行，从而奠定了福音广传外邦世界的基础。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历史上一代一代的先贤们凭信前行，在他们的世代忠心见证基督、广传福音。似乎他们在向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发出呼召与挑战：“今天是轮到你上场，是轮到你们上场，在今天这个时代与神同行，在今天这个时代见证神的荣耀，

在今天这个时代紧紧跟随耶稣的脚踪，参与神宏大的故事当中，参与神救赎万民的伟大计划里面！”

（二）凭信前行

宣教中国 2030 运动是宣教中国运动中一股支流，所提的 2 万名宣教士的目标是为中国教会所提出的阶段性的目标。到 2030 年，我们现在还剩下几年的时间，我们需要凭信前行。这个运动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我们这几年也参与在其中，共同见证了神荣耀的作为。虽然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挑战、试炼、压力，但是更多的是喜乐、恩典、与感恩。因为神在带领我们前行，所以我们相信在 2030 年的时候，神在中国教会身上的计划必能成就——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将属天的祝福分享到万族万民中的教会。

（三）携手同行

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不只需要凭信前行，还需要携手同行。一个人会走的快，但众人一起走才走的远。宣教中国运动需要兴起一批批的伙伴教会，一同携手、共同前行。在 2021 年的百牧会议中，近百位牧者共同整理出了《宣教中国运动的共识文本》，其中确认了“①宣教中国运动的本质；②宣教中国运动的动力；③宣教中国运动的异象；④宣教中国运动的目标；⑤宣教中国运动的策略；⑥宣教中国运动的主体；⑦宣教中国运动的方向；⑧宣教中国运动的合作”等多方面的共识。这是一个携手同行的基础，但需要更多携手同行的实践。

（四）领袖团队

在过去的 MC2030 运动当中，我们看到众多教会联结在一起，一同参与宣教运动。2020 年开始的联祷运动中，看到更多的教会走在一起。宣教运动与祷告运动，两者同时并进，形成了更加合一、联动的局面。在过去的宣教运动与祷告运动中，浮现出了众多宣教的领袖，即每一届宣教大会的主席、耶稣领导力的成员、全国联祷祭坛在各处的核心同工，以及各团队 / 联祷会 / 机构的领袖群体。这是神在这个时代所兴起的领袖团队。上帝兴起了这一批人，将负担放在这一批

人的心中，将宣教的热忱燃烧在这一批人的心中，这我们看见，神正在兴起这批领袖团队带领众教会一同走向合神心意的目标。

（五）事工推动

宣教中国运动不只需要异象，也需要很多具体的、实际的事工推动。2015年第一届宣教大会的时候，提出了11个行动纲领，而在过去近十年的宣教运动的推动中，这些行动内容一样一样都在落实和实践。例如举办宣教大会，几乎每年都在进行；例如发行宣教刊物，虽然停刊了，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复刊；例如进行宣教研讨，推动宣教祷告，培养宣教人才，兴起宣教教会，开发短宣路线，发展宣教工场，建立宣教网络，这些都在实践。在各地蒙上帝呼召的工人，带着宣教的负担和异象，在神所预备的岗位上忠心投身的时候，这些事工就能更好的推展，宣教中国运动会更加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六）策略展望

宣教中国2030的策略是一个整体性的策略，不能够只关注某一个领域，也不能只发展某一项事工，而是在各个方面要齐头并进，包括关注未得之民，持守宣教异象，具备宣教研究，动员宣教能力，做好宣教教育，进行宣教差派，搭建宣教网络，以及强壮宣教基地等。这几个方面想要同时并进，就需要众多同工们的集体努力，也需要众多团队和教会，能够在各个方面共同参与。

我们借着建立众多宣教型教会，持守宣教异象，建立宣教网络，推动宣教事工，发展出一个整全的宣教生态系统，宣教中国2030的异象必能够实现。宣教中国2030的异象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能够迈进宣教中国的时代，当然它的前提是先还完两万宣教士的债，因为我们过去领受了这两万名宣教士。我们希望能够还这两万名的宣教士的债，在我们看来，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说我们进入到一个宣教中国的时代了。

（七）异象实践

过去上帝使用过犹太人，使用过罗马人，使用过欧洲人、美洲人，那么如今上帝正在兴起亚洲的教会。我们也渴望中国教会，能够成为其中一个上帝兴起祝福和使用的教会。神的心意是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神的心意是要让

普天下那些黑暗之地的百姓都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渴望上帝能够怜悯中国教会，祝福中国教会，装备中国教会，使用中国教会，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见宣教中国的成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看见大使命的完成。

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上帝能够使中国教会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

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亲自纪念我们众多神的工人，一同回应你从天上来的呼召，投身其中的事奉。让我们做就做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跟就跟在你的脚踪后面，让我们能够一生与你同行，让我们能够成就你在中国教会身上所存的那永恒的旨意。谢谢主继续复兴中国教会，更多的使用中国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

反思当代中国教会 宣教的得与失

文 / 铭贤

撮要：此文为作者多年对中国宣教之持续参与、观察、跟踪、思考与宣教同路人接触、讨论、会议的成果。他尝试从教会、差会和宣教士三个角度或层面全面、宏观，并力求客观地分析，但仍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偏颇之处。所以，冀望此文能够引出更多的指正、提点与讨论。

从教会角度反思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得失，主要集中在宣教动员、短宣体验、钱援宣教、宣教培育、研讨会议、双职与营商宣教，以及整体水平等方面。我们将“得”与“失”，积极与消极，果效与不足平衡思考，力求做到不偏不倚。

从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层面之得失检视，作者会将重点放在训练装备、差派督导、支援系统、差传研究、应对危机和搭配合作等方面。态度与反省也趋于更加严谨、甚至苛刻。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教会本土差会之架构机制，亟需完善并不断更新，因为此乃差会稳定健壮，健康持续运作的基础。差会经济需要完全因信靠赖上帝，因为这是祂自己的工作，如

果是做在祂的心意之上，就必不缺乏供应。差派工人必须严格甄选，以保证宣教士们能长期委身宣教禾场与事工，降低宣教士的流失率。差传训练，需要立于实战实践的宗旨，相对足够地，针对性地装备训练。而差传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地，站立在前人经验和专业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地发展。

作为一个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本文作者每每想到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为数不多，却又极为宝贵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们，心中深感神恩浩大。在倍感尊荣并感恩的同时，也深切明白自身的软弱与不足。所以，他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讨论宣教之“得与失”时，强调我们需要肯定自己，亦需冷静面对自身的问题，并能积极对待之。

关键词：当代中国教会 宣教士 差会 差传 得与失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 10:1-2）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 10:17-20）

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差遣 70 个人出去传道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非常看重事奉与事工的评估与检讨，而且祂亲自带领门徒们检视反思，并及时调整他们的服侍心态与关注焦点。此成为我们今天所讨论之主题的宝贵基础。

关于当代海外华人教会差传运动之源起与发展，粗略整合来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此看法为华人教会界达成的基本共识。主要是因为“洛桑运动”

催生出的，于1976年开始的“华福运动”所带来的宣教动力。甚至有人说，“华福运动”是“洛桑运动”的华人版，海外华人教会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中得着激励和指引的。

当代中国教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主要精力放在恢复教会、祷告牧养，以及门徒训练和神学教育的发展上。差传运动之历史与发展是世纪之交前后才开始，不过20多年的时间。如今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已为普世教会所高度关切瞩目，当代中国教会宣教运动已经到了回顾与展望，反省与检视的必要时刻。

一、“得失”研究价值

1、缘起

十年前，香港浸信会差会与香港差传事工联合会于2011年4月16日，假尖沙嘴浸信会小礼堂联合主办宣教研讨讲座，出席者超过一百位。主题为“反思华人/香港教会宣教的得与失：一个谦卑的尝试”。

负责主题信息的是香港浸信会差会总干事及锡安浸信会义务顾问牧师连达杰牧师，两位回应讲员分别为国际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担任亚太区顾问及海外亚裔动员部副主任的梁永强牧师及香港差传事工联合会总干事洪雪良牧师。

是次讲座主题，研讨信息，激起笔者之极大兴趣。自己时常思想何时中国教会能举办一次关于“中国教会宣教得与失”研讨会？！在盼望、等待之时，心想倒不如自己先写一篇关于此主题的文章。但是由于宣教经验尚浅、资历不够，再加上联系网络局限，信息量不足等原因，一直拖到今天，拖了十年之久。

虽然十年以来，也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检讨反省的文章，但多属于较小范围、专门主题、与事工的文字。

比如2011年的“梦想起飞”。2012年的“当代中国教会面对之重大挑战”，“中国教会跨文化的角色、态度与挑战”和“中国宣教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2013年的“春天寄语——人生、事奉、事工之思考”。2014年的“跨文化宣教——中国教会，你准备好了吗？”。2015年的“关于‘宣教中国2030’之思考”，“新疆穆宣事工思考”和“再谈‘福音出中国’”。2016年的“宣教的中国教会——如何践行宣教”，“中国教会宣教新方向”，“谁来关心我——中国少数民族宣教现状分析”和“中国教会宣教训练模式探讨”。2017年的“也谈‘一带一路’战略

与中国宣教”和“中国宣教神学教育的发展、挑战与机遇”。2018年的“持守与持续”和“宣教是篇大文章”。2019年的“中国教会的处境与事工发展趋势”和“仍旧说话的遗址——北非早期教会”。2020年的“全球疫情下的省思”，“疫情常态下的宣教处境、路向与策略”，“疫情常态下的非洲事奉策略思考”，“疫情中的宣教士关顾与宣教士的自我调整”，“中国差会与国际差会合作的需要与设想”，以及“华夏与华传之合作差传”。2021年的“中国教会宣教士关顾辅导的训练”和“华夏使团与非洲内地会之差传合作”等等文章。

此文算是比较宏观地、全面地、整合地对当代中国教会宣教之反思尝试，当然所有的观察、观点、思想与反省，也都是建立在过往多年的众多文章基础之上的。

在此，也要特别感谢“反思华人/香港教会宣教的得与失：一个谦卑的尝试之一”宣教研讨会的连达杰牧师、梁永强牧师、洪雪良牧师的分享，给予笔者反思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得与失的方向与角度，以及为中国教会所提供的海外华人教会宣教得与失的诸多信息资料，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海外华人宣教状况，并谦卑学习、参考并借鉴其经验教训。还有香港差传事工联合会资深研究员熊黄惠玲老师通过研究香港教会多年普查数据而得出的对香港教会差传运动之深刻反省。所以，此文在反思当代中国教会宣教运动得与失时，笔者也会缕列一些海外华人教会，尤其是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的差传经验。

2、局限

此主题是一个庞大的课题，研究相当不易。除资历与经验以外，此主题研究之局限还在于中国教会自身所处的环境，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故没有办法进行量化的统计数据研究。不能如西方或海外华人教会般，有专门的机构每年都会整理出详尽的“教会研究数据”、“全球差传数据”和“年度差传数据统计”等。比如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推出的“香港教会研究”，以及香港差传事工联合会推出的“香港教会差遣宣教士统计简报”等。

此文为笔者多年对中国宣教之持续参与、观察、跟踪、思考与宣教同路人接触、讨论、会议的成果。由于缺乏量化的统计分析数据支持，难免带有主观性，甚至以偏概全。请同工们切记不要对号入座，仅供同路人参考。由于这个主题极

具研究价值和意义，而中国教会也实在需要面对和反省这个重要的宣教主题，所以，还是靠着神的恩典坚持尝试。

3、澄清

“得”是指中国教会、差会、神学院、宣教士和神的百姓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宣教的意识、理念、行政与策略、事奉与事工等方面，相较从前有明显的长进，并取得可见的显著果效。

“失”是指中国教会、差会、神学院、宣教士和神的百姓等经过多年的努力，但在宣教的意识、理念、行政与策略、事奉与事工等方面仍然有所忽略，或表现与果效，只是强差人意。

梁永强牧师认为，所谓“得与失”很难一概而论，要界定“得与失”固然不易，更何况一处的“失”，可能在别处已做得很好，即使真的是“未如理想”的“失”，同工们也已尽上最大的努力改善。因此说“失”也未免流于主观，对这些努力的同工来说，也有违公平；然而，若不检讨和反省便很难从以往走过的宣教路，得到经验并且改进。

连达杰牧师也指出，“得”与“失”的定位并非是绝对的。意思是说，教会“得”了以后，若果流于自满，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不再继续努力，有一天也会变成“失”。反过来说，“失”去以后，如果教会愿意正视问题，对症下药，寻求出路，并不断地努力改善。也会尝到“得”的成果。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叫我们在“得着”之时，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在“失去”之时，则仍可以不断地燃点盼望。

所以，“得与失”是相对而言的。在你是“得”，在他可能是“失”，反之，亦然。所谓“失”，并不等于“错”，而是不足之处或有待改善的地方。如何让“失”转变成“得”，才是我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还有，在同一个宣教问题上，会表现出既有“得”，也有“失”的情况。或者也会出现“得”、“失”参半；“失”多，“得”少；“得”多，“失”少等现象。这是本文所重点着眼之处，就是将“得”与“失”放在一起分析反省，以求尽量平衡与客观，并持积极反省，努力改善的心态。我们主要从教会、差会、宣教士三个层面予以思考讨论，来检视当代中国教会宣教的“得”与“失”。

二、教会角度

从教会角度反思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得失，主要集中在宣教动员、短宣体验、钱援宣教、宣教培育、研讨会议、双职与营商宣教，以及整体水平等方面。我们将“得”与“失”，积极与消极，果效与不足平衡思考，力求做到不偏不倚。

1、教会宣教动员

1) 在宣教理念上，当代中国教会在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争争辩辩，小会大会，学习研讨之后，从东到西，大江南北，城市乡镇的中国教会都基本上认同了应该“宣教”的观念，认同宣教应是每间教会和每个神的百姓之使命与责任。尽管各地区教会对“宣教”的观念仍然不尽相同。

当然，至今仍有部分教会对宣教，仍然比较冷淡。根据“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分别在2004年及2009年所作的全香港教会普查数据，约占四成的教会，在宣教路上仍未起步，仍显得徘徊犹疑、裹足不前，一些教会仍抱“差传与我何干”的态度。我们可以估计，中国教会至少在半数以上的教会仍在此之列。而“两会”领导下的公开教会，由于自身的处境与限制，我们相信比例更高。

究竟为什么有些教会多年来在差传事工上仍是原地踏步，这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究竟是人力、资源不足未敢起步？还是牧者无心无力去推动？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和《圣经》的教导？还是神的子民额坚心硬，对基督的吩咐置若罔闻？抑或是因教会内部问题丛生，无法兼顾宣教？

2) 在祷告动员方面，当代中国教会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有大批神的子民，千千万万神的百姓“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结 37:10），在为基督福音的兴旺，神国度的扩展，至死忠心地恒切祷告。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参太 6:9-10），“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 67:2）

由于中国教会宣教视野的不断扩展，普世宣教的持续参与，网络信息的不断丰富，宣教祷告事奉遂从空洞转向具体详细。为少数民族祷告，为各国各族祷告，为宣教工场祷告；为穆斯林祷告，为小乘佛教国家地区祷告；为非洲祷告，为印度祷告；为战争国家祷告，为疫情祷告；定时祷告，通宵祷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认领祷告等。这些绵延无尽的祷告，像大水的声音，像军队哄嚷的声音（结

1:24), 形成江河, 汇成大海, 造成当代中国教会祷告宣教的历史篇章。这是宣教动员的“得”。

另一方面, 祷告宣教动员也有“失”的现象。虽然祷告参与人多, 而且是此起彼伏, 昼夜不息, 甚至涛声雷动。但也有浮于表面, 太过笼统, 应付差事的表现。还有祷告之后, 抛于脑后, 回复如常, 仅仅限于祷告, 感而不动, 没有下一步的具体参与行动, 也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3) 在宣教培育层面, 当代中国教会欠缺很大, 需要加大力度, 长期投入, 系统规划, 才能使教会内不同年龄层的肢体都明白宣教的重要, 并系统地得到装备。

近年来, 中文宣教材料、宣教书籍及课程都有明显的增加。但这只是一个基础而已, 教会仍需进一步善用这些宣教教材, 才能培育出更多为主所用的“宣教人”和宣教士。否则, 宣教动员就只能是一个口号, 甚至成为空谈而已。

尤其这几年, “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与“普世宣教展望”课程, 得以在全国各地普及性地推广, 大量的弟兄姊妹, 都参与到学习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在网络上以聆听或观看的方式, 参与到宣教培育中。比如, 香港“良友圣经学院”的宣教课程, 以及台湾“好消息”福音电台播放的宣教科目。

为何今天中国教会仍须在宣教培育事工更加努力呢? 消极地说, 是因为一些资深的宣教士, 每当回顾其宣教成长路上的种种负面经历时, 就极力提醒后方教会, 应在教会中实施有设计有系统的宣教教育, 为日后走上工场作更充分的准备。积极地说, 教会若要在差传事工上不断突破成长, 不能只凭一腔宣教热诚。差传事工的发展, 除热心与情感外, 还需要有理念和知识。所以, 在堂会中推行恒久及系统的宣教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新近, 一间新一线城市的大型教会中, 有一位年轻同工正在申请加入笔者所服侍的差会。在与其母会同工进行阶段性评估时。才发现该教会虽然历史悠久, 堂会众多, 行政管理健全, 同工队伍整齐, 甚至有颁发学位的神学院, 但是对宣教的认知与了解, 训练装备, 实在是太少。为使教会能更好地投身参与宣教, 笔者鼓励该教会领袖和同工们带头学习, 在教会开始推动宣教训练事工。

4) 在宣教研讨会议方面, 中国教会也是从海外西方和华人教会学习经验, 积极、努力动员宣教。主要的动员方法, 除在讲台宣讲以外, 每年还会举办福音营会, 宣教特会, 宣教月/福音月, 宣教信息主题月, 差传年会等特别聚会。

各种宣教主题研讨会，国家地区性宣教研讨会，文化宗教主题研讨会，普世宣教研讨会等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有的在国内举行，有的在国外举行；或在线下或在线上，抑或线上线下同时举行。比较代表性地，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型的宣教会议为这些年的“宣教中国 2030”大会。比较深入研讨宣教主题的会议为“中国普世宣教研讨会”。

这些种种会议共同形成当代中国教会宣教运动重要元素，并成为参与，以及推动普世宣教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对宣教主题研究、宣教异象的传递、宣教事工推动、宣教策略制定等都起到训练装备的功用。

这些都是“得”，而同时，也有“失”的表现出来。比较明显的就是，会议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人力财力精力投入极大，但会议过后的跟进与行动显得不足。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这是中国教会以后需要特别注意，并要避免的。

2、短期宣教发展

当代中国教会有组织、有差派的短宣事工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教会的短宣事工，大多属于访宣形式。因为从时间段来看，都是在一至两周左右，不超过月余。教会同工们主要是观摩、考察；弟兄姊妹们主要是学习、体验等。短宣体验多由教会领袖和同工带头，经济比较好的城市教会相对更加热心，而中国西部地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主要的短宣工场，特别是新疆、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甘肃、陕西和宁夏等中西部省区。

近年来，中国教会的短宣事工已经扩展至海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北亚的蒙古、北朝鲜；东南亚的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中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比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南亚的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印度；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安哥拉、赞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尼日利亚等都渐渐成为主要的短宣工场。另外中东地区的，以色列、约旦、土耳其，甚至叙利亚、伊朗，也开始成为新兴的短宣体验工场。

目前短宣是当代中国教会参与宣教之最为主要的方式，“短宣”参与已经普及，教会热衷于短宣，方兴未艾，已然成为一场愈演愈烈的宣教运动。但是，需要提醒和警戒的是，很多没有目标或目标不明的访宣，以及过多的经济投入，以访宣代替长宣，短宣队员存有旅游心态，短期禾场服事留下一堆麻烦让宣教士去

处理等问题都凸现出来，这些都属于“失”的层面。中国教会需要及时检讨、不断评估，积极面对，以使中国教会的访宣、短宣事工规范起来，更加有力有效地支持长宣事工。

3、经济支持差传

中国教会在奉献经济践行普世宣教方面，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发现对宣教有认识、有负担的各地教会及神的百姓，都是甘心乐意地长久坚持奉献。特别是相对贫穷，生活环境较差的教会和神的百姓，更加火热爱主，在宣教奉献方面做得更好。反而是有经济实力的教会和生活宽裕的肢体，对宣教的经济奉献做的相对不足。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教会经济使用的方向不是宣教事工，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在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被影响的情况下，才有所参与的，还有存在如撒该（参路 19:1-10）所面对的挑战时，止步不前的情况。

“365”行动（每天奉献一元钱），设立“宣教奉献”箱，按收入百分比支持宣教，建立宣教基金和推行信心认献等，都是当代中国教会主要的经济支持差传形式。但是，在信心认献宣教方面，中国广大地区的教会还不是太明白，还需要继续学习并信心操练。

据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教会在金钱上支持差传 / 宣教事工堂会比率出现减低的状况。2009 年为 82.6%，2014 年为 67.8%，降幅非常之明显。

美国教会最大的差会美南浸信会也是全球最大的，2015 年宣布因为累积高达 2 亿 1 千万美元赤字，故大幅度削减人手。2016 年 2 月，美南浸信会公布，透过提早退休和自动离职等方法，在工场的宣教士已由 4,700 人减至 3,800 人，减少了 983 人。

经济的保证与稳定支持，为激励宣教士继续委身宣教，持守工场的最大助力。如今因为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导致停业停工之故，很多差会遂出现收入减少，经费压缩的情况。

《普世宣教手册》团队 2020 年出版了万杰森（Jason Mandryk）的著作：《病毒传播与福音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契机》。作者将他的思考与观察归纳为 80 个对社会文化、经济、媒体、教会、差传和宣教士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他指出“宣教奉献与经济繁荣息息相关。当经济受打击的时候，基督徒的奉献也会打折扣。研究显示，基督徒的奉献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头几周骤减。最

近美国一份有关非牟利机构的报告指出将近一半机构预计会损失五成或更多收入。……听闻一些宣教机构因为西方捐献减少，不得不裁减几百个在海外工场的本地同工。”

感恩的是，笔者所在差会的后防支援系统，却能够在国内面对巨大压力时，总是竭尽全力，优先考虑，保证前线战士的生活与事工需要。甚至在费用需要不减反增的需要下，比如线上事工的参与，导致网络费用大幅增加，以及出差旅行费用大涨；又如疫情影响导致工场上其他同工和事工的费用紧张或不足，仍能配合宣教士全力筹款保障，为宣教士们解除了具体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可以安心于宣教工场上，专心事奉。

但是，当代中国教会必须面对国内高消费指数、通货膨胀、就业困难、经济萎缩，收入减少，地震、瘟疫、台风，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以及躺平内卷等长期局面。此势必会影响到宣教奉献与宣教事工，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好地服侍鼓励神的百姓，管理好奉献，善用经济，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4、宣教人员增加

当代中国教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宣教事奉主要是针对同文化群体，范围主要在本地和本省市。进入二十一世纪，宣教重点开始转向近文化少数民族地区，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边疆地区，比较闭塞贫穷的地区，投入的人力与财力亦是愈来愈多。至今，仍是中国教会宣教之重点事工及区域。

开始时，宣教的参与多是由有看见的教会领袖与同工带头，渐渐延伸扩展到广大的、对灵魂有负担的热心肢体身上。继之，投身宣教的同工和肢体愈来愈多，尤其是参与短宣服侍的弟兄姊妹更加踊跃，争先恐后，人员快速增加。

特别是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以后，中国教会宣教明显地开始更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之宣教工场。同年发生的西藏“3.14 事件”，2009 年发生的新疆“7.5 事件”，2010 年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2014 年发生的云南昭通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灾害与暴力事件，更使中国教会神的百姓，看到自己的亏欠，并在神面前悔改，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宣教的行列之中。

但同时也有一种现象出现，一些肢体以有机会参与短期宣教服侍自居自傲，标榜自己为宣教士。对外声称自己“去宣教啦！”，“已经宣教了！”或者“已经是宣教士了！”还出现一个案例，同工突发疾病在禾场上去世，在墓碑上直

接写上“某某宣教士”的字样。以有机会参与宣教引以为荣是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夸耀或者标榜，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更不能混淆“宣教”、“宣教士”等之常规理念认知，而是应该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进入长期委身宣教的服侍中。

5、宣教工场广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宣教事工主要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各自独立发展，宣教工场为本民族本地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宣教国度视野的扩展，教会人力和财力的储备，宣教工场开始扩展到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直至全国范围。除国内宣教工场的不断延伸与扩展外，当今之15亿中国人，不仅居住在自己的国家。因为工作、生活、婚姻和学业等原因，已经主动分散分布在全世界范围，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地区生活、工作、留学和定居。就连中国人少为人知的遥远的小国冰岛和芬兰，太平洋岛屿小国帕劳和文莱，中美洲小国苏里南和伯利兹，非洲小国马拉维和塞舌尔等，都有大量并且继续不断进入的中国人。散居在全球范围的中国人的福音需要，以及牧养服侍中国人的地理范围，已经从中国大陆扩散至全球范围。“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的宣教路向就是以重点服侍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为优先，差会的口号为“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

在全世界分散的国人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特别是温州地区的很多肢体去到欧洲各国谋生，他们一边经营生意，一边也建立起教会，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匈牙利等国都有建立教会。福建的很多肢体去到南美、非洲各国发展，也在自己工作的国家城市建立起教会。甚至更有勇敢的肢体，去到战争动乱不止的中东地区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经营生意，开始聚集聚会，更盼望将福音传到本地顾客中。笔者认识的一位福建宣教同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去非洲岛国毛里求斯打工并悔改信主。后来回到国内成为教会热心同工，并参与到教会“差传小组”的服侍。

深盼当代中国教会神的仆人和子民们能如耶路撒冷教会般，因教会处境的变化，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主动地为宣教而分散全世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如果中国教会是为宣教而主动分散，那么中亚诸国、高加索地区、南亚次大陆国家、中南半岛诸国、太平洋岛屿、中南美地区、非洲大陆，尤其西非和北非穆斯林诸国等都是中国教会差派服侍的国家地区。

早在十多年前，福建一间闽南语教会中的一些肢体去到南太平洋某小岛国工作生活，并建立起教会。近年来，不少肢体再回到国内生活，该国华人教会的发展与福音事工受到影响，甚至教会开始出现萎缩的情形。今年，家乡教会已经开始计划差派人力再赴该国宣教扩展，并能坚固教会，继续广传福音。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教会似乎看不见本地国外族群的属灵需要，出现本地跨文化宣教被大大忽略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如今却发现，教会毋须飘洋过海，就能在咫尺之间接触“万民”，皆因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生活工作。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许多“未得之民”来到我们身边，好像五旬节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或进犹太教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徒2:9-10）。所以跨文化宣教工场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身边所处地区也大有宣教机遇，在本地也可以开展跨文化跨族群的福音工作。

本土跨文化宣教为城市宣教重要的部分，它的重要不只是与来自各国的人分享福音，建立教会，更重要的是能栽培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基于他们与原居地（祖国）的联系、语言相通、文化同源，使他们成为最好的福音使者是为上好的宣教策略。本地跨文化事工在欧美和海外华人教会，特别是港、澳、台、新、马等国都有很多成熟的事奉经验。中国教会需要急起直追，并远近兼顾。

6、肯定双职宣教

近几年，我们发现中国教会另有一些得着，就是“双职宣教模式”和“营商宣教模式”愈来愈得到肯定和重视，尤其在“创启地区”宣教工场，教会和差会更乐意使用这种模式差传。翻阅宣教期刊、杂志，或浏览不同差会及差传机构之网站，便会发现，有大量关于“双职宣教”或“营商宣教”的文章非常醒目。这几年，关于“营商宣教”的主题演讲与研讨会议，也提上日程，并开始进行了。

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宣教处境愈加复杂变化更多。更多宣教工场国家限制宣教士签证，甚至留学签证和 NGO 签证；还有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压力，以及末后世代的属灵争战等情况。导致宣教工人进入禾场，并获得长期居留愈加困难。最主要的是宣教工人需要公开合法的身份长期居留，以及事工开展需要平台等因素，使得中国教会、差会开始面对“双职宣教”和“营商宣教”差传模式。

目前，中国教会已基本接受、肯定双职宣教和营商宣教模式，说明中国教会面对当代千变万化的历史处境时，在策略上并不墨守成规，愿意学习并作出变通调整。但我们也需要了解的是，到目前为止，动员更多的有专业、有恩赐的肢体投身双职宣教事奉的明显不足，我们的营商宣教经验也是极其有限，还没有太多可普及的个案经验。

在过往的营商宣教经验中，最多出现的情况是，身在禾场的宣教工人因为恩赐之故，做生意亏本，导致落入气馁、挫折、埋怨与持续的压力中；也有一些同工在生意盈利后，异象改变，或者陷于生意的忙碌中，退出了宣教事奉。

还有一个有失脸面的案例。有位同工跟我咨询，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工人，竟然提出生意盈利后，自己与差派教会或团队如何分配利润的问题。此事情看似简单，要求也合理，但这背后却表现出差传政策的细则规定，宣教同工的心态与动机，差传经费投资的归属等诸多需要反省与调整的问题。

梁永强牧师鼓励说：“今天华人散居之处，除昔日已有数世纪移民历史的地区，如北美、澳洲之外，东南亚、湄公河流域，拉丁美洲都有华人教会。加上现时中国和华裔企业都在非洲及中东地区有大量投资，使当地华人数目倍增，各地教会也注意到这些地区的华人福音禾场。如果这些地区的华人教会能把握先机，不只重视‘商机’，也培养信徒关心和爱护当地人，华人教会将能肩负更多跨文化宣教的重任。”

7、整体水平提升

二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教会宣教的参与一直在摸索中成长着，整体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对推动宣教、落实宣教的意识增强了，投身差传的同工及领袖增添了，参加短宣的肢体更多了，为差传而作的祈祷加强了，金钱奉献方面也大大地提升了，很多教会有同工专门负责宣教，甚至出现了宣教牧师，不少教会设立差传部门、差传小组、或者差传委员会。还有短宣训练与教会动员宣教课程的组织与学习，也更加规范和系统了。委身宣教的同工们之心志、学历、装备等素质也提高了很多。总之，走在宣教路上的中国教会，正在循序渐进地学习、操练、践行着宣教的使命与责任，并在继续地成长，迈向成熟之中。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教会之宣教与整全的宣教还有些距离。中国教会从普世宣教历史以及诸多被神重用的宣教仆人身上承传了悠久的属灵传统，不但

重视圣经，而且热心传福音，此成为中国教会增长的稳固基础。宣教士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广传福音，拓荒植堂。可是对文化的使命与社会的责任，却较少思考。很多教会都认为抢救灵魂以外的事，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看为是宣教。但也有些教会、团队和机构，表现出将社会公益、赈灾慈善等同宣教的情况。在这两面，都可谓是有“得”亦有“失”。

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会议发表的《洛桑信约》指出，除坚守福音使命外，也肯定教会对世界和文化的责任，华人教会遂开始反省什么是整全的福音和使命。2006年第七届华福大会以“基督全人福音遍万邦”为主题，2011年第八届华福大会时，再次肯定并承接这个方向，以“基督整全福音临万民”为主题。这对当代中国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梁永强牧师说：“现在华人宣教士在工场上提供各方面的服事，即使在极困难的环境中，不能随意传讲福音，仍以无私的大爱去付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宣教士不再以‘服事为传道的手段’，也重视‘服事的本身价值和目的’”。宣教士在工场上服事，当然应以福音为重，但面对诸多的需要，以及事工的挑战，宣教士们自然就开始参与到很多类型的服事，例如教育、医疗、扶贫、赈灾等。一方面服务社会，造成美好的见证；另一方面，也为人际关系的建立，事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总之，面对整全的宣教使命，中国教会需要继续努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坚持一些原则，宣教工人们在工场国家参与社会服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预备人心，领人归主，所以，福音预工的投入比例不能超过福音事工的投入。因为宣教是为拯救灵魂而摆上一切，若宣教完全在社会服务的范畴内进行，就变成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了，也就改变了宣教的性质。

三、差会角度

在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层面之得失检视，我们会将重点放在训练装备、差派督导、支援系统、差传研究、应对危机和配搭合作等方面。态度与反省也趋于更加严谨、甚至苛刻。笔者是站在一个中国教会本土差会负责同工的角度，观察中国教会本土差会的现状情况。即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为了中国教会更多更

大地为主所用，就不再说乐观赞美的话，而是循着勇于面对，改善与发展的路径思考并建议。

基本上，目前中国教会本土差会之架构机制，亟需完善并不断更新，因为此乃差会稳定健壮，健康持续运作的基础。差会经济需要完全因信靠赖上帝，因为这是祂自己的工作，如果是做在祂的心意之上，就必不缺乏供应。差派工人必须严格甄选，以保证宣教士们能长期委身宣教禾场与事工，降低宣教士的流失率。差传训练，需要立于实战实践的宗旨，相对足够地，针对性地装备训练。而差传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地，站立在前人经验和专业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地发展。

1、本土差会需健全

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教会宣教不断成长的证明，也是宣教趋向成熟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中国教会本土差会主要以宣教团队、堂会差会、专门差会三种形式存在。以宣教为宗旨的团契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教会系统内组成的宣教团队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比较正规的本土差会出现于二十一世纪初。

近些年来，由于不断举行大大小小之宣教动员大会和宣教研讨会，宣教异象与使命之课程在各地教会的普及，访宣短宣的兴起等氛围之下，于全国范围内陆续地涌现出的本土差会，或者说宣教团队，确实不少，而且出现不断增加的情况，这是中国教会之“得”。但是不久就消失不见的情形也在不断出现，还有一些差会处于停滞休眠状态。据观察，目前仍在坚持运作的，也是压力不小，进展不大；有的卡在瓶颈，有的拼力维持。中国教会本土差会明日境况如何，实在难说。就像现在于蔓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一样，没有任何一国，任何一人，可以明确地说：“何时能结束！”总之，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仍需我们持续观望并关注。

首先，从差会架构角度看。目前中国教会本土差会整体情况有以下情形。宣教视野仍是比较狭窄，满足于现在禾场，现有事工，不能突破进深，扩展扩张。差会同工，大多无长期宣教经历，专业性和委身度不够。差会行政管理自由，呈现松散化状态。差会有章可循，但实际上却闲置不用，或执行困难，抑或差传机制不够健全。有的差会或团队甚至有名无实，架构空空如也，差会机制空白。

其次，从差会心态角度看。中国差会多为特立独行型，接纳、开放、合作性不够。差会有得过且过，不着急的心态，也没有危机和忧患意识。主动学习，主动请教的心志不足，面向对差会专业规范的要求与挑战，无从着手，无力改变。还有就是不愿付代价，仅停留在有机会参与即可，有事工做就行，或追求并满足于短期、快速和轰动效应的事工等层面。

再次，从差会运作角度看。中国教会本土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改善和完善。有时，笔者感叹，为何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本土差会的发展和成熟为何如此之慢，规范化与专业性为何加强不起来，宣教士的整体素质仍然有待大大地，不断地提高。

2、训练装备欠系统

据笔者观察粗略估计，当前中国教会之神学院校超过千间，各种专门事工机构也超过千家，宣教机构和团队，也有数百家之多。目前在港、澳、台、加、美及其他海外国家修读不同神学院的中国同工，超过两三千人以上。在海外跨文化宣教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也超过千人以上。这一切都成为当前中国教会继续不断进深跨越的动力资源，中国已经可以从宣教工场转型为普世差传基地。而且近年来宣教士跨文化职前训练从差会的“总部”伸展到工场上，也是很大的进步。比如东南亚泰国、南亚尼泊尔、非洲突尼斯，都有中国宣教士跨文化训练基地。这是中国教会宣教之“得着”。

然而，中国教会亦需要持续不断地理性冷静地观察分析，要想中国教会成为普世宣教的生力军，成为“宣教的中国”，中国教会必须时刻面对并长期更新完善两个问题或两方面之重要挑战：一是本土差会的建立与宣教机制之建立、运作、完善与更新的挑战；二是宣教神学教育和宣教士训练，特别是跨文化装备系统之健全、正规、完善的挑战。

当今的中国教会已经全面开始面对普世宣教的挑战。近些年来，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中国教会宣教士踏入广大的普世宣教禾场。但同时，不少问题也凸显出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宣教士们的装备与训练明显不足，尤其是欠缺跨文化方面的装备，以致无法应对工场的文化冲击、团队配搭、事工需要等。

有多少位踏上工场的宣教士接受过“跨文化训练”呢？又有多少位宣教士对“文化人类学”、“佛学与神学”、“伊斯兰教义教法学”、“伊斯兰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非洲部落宗教”、“小乘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南半岛的相互影

响”，以及“印度教文化对南亚地区的影响”等等宣教科目有较深入的认识与研究呢？中国教会神学院与宣教学院在跨文化宣教课程的设置上，以及经验资深的宣教讲师，包括宣教工人对跨文化的学习和掌握等等，都还有一大段距离。

中国教会之宣教士需要怎样的装备和训练，才能完全胜任宣教工场的需要呢？中国教会宣教士之装备训练，已经成为宣教的中国教会需要全面反省、检视并不断完善的重大课题。

3、管理督导跟不上

如果差会对宣教士的管理与督导能跟得上，并且及时有效，那么对宣教士信心委身，喜乐持守工场，工场团队稳定与见证，以及工场事工推动之发展与果效，就会带出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是，后方差会总部与前线宣教工场存在着时差时空距离，各自事奉事工忙碌自顾不暇的情况，还有不能及时并更多时间身处现场，具体处境不能感同身受，以及自身经验限制等，会发生督导建议不适合，说服力不强，甚至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情形。同时，也会导致前线宣教士，压力增加，担心忧虑，甚至气馁挫折的现象。长此以往，差会还会出现更多问题。

笔者夫妇于2003年前创立本土信心国际跨文化差会之初，就结合自己在西方差会（远东宣教会和基督徒援助会）与华人差会（美国大使命机构和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参与事奉的经验，并在本土教会文化的基础上，编定出“差会章程”和“宣教士工场行事守则”，并且每年更新一次，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以及工场的变化和 demand。制定下所有宣教同工们都参与更新修订，并提出和参加自己意见的规矩，以共同更新完善章则。

尽管如此，差会内部仍会有些同工出现不遵守规矩的情况。在需要、机会和看得见的好处及承诺面前，有时规矩也只是规矩而已，或者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还有心存侥幸的心理，差会是不会知道的，或者有，神是不会责怪的等等想法。本差会主要出现过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宣教士未加申请，隐瞒未报，差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以期成为其他中国教会本土差会的前车之鉴。

- 1) 私下收取大笔金额，据为己有。差会提醒，也不以为然，屡次再犯。
- 2) 自己借出差之名，自行安排返乡，超出费用却放在出差预算内。
- 3) 私下购置大额设备，甚至包括机动车辆。

4) 私自离开工场，答应地方教会的邀请，参加差会以外的会议等。

5) 背着差会与合作伙伴寻求合作，不服管理，导致团队同工离心。

中国教会差会在对前方宣教士，宣教工场和事工的管理督导方面，实在有很多不足，还需更多努力，投入经验人力，安排专人负责，依靠神赐予的智慧、原则与爱心，更好地陪伴、牧养、督导服侍宣教士，帮助他们不会因为管理督导跟不上，陷入软弱与试探，而是表现出美好的见证，并能彰显神的荣耀。

4、支援系统较薄弱

宣教士走在福音工作的最前线，其灵性、生命、品格及事奉能力的强与弱，都会直接影响差传事工的果效。差传后方的教会、差会与参与差传的肢体，若能够及时跟进并强化与前线宣教士的关系，发挥支援系统的作用，必定能促进前方宣教工场的稳定，同工关系的美好，与宣教事工的进行。

对于宣教士来说，教会和差会都是事奉的强力后盾，以及事工的伙伴同工，只是各自的角色与分工不同而已。特别是对于在疫情中持守工场的宣教士来说，后方的教会和差会基地，好像是鞭长莫及，具体能做的实在有限。但重要的是，教会和差会千万不要给予他们压力，而是更多地关怀问候，最好是无问西东，全力陪伴支持为好。教会和差会对宣教士的牵挂与关顾，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可以在祷告安慰、实际关怀与经济支持等方面体现出来。

过去这些年，中国教会开始肯定“差传铁三角”的重要，并强调各自的功能与责任。开始建立并竭力加强对宣教士的支持和关怀，在以下几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和成果：

1) 对即将走上工场的准宣教士的心理辅导和跨文化装备，以及职前训练有所加强。

2) 能够派同工上前线，探望、关怀、陪伴、鼓励并支持宣教士，给予他们充分的责、权、利，信任交托。

3) 对宣教士及其子女和父母给予的支援和关顾也有改善并加强。

4) 开始思考如何帮助退休的宣教士，筹备“宣教士之家”或“宣教士退休中心”。

5) 当碰到支援系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前线工场和宣教士所遭遇的具体处境与事件时，支援系统会努力寻求其他差会或工场上其他差会更有经验的宣教士去帮助他们，同时也授权前方宣教士们自己主动寻求援助。

近年来，“华福”、“差联”、“同路坊”等机构都努力在工场上举办联合的宣教士聚会，例如从1998年开始，在泰国举行华人宣教士退修会，无论来自哪个差会、国家，只要是在湄公河诸国服事的宣教士都可以参加，中国教会宣教士也渐渐地加入进来。此类型聚会也广受宣教士欢迎，教会与差会都乐意支持宣教士参加，共同见证在主里的合一。这类型的聚会若能定期举行，并推广到其他较多中国宣教士的工场，相信更多宣教士将能得到更多的牧养与关顾。继之，宣教工场上各差会、各团队的中国教会宣教士年度退修会也会随之举办起来。

虽然，在后援支持方面，中国教会有看见并看重，也有一些“得着”。但实际上，中国差会后援支持系统仍显得非常薄弱，漏洞明显。首先，中国差会后方差会行政同工，不如西方和海外华人差会，他们的行政同工都是由前线工场退下来的服侍多年的经验同工担负，我们则多是由教会热心宣教的肢体参与。其次，我们的后防同工对宣教的认知与宣教的经验较少，所以并不能切实地，感同身受地站在宣教士的角度更多考虑，以至于提供的建议、指导，以及具体的牧养关顾达不到效果。还有，前线与后方同工因为各自忙碌事奉，以及对工场具体处境和发生事件不能透彻了解，也导致支援不能及时跟上，或者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

5、应对危机易慌张

在末后世代，国际局势、地区政教，纷繁复杂、不断聚变的情势下，各种危机事件将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教会宣教士危机管理之紧迫性也就凸显出来，从而激起中国教会和差会领袖，以及宣教同工们开始思考宣教士危机管理这一重大课题。

2016年底，中国宣教同工任要岗在非洲刚果被劫匪杀害；2017年6月，年轻的中国宣教同工李欣恒弟兄、孟丽思姊妹，在巴基斯坦被IS绑架遇难。这两起连续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正热情高涨参与普世宣教的教会。一时间，在中国各地教会以及本土差会间，引起长时间的讨论，在持续关注事件的后续处理与结果之同时，显出中国教会众同工们的紧张和慌乱，不知该如何面对。我们虽然早有参与宣教服侍必须面对艰难和逼迫，甚至付出为主殉道的代价之观念，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并临到我们面前时，仍然显得手足无措。

记得在两位年轻宣教同工遭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收到一位本土差会同工的电话：“你们有关于宣教士危机管理的训练吗？”由此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在此方面的认知、政策与经验的缺乏。也导致不少教会，很多同工都陷入高度紧张和压力，甚至出现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的情况。

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同工们，多少年来已经历过不少的危机。但是，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文件还没有出现。只能看到一些零散的文件和文章，比如：某西北地区宣教学院，在穆斯林地区短宣和藏族地区短宣的经验基础上，出台了一周、二周、三周和四周时间不等的短宣守则。守则中特别就民族禁忌，居住和饮食安全等有针对详细的介绍。

再如，国内某本土国际差会，在十八年的历程中，针对不同地区工场发生的危机事件，结合处理诸多危机事件的经验，对《差会工场行事守则》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完善。特别就宣教士面对的政治和宗教处境，绑架与政变情形，以及自然地理与气候环境等，针对性地补充了预防危机，和危机处理策略的条例。

于此，我们知道，危机管理是开始参与普世宣教的当代中国教会需要长期面对的。中国教会宣教士危机管理机制之建立与不断更新完善，亦是差传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危机意识的建立与强化，可以帮助宣教士有备无患；即使处于危机之中，亦能帮助宣教士冷静沉着面对，进而转危为机。故，危机管理的加强对于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西方国际差会的危机管理与突发事件应对、处理与救援经验，已经相当成熟。当代韩国教会在四十多年的普世宣教参与中，已丰富地经历过诸多的危机事件，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危机管理系统。海外华人差会在不断涌现的危机实践中，也逐步建立起危机处理及管理的对应机制。此都成为当代中国教会建立危机意识，完善危机管理，处理危机事件的重要参考。

6、资源与研究空白

海外华人教会从宣教觉醒到全力推动差传，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差派过几千位宣教士到普世宣教工场，这是“得”。但从设立华人宣教训练学院的角度看，就发现这方面是明显不足的，理想与现实仍相距甚大，可算是一种“失”吧！

海外华人神学院事工已经超过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但是宣教学院事工的建立与发展确至今还未形成“大气候”，但朝这方向作出努力见证仍是有的。例

如多年前“马浸神”已率先作出尝试，把宣教与神学教育融合起来。香港的“浸信会神学院”，则努力推广信徒宣教证书及文凭。“中华神学院”也把四门宣教科目纳入全职事奉课程内，成为每位神学生必修科目。“建道神学院”奠基于开荒宣教大传统，努力打造学院宣教文化，在建立跨文化宣教课程上有较突出的表现，在数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系之经验基础上，宣教学博士系统也建立起来。此外，“澳门圣经学院”也在努力促使该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宣教学院。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也开设起宣教学博士课程。

在宣教学术研究方面，海外华人教会相比于西方教会，华人宣教学者却是屈指可数，而兼具宣教工场经验的宣教学者更少。由于缺乏对宣教进行严谨的圣经及神学研究并工场策略与现况的反省，致使华人教会宣教的发展遇到很大难处。

值得庆幸的事，近些年来已经有一批具远见、有魄力的领袖，开始极力提倡学术修养与灵性操练并重，两者并不抵触，为华人宣教神学教育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当然宣教研究的学者具备实际的工场事奉经验，才不致流于纸上谈兵。除鼓励学者研究宣教课题外，在宣教工场的同工更可以写下宣教工场的历史文化、教会发展历史、宗教族群研究、生命反思，甚至保存宣教士代祷信等，为宣教研究留下宝贵的资料。我们需要留下这些足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皆可以从事研究，但每个宣教同工都可以对生命及事工作出诸多的反思。

还有一个好的榜样，即1976年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差联刚成立时的领袖们具有真知灼见，极力鼓励要重视宣教研究，虽然资源有限，仍然成立“前线差传中心”，并由全职同工负责。他们第一个研究项目是有关香港教会差派和支持的宣教士。当时出版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报告和丛书，而且每年发表香港教会宣教工作的统计与分析资料，对日后的研究工作预备了最基本的素材，为宣教研究留下重要的材料。

因此华人教会除差派更多宣教士去收割主的庄稼外，也需要有远见，懂得投放资源，栽培“甘于寂寞、忠于所托”的宣教学者。我们需要从宣教历史留下的经验中学习，从《圣经》中认识神的心意和全面的宣教观，并掌握世局，为华人教会的宣教路指出未来的方向。

以上从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资源不足，以及缺乏宣教学术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国教会在这方面更是乏善可陈。特别是未得之民研究，工场探测与开发研究等。

如果中国教会差传界能成立“联合差传调研中心”，在开拓每一个宣教工场前，都能先做较为详尽准确的工场调查，了解工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然后提出适宜的差传策略建议，再交由各差会按能力去承担。这样做既节省金钱和时间，又更能见到更多福音的果效。

另外，中国教会积累自己的经验，建立本土化宣教学院，处境化宣教士职前训练等，都应是学术、技术与经验结合的产物。宣教的中国教会需要一批专门性的宣教研究人才，需要学术性、指引性、可行性之宣教研究与宣教事工论文不断涌现出来。

筹备建立并不断扩展增加的“宣教资源中心”，不失为一种最佳的补足与发展模式。因为它是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之必需，并可成为最大之助力，当然这也是一项宏大、艰巨、长期投入，持续发展的宣教工程。

7、配搭合作应加强

宣教士要以诚以爱谦虚地服事人，更要尊重别人的文化，让未得之民接纳这些福音使者和他们所传的福音。再加上科技不断发达，传扬福音的方式与工具也日新月异，从单张、小册子到福音广播、影音、电脑网络，宣教的方式与时俱进，变得多元化。宣教事工也尽量按当地的需要服事，从医疗、教育、赈济，到社区发展、职业训练，各式各样，而各宣教同工也各尽所能，一起同心见证基督的大爱。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西方差会都意识到没有一个差会可以“独力”完成宣教使命，他们必须要互相了解尊重，分享经验与资源，更要避免竞争和重复工作，才可以事半功倍。合作的基础也从“工作伙伴”，转为“天国伙伴”，不再以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来完成“我机构”的目标。纵然这目标也是为了福音，但始终都是以“我机构”为出发点。当彼此的关系改变后，“天国伙伴”会问：“我有什么可以付出，让你更有效完成神所交付给你的天国使命？”这不再是为了达成“你或我”的目标，而是为了“祂”的荣耀而同心协作。

在这大前提下，国际差会的主管都相约交谈，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并进一步合作和分享资源。因此近年许多差会都不再各自为政，并建立起许多策略伙伴。例如联合圣经公会把他们开发的圣经翻译平台电脑软件 Paratext 分享出来，让其他圣经翻译机构同工可以使用；在同一语言区域内工作的宣教机构会定期举

行咨询会议，互相交流经验和合作；也成立了“国际口述联络网”，为教育水平较低而要靠口述传播福音之族群，探讨讲述《圣经》内容的方法。

1) 海外华人差会合作

在华人差会方面，他们即使属于不同差会也无分彼此，定期有团契生活和同心祷告。在港、马、新、台、悉尼等差派地区，差会之间也常有接触，并一起推动宣教和关心宣教士。过去多年，“华福”亦主办了多次“世界华人差传机构主管研讨会”。可是现时在工场上，较少看到华人差会的主管之间有较高层的伙伴协议。华人宣教工作要继续前进，也许大家要多问“我可以怎样服事你？”，而少问“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香港差联资深研究员熊黄惠玲老师说：“过去十年，香港宣教士人数增加和差传运动的进展，全赖差传机构、宣教士、差传领袖和堂会的努力。”明显地，这位差传机构同工认定了，通过堂会（包括差传领袖）、差会（包括差传机构）及宣教士三者的协调和努力，香港教会才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把差传事工提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

特别是几位高瞻远瞩的前辈和关心宣教使命的牧者，包括屈均远长老，卢家驹牧师和滕近辉牧师等，在1973年12月成立“香港差传事工联会”，为香港教会的当代宣教史立下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差联”其性质并不是“差会”，乃是一个跨宗派的联络性的差传机构，其中尤重视差传异象使命的传承及差传教育的推动。其角色主要是协助及鼓励不同的堂会、差会、宣教士及神学院，能尽上其宣教本份。其同工经常受邀到各处进行训练及传递差传信念的工作，她也曾在香港催生了一些大型的宣教运动，例如“恩临万邦”、“齐来关心穆斯林祈祷会”，宣教士候选人的心理评估服务、关怀宣教士子女等，都是“差联”、教会及差会合作的成果。

1999年，新加坡六间差会机构联合举办华文宣教营、宣教会议及课程，推动华语教会参与宣教工作。至2003年，九间差会机构正式组织“新加坡华文差传联合事工”，致力推动华文教会参与普世宣教，至今已增加至十三个成员机构。台湾亦于1998年6月成立“中华基督教联合差传事工促进会”，并举办了多项宣教研讨会、联合退修会等，以推动台湾的教会参与宣教工作。

由此可见，海外华人差会在宣教工场上有互相合作，或是在地区之间有互相交流，甚至合作平台也渐渐成形，但跨区域的沟通和建立伙伴关系仍有待发展。

其实各地区华人教会和差会可以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在同一宣教工场会有来自不同差会的华人宣教士分别从事不同的宣教工作，如布道、建立教会、教育、社区发展、圣经翻译、识字教育、医疗服务等。这些宣教士的差会和支持教会的领袖可以举行联合的策略会议，讨论在宣教工场上如何更紧密地合作，使事工得以更全面发展。

在海外华人差会中，还有一个开始于 2010 年的合作的见证，即“华传”和“神州”合并为“神州华传”。在合并的庆祝会上，王永信牧师说：“这样的合作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最后也只维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再度分开，各自事工。看来联结合作确实不易。

2) 中国教会差会合作

近年来，中国教会出现一个现象。一群有负担的本土差会同工，看到普世宣教的挑战，看到中国教会本土差会的经验不足，各自艰难生存等境况，遂开始筹备“中国教会差会联合会”事工，盼能更好地服侍并推动普世宣教。

20 多个本土差会主管同工于 2016 年首次聚集在一起，开始就“建立良好差会机制”、“差会合作”、“宣教士训练”和“宣教士关顾”等宣教主题进行讨论。中国本土差会与差会之间的联结，是为初步的彼此接洽与互相了解认识的尝试。

另外，网络世代的成熟，也给中国教会提供了更加利于配搭合作的平台。教会系统内部，地区之间的合作；联合举办宣教会议与多差会联合退修会，甚至与海外差会合作等都开始看到可喜的得着。以下就以笔者所服侍的差会为例。

我们差会从创始之初就确定与众教会和众差会协作配搭之原则，以共同完成大使命。感谢神从开始就给予差会有机会与海外华人差会及西方百年差会合作，使差会在机制建立与完善，行政管理与规范，异象延伸与扩展，同工督导与关顾等方面，都有诸多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以使差会不断地发展与成熟壮大。

差会与中国教会本土差会之合作更晚一些时间，那是因为中国本土差会之出现的时间稍晚，在不同地区相继涌现的时间是在 2010 前后。在中国教会本土差会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本差会也有机会担当服侍、提携的角色，并与不断成长的本土差会多方面配搭合作。主要合作之本土差会有云南苗族福音团契、滇西远征使命团、温州宣教中心、上海中宣会、福建安提阿宣教中心和福州恩福宣教团契等。

差会与海外华人国际差会华传之合作更是持续了多年。基于自己和林安国牧师的师生友谊关系，以及三十年的同工服侍，使得笔者对华传也有较多的观察与认识。也是因为师从林老师，并信任、认同林老师的宣教理念与架构。所以，除在我们个人之间配搭事奉之外，也共同带领、推动我们两家差会之间的多年合作。还有负责工场和培训的国际副总主任何俊明牧师，以及香港办事处主任钟国良长老，多年的彼此尊重与信任，良好及时的交通，事工对接顺畅，共同协商推动，以及弹性处理各种事件，都成为我们两家差会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持续配搭成功的重要支柱。

华夏与华传在差会合作方面是比较紧密的，也是互相依赖互助的。华夏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与机会，需要积累完善差会机制的经验等。华传需要国内相对成熟的差会、机构、学院与同工的建议、同工与参与服侍，以在“福音出中国”之宣教异象中，更多地推动祝福中国教会。

差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参与青年宣教营，服侍中国华传办事处，共同举办宣教研讨会，以及组成宣教讲师团，共同服侍国内宣教神学院校等。在宣教事工合作方面，主要在宣教士职前训练，联合差传跨文化宣教士，以及文宣事工等方面。当然也有失的一面，在林安国牧师，以及同辈的几位同工先后荣休之后，两间差会之间的合作也渐渐褪去。其中之一的原因为建立于信任基础上的人情关系不复存在，还有事工方向与策略的转换等。

感恩的是，神还为差会预备了非洲内地会（以下简称 AIM）。这间有着在非洲宣教 126 年历史的百年经验国际差会，成为我们的最佳合作伙伴。笔者有机会与 AIM 国际总主任交通并分享异象，交换意见与设想，有机会赴 AIM 北非、东非和南非总部考察，并与主要同工们会议讨论。神带领我们都共同看重的是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宣教，以及未得之民宣教。神带领 AIM 愿意谦卑地服侍中国教会国际差会，并愿意协助中国本土差会训练指导扶持中国教会实习宣教士。在恩主的带领下，我们双方经过多时多方的祷告会议，通论沟通，协调安排，终于 2019 年 4 月签署合作备忘录。但是实际的合作配搭已于 1 月份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

3) 中国与国际差会合作

笔者以为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必须走合作路线，需要建立国内、国际之合作关系网络。令中国差会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差会向中国差会表达出的合作意愿与具体行动。诸如，于中国经营多年的“学园传道会”之国内团队已

经独立运作，开展事工，宣教士们也都是自筹费用。“海外基督使团”和“青年使命团”都吸纳了较多中国教会年轻同工，给予他们机会学习和操练宣教。“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和“非洲内地会”都与中国本土差会合作多年，开放工场，接纳同工，提携培养中国宣教士，协助中国差会福音出中国，更多地承担普世宣教责任。“美南浸信会”和“国际事工差会”都已经在多年前，就设立专职部门和同工，联络中国教会，动员中国教会，参与到普世宣教的大军中来。今年，国际事工差会已开始于国内征召同工了。

在谈中国差会与国际差会合作之前。中国差会要承认：中国表面强大，实际脆弱；中国教会外强中干，大而不强，人多而不作为；中国本土差会，外不强，内也干瘪。中国差会非常有限，无经验、无禾场、无机制、无支援系统等，所以必须向国际差会请教学习。但是，中国差会也要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必须迎难而上，忍辱负重，永不言弃，坚持到底。总之，中国教会本土差会需要主动并努力地寻求与国际差会合作之渠道。求神预备开路，也感动国际差会同工，能看到普世宣教需要合作协作，共同迎对挑战。

在谈中国差会与国际差会合作之前。国际差会要能看见：中国教会宣教同工资源丰富，终将成为更多承担普世宣教的生力军。中国宣教士比较受欢迎，特别是在西方同工不方便出现的穆斯林世界穆宣工场。中国宣教士的以肤色优势在前线作战，西方同工可在后方系统支援。中国宣教士比较吃苦耐劳，忍受艰困环境，不讲条件与待遇，并能长期持守禾场。中国宣教士，在工场上，在团队中，在各种处境中，更加会有弹性，会变通处理事物，特别是突发状况与紧急事件等。

与海外差会合作需要两个前提，第一是海外西方和华人差会需要谦卑地接纳、认可并愿意扶持中国教会之本土差会；第二，中国教会之本土差会或宣教团队需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但也需要凭信心不卑不亢地主动向海外西方和华人差会学习，并寻求合作的机会。

谈到中国差会与国际差会之具体合作，那就会涉及到具体合作层面之具体事工，以及具体合作事工之运作步骤等等。合作层面主要是在宣教士训练、差会机制、联合差派、工场事工等方面。而合作之实施步骤中，国际合作推动者的资历，以及成立国际合作委员会，常设机构办公室的设立与运作，将成为中国差会与国际差会持续合作的基础，事工推展之关键。

笔者以为“华传”的态度和理念是中外差会合作的理想模式之一。“华传”与中国教会合作的目标是动员海外教会，并建立宣教平台，以协助中国教会迈向普世差传。具体做法是：

(1) 推动中国教会的《圣经》和宣教训练，包括宣教士职前训练。

(2) 与中国教会合作差派宣教士。比如，与国内本土差会“华夏人橄榄山福音使团”合作，联合差派宣教士到泰国和墨西哥。

(3) 为中国教会宣教士提供签证申请，语言学习，和事奉平台。

(4) 借助工场管理系统训练、督导中国教会宣教士，协助其成为资深宣教士，即为中国本土差会训练、培养工场主任，达至最终能独立开展宣教平台并推动宣教事工，亦能带领帮助宣教新兵。

四、宣教士角度

作为一个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每每想到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为数不多，却又极为宝贵的中国教会宣教士们，心中深感神恩浩大。在倍感尊荣并感恩的同时，也深切明白自身的软弱与不足。所以，当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讨论宣教之“得与失”时，我们需要肯定自己，亦需冷静面对自身的问题，并能积极对待。所以，我们从宣教士角度讨论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得与失时，会多从提醒、鼓励和改善的层面反思。

1、适应文化吃苦耐劳

散布于全球的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适应环境和坚持坚守的特点，基本上已成为普世所公认并达成的共同看见。中国教会的宣教士们更是将这些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他们能够在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颇具挑战的地理气候、不易适应的当地饮食、比较压抑的政治宗教处境等等情形下长期驻守，实在是神莫大的能力与恩典。笔者曾见过在跨文化工场上，超过 10 年，20 年，最多超过 30 年的宣教同工。此为教会“传者”之“得”。

同时，长期持守宣教工场的同工，也不同程度，不同方面表现出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交往、同工合作配搭等方面的不足与欠缺问题。此需要中国教会的“差者”与“传者”，长期正视面对。

2、生存生活能力较强

面对异国他乡的孤单无助、语言不通的沟通压力、文化的挑战与激荡等，能够尽快适应文化处境，再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够帮助宣教同工们提高在跨文化宣教工场的生存与生活能力。笔者在非洲的无垠沙漠、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严重缺氧寒冷的高原、局势动荡不安的城市、自然环境异常艰苦的山区等都曾看到过长期持守服侍的宣教同工。这是中国宣教同工们宝贵的“得着”。

如果说中国教会宣教士们的生存生活能力较强，归根到底是基于从神而来的异象所产生的事奉动力，就如《使徒行传》所说：“我也要教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阿，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徒 26:17-20）

同时，长期的孤单坚守，在缺少及时、有力的后方支援之下，有些宣教同工也出现消极、埋怨、挫折，身体患病，心灵软弱，甚至苦毒和崩溃的情形。此为传者之“失”。

3、语言学习能够突破

语言学习是跨文化中国宣教士们宣教事奉最大的挑战之一。宣教士之间通用的国际语言——英语沟通上需要过关，熟练驾驭，才能取得更加畅通的沟通，并促使合作更加无阻。在宣教工场当地语言的学习上，中国同工因自身单元文化背景之故，语言恩赐不突出，学习语言更加困难。以至于很多宣教士知难而退，或者停滞不前。不能熟练地使用工场语言，导致沟通不畅，对事工的参与及开展，都势必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都知道西方宣教士在学习语言方面的优势与恩赐。曾几次听到过西方，甚至韩国的宣教士对我说：“中国的同工们在工场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他们的当地语言始终不能突破。”但是，同样在不同工场上，看到和我们一样单元文化背景的韩国宣教士们，却能突破工场语言，并能流利地表达和对话，甚至清楚地宣讲和分享信息，使得我无话可说。

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社区是一种优势，语言恩赐也是神的恩典，但是能够突破语言，更需要抽出大量时间扎扎实实地学习与操练，必须付出相当的工夫与

代价，再加上适合的学习方法与技巧，相信靠着神的恩典，终能不断突破并长进。感恩的是，已经能看到不少中国宣教士在宣教工场语言学习方面美好的见证。比如巴基斯坦的乌这尔都语、埃及的阿拉伯语、突尼斯的柏柏尔语、东非的斯瓦西里语、泰国的泰语、南美的西班牙语等等。

4、开拓事工能力较弱

笔者在国内各地区教会参与征召宣教士时，发现披荆斩棘，开荒拓土性格与恩赐的同工很少。还有机会在宣教工场上观察中国教会宣教士时，也发现中国教会的宣教同工们开拓事工的能力相对较弱。中国教会的宣教同工们大都希望被差往宣教团队稳定、宣教事工成熟的宣教禾场，并被安排在相对熟悉的事奉岗位上。

笔者试从一个中国宣教同工的角度揣摩中国教会宣教士们的心理状态。比较多的是出于担心害怕，自觉能力不足，或者信心不够；还有就是担心一旦开始，若出现资源不够，局面不可控，需要愈来愈多怎么办。此些种种，导致宣教同工们畏手畏脚，不能放开，不能积极主动，缺乏勇气和信心，以至于不能更多更好地发展事工，从而出现满足于现状，只要有服侍，有工作做就好的情况。最后甚至出现闲懒怠惰，不思作为的消极状况，从而出现宣教工场事工停滞不前的局面。

在此，笔者特别恳求宣教的上帝，在中国教会兴起更多刚强壮胆、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能力，能够大刀阔斧、开疆拓土的宣教同工。还有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寻求发展事工，努力忠心事奉的宣教同工。

5、素质不够自卑自怜

从宣教事奉的角度而言，确实对宣教士的素质要求较多较高，这都是为了宣教事奉的持续性，宣教事工的有效性，以及宣教工场的稳定性等等。差会甄选宣教士时会更多考虑申请同工清楚的宣教异象和目标、诚实正直的品格、灵命的成熟度、自律纪律的特质、生命与事工的经验、同辈、老师、同工和上司的好评、对母会的委身程度、愿意顺服权柄、稳定的情绪、良好的身体状况、学习语言的动机、能够贯彻始终、最好有开拓事奉经历、肯牺牲的精神、有好的生活见证、有仆人的心志、较好的沟通与管理能力、具有明显的恩赐技能、愿意受教并听取

意见等等。当然，具有弹性潜力和可塑性，并愿意更新改善的同工，也是差会接纳、投资、发展，并不断牧养督导的对象。

很多中国教会宣教同工能够长期委身持守禾场，是“得”的方面，但在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同工也有“失”的方面。特别是自我形象欠佳，自信心不足，自身素质不过硬，不少宣教同工出现自卑自怜、孤单孤立、自我封闭的情形。在长期持续，不断增加的重重压力之下，出现崩溃，震动工场的局面。比如多年前发生在埃及宣教工场，中国宣教士跳楼自杀的事件，笔者认为多是以上所述方面，长期积累，不断积压所导致的，或者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笔者在某国宣教工场上也曾听到过一位中国教会宣教同工这样说：“在我们这里，西方宣教士是一等公民，华人宣教士是二等公民，中国宣教士是三等公民。”在此方面，特别是在国际合作的团队中，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情况。

盼望所有中国教会宣教同工们，都能回到《圣经》里，以神的话装备并建立自己，除去消极负面的自我形象，积极建立存心谦卑，不卑不亢，看别人和自己同样宝贵，看自己与别人同等重要的生命。在神赐予的我们的信心中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各尽其职，彼此成全，彰显出神赐予我们的荣耀尊贵的身份。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 12: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 2:3）

6、殉道情结观念误区

最有可能是神仆大卫说：“在耶和华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 116:15）

主耶稣亲自挑战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4-25）又曾说到：“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太 24:9）

使徒彼得也鼓励神的百姓：“你们蒙召原是为。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前 2:21）

使徒保罗更是以自己的亲身见证激励宣教同工们：“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2-24）

还有更多的《圣经》的话语，普世宣教历史上因受逼迫为主殉道的诸多见证人，包括中国教会历史中，太多为主坐牢，甚至殉道的仆人使女们的榜样，这一系列的挑战与榜样，形成中国教会神的仆人使女们之殉道情结，以为主殉道为最终的事奉目标，以有机会为主殉道为自己最大最高的荣耀。

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事，殉道情结也会造成误区。宣教士持守的宣教受苦理念应该是：除了为基督，为信仰，为真理，为神的国度，为神的荣耀而受苦之外，其它的苦都不需要吃，更不需要自找苦吃，甚至以受更多的苦，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加敬虔，更讨神的喜悦，而自我标榜。

2016 年底，发生中国宣教同工任要岗在非洲刚果被劫匪杀害事件。我自己看到的消息说，是该同工在遇到劫匪时，为保护所护运的物质而被杀害。我自己觉得实在有些不值，难道物资比宣教同工的生命更加重要吗？是差会的政策规定有疏漏吗？还是为主殉道的情结在作怪呢？在此，笔者不敢妄加更多的评断，但此事件确实需要更多的反省与检讨。2017 年六月，年轻的中国宣教同工李欣恒弟兄、孟丽思姊妹，在巴基斯坦被 IS 绑架遇难事件，提醒我们在穆民中事奉之宣教策略也需要深入地检讨。我们单有满腔的热情与心志，却急近功利，不顾工场具体处境，导致欲速而不达，或者落入错误的宣教观念，宣教的认知误区中，那真是宣教的“大失”。

7、前方和后方各顾各

新近，看到一位进修宣教学博士学位的同工撰文“中国本土宣教差会及教会在跨文化宣教士关顾方面的现状调查和建议”。该同工采访了 15 位中国教会宣教士，其中 7 位是中国家庭教会差派的，5 位是中国本土差会差派的。有 9 位的年龄是在 25-35 岁，95% 的宣教士都是第二代，甚至第四代的基督徒。绝大部分宣教士是夫妻带着幼小的孩子一起走上宣教工场，许多孩子是在宣教工场出生的，他们多是在 4 个月至 14 岁之间。其中 75% 的宣教士是在近 5 年内进入宣教工场的，宣教工场覆盖到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和中美洲。

该同工调查发现并提醒，中国家庭教会和本土差会对宣教士的关顾普遍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虽然每个宣教士都会坚持每两个月给自己母会和差会写代祷信，但是母会的弟兄姊妹是否真的在坚持为他们恒切地祷告，他们并不能够完全肯定和确认。差派他们的本土差会基本上能够每个月在网上与他们沟通，为他们祷告，但有时候也会因某种原因而间断。宣教士属灵上的祷告支持，不能仅仅依靠每月一次的线上祷告会或者教会内弟兄姊妹们的属灵感动，而是需要一个“宣教支援小组”，用稳定而规律的恒切祷告和爱心关怀来支持。

正如该同工的访问调查所示，笔者也以为身居大后方的教会与差会对前方宣教同工们的督导与关顾远远不够。可能是因为距离遥远，可能是因为安全问题，也可能是都比较忙碌，还有可能是自顾不暇等种种原因，遂导致前方与后方各顾各，宣教士们有需要时却得不到支援的局面。此对宣教同工、宣教工场，以及宣教事工，都会带来很多的“失”。所以，看重、加强、规范前线与后方的联结，建立完善督导与关顾系统，才能更好地发展宣教事业，才会出现更多的“得”。

另外，国际差会对中国教会宣教同工们也有一些观察与建议。由于中国之特殊处境与安全原因之故，他们对中国教会宣教士的了解与认识，多是透过对宣教士的接触，再得出一些分析与意见：

第一，中国宣教士在神学教育和宣教训练方面，特别是宗教、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装备明显不够。这主要表现在禾场神的服侍上，因为装备不足，在策略制定，信仰对话，文化汇通，处境化事奉等方面，都显示出比较被动的局面。所以，也就谈不上工场研究，人类学研究，宗教信仰评析与福音策略探讨等。

第二，中国宣教士在的工作执行能力不足，也需要加强执行力，并不断提升领导力。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多同工出自于农村背景，由于相对封闭，视野较窄，操练的机会少等原因造成的。但是，中国宣教士们的可塑性比较好，只要谦卑学习，勤加操练，假以时日，必会涌现出很多的成熟宣教领袖来。

第三，表现在队工合作上，由于中国文化的影晌，中国宣教士多属于含蓄、低调、保守型，也会有些自卑情绪。从而在融入团队圈，与同工打成一片，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就会表现的比较被动。这是中国宣教士们在跨文化团队里，国际合作中，需要正视的问题。

第四，西方宣教同工建议中国宣教士在综合素质方面需要加强，比如：增强幽默感、养成自律的学习研究习惯、保持健康的家庭关系、接受批评与不同意见、能平衡家庭需要与事奉要求，以及懂得休息调整等方面。

第五，国际差会觉得中国教会对象教士的支持力度不够，差会支援系统不足，也需要加强及完善。据观察，中国对象教士的经济支持比例多在城市教会，宣教支出占教会总奉献收入比例，最高能达到 30%，但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子，一般都在 1-15% 之间。而农村教会的宣教费用支持，谈不上月比例，可能以季度、半年度或全年度，一次性或几次性计算更加准确，多在 1000 元，至数千元之间。但是广大的城市和村镇教会，个人暗中单独奉献宣教的肢体为数不少，此对前线宣教士们的鼓励也是很大的。如果能归入系统管理，对象教士避免没有财务监督，导致灰色收入，免于在钱财上受试探而陷入软弱是最有帮助的。

前面所提到的同工在观察“差派教会或差会在经济上是如何支持和关顾宣教士”时，发现中国教会直接差派的宣教士普遍存在经济上的压力。主要原因是，一些教会的肢体认为，海外宣教士的奉献收入与国内传道人的奉献收入不应该相差太多，这就忽略了海外宣教工场的实际消费水平普遍高于国内的情况。这样的认知，给海外的宣教士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此外，由于许多家庭教会在他们的海外宣教工场没有工场主任，教会领袖对象教士的实际情况也不十分的了解，因此，教会提供给宣教士的奉献金额没有标准和制定依据，只能凭感动和教会的实际经济状况来决定。例如，在中东服事的某宣教士家庭，他们收到的奉献金额，在近十年内都没有调整过，宣教士们能体谅国内教会的艰难，也不愿意向教会提出增加奉献的要求，但却始终承受着家庭生活需要而带来的压力。

结论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每 5 年举行一次全港教会普查，最新一次的调查在 2019 年举行，并于 2020 年 5 月底举行发布会。近些年来，香港差联资深研究员熊黄惠玲老师持续观察到香港教会出现的宣教运动退朝现象。从《处境剧变下的牧养更新——香港教会研究 2014》，翻开差传 / 宣教事工部分，就能赫然发现几乎每一项差传事工的数据，都较 2009 年有很多的下降。

- 1) 堂会设有差传部门 / 差关小组, 从 61.0% 降至 55.7% ;
- 2) 设有差传 / 宣教事工的固定性组织堂会比率, 从 60.7% 降至 53.4% ;
- 3) 设差传、宣教章则或政策堂会比率, 从 48.1% 降至 40.2% ;
- 4) 设有差传 / 宣教年会堂会比率, 从 40.65% 降至 34.7% ;
- 5) 设有差传 / 宣教主日堂会比率, 从 67.9% 降至 64.0% ;
- 6) 定期举办短期宣教活动堂会比率, 从 76.5% 降至 63.2% ;
- 7) 设有专责负责差传的同工堂会比率, 从 45.7% 降至 33.1% ;
- 8) 负责差传工作的人曾接受训练堂会比率, 从 43.9% 降至 35.8% ;
- 9) 定期出版差传 / 宣教教育刊物堂会比率, 从 32.4% 降至 24.2% ;
- 10) 在祷告上支持差传 / 宣教事工堂会比率, 从 78.9% 降至 67.6% ;
- 11) 在金钱上支持差传 / 宣教事工堂会比率, 从 82.6% 降至 67.8%。

她继续观察 2019 年的宣教普查数据, 报告结果显示出很多不乐观的情况, 比如参加崇拜的人数下跌, 奉献减少, 植堂意欲下降, 年轻信徒减少, 年长信徒人数比例增加, 教会牧者相继达到退休年龄, 未来堂会牧者严重不足等。数据显示出香港差传运动已呈衰退现象, 香港教会已经意识到这个局面, 差传运动已经开始进入重整之中。这对正在兴起的中国教会宣教运动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警戒。

推动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着实不易, 以往教会走过的路, 不论是“得”, 还是“失”, 所得到的经验都是宝贵的。中国教会日后推动宣教, 自然可以海外华人、特别是美国、新加坡、港、台华人教会的教训经验作为借监与参考。

梁永强牧师谦卑地建议: 海外华人差会一定要留意在与中国的教会交流时, 重要的是传递宣教的愿景和热诚, 以及分享差会运作的原则与经验, 切勿把境外差会的章则强加于中国的差传架构上。其实中国教会有许多经验和长处是值得海外华人教会和差会谦虚学习的。况且, 在海外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与章则, 不一定全都可以应用在中国教会的处境上, 将来中国教会的宣教架构, 可能也不同于传统的“差会”模式。至于中国教会的宣教行政模式, 应该由中国教会的领袖决定, 对于海内外彼此合作的方式, 待时机成熟, 也是值得详细讨论和研究的。

本文所提到的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得”与“失”, 都是笔者自己在多年的宣教事奉中综合宣教工场上与同工的接触、观察和讨论而得的, 所以难免会有失偏颇。更何况有不少在工场上事奉的宣教同工, 事奉性质多元化, 要搜集他们的资

料，倍加困难。即使力求客观，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偏颇之处。在此，冀望此文能够引出更多的指正、提点与讨论。

笔者观察到，近年来有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随着环境的自由，中大型教会于全国各地都不断涌现，这些教会人力财力资源丰富，也喜欢走自己的路，从而在宣教事工上表现出更强的“主导性”。即使与差会有合作的关系，也不一定完全配合差会的策略与安排。这些教会很想更多地参与宣教策略的制定，希望在经费的运用上有更大的“话语权”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差会”今后的角色与定位应该怎样呢？该如何与众教会作出合宜的互动呢？这样的趋势，对今后中国教会宣教事工的发展，是“得”还是“失”呢？

宣教的“得”与“失”，是一张永远写不完的清单，也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但是，在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面对并反思宣教的“得”与“失”时，我们需要准备好应有的态度。

正如使徒保罗所言：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 3：12-14）●

影响中国跨文化工人文化 调整和留任工场的因素

文 / 泰伯·劳克林 (Tabor Laughlin) 刘明德译

撮要：本文为作者博士论文第四至第六章主要内容之选摘。作者的论文研究调查了中国家庭教会在境外跨文化工作者的关系和经历。主要涉及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在跨文化关系中取得成功或挣扎，以及分析哪些出行前经历和工场经历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工场的留任。

本研究进行了 25 次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与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有联系，并在中国境外跨文化服侍至少两年。大约一半受访者是通过国际宣教机构差派，另一半则是通过中国宣教机构差派的。宣教士在中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服侍。一些受访者只在工场工作了几年，而有些人已经在工场工作了十年或更长时间。

该论文调查研究的结果分析了中国宣教士如何在宣教工场和跨文化关系的跨文化上取得成功或挣扎，以及他们为调整和建立关系所做的工作。许多接受采访的宣教士似乎在工场上跨文化方面茁壮成长，很好地学习了当地语言，并有效地建立起跨文化关系。该研究还揭示出中国宣教士面临的挑战，即资金不足以及在宣教工场寻找工作和赚钱困难。这项研究的其他发现包括孝道对中国宣教士的影响、以及教育成就与跨文化有效性之间没有相关性。

关键词：跨文化工人 文化调整 行前准备 语言学习

第四章 调查结果的陈述

本章介绍了访谈的结果。本章内容代表了研究中的七个面谈问题中的每一个。这些包括对受访者的：跨文化适应和工场应对；工场行前培训经验；与工场当地人的跨文化关系；学习当地语言的能力；当他们感到舒适或不舒适时的工场体验；是什么因素让他们留在了工场上；以及他们有过的其他积极或消极的经历。在七个部分中的每一部分中，都有一个调查结果的介绍和一个结论。完成 20 次访谈后，数据达到饱和，收到的回复不再产生新的信息或见解。

受访者的背景信息包括：化名；他们的婚姻状况以及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在宣教工场服侍的地区；他们在那个国家服侍了多少年；最高水平的正规教育；他们的宣教机构是国际或中国宣教机构；他们的签证类型；以及他们是否隶属于一个团队。

受访者的化名首先是男性受访者使用“M”，女性受访者使用“F”。然后第一个数字表示他们在宣教工场上工作了多少年。最后一个数字是指定他们在列表中是男性“M”或女性“F”的先后排列次序(1、2、3等)。例如，“M-10-8”代表男性“M”在工场十年“10”，是本榜单上列的第 8 位男性。明确的一点是 M-4-13 和 F-4-9 已婚并一起接受采访。这就是为什么下面的列表有 26 个名字，而不是 25 个。本论文中所有其他提到受访人数为 25 的情况，均指 M-4-13 和 F-4-9 按照一位受访者处理。并且在我的研究中这是唯一(二人合并按一人处理)的案例。

表 4.1 受访者背景信息

化名	单身 已婚	区域	服侍 年数	教育 程度	宣教 机构	签证 类别	是否团队 成员?
F-4-1	单	中亚	4	学士	国际	学生	是
F-5-2	单	中东	5	学士	国际	旅游	是
F-5-3	婚	中亚	5	学士	国际	学生	是
M-2.5-1	婚/孩子	中东	2.5	中学	中国	旅游	是
M-2-2	婚/孩子	东南亚	2	中学	中国	志愿者	是
F-6-4	婚/孩子	中亚	6	学士	中国	工作	是
F-3-5	单	中东	3	学士	国际	旅游	是
M-3-3	单	东南亚	3	学士	中国	工作	是
M-3-4	婚/孩子	东南亚	3	学士	中国	志愿者	是

M-8-5	婚/孩子	中亚	8	硕士	家庭教会	学生	否
M-3-6	婚	中东	3	中学	家庭教会	学生	否
M-4-7	婚/孩子	中亚	4	学士	国际	学生	是
F-6-6	单	东南亚	6	准学士	国际	工作	是
M-10-8	婚/孩子	东南亚	10	中学	中国	工作	是
F-13-7	单	东南亚	13	道硕	国际	工作	是
M-5-9	单	东南亚	5	高中	国际	工作	否
M-9-10	婚/孩子	东南亚	9	中学	中国	社会	否
M-8-11	婚/孩子	东南亚	8	中学	国际	工作	是
F-3.5-8	单	中亚	3.5	学士	国际	学生	是
M-12-12	婚/孩子	中亚	12	中学	中国	工作	是
M-4-13	婚/孩子	东南亚	4	高中	中国	工作	是
F-4-9	婚/孩子	东南亚	4	中学	中国	工作	是
M-5-14	婚/孩子	东南亚	5	高中	中国	工作	是
F-8-10	单	中亚	8	学士	国际	工作	是
F-7-11	单	东南亚	7	学士	国际	志愿者	是
M-5-15	婚/孩子	东南亚	5	中学	中国	工作	是

综述上述背景信息：25名受访者（共26名，其中M-4-13和F-4-9是夫妻按1人计算）中有15名是男性，10名是女性。10人是单身：8名单身女性和2名单身男性；15名已婚。除了2名已婚的无孩外，所有这些已婚人士都至少有一个孩子。在有孩子的13人中，有9人有学龄儿童，其中4位父母的孩子送去以当地语言授课的当地学校，其他5位学龄儿童上的是英语授课的国际学校。在工场有孩子的家庭中：有的中国妻子回国生孩子，丈夫留在国外，夫妻二人分居数月；有的作为一家人一起离开宣教工场回到中国生孩子；有的没回中国就地生了孩子。

就宣教士所服侍的地区而言：25人中有12人在东南亚；8人在中亚；4人在中东；1人在南亚。有关就他们在工场上的年数而言：25人中有10人在工场上待了2到4年；11人在工场上5到8年；4人在工场工作了8年或更长时间。关于在中国的老家：25人中有8人来自华东，8人来自华中，3人来自东北，2人来自东南，2人来自西北，2人来自西南。

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25人中有13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其中2人在宣教工场获得了学士学位；8人最高学历是中学；3人的最高学历是高中；1位拥有副学士学位；2人拥有硕士学位，其中1人在美国获得MDiv，另1人在其服侍工场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按表格来看应该是硕士2人，学士11人，副学士1人，高中3人，初中9人，共26人。译者注）

25 名受访者中有 23 名是汉族人；M-9-10 来自傈僳族；F-13-7 是半满半汉。关于差派他们的宣教机构：25 人中的 12 人属于国际宣教机构；11 人是通过中国宣教机构派来的；另外 2 名不属于宣教机构，而是通过中国的家庭教会独立派来的。

关于他们在其工场的签证形式：25 名受访者中有 12 人持有工作签证，其中 4 人教中文，3 人经营企业，2 人有工作签证但不做生意或工作，1 人表面上有公司，但不为公司做任何工作；此外还有 1 人有宣教士签证，6 人有学生签证，4 人有志愿者签证，3 人有旅游签证。

关于他们与其他宣教士互动的的话题，25 位受访者中有 21 位回答为属于一个团队。那些属于国际宣教机构的人更有可能与中国宣教士和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混在一起。

一些来自中国机构的宣教士也隶属于混合国籍的团队。其他宣教士也与当地信徒配搭，包括一些国际机构的受访者和一些中国机构的受访者。一些来自中国机构的团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只与中国宣教士互动；其他人属于中国团队，但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其他宣教士互动。25 名受访者中有 3 名与其他中国人没有任何互动。M-5-9 和 M-5-14 附近没有其他中国宣教士。M-8-5 不愿与中国宣教士交往，因为中国的安全局势紧张。25 名受访者中有 6 人只参加当地教会，其中包括：属于当地团队；在当地教会服侍；正在建立一个当地教会；或者，其他只参加当地人教会的人。

第一个研究问题涉及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在跨文化关系中取得成功或挣扎。它考察了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困难的普遍印象。与该研究相关的还有分析这些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适应学习当地语言和融入当地文化。最后，该研究调查了那些有助于更得心应手的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宣教工场发展有效跨文化关系的感知因素。

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分析了哪些工场行前经验和场上经验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跨文化服侍中的留任。这包括哪些场前准备或后勤支持对中国宣教士有用，以及他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工场行前准备或后勤支持。对支持系统也进行了分析，例如他们的母会支持、队友的支持、宣教机构和其他有助于留住宣教士的具体因素。

一、跨文化调整与应对

1、更轻松的跨文化调整

对于6名受访者来说，他们搬到新国家的过程更容易。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家乡与新国家的环境、文化和习俗相似。F-6-4说：“因为我来自遥远的中国西北地区，所以更容易适应（中亚的生活）。跨文化的感觉并不是那么明显，我家和这里差不多，当我搬到这里时，我觉得我是还乡了。”来自中国西北同一个省份的F-8-10同样解释了她在中亚生活的文化冲击是最小的。

M-8-11表示他对东南亚的适应更顺利，部分原因是他来自中国西南的一个类似地方。他说：“挑战并不大，我的家乡在中国西南地区，所以这里的食物和其他方面我更容易接受。”

M-5-9解释了由他在中国的一个村庄长大，所以他更容易在东南亚的一个村庄担任宣教士。“我的个人背景是住在一个村庄，我在工场上的一个村庄里生活并没有遇到太多问题，我已经适应得很好，无论是贫穷还是当地家庭的食物。”

M-2-2提到在搬到现在的国家之前在另一个国家三年的生活如何帮助他调整宣教工场。两位受访者表示，在搬来之前短期访问该国缓解了在那里的调整难度。F-8-10说，“（我）之前来过这个国家两次，所以在（我）搬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知道这里是什么样的，这有助于（我）有切合实际的期望。”M-8-11同样说：“在我们搬到这里之前的两年里，我每年来这里一次，并在这里呆一个月，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2、最常见的跨文化适应挑战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在工场上的头几年最大的跨文化适应挑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11人）是新文化中的食物或饮料。一些受访者表达了他们是如何冒犯了当地人，因为他们拒绝遵循他们的饮食习惯。M-2-2说：“在那个国家，他们不使用筷子，我们在山上，他们用手吃饭。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不喜欢用手吃饭。我出去找竹子做筷子，砍筷子的时候用刀割破了手腕，我不得不特意去找竹子，试着做筷子。这向当地人表明我未能接受他们。”另一位受访者M-5-9同样说：“在这里的村庄里，他们会吃青蛙、蛇和蜘蛛。我怕蛇，有一次老师去市场买了蛇，回来给我们做饭，当我去厨房看到所有这些蛇时，我拒绝吃

它们。我离开去钓鱼是因为我不想吃他们吃的东西，因为其他学生都在吃蛇。我当时拒绝的反应和行为一定得罪了当地人。”

其他受访者最初难以适应当地人的食物，但最终适应了。M-8-11 表示：“早餐他们吃干米饭，午餐他们吃干米饭，晚餐他们还是干米饭。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不得不适应这里的食物。在几个月内，我就适应了。”另一位受访者 M-3-6 难以适应中东的咖啡文化。他说：“喝咖啡（是一个挑战）。这里的人总是喝苦涩的阿拉伯咖啡，每次见面都需要坐下来喝杯咖啡，现在我们大多已经习惯了。”

在跨文化调整中，受访者最初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语言（10 人）。一些受访者觉得他们自己无能为力。F-3-5 说：“当我出去时，我什么也听不懂，我一直需要一个翻译，我觉得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语言的另一个挑战是他们无法与他人交流以进行外展活动。M-3-4 说：“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不懂语言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无法与他人交流。我去大学见学生，但当时我们不会说当地语言，我们试图和学生说英语，但他们的英语又很差。”

其他受访者对在工场工作一两年后语言能力缺乏提高表示失望。M-4-13 说：“我每天都去上语言课，但是在我第一年的语言学习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语言能力是有限的。我无法记住词汇，我很失望。我去购物，但因为语言困难，我不知道如何说出我想说的话，人们往往无法理解。受访者跨文化适应的一个共同挑战是与当地人（9 人）的人际关系。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当地人的关系期望感到不舒服。F-3-5 说：“这里的人很容易交朋友，即使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与人的亲密。我在这里的朋友希望我与他们分享我生活中的一切，这对我来说很难，我觉得我需要界限，这有时会给我带来压力。”

其他受访者对误解当地人的想法表示沮丧。F-13-7 说：“当我和当地人发生冲突时，我认为他们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没有理解我。有时我觉得我应该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或他们如何看待事物，但后来我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掌握他们的想法。”

F-3.5-8 的钱被她认为是她“最好的当地朋友”的人偷走了。她说：“我有一个当地穆斯林的朋友，认为我们是好朋友，她经常来我们的公寓。我和我的室友开始少了钱，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这个穆斯林朋友偷了我们家的钱，我以为我可以信任她，她也信任我。然而，她最终偷了我们的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3.5-8

和她的室友与这位穆斯林朋友对质。他们告诉她，她偷钱是如何违反圣经的教导的。从这次经历中，F-3.5-8了解到，她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必须更有智慧，因为一些当地人与她的穆斯林朋友相似，并会试图从她那里偷钱。F-3.5-8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当地人与她成为朋友的动机，无论是因为他们真正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或者因为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富有的外国人，因此只想要她的钱。起初，F-3.5-8觉得很生气，像是被骗了一样。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考虑过永久离开这个国家，回到中国。但她意识到这种负面体验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这次经历帮助她更好地了解了当地人，以及他们有多穷以及他们可能需要多少钱。

F-3-5对与当地人的关系很浅表示沮丧。她说：“在第一年，由于语言能力不足，我经常无法与他人进行深入交流。我结交了新朋友，但只能与他们谈论浅薄的话题，与他们建立表面的关系。”

跨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挑战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7人)有关。一些受访者因住房问题而感到沮丧。M-3-6说：“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水很快就用完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水，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周只收到一小桶水可以使用。”M-4-13不赞成当地人处理垃圾的方式。他说：“他们把垃圾放置很长时间，然后把垃圾烧了，它腐烂得不得了。所以我开始每周把我们朋友家的垃圾扔出去，这冒犯了当地人。他们认为我不赞成他们处理垃圾的方式并看不起他们。”M-4-13很惊讶当地人被他的行为冒犯了，因为扔垃圾似乎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从这次经历中，M-4-13了解到他需要使用当地人方法来处理垃圾，而不是他自己的方法。否则，当地人会生气。他了解到，下次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他在做决定之前，需要小心翼翼地询问当地人他们会如何处理。一位受访者对当地的宗教习俗有困难。M-5-15说：“挑战在于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如果他们在路上或任何他们看到偶像的地方，他们都会停下来拜偶像。”F-8-10曾与中亚的当地习惯性地互相亲吻作斗争。她说：“人们见面时，会亲吻对方的脸两三下，起初，我很讨厌这个习惯。”

跨文化适应的一个普遍挑战是当地人对时间的看法(6人)。一些人对此感到愤怒。F-7-11说：“在中国，人们不会太晚到达。然而，当地人特别不守时。当我第一次到达时，我设定了与当地朋友见面的时间。我们说下午3点见面，但是当我下午3点去的时候，我没看到他们。我一直等到下午4点或4点30分，直到他们来了。在(发生这种情况)三五次之后，我很生气。”

6位受访者表达了团队冲突带来的挑战。有些人在加入国际团队时遇到了挑战。M-3-4说：“来自许多国家的人都在我们的团队中。我们必须适应团队中的多种文化。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来自像中国这样的单一文化背景，进入东南亚的多元文化团队很难。那段时间我的妻子压力很大。”同样，F-6-6说，“我们遇到了团队问题。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人，队友来自台湾、香港或新加坡，会说中文。然而，试图一起服侍时我们遇到了不同类型的冲突，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式。人际关系对我来说很难。”

其他受访者与中国队友发生了冲突。F-5-3表示：“我有一个中国室友，他是我的队友。当我们住在一起时，我意识到我们的性格不适合住在一起。和她住在一起，我觉得很累。”

F-3-5指出适应国际教会的挑战。她说：“我第一年的一个挑战是去国际教会。一切都是英文的，我不习惯听英文讲道，因为一切都是英文的，我觉得我每个主日在教会里没有得到属灵上的鼓励。”

有4人遇到了与事工相关的挑战。M-3-3说：“我在这里的第一年主要压力是在孤儿院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孩子在一起，这些孩子只会说当地语言，但当时我不会说。此外，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在孤儿院没有足够的工人。”

3名受访者提到了签证方面的挑战。M-2-2说：“每次我们需要办理签证时，我们都必须回国内跑一趟。我们的大量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于处理签证。每年我们来自中国资金支持的三分之一用于处理签证，这是我们最大的压力。”M-5-14在南亚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他说：“主要的挑战是我的妻子和孩子无法获得长期签证。我们每年大概有六个月分居两地，每次我的家人来只能呆三个月，然后他们必须回国。然后他们需要在国内停留至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次签证。太糟糕了！中国人很难来到南亚这个国家，因为双边关系不好。”M-2.5-1表达了他的签证压力。他说：“我们想长期留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份可以给我们签证的工作，但签证问题是个头疼问题，很难找到工作，外国人很难在中东经营业务。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长期保持下去？之前我们有个三个月的旅游签证，不得不每三个月离开这个国家更新一次。这是可行的，但压力很大，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终非长久之计。”

3位受访者面临的挑战是适应天气，尤其是在炎热的气候中。M-5-15说：“东南亚最难的地方是天气，那里每天都是大约34或35摄氏度，甚至超过40

度。我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宣教工场上的2名单身女性对当地男性对待她们的方式表示厌恶。F-3-5说：“中东的主要挑战是当地人。我经常走在路上，一群男人会冲我大喊‘你结婚了吗？’或者‘你多大了？’这总是让我感到不舒服。”F-3-5说她没有受到当地人的的人身威胁或虐待。她确实与她的宣教机构上司讨论了这些问题，她通过为这些挑战祷告并与她的上司会面讨论这种状态来解决与当地男性的紧张关系。结果，F-3-5就只负责服侍当地女性而非当地男性。如果她看到当地男性，她只会与他们进行基本的交谈。此外，单身女性F-4-1表示害怕深夜独自外出，因为她觉得不安全。

2名受访者在适应方面的主要挑战是与家人相处。F-6-4说：“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在我们来到这的第一年，我们遇到了疾病的挑战，医疗条件很差，有些俄语医学术语我听不懂。当我们有健康问题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M-2.5-1说：“我和我妻子之间存在冲突。在压力很大的跨文化环境中，有时我们沟通艰难。我们家有问题，这种压力导致我和妻子之间出现问题。”

2名受访者在强烈的孤独中挣扎。M-3-4说：“早期的挑战是孤独。我们没有任何朋友，我们是这里唯一来自中国的家庭，我们无法与他人交流。有时，当我们无法与他人交谈时，我们会感到想家和孤独。那个时候压力很大。”M-3-6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和孤独，他甚至不想出门，也不想与人们见面。M-3-6说：“在中东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因为多种因素，我经历了强烈的文化冲击，甚至不想出去。我不想见任何人或结交新朋友。我们出去的时候，当地孩子会说很多脏话。当我们出去时，我们害怕孩子们会抓起石头来打我们，我们只想闭门独居。”

3、应对跨文化挑战

受访者应对跨文化适应的困难方面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在应对思乡之情时，部分受访者通过视频与中国家人和朋友交谈。F-4-1说：“第一年，在（8年前）春节期间，我非常想家，和家人通话时遇到了技术难题。现在我可以随时通过视频与他们交谈，所以我不再那么想家了。”

M-3-6 表达了如何应对思乡之情的另一种方法是学习语言并结交当地朋友。他说：“我们在这里的第一年很想家，但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开始学习语言并拜访当地的朋友。”

2 人提到了与一大群中国宣教士一起前往宣教工场如何减轻思乡和文化冲击。M-10-8 说：“我们 10 多人一起搬到了这里。我们并没有那么想家，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熟悉的中国人。我们感觉像一家人。起初，我们很想家，但慢慢地就不那么强烈了。” M-12-12 同样说：“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 10 到 15 个中国人的团队的一员，人们一起搬家，一起生活。当我们到达时，这有助于消除一些文化冲击。” M-12-12 描述了宣教机构派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减少宣教士的孤独感和文化冲击。然而，问题是他和他的队友总是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少与当地人或当地人文化互动。所以很难信任当地人，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亲密的当地人朋友。

另外 2 人表示，他们习惯远离家乡生活，所以在宣教工场上并没有过度想家。M-5-14 说：“从 2007 年开始，我已经适应了远离家人，我不经常打电话给他们，在我搬到南亚之前，我已经习惯了很少见到家人。”

F-6-4 强调减轻她的思乡之情的因素是她的母亲和家乡教会对她的支持。她说：“我妈妈信主，我们在中国西北的家里有一个家庭教会。虽然我可能会想家，但我知道他们在为我祷告，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就应对食物的跨文化挑战而言，有 5 人未能适应当地人的食物，因此不再外出就餐。M-8-5 说：“食物不像中国那样多样化，中国有很多选择。我们很少出去吃饭，更多的是在家做饭。”

其他受访者通过明确自己的使命和适应文化来应对困难。M-9-10 说：“在应对肮脏市场和购买不新鲜食品的挑战时，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使命。如果我能明确我的呼召，我就知道是上帝呼召我来到这里，我就会意识到我（在当地食物方面）的困难并不那么严重。” 同样，M-10-8 说，“我改变了自己以适应当地的文化、天气和做事方法。”

关于当地人时间观念的挑战，一些受访者虽然遇到了最初的困难，但最终适应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M-12-12 说：“虽然最初很难适应当地人的时间观念，但现在在某些方面我比当地人还慢。有时候当地朋友会批评我迟到，我告诉他们‘是的，我是当地人，我看起来像一个中国人，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当

地人。’” M-4-7 说，“我出去之前先打电话给人们提醒他们我们一会要开会，以确保他们已经离开了家。当我在等他的时候，我可以有本书看。” F-3.5-8 已经适应了当地人时间文化，提前多次打电话提醒。她说：“提前一周和这里的朋友安排见面时，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我需要提醒他们我们是在同一天见面，这样她就能记住了。”

M-8-5 解释了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帮助他们适应时间观念的困难。他说：“第一年他们迟到会激怒我。学习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语言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做，我可以适应他们的文化。”

为了解决团队冲突，M-3-4 表示这需要对话并相互熟悉。他说：“为了解决（与国际团队冲突的）挑战，我和妻子抽出时间和他们一起喝咖啡聊天。这就是我们处理它的方式：彼此交谈多次，一对一和面对面。花了一段时间并定期一起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位受访者指出导师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团队冲突。F-7-11 说：“该机构的一位导师帮助我们解决了团队冲突。导师给了我们方向，帮助我们解决关系中的问题，并用不同的角度思考。经过这样做，我可以和我的同事和解。”

为了应对在中东的强烈孤独感，以及不想离开家，M-3-6 谈到了他是如何开始绘画的。他说：“以前我很少画画，但在那段艰难的时光里，我买了画笔在家里画画，这帮助我度过了我们的最难熬的时候。”另一个应对孤独的技巧是 M-3-4，他提到通过与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交谈，在宣教工场上忍受孤独对他和他的妻子来说是多么宝贵。

在应对语言学习的挑战时，受访者指出开始学习语言如何帮助他们克服最初的语言挑战。M-8-11 说：“主要的挑战是无法说这种语言，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有一位中国宣教士朋友可以指导我，我开始学习语言并跟他一起学习，我的语言慢慢提高了。” M-5-15 说：“我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无法学习语言，所以我无法发出他们的声音；然而，去年上帝带领我开始了语言课程，现在我可以慢慢说更多了，我已经克服了这个语言障碍。”

在应对调整中的人际关系方面，F-5-2 通过学习语言和带队友见当地人，得到了帮助。她说：“我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当地人在一起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我有精力和他们在一起，邀请我的一位队友和我一起去见当地人朋友也是有益的，这让见面更轻松了。”

M-10-8 认为改善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的关键是改变当地人的误解。他说：“当我们来到这里时，当地人问我们，‘你是中国人，但你很穷。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了克服这一点，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他们的误解，他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我们。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有些人不想和我们做朋友。”

在适应当地人文化方面，2 名男生表示他们适应了上厕所时不使用纸。M-5-14 说：“南亚人上厕所不用纸，吃饭是用手，我慢慢适应了这样做。”

F-5-3 提到研究当地人文化以适应新文化是多么有利。她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习并主动尝试看到当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所以我做了研究，第一年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我在网上找到资源来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这对我很有帮助。”

M-2-2 在适应不同的宣教工场的交通工具时说：“在这个国家，他们开得很快，很少有红绿灯，他们在左侧行驶，当我来到这个地方时，我意识到我需要像他们一样开车，这样我才不会撞车，我不得不调整。”

F-13-7 为了避免被东南亚的当地人司机骗，“(被出租车司机严重骗了之后)我从别人那里学了桥和路的名字。然后当我乘坐出租车时，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司机到达那里的方向，这样他就不会乱走路了。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学习这一切，以解决这些问题。”

总结一下跨文化调整和适应。几位受访者在进入宣教工场时有更容易的调整；那些在与他们在宣教工场相似环境中长大的人有更平稳的调整；中国宣教士在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活方面经历了许多挑战；一些最普遍的挑战与食物、语言、与当地人的关系、当地人对时间的看法和团队冲突有关。中国宣教士有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些困难。

二、工场行前准备

在 25 名受访者中，有 11 人进行了三到六个月的某种形式的工场行前准备。2 人有七到十一个月；3 人有一到两年；而且，8 人有超过两年的准备。对于其中一些，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是英语语言学习。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通过短宣旅行接触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或者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宣教培训”或参加神学教育的神学院。

表4.2受访者的宣教预备

化名	宣教训练	神学教育	包括其他
F-4-1	3个月	无	
F-5-2	3个月	无	
F-5-3	3个月	无	
M-2.5-1	1年	无	短宣
M-2-2	1年	2年	短宣
F-6-4	2年	无	短宣
F-3-5	3个月	无	
M-3-3	8个月	2年	英语学习
M-3-4	3个月	2年	短宣
M-8-5	无	8个月	英语学习
M-3-6	2.5年	无	职业训练/英语学习
M-4-7	3个月	无	
F-6-6	3个月	无	短宣
M-10-8	6个月	无	英语学习
F-13-7	1年	3年	
M-5-9	3个月	无	
M-9-10	1年	3年	短宣
M-8-11	1年	1年	短宣
F-3.5-8	3个月	无	
M-12-12	1年	1年	职业训练
M-4-13	3个月	无	短宣
F-4-9	3个月	无	短宣
M-5-14	2年	1年	短宣/英语学习
F-8-10	3个月	无	
F-7-11	1年	无	短宣
M-5-15	8个月	无	英语学习

在 25 名受访者中，24 人接受了宣教培训，只有 M-8-5 没有接受任何宣教训练。在接受宣教培训的人中，有 1 人不到三个月、11 人有三到六个月、3 人有七

到十一个月、5人是一到两年、2人至少有两年、2人结合神学和宣教训练超过两年。大多数接受三个月宣教训练的人都属于国际宣教机构。参加过三个月培训的国际宣教机构的人研究了以下主题：该国的文化差异；管理文化冲击；语言学习方法；适应工场；团队动态；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如何看待宣教；如果单身或已婚，如何在工场上生活；压力管理；以及更好地了解福音。除了上面列出的科目之外，其他在宣教培训中的人也学习了宣教历史，或者开设了专注于穆斯林或其他特定外展的课程。

对于大多数进行了至少一年全面宣教准备的受访者来说，短宣旅行是他们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旅行包括在中国境内外的少数群体中服侍数天或数月。

对25名受访者的神学教育进行分析：其中12人接受过神学教育；13人没有受过任何神学教育。2人有三个月或更短的时间、2人有四到八个月、2人过了一年、3人至少两年、2人结合神学和宣教训练超过两年。受访者提到的神学教育包括地下和中国的非正式神学院：讲道、牧养、辅导、系统神学以及研读圣经的所有书卷。

1、他们得到的最有帮助的工场行前准备

许多受访者(6人)提到他们所接受的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有人说，这给了他们坚实的神学基础。M-3-4说：“在中国圣经学校的两年对我很有帮助。我可以理解并熟悉整本圣经，全部66本书，我读过很多遍，我们背诵经文。我可以有一个强大的圣经基础，这现在很有价值，因为它帮助我养成了每天阅读和理解圣经的习惯。”M-9-10说：“在我进入这个工场之前，最有帮助的是学习系统神学，这让我对真理有了圣经的基础，更好地掌握福音。”另一位受访者M-3-3表示，如果没有他的神学基础，他将不会仍然在宣教工场工作。他说：“如果我没有神学基础，很难在这里坚持这么久，因为在异乡生活压力很大。”F-13-7认为她的神学教育对她有帮助，因为她可以牧养自己。她说：“这次神学教育让我的整个教义框架变得清晰。当我感到孤独或遇到其他问题时，我的神学教育使我能够牧养自己。我的神学院生活一直是我的主要力量和动力。”

许多受访者有过短宣旅行。这些短宣旅行大多持续数月或一年，在中国西部或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服侍。其中一些受访者(6人)特别表示这些短

宣旅行对他们准备前往宣教工场很有帮助。一些人提到这些旅行是如何有利的，因此他们可以体验跨文化生活。M-3-3说：“在那个国家的那一年，我们可以亲身体验跨文化的生活。当我搬到东南亚时，因为在另一个国家的那一年，我以前有过跨文化生活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M-2.5-1提到短宣旅行对他有多大帮助，因为他可以学习适应性。他说：“我可以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吃他们的食物，学习他们的语言。起初，我觉得我的文化比他们的文化优越，但后来我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文化并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当我搬到中东时，我在那个国家培养的这种适应性很有帮助。我可以尊重他们的文化，并尝试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做事。”M-4-13表示短宣对他来说是多么有利，因为这帮助他实际思考周围环境和经历。他说：“在短宣期间，我不得不实际考虑周围的环境。我们已经使用这些技能来思考我们在工场上所见和所经历的事情。”

对于那些提到个人属灵操练的话题，有2位评论了在宣教训练中学习如何操练自己的灵性生活的帮助。M-5-9说对他来说有价值的是操练属灵生活。他说：“重要的是培养属灵生活。老师们强调，一旦你踏上宣教工场，你的属灵生活将面临许多挑战，你必须学会如何牧养自己。”对于F-5-3的准备，有利的是强调上帝最关心我们的个人状况而不是我们的成就。她说：“他们强调，上帝最关心我们的个人状况，而不是我们在宣教工场的成就。”F-3.5-8提到学习如何休息对她有帮助。她说：“对我最有益的是关于休息时间的培训，每个星期我们都需要留出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来休息，从生活中休息一下。”

至于与语言相关的培训好处，3人提到学习语言学习方法对他们进行宣教准备有何帮助。F-6-6说这让她加快了语言学习的步伐。她说：“老师教会我们语言学习的技巧和方法，给了我一个节奏，帮助我了解自己处于语言学习的哪个阶段，以及如何达到更高的水平。当我学习当地语言时，我可以评估自己，看看我在哪里改进以及我需要改进的地方。”M-3-3认为对他有帮助的是英语语言学习。他说：“英语是我们的交流语言，我们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所以我们需要英语来交流。”

关于更具体地侧重于事工或宣教的培训的有益部分，M-8-11指出接受牧养培训对他有帮助。他说：“我的训练包括教牧训练，我经常牧养别人，我在学校学到的一切都让我在这里牧养了当地人。”M-2.5-1的学到有益的地方是了解宣教需求。他说：“我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和他们的宣教需求，以及我可

以如何为满足这些需求做出贡献。”M-5-14 因阅读宣教士传记而受到鼓舞。他说：“我们收到一些小册子，上面有宣教士传记，阅读这些小册子对我很有帮助。宣教士传记帮助我一直在宣教工场工作，直到现在。”

一些受访者指出，他们的部分培训有利于他们在工场进行调整。2 人表示，(提前)让培训老师告诉他们在宣教工场会遇到哪些困难是多么宝贵。F-5-2 说：“在训练中我可以了解到我在宣教工场会遇到什么压力，这对我很有帮助。这些压力是在宣教工场上很正常的，当生活困难时，我的压力会减轻。”对 F-4-1 有利的是了解宣教工场的周期。她说：“研究宣教周期的过程对我很有帮助。当我的生活中发生一些情况时，我知道我处于调整过程的哪个阶段，这是正常的经历，这有助于我减轻压力。”F-8-10 训练的一个有用组成部分是训练老师告诉她在宣教工场找到她喜欢的方面。她说：“学习如何在宣教工场享受生活是有建设性的。这包括如何找到我们喜欢吃的地方，或者咖啡店或中餐馆。他们教导我们要有个爱好，比如锻炼或游泳。”

其他人提到了对他们有益的准备工作的其他方面。M-12-12 说职业培训对他有益。他说：“职业培训很有帮助，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在这里拥有真实的身份。”对 F-6-4 发展团队合作有帮助的是在训练期间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做所有事情。她说：“在中国，我们在一个团队中一起训练，这为进入宣教工场、成为团队的一员、大家一起工作做好了有效的准备。”

表 4.3 他们收到的最有帮助的工场行前准备

	回应数量
神学教育	6
短宣	6
语言学习方法	3
工场上学习时常遇到的挑战	2
属灵生活操练	2

2、他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工场行前准备

受访者最普遍的(25名受访者中的12名)希望接受但没有接受过的工场行前准备是**职业培训**。一些人提到职业培训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挣钱养活自己。M-8-5说:“最重要的是接受职业培训,能够在社区内工作。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没有这些技能,在这里很难找到工作并赚钱。”类似地,M-2-2补充说:“我的宣教准备缺乏关于如何为宣教目的而在工场进行商业活动的培训。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不足,我们的签证费用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创业来养家糊口?”M-3-3说:“来这里之前接受过职业培训会有好处,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来了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如果中国的教会不再支持我们,我们就不必担心没有钱。通过拥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工作结识更多的当地人,而不是在这里没有工作或技能。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职业培训)。”

关于缺乏资金支持和需要在工场工作的话题,M-5-15谈到了他在工场工作的第一年,由于没有得到中国的资金支持,他不得不在一家工厂工作。他说:“当我第一次搬到这里时,我认为我需要在工厂全职工作,我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那时我没有任何教会的支持。”

关于接受职业培训的需要,M-3-6认为这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和社会地位。他说:“我现在有第三年的学生签证,但如果我们想长期留下来,我不能继续持有长期学生签证,否则,别人会怀疑我们。他们会想‘你的钱从哪里来?’”关于获得签证和在宣教工场拥有合法身份的话题,F-4-1说,“我们必须自行办理签证,进行这种准备是有益的。我希望我在获得合法签证和身份方面有准备和支持。”

F-8-10同样指出职业培训对于长期在工场服侍是多么必要。她说:“我们不能总是使用学生签证,如何在宣教工场找到并维持一份工作,是比神学教育更实际和关键的准备。我希望我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

M-5-9表示他可以将技能培训传授给当地基督徒。他说:“我的负担是要服侍这里的村民,但村里的牧师没有工资,他们要靠种地养家糊口。我想学习技能训练,我想把我的技能传给当地人。”

F-3.5-8是一名中文教师,她希望在她上工场之前能拿到中文教师资格证。

4位受访者希望他们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另一个准备是英语语言学习。有些人表示,他们的英语能力不足与其他宣教士交流。M-2-2说:“我听不懂更复杂的英语,当我与其他宣教士交流时,很多时候不知所云。有时当我和他们一起工作时,我觉得语言是一个障碍。”其他人则指出学习英语将使他们受益于事工。M-8-11说:“来工场之前如果在中国学英语的话对我第一次搬到这里会有帮助,这里的年轻人会说英语。然而,当我们搬到这里时,我们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

3人希望他们接受过神学教育,但他们没有。有些人提到这将如何帮助他们在外地事工。M-4-13说:“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神学教育。我在这里的四年里,有时人们会问我问题。当我们与他人分享时,我可以更好地与他们分享。”M-4-7说:“与他人讨论更深层次的神学话题时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对我来说很有价值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处于穆斯林环境中,我们经常与他们讨论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了解如何与这些人谈论圣经和伊斯兰教。”M-4-7谈到他之前的穆斯林事工培训是如何在穆斯林中传福音的骆驼布道法(CAMEL,骆驼布道法试图从古兰经中有关耶稣的段落开始,使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他主要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逊尼派穆斯林交往。他会与他们讨论上帝的爱、人的罪、耶稣的救赎和生命。他阅读了一些古兰经和一些已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流行基督教书籍,例如《耶稣与穆罕默德》和《寻求真主》、《寻找耶稣》。他说,很少有关于穆斯林事工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所以他在这方面的阅读选择有限。

2人解释了进行特定的文化培训会有一些帮助。F-3-5说:“如果我们接受培训,让我们了解我们将要进入地区的特定文化,那将会是有益的。”M-3-6说:“我们在菲律宾的训练中,没有遇到很多穆斯林。当我们搬到这里时,穆斯林是一个可以服侍的新群体,这是我们训练中的一个缺陷。”

F-5-2认为进行国际团队训练是有益的。她说:“我希望我以前有与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服侍的经验。在中国服侍五年,我只和其他中国人一起服侍,但我在这里的团队是国际的,我们的上司是韩国人。在我离开之前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服侍会很有用。”F-6-6和F-5-2认为进行冲突解决培训很有价值。

M-3-6表示,在他们到达中东之前进行一次短期的中东宣教旅行会有所帮助。他说:“在到这里之前,先来这里进行一次短期的宣教旅行会比较有利,这样我就可以提前知道在这里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我本来可以在搬到这里之前在中国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学习如何在这里创业或找工作。”

M-10-8 指出缺乏筹款技能培训。他说：“培训的一个不足是学习如何筹集资金。这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的事工和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筹集支持，而现在的资金不足。”

在结束这部分受访者的工场行前准备时，所有受访者都接受了至少三个月的宣教准备。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接受过神学教育，其中 7 位受访者接受了至少一年的全日制神学教育。至于他们得到的最有帮助的准备方面，最主要的回答是神学教育和短宣旅行使他们受益。关于工场行前准备，他们 25 人中有 12 人表示希望接受职业培训，这无疑是对这个问题最广泛的回答。这些受访者中的许多人指出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结识新朋友、在社会中拥有合法职位以及获得签证。除了这个回复，4 人希望他们已经接受了英语语言学习，3 人希望他们接受过神学教育。

表 4.4 他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工场行前准备

	回应数量
职业培训	12
英语语言学习	4
神学教育	3
当地文化培训	2

三、跨文化关系

1、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因素

对于与当地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因素，8 位受访者提到在各个方面帮助当地人的相关性。M-12-12 强调不仅要帮助他的当地朋友，还要让他的当地朋友帮助他。他说：“对于亲密的不信主的朋友，当我们一个孩子生病时，我会请他们来帮助我。我们都有孩子，他们愿意来帮忙。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来而不往非礼也！”其他受访者描述了通过帮助他们建立起紧密的友谊。F-6-4 说：“我会和他妻子聊天并留在她身边。当他们做任何家务时，我都会帮他们做，他们信任

我们。当我们回到中国然后回到这里时，他们看到我们很高兴。和他们在一起很容易，他们将我们视为他们的亲戚之一。” F-7-11 说：“必须以真诚的心服侍他们，关心他们的需求。我可以考虑如何以各种实际方式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尊重他们。” M-5-9 说：“一位当地朋友离开去中国当水手。临走前，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去了他家并见到了他家人。他去中国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探望他的家人，这对他来说很感人。他的母亲告诉他，‘你有这样的（好）朋友’。”

7 位受访者提到了拥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对于结交亲密朋友至关重要。F-8-10 说：“首先是语言。如果语言不足，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F-5-2 说：“语言能力提高了，现在和他们说话更容易了，他们也可以放松下来。” F-13-7 说：“有必要说一口流利的语言，让当地人知道你尊重他们的语言。”

其他人表示语言缺陷如何成为结交朋友的障碍。F-6-6 说：“由于我的语言限制，我与当地人的友谊仍然存在障碍。我想和当地人成为更深层次的朋友，但语言是一个障碍。” 同样，M-4-13 说，“我一直想结交当地家庭的朋友，但我在最初几年之后，我没有任何当地家庭的朋友。有时我想和别人谈谈，但不能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想说的话。” M-5-15 说：“我们还是没有表达清楚，交朋友的主要障碍是我们的语言限制。”

其他受访者通过拜访非信徒并邀请他们到他们的家中来与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F-6-4 说：“有时我们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虽然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们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吃猪肉。他们信任我们，他们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其他人提到共同用餐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同样，3 人评论了为当地人做饭如何有助于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3 人指出了尊重当地人的重要性。M-4-13 说：“首先是尊重他们，而不是看不起他们，这种态度是关键，这个人一定认为你尊重他们才行。” M-5-9 说：“我尊重他们，这很重要，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愿意成为一个倾听者。”

3 人提到照顾当地人可以帮助建立更紧密的关系。F-5-3 说，“关心他人很重要，他们可以知道你关心他们。当别人生病时，我去看望他们。当我无事可做时，我会给他们发信息。当其他人需要帮助时，我会帮助他们完成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3 位受访者通过效法当地人的方式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F-6-4 说：“我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谈，并尝试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我戴着头巾和长裙去穆斯林村。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时我和他们一起做饭。

他们是农民，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去田里。这让交朋友变得容易。” M-5-14 说：“因为我很随和，所以我会留在他们家里。他们没有床，睡在地板上。它很脏，但我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很好。没有电或互联网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当地人很可能会欢迎并接受我，因为我愿意像他们一样生活并与他们一起生活。”

分析提到与受访者性格相关的因素时，2 人认为他们稳定的性格有助于建立关系。F-6-6 说：“我很随和，和我在一起时，他们不会感到任何压力。他们认为我不仅教他们中文，而且我就像他们的姐姐一样，可以和他们聊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和他们共度时光。” 2 人提到外向的性格使他们受益。M-4-7 提到他的友善如何帮助了他。他说：“当我和其他人一起去见他们的当地朋友，而他们的当地朋友看到我时，他们认为我很友好。他们愿意与我交谈，并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向我敞开心扉。我的友善帮助人们放松。关于与受访者建立更深关系的其他因素，M-12-12 提到与他们合作如何促进建立关系。M-3-6 描述了当他们一起玩乐时，他的关系如何变得更亲密。F-7-11 谈到她的主动帮助她建立了关系。M-3-4 的一个因素是他善于提问。

M-2.5-1 与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他说：“我儿子和我们当地人的孩子一起玩。我们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当他们需要任何帮助时，我帮助他们。他们家办婚礼的时候，我和当地人一起参加了。或者当他们有聚会或葬礼时，我和他一起去。他将我视为他们的家人之一。”

F-13-7 强调了不批评他们文化的重要性。她说：“我学会了欣赏他们文化的美丽方面，而不是批评他们的文化。学会尊重，甚至去了解这些文化元素是最重要的。”

一位受访者表示，由于容易受到当地人的影响，当地人会公开与她分享他们的挣扎。F-7-11 说：“我在一个穆斯林村庄呆了大约三年。头两年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但村里的其他人甚至不和我们说话。第三年，我开始每周一个人去这个村子，我一个人去，感动了当地人。当我开始与许多女性交谈时，她们愿意与我分享她们的挣扎。”

至于分析受访者在哪里认识他们的当地朋友，他们中有 8 人提到是通过教中文。有些人在语言中心教中文，其他受访者通过免费教他们中文认识了他们的当地朋友。其他受访者表示通过教中文认识了其他老师。F-13-7 说：“我的同事是一位可爱的当地女性。我们一起吃饭或购物，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可以互相信

任。我们认识十三年了，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一起吃饭。”其他教授中文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与班上的学生见面并共度时光。其他受访者在他们并没有工作的学校遇到了他们最亲密的当地朋友。2人是当地大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另一位受访者 F-5-2 在她并没有工作或学习的当地大学里服侍时交到了当地朋友。

3人在运动时认识了当地朋友。F-4-9 谈到她的丈夫 M-4-13，“我丈夫喜欢打篮球。他经常在大学打球，我和他一起去。在他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女学生，我意识到她和我有共同点，那个女孩和我总是很高兴地交谈，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当我对任何事情有疑问时，我都会问她。”

就受访者结识当地朋友的其他方式而言，有6人与当地队友或室友成为亲密朋友，其他受访者提到了与当地队友一起服侍的困难。5位受访者与邻居成为朋友，5位受访者在当地教会交到了他们最亲密的当地朋友，2人与他们的语言老师成为了朋友，M-3-3 交的当地朋友是他工作和服侍的孤儿院同事，M-3-6 通过辅导孩子认识了朋友，M-4-7 在公园里与人分享福音时交了一位当地朋友。

一些受访者与当地人有过消极的关系经历。M-12-12 解释说：“我附近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每次出去我们都会用他的出租车，第一次我们讨价还价，他说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以为每次我使用他的出租车时都不必与他讨价还价，但我很意外其实还是需要讨价还价的。有一次我上他出租车时没有问价格，我一到地他就多收了我一大笔钱。”

2、受访者对当地人文化欣赏之处

关于受访者对当地文化或当地人的欣赏，5位指出他们的礼貌或友善。M-5-14 说：“南亚人很友好，所以很容易与他们建立关系。在火车上，您可以轻松地与陌生人交谈。”4位受访者肯定了当地人的热情和热情。

M-10-8 说：“我喜欢他们热情好客的态度。当我们去他们家时，他们会热情地照顾我们。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喝茶，和他们聊天。即使你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热情地照顾你，给你水喝。有时他们会为你做饭，即使他们不认识你，他们愿意欢迎其他人。”3人提到了他们如何欣赏当地人的简单。

F-7-11 说：“我认为他们太简单了。如果你把钥匙放在外面一整晚，第二天早上钥匙仍然在门里，第二天早上你找钥匙却找不到，发现钥匙还挂在外面的门上。如果这发生在中国，你的钥匙早就没了。”3人欣赏当地人如何尊重长辈。

F-8-10 说：“他们尊重比他们年长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加尊重我，我喜欢这一点。”其他人则提到当地人的乐于助人。M-9-10 说：“我可能不认识他们，但我向他们问路，他们会立即以友好的方式指明方向。”

F-5-2 喜欢当地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她说：“这里的人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中国，人们很少说“我爱你”，但在这里却经常说，他们喜欢用肢体语言与别人交往，我喜欢这一点。”

F-3-5 很欣赏中东人喜欢花大量时间在一起。她说：“我喜欢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和你一起摆龙门阵，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咖啡店喝咖啡或茶。”

M-4-7 喜欢当地人强调人际关系的方式。他说：“关系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男人有很多朋友。有时，当我遇到某人时，他们会帮我介绍他们所有的其他朋友。他们粘在一起，我注意到我的朋友会经常和他的朋友在一起。”

F-6-6 喜欢当地人的包容性。她说：“在中国，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自信，但这里的人赞美别人。在这种环境中，我愿意向他人敞开心扉，我觉得很有信心，这让我想和他们成为朋友。”

3、对当地人文化不喜欢的方面

就当地文化或他们不喜欢的人而言，8 位受访者提到了他们认为的当地文化和人们的不诚实和腐败，有些人提到了当地人的说谎。

M-12-12 说：“工人们告诉我，他们需要请假并要求我预付工资，他们说他们需要钱来照顾生病的母亲，我讨厌他们反复这样做，因为他们的母亲没有生病。”

M-2.5-1 分享道，“我不喜欢这里的人撒谎。在中东，我买了一辆车。车主说这是一个好车，我看了看车，看起来还不错，就把押金付给了车主，我带车去检查，得知发动机不工作时，我要求车主退还我的钱，但他拒绝了。”还有 2 位受访者不喜欢当地人老是借钱。F-3.5-8 说：“我不喜欢当地人经常说他们没有钱并要向别人借钱。然而，他们最终不会归还这笔钱，尽管他们可能说会还钱。”3 人表示不喜欢当地的腐败。M-3-3 补充道：“我不喜欢警察，他们收受贿赂并且腐败，他们认为中国人很富有。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多次给他们钱。”其他人则指出他们不喜欢当地人的人际交往方式。3 人提到他们不喜欢当地人对待女性的方式。F-3-5 说，“在中亚，和其他外国女队友一起走在路上时，男人会向我们吹口哨，

或者边走边和我们说话,我不喜欢这个。”2人不喜欢当地人交流时不坦荡。F-6-6说:“当地人很有礼貌,很难拒绝人。你邀请他们到你家吃饭,然后她会想理由说她不能,但她真的不想来。当他们生气时,他们仍然会微笑。”2位受访者不喜欢当地人过于关注自己家人的想法。F-8-10说:“家庭对家庭成员有很强的控制力。如果有人信了,他们的家人就会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不信,当家人向他们施加巨大压力以遵守他们的想法时,我会感到困扰。”M-3-6不欣赏人们在人际关系中的冷漠。他说:“很多人一开始对你很热情,但后来就变冷了。他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是亲哥们。’你认为你们的关系很好,但过一段时间,关系就会改变。”

一些受访者不喜欢与当地职业道德相关的文化和人的某些方面。M-3-3提到了当地人常不完成工作。他说:“你要求他们做某事,如果不是每天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完成工作。当他们没有完成时,如果你对对他们生气,他们就会辞职并愤怒地说:‘我辞职了’。你不能让他生气,否则,他不会为你完成工作的。”M-10-8的难点在于当地人的懒惰。他说:“我不喜欢他们的懒惰,他们做每件事都很慢,他们的懒惰导致他们变得贫穷,他们的懒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导致了问题。”

也有受访者表示不喜欢当地人对外国人的看法。M-3-4不喜欢当地人对中国人的不平等待遇。他说:“当地信徒或非信徒对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最发达的地方的人给予特殊待遇。我认为人们应该被平等对待。”2位受访者不理解当地人如何依赖他人。M-8-11说:“他们对外国人的依赖太大了。当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时,他们想为自己获得一些好处。我不喜欢这个。”

至于当地人文化的其他方面和不喜欢的人,F-6-6不喜欢不方便、不可靠和缓慢的公共交通。F-3-5不喜欢中东到处都是抽烟的人。

4、向当地人自我敞开的程度

关于受访者在沮丧时会与谁分享,许多(11人)说他们与当地信徒和当地非信徒分享。6位受访者提到会与当地信徒分享自己的挣扎,但没有与当地非信徒分享过。一些人说只与当地信徒分享,但他们没有提到任何与非信徒分享的事情。

5位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遇到挫折时不与任何当地人分享。M-8-11说:“通常我会与其他宣教士分享。”M-3-4说:“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与中国上司分享。”至于为什么人们不与当地人分享他们的挣扎,有2人不想向当地人表达他们的弱点。M-10-8说:“我很少与当地信徒分享自己的挣扎。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我

们的弱点和挣扎。”2人提到他们不与当地人分享他们的挣扎，因为当地人不会理解他们。M-8-5说：“至于与当地信徒分享方面，我们有文化差异，所以我不与他们分享。”F-3.5-8不与当地人分享，因为中国人更了解她。由于他的当地语言限制，M-5-15只能与说英语的人分享自己的挣扎。M-3-6与当地非信徒分享，因为他在宣教课程中学会了与当地非信徒分享自己的挣扎。

总结宣教士的跨文化关系经验时，提到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多个因素。8人列出了“互相帮助”。还列出了“具有足够语言技能”的必要性。其他常见的反应是像当地人一样，为他们做饭，尊重和关心他们。关于受访者如何认识他们最亲密的当地朋友，他们中有8人是通过教中文认识的。其他常见的回答他们是队友或邻居，或者是在当地教会或参加体育运动时遇到的。在受访者最欣赏当地文化和当地人的方面，最普遍的回答是他们的礼貌、热情、好客和对长辈的尊重。

他们不喜欢的文化或人的相关方面是，他们被认为经常撒谎、欺骗或作弊。还提到了当地人对待单身女宣教士的方式、警察的腐败以及当地人在沟通上的不坦荡。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与当地人分享他们的挫折或挣扎，大多数受访者确实与当地信徒或非信徒分享，25名受访者中有5人解释说不与当地信徒或非信徒分享。在讨论受访者不与当地人分享的原因时，有些人谈到他们不希望当地信徒看到他们的软弱，还表示当地人不会理解自己的挣扎。

5、当地语言能力

在接受采访的25名宣教士中，有3人参加全日制学习语言至少两年。F-6-4从小学习俄语，曾在中国一家俄罗斯公司担任翻译。M-8-5和F-7-11就读于一所主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M-8-5在那里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在25名受访者中，有9人至少兼职学习了两年语言；3人全日制学习了六个月至两年；7人在六个月到两年之间进行了非全日制学习；其中2人学习时间不到六个月。没有被访者只自学或根本不学。

6、当地语言水平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语言能力。例如，当被问及“你能去银行或买东西吗？”21人说“没问题”。4人说他们有“一些问题”。M-3-3说：“可以购物，但不能在银行做什么。”没有人说他们不能完成这些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你能和当地人随便聊聊吗？”15人说“没问题”。例如，M-4-7说：“基本会话是熟练的，我可以谈论天气、政治或新闻。”M-8-11说：“是的，讨论更深层次的话题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0人表示，他们在交谈中遇到了“一些问题”。F-13-7说：“是的，但如果话题太复杂，我就不行了。”F-4-1说：“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能听懂，有时他们无法听懂我。我可以表达简单的话题，但我不能谈论更深刻的事情。”M-3-3说他主要使用英语。他说：“当我说当地语言时，我说得很慢，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会说英语。我很少说母语，所以我慢慢地学会了这门语言。在孤儿院，我们说英语。”没有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无法与当地人交谈。

对于“你能读懂当地语言报纸等吗？”这个问题，8人说“没问题”。F-8-10说：“我能看懂70%的报纸，有时我看当地人的新闻，大部分都能听懂。”12人表示他们在阅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6人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懂。

至于“你能用当地语言讲道吗？”的问题。在回答问题的人中，略少于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用当地语言讲道“没有问题”。M-9-10说：“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2人讲道时说“有些问题”。7人说：“我不能讲道”。

总结关于语言学习的这一部分，25名受访者中有12人曾至少两年兼职或全日制学习语言。所有受访者都至少采取了一些正规的语言学校，没有人通过单独学习来学习语言。对于询问他们的语言能力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澄清他们的回答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自己能力的看法，没有基于任何测试，并且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真实能力。一些受访者对语言问题的回答存在一些歧义。例如，尽管F-6-6称自己与当地人交谈“没问题”，但她在采访的其他地方表示，由于她的语言能力，她在与当地人建立关系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与此类似的是M-4-13，他也表示自己与当地人交谈“没有问题”，但在采访的其他地方他表示，有时在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时，他们很难理解他与他们的交谈。

四、工场上的舒适度

1、工场上舒适的经历

当被问及他们在工场上什么时候感到舒服时，有5人说是因为当地人的友谊。F-6-4说：“当我们看到他们时，我们欣喜若狂。我们能够患难与共。有时我们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或去他们家吃饭。我们关系密切。我和他们在一起有他乡

遇故知的感觉，我们不会感到孤独。” F-5-2 说：“我喜欢和当地人在一起，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或者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在所有方面，包括与当地人的关系，我都在这里感到满足。”

4 人提到他们很舒服，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文化。M-9-10 说：“我在这里已经 8 年了。我有很多朋友。我有信主的当地朋友。现在我的家人都在这里。对我来说，这是我在东南亚的家。” F-5-3 说：“我可以闭上眼睛，知道一切都在哪里。想想当初搬到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现在闭上眼睛就知道咖啡店在哪里了，我知道那个超市在哪里，我感觉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4 人评价了舒适的环境。F-4-1 说：“我喜欢风景和清新的空气。” M-4-7 说：“我们去公园走走，有时我们和别人一起去钓鱼，我们去爬山，在山上烧烤，这些都很棒。”

4 人提到他们与团队的积极和愉快的经历。M-2.5-1 说：“我们的团队不仅可以成为同事，还可以成为朋友。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时，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互相帮助。这有助于我承受一些压力。” F-3-5 说：“我这里有一个中国队友。我们已经能够谈论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以及我们在这里的压力。我们互相祷告，一起唱敬拜歌曲，这让我感到很舒服。我们可以讨论并解决我们遇到的任何冲突。”

3 人指出宣教工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压力较小。M-3-3 说：“与在中国时相比，我感到压力更小。生活节奏很慢，这让我感觉很舒服。” F-3.5-8 说：“我的空闲时间比我在中国的时间还多。” 2 人感觉很舒服，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文化中的生活。M-5-15 说：“现在我在这里住了四年，我可以从内心爱这个国家并接受这个地方，即使这个国家有混乱或不公，但我已经乐不思蜀了。”

M-2.5-1 提到看到神作工的祝福。他说：“神已经把中东难民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可以接受福音。我们每周去拜访他们三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来到教会并了解了上帝，听到信徒的见证对我来说是鼓舞人心的。虽然我们在语言和跨文化方面遇到困难，但看到上帝在这里如何工作，我们感到鼓舞。”

F-6-6 说她很享受她的工作。她说：“我很高兴能和穆斯林村庄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对我的教导反应良好，当他们看到你教给他们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时，他们就会改变。当我看到他们进步时，我很高兴。我在村里的志愿工作有很多因素：教中文、画画等等。”

F-3-5 谈到她现在的生活比她第一年在工场上最艰难的时候要好得多。她说：“我在中亚的第一年压力很大，很可怕。第一年之后，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觉得我很享受人际关系、事工和语言学习。在我之前的经历之后，上帝对我说‘我带你来的。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

2、工场上不舒服的经历

4 人在与当地人的的人际关系上有困难。F-3.5-8 表示很难在她的当地人朋友偷了她的钱后，还可以信任当地人。她说：“因为我和那个女孩的关系以及她偷了我的钱，所以很难相信任何其他当地人。” F-8-10 不喜欢当地人会因为未婚而打扰她。她说：“我不喜欢人们经常问我，‘你结婚了吗？’尤其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觉得人们会想‘你有什么问题吗？’”

2 人提到了当地警察的困难。F-4-1 说：“警察试图从中国人那里拿钱。这让我很不舒服。” M-5-15 说：“有一次我骑摩托车非法转弯，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违规行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 1 美元来处理它，但他们想要我作为外国人的 50 美元。我很生气。当时我不会说英语，我说英语，但警察听不懂。”

2 人因团队冲突而苦恼。F-5-2 说：“和我的韩国上司一起工作很难。当时我知道他对我不满意，这给我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持续了大约两年，我在中东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他希望我做的越来越多，这给了我更大的压力。” F-6-6 说：“我们的团队存在多年未解决的问题，是我和队友们之间的问题，以及与他们之间的冲突。除我以外我们的大部分队友都是香港人，我们有十多人。”

2 人提到孤独的挑战。M-3-3 说：“独自一人在这里让我感到孤独。我的主要问题不是缺少队友，而是我想结婚。” F-7-11 说：“队友离开后一人呆在这里很可怕，孤独在不断地侵蚀我。”

2 人在环境方面遇到了困难。M-3-6 说：“这个国家从外面看并不美丽。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福音的目的来到这里，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国家。” F-7-11 谈到天气时说：“东南亚太潮湿了，它对我的身体有负面影响。”

M-4-7 提到了他家人的压力。他说：“有时我和妻子会争吵，我们有让我们担心的生活压力，比如我们孩子的教育。”

F-5-2 谈到了事工挑战。她说：“上学期我意识到我很容易喜欢和别人比较，这带走了我在事工中的大部分平安和满足。” F-6-4 谈到了医疗方面的挑战。她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有健康问题，我去了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去生孩子的时候，被告知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让外国人生孩子，我找不到接受我们的医院，此外，在孩子出生的前六个月我无法在医院接受检查。”

M-3-6 面临的挑战是不便。他说：“我们想买一辆车，外国人买车，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我们买了这辆车，但我们必须以当地朋友的名义登记这辆车，很难找到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

总之，让他们在工场感到舒适的最常见的反应(5位受访者)是与当地人的友谊。这些人提到他们如何与当地人建立相互信任和爱的关系。4位受访者讨论了他们亲密而鼓舞人心的团队，他们的特点是一起恳切祷告，属灵上互相鼓励。其他值得注意的反应是他们对这个地方和有吸引力的环境的熟悉程度。对于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经历，最常见的反应是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困难。其他相关回应包括当地警察、孤独、天气和团队冲突。

3、留在工场上的因素

至于留在工场上最关键的因素，11位受访者提到了神呼召他们的重要性。2人年轻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召唤，M-2-2说：“我从小就得到了这个呼召，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母亲和祖母为我向上帝祷告，并让我为上帝服侍。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阅读圣经中的使徒行传 1:8 时，上帝是如何在我里面运行的，然后我知道上帝呼召我成为一名宣教士。我的家人支持我，尤其是我的母亲。” M-3-4 描述了他妻子从年轻时就被呼召去宣教的重要性。5人说上帝的呼召如何让他们留在工场上。M-8-5说：“看到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可以在工场上坚持下去。如果你在遇到困难时来自上帝的呼召不明确，很容易放弃，为什么我们还在工场上？当上帝清楚地给我们这个呼召时，我们就会有力量继续下去。” 3人觉得他们被上帝呼召去完成某项任务或事工。M-9-10说，“我知道我在这里的任务，我不能离开这里，我能坚持到现在的原因是上帝的呼召。” M-4-7说：“我相信上帝呼召我来到这里。我可以理解，在我的事工中，我正在提供宝贵的贡献，我有经验，可以帮助同事，我可以帮助当地的朋友信主，我看到我正在影响人

们的生活。” F-3.5-8 谈到了她必须触及人们灵魂的某种呼唤。她说：“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一个集市上行走时，我的心都碎了，因为周围所有的人都迷路了，死后会下地狱。我泪流满面，决定长期留在这里。当我感到软弱、遇到挑战和悲伤时，我知道上帝呼召我将福音带给这些人。”

11 人提到在宣教工场上当地文化的属灵需求是将他们留在那里的的重要因素。4 人提到希望看到人们得救，F-4-1 说：“我有一个负担让这里的大学生得救成为主的门徒，年轻人想认识上帝，但他们不知道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认识上帝。” M-5-9 说：“在这里的村庄，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偏远的村子基督徒很少，村子里没有信徒，也没有教会。” 4 人提到负担如何使他们留在宣教工场上，M-5-14 说：“由于签证问题，我曾考虑离开这个工场，我还在这里是因为我对人们有负担，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当我为他们祷告时，我的心为他们感动。如果我再坚持十年甚至更久，只要有一个人信主，这一切都是值得。” 3 人谈到了希望看到当地教会复兴是另一个动机。F-3-5 说：“我希望看到当地信徒有自己的资源，当地教会可以自己点燃火，发展事工，这就是我想长期留在这里的原因。”

7 位受访者谈到了家庭支持对于让他们留在工场上的重要性。许多人提到父母的支持，不断为他们祷告和鼓励。F-5-3 说：“我父母一直支持我，他们每天都为我祷告，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可以与他们分享，他们会为我祷告。” 3 人谈到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支持。F-13-7 说，“我家人的支持是关键，在考虑来东南亚时，最大的阻碍是我担心我妈妈，因为她身体不好，而且年纪大了，这就是当时让我不安的原因，你知道我们的父母对中国人有多重要。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尤其是女人：父母在，不远游。这对我来说很难，但上帝能帮助我仍然来的原因是我有姐姐照顾我的母亲，我姐姐在我们教会工作，是我的主要支持者。” 其他人也提到了来自家人的类似支持。

2 人提到起初他们已经长期离开该工场，几年后他们又回到了那个国家的工场。M-5-15 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半年后我想离开，我不喜欢这里，我离开了宣教工场，但上帝一直在呼唤我并拉扯我，上帝在我心中点燃了开始燃烧的火。我知道我想回到这个地方服侍，即使我受苦或遇到困难。” F-6-4 说：“我刚来这里四年的时候，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提早回家，但我回到国内，仍然对这个地方有负担，想念这里的朋友。回来之前，我很紧张，但这种负担和目的从未

改变，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负担，我就不会在这里。我在家有工作，有房子，那里的一切都更容易，包括我们孩子的教育。”

2人指出了成为中国宣教士开拓者的重要性。M-2.5-1说：“我们是中国家庭教会派往中东的第一代中国宣教士。现在我们正在磕磕绊绊，但我们希望能帮助到这里来的下一代中国宣教士，让他们避免犯一些我们犯过的错误。”M-12-12说：“我是一名中国宣教士，中国人不擅长做宣教士，我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中国宣教士，然后我可以帮助后代的中国宣教士发挥作用，我是开拓者。”

2人说对当地人的爱让他们留在了那里。F-13-7说：“当我在这里五年时，我对这个国家持批评态度并想离开，但后来我意识到让我留在这地方的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个国家人们的热爱。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所以我想我不能离开。”M-10-8说：“我们当然不享受这里的生活，根本比不上国内的情况。这个地方各方面都比中国差，但我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们对当地人的爱。”F-6-6提到了神的引导对她留在场上的意义。她说：“我知道上帝是如何引导我的，我有很多次想回中国，我的家乡教会要我回去，并强迫我回去，但在为此祷告后，我觉得神要我留在这里服侍，我一直在坚持。”

F-7-11谈到明确的目标如何让她留在场上。她说：“虽然多年来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来这里，但我的心很清楚神来这里的目的。当我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打算再呆十年。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对自己说过这句话，这有助于我继续留在场上。”

M-3-3出于义务感留在宣教地，因为他还没有被替换。他说：“上帝给了我一项任务，但我还没有完成。在孤儿院，我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完成这项工作，没有人来接替我，所以我不能离开。”

4、使他们留任在工场的支持体系

在讨论让他们留在工场上的支持体系时，许多人提到了他们宣教机构的支持。6人强调了其所在国际机构的全面支持。F-4-1说：“我得到了宣教机构的支持。我在我们的宣教机构得到其他中国人或外国人的支持。他们鼓励我的心，为我祷告。我们经常看到住在中国的宣教机构负责人，我们彼此分享，我们的工场机构上司也帮助了我。”M-4-7说：“宣教机构的支持是巨大的。宣教机构成立并监督这里的语言中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工平台。我们已经和队友成为朋友，可以一起服侍。当我有困难或其他需要时，我的队友或我们机构的其他人

可以帮助我，比如搬家或照顾孩子的教育。” F-7-11 说，当我与工场（国际宣教机构）领袖一起服侍时，他们不仅告诉我该做什么，而且还指导我参与到他们的事工中。在与当地人之间的事工有关的任何事情中，他们问我“你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些在工场监督我们的人希望我们学习如何思考宣教工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我们做他们让我们做的一切。

其他人表达说国际机构主要协助财务和其他需求，而不是提供事工指导。M-5-9 说：“我们的宣教机构帮助我们解决财务问题，机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从未去过宣教工场，因此在事工方面，他们无法帮到我们很多。有时他们会来一个城市上课，我会去见他们上课。我经常与我们宣教机构的一些宣教士联系和祷告。”

F-5-2 说她没有得到她的国际机构的大力支持。她说：“我与我的宣教机构没有持续的联系，我想我不再需要宣教机构上司而来的这种支持了。”

至于中国宣教机构的人，有 4 人表示他们得到了中国机构的全面支持。M-10-8 说：“宣教机构支持我们管理财务和处理我们所有的行政任务。他们帮助我们制定我们告诉他们的计划，他们也会对这些计划负责。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联系我们的负责人。我们通过小团体获得稳定的宣教士关怀。” M-4-13 说：“我们的宣教机构领袖们试图了解我们的处境并为我们祷告。机构的培训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帮助我们解决财务问题。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留在这里。”

其他人则提到来自中国机构的属灵支持和教导。M-2-2 说：“我们的属灵支持是通过我们宣教机构提供的。我们的负责人每周给我们在线上课，这是他们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的负责人与我们分享圣经并鼓励我们。” F-4-9 补充道，“当我生气时，我可以和机构的一些上司坦诚交流，他们可以为我们的情况提供客观的视角，这个很重要。” F-6-4 说：“我们的 2 名负责人定期在线教学，我们学习团队建设，成为领导者和建立关系。这种教学有助于我们不断改进和思考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我们能学以致用，这有助于给我们新的力量。”

10 位受访者谈到了他们从中国教会得到的支持。其中 7 人得到了他们家乡教会的全面支持，这有助于让他们留在工场。F-5-3 说：“我的母会作为一个整体每月会为我们祷告两次。我在教会还有其他朋友，他们每周都在小组聚会上为我们祷告，我经常和他们交谈，并把我的祷告信寄给他们。在春节期间，他们送我礼物。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们，感觉他们就像我的家人，即使我住在很远

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忘记我。”3人提到了他们在自己的母会中如何受到老年人的鼓励。F-4-9说：“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村里家庭教会的老姊妹们整天坐着听我们分享，然后他们都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帮助我们留在这里直到现在，我们有后备支持。”2位受访者讲述了他们经常与教会中的某人接触，并且教会中也会有人来访。M-3-4说：“我们的支持教会总是为我们祷告和鼓励，并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我们每个月谈一两次，他们之前来看过我们。”

3人指出他们从中国许多教会获得各种形式的支持。F-3-5说：“现在我的支持来自几个教会。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帮助我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工作，现在中国有好几间教会在个人和经济上关心我。”

6人谈到他们的家庭教会的支持主要是在经济上和祷告上。M-2.5-1说：“支持我们的教会在经济上支持我们并为我们祷告。”

M-3-3说如果他未完成他的工作，他会为中国的教会感到尴尬。他说：“中国的教会支持我来这里工作，这项工作尚未完成，如果我没有完成我在这里的工作，我会为中国的教会感到尴尬。”

3名宣教士基本上独立于宣教机构或家庭教会的支持。M-8-5说：“我们很少和我们的家庭教会交谈。我们的宣教领袖给我们压力，我们很少与他们交谈，我们有队友，但不太了解他们，我们在这里靠自己。”M-3-6说：“这个春节我们回了家，我们的家庭教会不希望我们回到宣教工场，这已经很难了，我们从教会得到很少的牧养或宣教关怀。此外，我们不属于宣教机构。”M-5-9说：“现在我没有队友的任何支持，我住在一个村庄，我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支持。”

7人指出了队友的支持帮助他们留在工场上。F-3.5-8说：“如果我一人在这里，我不会坚持，但我有一个团队，我的队友很关心我，我不是一个人。”同样，F-3-5说，“队友的支持非常重要，如果我的团队不能很好地合作，那就很难了，我早就离开了。”M-10-8说他与队友们都是唇齿相依。他说：“我们的队友支持我们，我们都互相祷告安慰，一起服侍，留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对彼此负责，我们一周见几次面。”有些人说到与队友的彼此分享，F-4-1说：“我的团队鼓励我，我可以与他们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4位受访者还提到让他们留在工场的还有导师的支持。2人提到他们宣教机构的一位导师。F-5-3说：“我们机构里有一个姊妹是我的上司，我们关系密切，她就像我的导师，我们每月两次通过视频互相交谈。她是一名宣教士，所以她了

解我们在宣教工场面临的挑。” F-3.5-8 说：“我的导师给我建议，我每个月联系他们一次。”

F-8-10 提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给予她的支持。她说：“这位导师帮助我看到了我内心的各个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辅导，就很难了，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所以她会给我建议和帮助，她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以及我在工场上需要注意什么。”

3 人描述了其他中国朋友的支持。M-4-7 提到朋友的来访，他说：“我们保持联系，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每年大约会来看我们两次。” F-5-2 得到中国宣教士的支持。她说：“我在东南亚的另一个国家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一名宣教士，已经服侍很多年了，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和支持。” 3 人谈到大型宣教大会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鼓舞人心。F-3-5 说：“在大型宣教大会上，我们可以见到在其他地方服侍的人，并互相鼓励。这向我表明，我并不孤单在这里，上帝正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F-5-2 通过阅读书籍受到鼓励留在工场。她说：“读书让我深受鼓舞。最有帮助的是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写于 1600 年代的一本书，这让我有了新的愿景，我能看到上帝的威严，我意识到我需要等待上帝，看到祂无法形容的美丽。这有助于我正确看待我在这里面临的挑战。”

M-9-10 提到了短期教师和团队如何鼓励他。对于老师，他说：“老师会来教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每三个月学习一次。我们学习一门课程，他们用神的话鼓励我们。我从这些老师那里得到了牧养。” 关于短宣团队，M-9-10 说：“我带领短宣团队从中国到我服侍的所有地方，他们可以看到我在做什么，他们每年来一次，这对我们来说是鼓舞人心的。” F-7-11 说：“中国大陆的同工们来做短期旅行并鼓励我们。”

5、工人希望他们本该得到的工场支持

至于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工场支持，10 位宣教士表示需要在他们的宣教机构中有宣教经验的人来指导他们或有人给他们宣教士关怀。一些受访者谈到他们缺乏可以指导他们解决问题的导师。F-5-2 说，“许多宣教士就象我在工场上的头几年那样遇到过困难，有一位可以为我们提供实际帮助、指导或咨询的导师是很有价值的，当遇到任何困难时，宣教士可以与这位导师交谈以寻求帮助。”

M-4-13 说：“我们没有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我们进行事工。我们的中国宣教机构上司不了解我们在这里的生活。” M-5-9 评论说他的宣教机构处于早期阶段且缺乏经验。他说：“我们的机构还比较年轻，才成立了大约十年。我们在这个国家缺少有丰富经验的人，我们在工场上的需求是有一位宣教师。” M-12-12 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没有经历过的情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与人分享福音。我们没有导师。我们所有的宣教机构上司都在中国，不了解这里的生活。”

一些受访者提到，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希望宣教机构有一个固定的人来帮助他们。M-4-7 说：“有时当我和宣教机构的上司谈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和事工时，他们不明白我告诉他们的一切，这让我很失望。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固定且始终如一的人，他拥有丰富的跨文化宣教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一个模型来遵循并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M-3-4 说：“我们缺乏会员关怀，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没有固定的人可以与之交谈。除了我们的主要负责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照顾我们，这将是有益的。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不知道该与谁交谈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其他受访者指出与缺乏宣教士关怀有关的其他需求。M-3-3 作为单身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关怀。他说：“因为我是单身，我会感到孤独，有时。我希望有人照顾我。现在我在工场上没有这个，所以我经常感到孤独。” M-9-10 说他在工场上没有得到照顾。他说：“我在工场上没有人牧养我，当我遭受文化冲击时，我不知道与谁分享我的挣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也没有任何关心我的人，我想如果我有这个，它会释放我的一些压力。”

F-8-10 认为国际机构并不总是知道如何照顾中国宣教士。她说：“有时国际宣教机构不知道如何照顾中国宣教士成员，为中国宣教士做会员关怀是一个新概念。”

对于受访者缺乏的工场支持问题，另一个普遍的回答是需要更多的财务支持。8 人提到需要更多的财务支持。M-3-3 谈到来自中国的不一致支持。他说：“我们必须依靠中国的支持，他们每三个月给我们一次钱，但有时他们会等四五个才给我们钱，这不可靠。” M-8-11 谈到他们在中国教会的经济支持是不足的。

4 人表达了支持者被切断支持时的压力。F-3.5-8 说：“有时支持者会切断他们的支持，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如果我看到我的账户快要空了，那就很难了。” M-8-5 说：“当支持我们的教会出现问题时，他们就无法再支持我们了，这压力很大。” F-6-4 说：“由于最近中国的安全问题，我们与我们的家庭教会的联

系较少，有时我们的经济支持也会中断，这是一个挑战。” F-3-5 说：“在我的第一年，我经常遇到经济困难，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任何工资，因为以前支持我的人不再支持我。”

有 4 人表示，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M-8-11 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供应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解决。” M-8-5 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上学，但我们没有经济支持来做这件事，这压力很大。” M-2.5-1 说：“我们担心儿子学校的钱。我们从中国得到的支持不足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儿子分配任何特别的钱。” M-10-8 补充说：“我们对生活成本的支持不足，我们对女儿的学费有很大的压力和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的学费从哪里来。”

对于那些想在场上赚钱养家糊口的人，M-12-12 表示做生意很难赚钱。他说：“在这里做生意很难，我开了几家公司，所有的公司都赔钱了。去年我的生意破产了，我们损失了很多钱。因为我现在服侍的学校是免费的，我们不赚钱，我们有外部人士在经济上支持我们的业务。” M-8-5 提到他寻找新工作以尝试自给自足，因为中国的支持很少。他说：“我们在财务上压力很大。通常中国的教会会支持我们，但金额很少。我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我有一份工作，但不合适。我又要找工作了。”

3 人提到他们需要在场上持续的支持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他们需要志同道合的队友来分担重担。M-9-10 说：“有一个能和我保持一致的队友很重要。” 同样，M-2.5-1 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与我们分担负担的队友。有时我确实因为这个而感到孤独，我们需要的人不仅会按照我的计划去做，而且还需要能够帮助我分担领导责任的人。”

在总结人们留在工场上的关键因素的这一部分时，最普遍的反应是**上帝的呼召**使他们留在那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家人的支持以及对工场需求的了解。还提到了对人们有负担，渴望成为中国宣教士的开拓者。

在讨论与宣教士留在工场最相关的支持体系时，许多人谈到了他们从国际宣教机构获得的全面支持，包括提供财务管理、导师、培训、成员关怀、指导和紧密团结的工场团队。有些人属于国际机构，但与机构负责人或任何队友的联系很少。对于那些属于中国宣教机构的人，有些人提到机构也提供了类似的广泛支持。其他一些属于中国宣教机构的人，在他们的宣教机构中很少得到属灵关怀或

指导。几位宣教士谈到了他们从家乡教会或中国其他教会获得的重要的无所不包的属灵、经济和关系支持。其他人通过他们的宣教机构分配了一个家庭教会，可能只从那里得到祷告和经济支持。多位受访者还提到，他们从队友或所在机构的导师那里获得了支持。一些受访者是独立的宣教士，与宣教机构、中国的教会或在外地的队友没有密切联系。

在回答他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工场支持的问题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在机构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人可以指导他们的事工，以及一位可以提供宣教士关怀的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应是缺乏足够的财务支持。有些人希望他们可以工作并自给自足。对于其他人来说，当支持者切断支持时，压力会很大。有些人没有足够的支持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

五、其他正面或负面经历

1、正面经历

至于其他正面经历，4人提到了他们与宣教工场队友的亲密友谊。F-4-1说：“我喜欢有可以分享的朋友。当我搬到这里时，我知道有一些可以公开分享的朋友很重要，可以释放一些在这里生活带来的压力。与队友和其他朋友一起，当我感到难过或遇到困难时，我可以与他们坦诚地分享。这对我有帮助。”M-3-3说：“有时候和队友一起吃饭，我们互相鼓励，我感觉很棒。”F-13-7说：“我和队友互相支持，互相祝福。”F-7-11说：“自从几年前很多人离开后，一个家庭来了，两个中国家庭来了，我已经能够帮助他们并与他们一起服侍。”

3位受访者提到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神的工作。M-2.5-1说：“以前我们面临经济压力，但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我都会祈求上帝的带领。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可以学会仰望神、不抱怨，上帝会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F-6-6说：“我已经看到上帝如何帮助我在工场上成长和成熟，来到这里后，我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现在我在属灵上有所成长，我有过经验，也成熟了。”

3人描述了事工中的积极经历。F-6-4说：“去年夏天，我们在一所当地中学举办了夏令营，我们和台湾的短期工人一起做，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M-4-7说：“看到一位当地穆斯林朋友对基督教感兴趣，这令人鼓舞。”M-8-11说：“我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工。我们正在进步和成长。”

M-3-4 谈到在经济上帮助他人。他说：“我们已经学会了，虽然有时我们没有多少钱，但要在经济上支持有需要的人，上帝可以通过我们服侍他人。”

2、负面经历

有些人提到了与他们的宣教机构或团队有关的负面经历。4人提到了团队挑战。F-13-7 解释她队友的问题。她说：“我队友的抑郁症导致她开始对我进行心理攻击。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们让她回到了中国。这些攻击持续了大约一年，当时我很沮丧，但当时我们的上司帮助和鼓励了我，并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她的问题。”2人谈到他们的宣教领袖对他们的误解，M-9-10 谈到他所在机构的误解。他说：“有时当家里人遇到问题时，中国宣教会说‘让上帝来照顾吧’之类的属灵话语。如果一个宣教机构的领袖像这样鼓励宣教士，当宣教士的父母生病了，但宣教士却不去看父母，这太可怕了。”F-5-2 提到人员不断地离开。她说：“每年我都有一段较低迷的时期，我们的机构派人来这里呆两三年然后回去。我们和他们已经很亲密，相处得很好，一起快乐地事奉，然后一两年后，他们离开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我都会经历这些充满挑战的环境。”

3人提到了他们遇到的身体问题。F-4-1 说食物如何对她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她说：“因为这里的食物缺乏营养，我的身体受到了挑战。这是一个挑战，有时我不得不回中国，有时我也因为语言学习的压力而太累了。”M-3-6 谈到了他们的不孕症。他说：“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他们经常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孩子，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几年了，但我们一直没能生孩子，这压力很大。”F-6-6 说团队冲突伤害了她的身体。她说：“团队问题影响了我的健康。当人们说伤害我的话时，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所以我心里一直很苦涩，一直不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健康出了问题，寝食不安，很不开心，其中一些不好的经历影响了我的健康。”

2人分享了他们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负面经历。M-2.5-1 谈到了他因为缺乏语言能力而考虑离开工场的想法。他说：“有时我会感到沮丧，因为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语言，这很难，有时这是有压力的。有时我们怀疑自己的呼召，上帝真的要我们在这里吗？当我感到沮丧时，我会说，‘上帝啊！我没有这种语言学习能力’，我想找借口。”M-3-4 因为语言没有进步而感到沮丧。他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是第三年了。我希望我们的语言现在更好，但我们最初的几年我们将时

间在事工和语言学习之间进行了分配。我希望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先是全职学习语言一段时间，而不是兼职。”

至于受访者分享的其他负面经历，M-12-12 谈到了一些本不该上到工场的中国宣教士，以及他们如何对其他宣教士产生负面影响。M-3-3 谈到抑郁和孤独。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情绪低落，我不想与人交谈或与人相处，我想家了，想要回家。每年我都会有好几次这样的感觉，并感到气馁。我不想出去，只想一个人呆着，那些时候我感到很沮丧。如果在这期间有人可以联系我并通过视频一起交谈，那就太好了，我会兴奋起来。”M-3-6 谈到他的家乡教会缺乏支持。他说：“我们的家庭教会不支持我们。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回国。我们不想回到中东，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我们最近一直在低谷里。”M-2.5-1 表示在中东将中国货币兑换为当地货币存在困难。F-5-2 分享了与来自中国的朋友的联系减少的感受。M-2.5-1 谈到与妻子的冲突。他说：“有时当我和妻子争吵时，会变得很激烈，但我们不想让人们知道。如果我们让这里的其他信徒知道，他们会感到气馁。他们会说，‘宣教士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和妻子讨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有时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想离开工场。”在总结受访者希望分享的其他正面或负面经历时，最普遍的正面回应是看到上帝的工作，还提到了与工场上队友的友谊，以及受到事工的鼓励。

他们希望分享的负面经历包括团队关系困难、身体问题、上司对他们的误解以及语言学习方面的挑战。

第五章 调查成果分析

论文的最后一章遵循以下大纲：首先介绍研究中出现的主题，也是本章的主要部分，这包括与先例文献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其次，将从研究中得出启示。

一、研究问题

第一个研究问题涉及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在跨文化关系中取得成功或挣扎。它考察了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困难的普遍印象。与该研究相关的还有分析这些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适应学习当地语言和同化当地文

化。最后，该研究调查了那些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宣教工场更得心应手地发展有效跨文化关系的感知因素。研究对象仅包括那些在该工场停留至少两年并且没有提前打道回府的人。

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分析哪些场前和场上经验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跨文化服侍中的留任**。这包括哪些场前准备或后勤支持对中国宣教士有用，以及他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场前准备或后勤支持。还分析了哪些支持体系（例如母会支持、队友的支持、宣教机构）或其他特定因素促成了宣教士的留任。

二、凸显主题

在第4章报告的数据中，共出现12个主题。其中包括：财务如何成为一项重大挑战；职业培训的需要；孝道对中国宣教士的影响；教育成就和跨文化有效性之间如何没有相关性；当地语言学习的成功和挣扎；宣教准备如何促进跨文化的有效性；与当地建立亲密关系；宣教团队是帮助还是阻碍；宣教机构的支持程度；单身宣教士的独特挑战；克服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挑战；最后，短宣是有益的宣教准备。

1、财务是一项巨大挑战

缺乏资金是许多中国宣教士的障碍。那些隶属于国际宣教机构的宣教士没有具体说明他们从哪里获得财务支持。对于中国宣教机构的人，许多人指出他们从所在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或其宣教机构介绍给他们的其他家庭教会获得经济支持。一些人提到从中国的多个教会获得经济支持。许多受访者提到他们从中国教会得到的支持难以保证持续性，这些挑战是非常现实的。一些受访者指出，由于缺乏资金，他们的婚姻压力很大。此外，资金是基本需求，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务资源，他们必须打道回府。这些财务支持不稳定的中国宣教士可能更有可能过早地离开宣教工场，这与罗伯·海在 ReMAP II 研究中所写的有关，即提供稳定财务支持的宣教机构会产生更高的宣教士留任率 (2007b, 339)。许多其他受访者补充说，中国的经济支持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些中国宣教士面临的挑战与霍华德·布兰特的发现一致，即“可持续财务”是亚非拉世界宣教士的主要障碍 (2009,

50)。几位中国宣教士描述了当他们的经济支持被切断时所产生的压力。当他们的经济支持者停止支持他们时，这些受访者会感到压力，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审查或其他原因。这些宣教士的经历与林所写的类似，一些新兴宣教国宣教士面临挑战，因为他们母国的经济援助被切断(2007, 342)。

几位中国宣教士表达了对缺乏经济支持来支付孩子教育的担忧。这些宣教士没有从他们在中国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任何专门用于子女教育的资金，因此他们不知道子女教育的钱从哪里来。这些中国宣教士的挑战与林的描述相符，即儿童教育是新兴宣教国宣教士被忽视的经济支持需求(2007, 341)。与差派中国宣教士的宣教机构相关的还有莱恩的建议，即宣教机构和宣教士需要明确谁将支付在宣教地的费用，包括儿童教育(1990, 52)。

一位受访者解释了他从中国家庭教会收到的中国货币兑换成中东当地货币的不便。他必须先把从中国教会收到的钱从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然后再从美元兑换成当地货币，他无法在中东的当地银行直接将人民币兑换成当地货币。他将中国货币直接兑换成当地货币的挑战与丹尼斯·莱恩关于一些国家的宣教士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当地货币的困难的发现相似(1990, 54)。此外，这位受访者在兑换货币方面面临的挑战导致他整体缺乏资金，因为他每次兑换另一种货币时都会亏损。

2、需要职业培训

调查结果中出现的第二个主题是宣教士因缺乏接受职业培训阻碍了他们。受访者表示担忧的动机包括，这些技能或培训将使们能够获得签证、在工场上具有可信度、与当地人交往并在工场上赚取利润，以缓解他们的财务挑战。访谈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大家在职业技能领域缺乏准备，无法获得长期签证并在宣教工场赚取收入。在回答他们希望接受但没有接受的工场行前准备时，11人谈到他们在准备过程中缺乏但又是需要的是职业培训。44%的受访者提到了这一点，而排名第二因素(英语语言学习)的受访者只有16%，这表明它对中国宣教士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一些人补充说，职业培训将提供一个社会平台和地位。受访者谈到持学生签证不可能在工场长期工作，以及在工场长期服侍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在工场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是必要的，以避免当地人对受访者及其家人产生怀疑，并想知道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这些中国宣教士面临的缺乏职业培训的

挑战与赛斯·安奥米所写的有关，即亚非拉世界宣教士将如何从行前的职业发展培训中受益，以便他们可以在宣教工场找到工作(1997b, 236)。

一些受访者讨论了职业培训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赚钱、养家糊口。1位受访者指出，通过生意赚取足够的收入来养家糊口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中国提供的支持很少的情况下。另1位受访者补充说，在宣教工场工作和赚钱是理想的，这样他就可以结识更多的当地人，而不必担心中国的资金支持不足。这些中国宣教士渴望有工作、有收入，并且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家庭教会不可靠的经济支持，这强化了张(Philip Chang)的建议，即可以通过差派全职宣教的“带薪服侍同工”来克服低经济支持工场(2007, 354)。

3、孝道对中国宣教士的影响

中国宣教士的第三个凸显的主题是中国社会中孝顺观念对宣教士在外地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分析中更深入地了解对中国宣教士产生重大影响之孝道的各种动态，孝道在经典和流行思想中被定义为“支持、从属(或服从)和延续家族谱系”(Ikels 2004, 3)。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孝道涉及到年轻一代赡养父母的责任，以及“协调家庭关系、维持家庭连续性”(赖 2010, 205)。此外，“未能达到当地的孝道标准会导致个人形象受损、社区声誉受损，以及遗产的损失或减少”(Ikels 2004, 6)。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宣教士进入宣教工场时，如果他们被认为抛弃了在中国的年迈父母，没有达到社会的孝道标准，就会感到可耻。

在今天的东亚大部分地区，家庭可能是供养老年人的主要资源(Ikels 2004, 9)。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下，是缺乏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为老年人提供可靠且负担得起的养老院选择。对这些中国宣教士中的许多人来说，一个额外的因素是，由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独生子女政策”时代，这些宣教士中有许多是父母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来帮助养家糊口，这就是这些宣教士的背景。因此，对于许多中国宣教士来说，照顾父母是宣教士流失的主要问题和潜在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反映在受访者的陈述中。例如，一位宣教士表示，虽然她在中国有年迈的母亲，但她能够去宣教工场，得益于她的姐姐承担了照顾母亲的责任。如果她姐姐没有愿意照顾母亲，她移居东南亚会心虚，觉得自己抛弃了中国的母亲。对处于类似情况的中国宣教士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义务照

顾年迈的父母，这可能会阻止他们最初进入宣教工场，或迫使他们提前离开宣教工场。这些情况对这些有此经历的宣教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许多接受采访的中国宣教士指出了与他们的家庭有关的其他积极和消极因素。7位接受采访的中国宣教士提到，他们家人的支持是他们留在外地的主要影响之一。4人解释了父母双方如何成为基督徒，并通过他们稳定的祷告和鼓励来支持他们。3人谈到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的支持不一定只是来自他们的两个父母，而是来自他们的姐妹、兄弟，或者他们的父母和大家庭，他们都是基督徒，并且都支持他们在宣教工场。这个因素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使得这些受访者最初成为宣教士，并帮助他们留在工场的原因。

另一方面，F-3-5 分享了她的家人缺乏支持对她来说是多么困难。她说：“我的父母不赞成我在宣教工场工作。（一个原因是）我（是）单身。我妈妈和外婆都是信徒，但我妈妈也反对我去。”如果家人支持，家庭祝福是中国宣教士的一大力量和动力。然而，由于他们的孝道背景，他们的家人缺乏支持对他们来说同样形成困难和阻碍，正如 F-3-5 所表达和经历的那样。孝道和家人的支持程度如何促进或阻碍这些中国宣教士在外地的留任与莎拉·海所写的有关家庭祝福对于新兴宣教国宣教士留任至关重要是一致的，尤其是把孝道看得很重要的地方 (2007, 71)。此外，Hung 证实了孝道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 (2007, 78)。如果他们搬到宣教工场后缺乏家人的支持，可能会阻碍这些人成为宣教士，或迫使他们过早地离开宣教工场。

4、教育成就与跨文化有效性之间没有相关性

本研究的第四个凸显的主题是教育成就与跨文化有效性之间没有相关性。在接受采访的 25 名中国宣教士中，有 11 名仅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从这项研究，以及我通过访谈对宣教士的个人判断和评价来看，与那些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相比，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在有效的跨文化适应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许多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似乎在学习当地语言和建立跨文化关系方面表现出色，而一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却在跨文化事工中并没有适应。这些发现与罗伯·海的描述相反，即高留任宣教机构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宣教士数量是其两倍 (2007a, 55)。因此，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国宣教运动与韩国宣教运动不同的特点，据朴提摩太牧师说，韩国宣教运动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韩国宣教运动强调正规教育 (2010,

169)。然而，这项研究的发现与 Jaap Ketelaar 的发现相关，即尽管受过普通教育的宣教士在宣教工场的跨文化效率更高，但一些有效的宣教士却是接受了很少正规学校教育（2007 年，58）。这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宣教士在宣教工场跨文化调整的有效性与尼日利亚的纳撒尼尔·阿宾博拉所描述的类似——他的宣教机构宣教士在宣教士中很有效，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缺乏中学以上的教育（Abimbola 2007，6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美国的教育体系不同。因此，学士学位在美国的含义并不完全是在中国的含义，例如，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比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少得多。

5、当地语言学习的成功与挣扎

研究中第五个凸显的主题是受访者的成功与努力学习当地语言有关。出于本论文的目的，我认为精通当地语言是指精通以下能力：阅读报纸、购物和就日常问题进行交谈。使用这些参数，25 位受访者中有 8 位精通该语言。这种“熟练程度”可能与机构间语言圆桌会议（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ILR）规范的第 3 级（一般专业熟练流利程度）最为相似。

7 位受访者指出，要交到亲密的当地朋友，足够的语言能力是最重要的。在 25 名受访者中，有 12 人以课堂形式或与导师一起兼职或全日制学习了至少两年的当地语言，所有受访者都兼职或全职学习了至少六个月的当地语言。这表明语言学习是所有这些中国宣教士和差派他们的宣教机构的首要任务。8 位受访者在对他们的当地语言能力进行自我评估时说既能熟练地以当地语言交谈，又能流利地用当地语言阅读。

10 名受访者回答说，在工场的头几年，适应语言是一项重大挑战。一些受访者指出，语言障碍可能会成为结交当地家庭朋友的障碍。一位受访者表示，在她进入该工场的最初几年，由于语言不足，她很难与当地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一些受访者表示，有时他们希望与当地人交谈并与他们交朋友，但当地人却不知所云。一位受访者描述了他只能向会说英语的当地人自我敞开的表达的挣扎，因为他的当地语言太差，无法用那种语言分享。其他受访者表示，由于在当地工作多年后当地语言仍缺乏进展而感到沮丧，甚至有人谈到因为这种挣扎而考虑离开宣教工场。

这些受访者的当地语言熟练程度对他们结交亲密朋友能力的影响与基督教和世俗学者一致，他们同意学习外语以建立有效的跨文化关系的重要性

(Gudykunst 和 Hammer 1988, 126 ; Lingenfelter 和 Mayers 2016, 17 ; 莫罗、坎贝尔和格林纳 2014, 77-78 ; Elmer 2006, 66, 77-78)。

6、宣教工场行前准备如何促进跨文化有效性

该研究的另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宣教士工场行前准备促进了跨文化有效性。所有接受采访的中国宣教士都接受过一些宣教准备。这种宣教准备可能包括获得英语学习、进行短宣旅行、接触中国的少数民族、参加神学教育的神学院、或者其他形式的“宣教训练”。

9 位受访者有两年多的宣教准备。M-12-12 和 F-13-7 似乎是在跨文化方面最为成功并在宣教工场工作至少十年的人，他们接受了两年多的宣教准备。得心应手，我的意思是他们成功地学习了语言，与当地人建立了友谊，并且似乎过着幸福充实的生活。F-13-7 在美国获得了她的道学硕士 (MDiv)。相比之下，一些宣教士属于国际机构，这些机构只提供三个月的宣教培训，没有任何特定的神学教育。但是，从我自己在中国工作十年的分析和感受来看，其中一些宣教士似乎在宣教工场已经得心应手。相反，一些进行过两年多宣教准备的人似乎仍然在跨文化方面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在本研究中，正如布洛赫 (2007a, 18) 所提出的那样，接受至少一年的宣教士准备与保持较高的宣教士留任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在接受采访的 25 名中国人中，有 24 人接受过宣教训练。这种“宣教培训”包括以下主题：当地的文化差异、管理文化冲击、语言学习方法、适应工场、团队动态、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如何看待宣教、如果单身或已婚如何在工场上生活、压力管理以及更好地了解福音。同样，那些在工场工作至少五年并接受过至少一年宣教训练的人似乎在工场具有卓越的跨文化理解、适应能力和生存之道。另外一面来讲，也有一些甚至接受过广泛宣教训练的宣教士似乎仍在跨文化上挣扎。此外，一些宣教士只接受过三个月的宣教训练，但似乎在建立跨文化关系和在实地调整方面表现出色。这些现实表明，关于接受更广泛的宣教培训是否有助于留住中国宣教士的研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罗伯·海所提出的认为留任率较高的宣教机构对宣教培训的要求要高出两到三倍 (2007a, 55)。

13 名宣教士接受了宣教训练，但缺乏正规的神学教育。一些属于提供三个月宣教培训但没有神学教育的国际机构的人，他们已经在宣教工场上工作了至少五年，看起来在跨文化方面得心应手，并且有亲密的当地朋友。25 名受访者中

只有 1 人缺乏宣教培训。工场宣教前培训对受访者的重要性与罗伯·海所写的一致，即工场宣教前培训是跨文化服侍中留任宣教士最有益的培训 (2007k, 105)。

25 名中国受访者中有 12 人接受过神学教育。其中 7 人至少有一年。在分析那些在其工场工作至少五年的人时，那些接受过至少一年神学教育的人似乎更加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受访者是通过国际宣教机构派来的，这些机构没有提供前期的神学教育。这些宣教士中的许多人，虽然没有接受过工场前神学教育，但似乎仍然在工场上得心应手，然而，在 25 位受访者中，有 6 位提到神学教育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实地准备。此外，有 3 人指出神学教育是他们希望自己接受但没有得到的实地准备。因此，受访者的经历和罗伯·海的结论之间似乎存在一些高度相似之处，即高留任率机构的宣教士所接受的神学教育是低留任率机构的宣教士的两倍 (2007k, 106)。

7、与当地人建立亲密关系

本研究的另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受访者与当地入有效建立关系方面的成功和挑战。在本论文中，如果一个人与当地入有广泛的关系，相互信任的证据，以及与当地入交往的舒适程度，就会被认为是良好的关系。这些术语来衡量，大多数人似乎都与当地人建立了正面关系。正如文献综述中提到的，有一些因素通常被认为对有效建立跨文化关系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些因素以多种方式反映在这些中国宣教士的调整能力上。这些因素之一是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古迪昆斯特和金写道，当我们与其他族裔的人交流时，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焦虑 (2003, 339)。更少的焦虑和更少的不确定性会带来更好的“沟通的感知质量和有效性” (341)。另一个因素是成为“好的倾听者”。埃尔默指出，当我们成为“好的倾听者”时，我们不仅向谈话者展示了我们对他们的爱，而且谈话者会很乐意与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 (2006, 122)。

有效建立跨文化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避免以种族为中心的态度。勒斯蒂格和科斯特写到我们思考自己在其他文化中对“视觉、声音和气味”的“情感反应”时都揭示了我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心态 (2006, 160)。另一个因素是向当地入的自我敞开的表达。多德写道，如果一个在期望“高度表达”的文化中“表达不足”，或者在重视“低度表达”的环境中“过度表达”，那么“文化冲突”随之而来 (1998, 190)。另一个因素是培养对当地文化的掌握。古迪昆斯特和金

解释了“知识”以及它如何与了解其他文化以及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异同 (2003, 280–282)。我们要“注意”并承认他人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283)。最后一个因素是融入当地文化和学习当地语言的重要性 (Gudykunst and Kim 2003, 292; Gudykunst and Hammer 1988, 126; Lingenfelter and Mayers 2016, 114; Elmer 2006, 66, 77–78)。

必须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明确要求受访者与我分享他们在建立跨文化关系中遇到的挣扎的故事，这可以更全面地描绘受访者在跨文化关系中的经历。所有描述他们在建立跨文化关系方面遇到困难的受访者都在采访中没有被明确询问。他们被问及哪些主要因素促使他们与当地当地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引出了受访者讲述他们与当地当地人亲密关系的故事。

受访者指出，他们自己的友善、语言能力和随和的性格是帮助他们减少与当地当地人互动时焦虑的一些因素。这些经历与古迪昆斯特和金所写的类似，即当我们与其他族裔群体交流时，我们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以及如果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焦虑和不确定性，我们的交流将变得有效 (2003, 339–341)。

一位受访者承认，在一个东南亚国家呆了五年后，她对那个国家持批评态度，不喜欢她那里并想离开。然而，在那里住了更长时间后，她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她现在明白不仅要避免批评当地文化，还要欣赏和尊重它。这与古迪昆斯特和金的发现是一致的，他们写道应对焦虑的破坏性方法包括批评其他文化 (1992, 365)。

一位受访者谈到他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帮助他与当地当地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对于建立有效的跨文化关系所必需的研究结果一致 (Gudykunst 2004, 182–186; Dodd 1998, 202–203; Elmer 2006, 122)。

一位受访者解释了她与当地家庭的朋友一起体验到的共同幸福，以及当地家庭如何将她的家人视为他们的“亲戚”之一，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亲密。这些发现符合 Ted Ward 将“同理心”定义为部分涉及“情感联系” (在莫罗、坎贝尔和格林纳中引用, 2014 年, 221)。

80% 的受访者指出了与当地当地人公开分享他们的挣扎。其他受访者未能与当地当地人分享他们的不满，一些受访者只与其他宣教士或他们的国内上司分享。不与当地信徒分享的原因包括不愿意展示自己的弱点，以及认为当地人不会理解他们。一位人士指出，在中东，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公开向当地人自我敞开的表达对她来说是一项挑战。跨文化关系专家 (Gudykunst and Kim 2003, 333; Lustig and

Koester 2013, 227–245; Dodd 1998, 189–190; Elmer 1993, 157) 描述了那些向当地人自我敞开的表达的人如何更有可能与当地人建立更深的关系。

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她如何通过了解中国和那个国家的异同来适应新文化。她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还在网上研究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她的经历与一些专家所写的类似，即需要了解与该文化的特征和习俗相关的特定文化知识，包括使该文化与众不同的原因 (Lustig 和 Koester 2006, 69–70; Moreau, Campbell, and Greener 2014, 232–233)。另一位受访者谈到，当她对当地文化有疑问时，她是如何向当地好朋友寻求帮助的。这种方法类似于埃尔默所写的关于向他人学习的重要性——向他们询问有关他们文化和生活的问题，并让他们教我们了解他们的世界 (2007, 98)。

一位受访者谈到戴头巾和穿长裙以融入当地穆斯林文化；她还提到，她和当地妇女一起到田里帮助她们种地。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帮助当地人把她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对待。另一位宣教士谈到他愿意睡在村里当地朋友肮脏的家里，没有浴室，没有电，也没有互联网，并评论说，当地人接受他是因为他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喜欢他们。这些研究结果与多位学者关于遵循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以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必要性所写的一致 (Gudykunst and Kim 2003, 292; Gudykunst and Sudweeks 1992, 365–366; Lingenfelter and Mayers 2016, 10–11, 114)。

当受访者被问及跨文化适应挑战和他们不喜欢的当地文化方面时，25 位受访者中有 8 位提到了他们对当地人总是迟到并且在他们开会时迟到而感到沮丧。林根费尔特和梅耶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跨文化事工》中写道，每种文化对时间的看法都不同。他们书的第一章描述了一些文化如何强调守时，而另一些文化则不太关心时间，以及这种时间观念的差异如何在进入新文化时造成压力 (2016, 25–38)。

3 人谈到尊重当地人如何帮助与他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些经历与埃尔默的评论一致，即我们要尊重他人，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2006, 45)。

9 位受访者提到，他们在工场上的头两年里，一个主要的挑战是与当地人的际关系有关。一位女士描述了她在中东如何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向当地人自我敞开的表达。中东的另一位受访者对她的当地朋友期望与她共度大量时间感到筋疲力尽。2 位东南亚受访者表示，由于当地人在沟通上的不敞开，常常会不知所云，这让他们感到沮丧，1 位受访者的钱被一位她认为是“最好的朋友”的穆斯林当地人偷走了。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她刚进入该工场时与当地人的关系很浅，因为

她的语言能力不足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此外，一些受访者描述了他们与当地人的友谊因为自己的当地语言不足而受到阻碍的。如前所述，一些人提到在与当地人交朋友时遇到困难，例如当受访者无法理解当地人的口语，另一位表示只能和会说英语的当地人交朋友，因为他的当地语言能力不够。

一些受访者谈到了与当地人的其他负面人际关系经历。一位受访者指出，当她拒绝帮助一位正在学习中文的当地女生做中文作业时，那个女生很生气。在另一个案例中，人们对“朋友”的含义存在误解。南亚的一位受访者指出，在与当地印度教徒交朋友方面存在挑战，因为他在家里吃他们为偶像献祭的食物时感到不舒服。

8、宣教团队是帮助还是阻碍？

宣教团队是帮助还是阻碍中国宣教士是从研究中得出的另一个主题。许多宣教士在他们的宣教机构团队中提到了正面经验。一位受访者阐述了她与中东一位中国队友的亲密关系，他们相互鼓励和彼此祷告。同样，另外3人指出，他们强大的团队让他们留在了工场上。一位受访者谈到队友之间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他们可以互相分享，互相支持，互相背负重担。这些研究结果与布洛赫的表述一致，即与队友的密切关系是使新兴宣教国宣教士留在工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7a, 15)。罗伯·海证实，由于新兴宣教国通常比较注重关系，他们与队友的积极关系是他们留在场上并提高效率的关键(2007i, 163)。

相反，一位受访者表示，即使在全是中国人的团队内，她与队友还是相处得不好，这让她筋疲力尽。她的经历与罗伯·海的观察一致，即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对于留住新兴宣教国宣教士同样重要，但团队冲突可能会严重分散这些宣教士的注意力(2007, 175)。一些中国宣教士在国际宣教机构团队中挣扎。一位受访者表示，来自中国等单一文化背景的宣教士在多种文化的国际团队中，要健康成长是多么困难。另一位同样指出，即使在与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其他讲中文的团队一起工作时，他们在尝试一起服侍时也会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服侍都有不同的想法。另一位受访者解释了在韩国团队上司手下工作的困难，她说她花了很多年才学会在他手下工作得很好。这些受访者的挑战与罗伯·海的结论一致，即国际团队内部的团队冲突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人们很难与不同的人很好地合作(2007e, 176)。

2人讨论了因离群索居而无法定期与人交流的情况。这2位受访者都是独立的宣教士，与队友、宣教机构或中国家庭教会没有经常接触，但他们掌握了当地语言，并在工场适应得很好。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没有团队而感到不满。

至于如何准备中国宣教士在国际或中国宣教机构团队中的宣教工作，一位受访者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宣教前准备包括与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服侍，这样可以在多元文化团队中亲身体验事工。为了在培训期间培养积极的团队合作，另一位受访者提到在她的培训期间的团建很有帮助，这使她进入工场后在团队中工作得很好。

9、宣教机构的支持程度

该研究的另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宣教士从其宣教机构得到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支持。25名受访者中有12人是通过国际宣教机构派来的。许多中国宣教士描述了他们从这些机构得到强有力的实地支持。一位受访者谈到她常与所在机构的工场领导定期接触，他们为她提供帮助和鼓励。一位受访者的宣教机构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支持，他评论说，他的机构甚至为他提供了在语言学校的工作平台。另一个提到她的宣教机构上司不只是简单地给她指示，而是教她如何根据环境和人际关系见机行事。然而，在国际宣教机构内实地支持方面的一个负面经历是，一位受访者报告说，他的宣教机构上司从未在宣教工场生活过，因此无法在许多领域提供事工指导方面的实质性帮助。这些经历与罗伯·海的表述相似，即对于差派新兴宣教国(NSC)宣教士的宣教机构，提供实际的工场支持至关重要(2007h, 151)。

25名受访者中有11人是通过中国宣教机构差派的，另外2人不属于宣教机构，而是通过中国的家庭教会独立差派的。

关于中国宣教机构的人，有4人表示，他们的中国机构帮助他们管理财务、提供祷告和属灵关怀支持，并通过国内的家庭教会资助他们。其他人谈到从他们的中国机构获得属灵支持和教导；有些人提到，他们的宣教机构上司每周都会为该机构的所有宣教士提供在线教导。对于中国宣教机构内部的负面经历，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宣教机构上司缺乏宣教经验，因此对当地生活缺乏了解。因此，他们觉得机构上司无法为他们的事工提供明智的建议。另一位受访者也解释说，工场没有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他们完成事工。文献没有提到拥有具有跨文化宣教经验的新兴宣教国宣教机构上司的重要性。

10、单身宣教士的独特挑战

另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单身宣教士面临的独特挑战。采访的 25 名宣教士中 8 名是单身女性，2 名是单身男性。其中一些中国宣教士似乎对仍然单身感到不满。一位单身男性受访者表示他的主要问题是他想结婚但仍然单身；一位单身女性提到，有当地人问她是否已婚时会激怒她。她有一种印象，当地人可能会认为她很奇怪。这些研究结果与莎拉·海的表述一致，即宣教士必须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感到满意，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 (2007, 73)。

国际宣教机构中的一些单身中国宣教士表示，有一位导师在实地帮助他们。一位现已结婚但在工场时一直未婚的受访者谈到她所在机构的一位女士，她每月通过视频与她交谈两次。这位女士也长期担任宣教士，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另一位受访者描述了每月与她的导师的对话，以及她的导师如何给她有益的建议。一位女性受访者表达了她那具有丰富宣教经验的心理辅导员如何帮助她评估和理解她的想法和情绪，从而给她宝贵的指导和帮助。一位受访者指出，她所在宣教机构的一位导师帮助她解决团队冲突并寻求和解。关于她们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支持类型，一位单身女宣教士谈到她多么希望有一位导师来帮助她提供实际帮助、指导或咨询，但她无法获得。中国宣教机构中的一些单身宣教士也提到缺乏导师。接受采访的两位单身男性提到需要一位导师来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经常感到孤独。这些宣教士的经历与彼得妻子的建议相似，即支持单身宣教士的一种方法是为他们提供一位会照顾他们和满足他们各种需求的导师 (彼得的妻子 2009, 175)。相比之下，接受采访的已婚宣教士没有提到让他们机构的导师帮助他们的重要性。

一位单身女宣教士表示感到不安全，害怕深夜外出。她的经历与彼得妻子的评论一致，即单身宣教士妇女经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彼得的妻子 2009, 175)。

11、克服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挑战

另一个出现的主题是克服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挑战。一位受访者描述了他们在抵达东南亚时，一些当地人认为他们应该像在那里看到的其他中国人一样富有，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很穷时，他们不愿意做他们的朋友。通过与他相处的时间，当地人发现他们之前对他的误解是不准确的，因此他们可以与他建立亲密的友谊。另一位受访者谈到，由于中国与那个国家的关系不佳，他

最初居住的南亚国家的人们在听到他是中国人时可能会感到紧张。然而，当他们看到他能说多么流利的当地语言时，他们可以信任他并与他建立友谊。这些宣教士的经历与埃尔默的建议一致，即通过向他人学习，我们可以消除相互的刻板印象 (2006, 98)。

一些受访者谈到了他们因偏见而受到当地人的消极对待。一位受访者讲述了他对中国人有偏见的经历。M-3-4 说：“当地信徒和非信徒对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最发达的地方的人给予特殊待遇。我认为人们应该被视为平等。”² 人提到他们不喜欢当地警察，因为当地警察认为中国人都很富有，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商人。他们说，警察经常想占中国人的便宜，骗他们钱，这些受访者谈到警察会如何针对性地对待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或美国人。

12、短宣作为有益的宣教

最后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工场行前短宣经验对中国宣教士的好处。当受访者被问及什么工场行前准备是有利的问题时，6 位受访者回答说短宣对他们是有利的。这些短宣旅行很有价值，因为它们帮助受访者体验了跨文化生活，培养了适应能力，并学习了如何切实深入地思考他们的环境和经历。一些受访者对宣教工场的调整更容易，部分原因是之前曾到该国进行短宣旅行。一位受访者希望他在搬到中东之前曾进行过一次中东的短期旅行会更好，他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加深他对在中东找工作有多难的理解，从而使他在离开之前在中国接受职业培训。因为大多数汉族人对其他民族的接触相对有限，正如很多人提到的，短宣经历非常有利于他们体验另一种文化，接触其他人。鉴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访谈表明短宣经验可以成为提高潜在中国宣教士文化意识的宝贵准备。

这些受访者的经历与威廉·泰勒和史蒂夫·霍克所写的关于跨文化生活的好处是一致的，以便为宣教士在宣教工场的跨文化生活做好准备 (2009, 107)。这种跨文化体验可以通过短宣旅行获得 (2009, 107)。Evelyn Hibbert 支持在进入宣教工场之前在跨文化环境中生活足够长的时间的重要性，以尽量减少个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 (2016, 69)。David Lee 写道，针对来自单一文化背景的亚洲人训练时，宣教士应该体验跨文化，这种体验有助于培养个人品格、跨文化事工技能和宣教理解 (2008, 113)。

总结

第一个研究问题涉及中国宣教士与当地人建立跨文化关系并适应当地文化的能力。综上所述,许多受访者在建立跨文化关系、学好当地语言、向当地人自我敞开的表达挣扎以及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信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一些受访者在建立跨文化关系方面遇到困难,未能很好地学习当地语言,也没有与当地人建立信任或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关系。数据证实,那些成功地学习语言、自我敞开的表达并与当地人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人在工场调整得更好。另一方面,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好的人,在工场上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第二个研究问题探讨了提前的准备和工场支持如何帮助中国宣教士留在宣教工场。大多数受访者(25人中的23人)接受过至少三个月的宣教培训。几乎一半的受访者(25人中的12人)没有学士学位,但这种不太正规的学校教育并未对他们学习语言和建立跨文化关系的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当被问及受访者希望接受哪些工场准备但没有接受时,最普遍的回答(25个中的11个)是技术或业务培训。与亚非拉世界宣教士的一般挣扎类似,许多受访者报告说一个重大挑战是中国教会的财务支持不足。此外,受访者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普遍存在的家庭祝福有助于他们留在工场。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这项研究本质上是定性的,因此其发现不能推广到其他群体或人群。

总的来说,中国宣教士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宣教士与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有许多相同的跨文化适应和当地语言学习挑战。这些发现并不出人意料。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往往与更广泛的文献一致,中国宣教士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宣教士一样。然而,鉴于他们来自的极端环境(中国),他们工作的环境更加困难(例如穆斯林世界、东南亚),以及他们必须学习非常困难的语言,他们可能会经历更艰难的宣教挑战。

将中国宣教运动与其他研究的亚非拉世界宣教运动(韩国、拉丁美洲、印度、非洲)进行比较,中国运动在某些方面与韩国运动相似:他们都来自东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孝道的重要性和家庭对宣教士的支持。与韩国宣教士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来自单一文化背景(超过90%的同一种族)时跨文化服侍的挑战。然而,韩国宣教运动与中国宣教运动的主要区别在于:韩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中国

则是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宣教士在缺乏资金支持方面的挣扎与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印度和非洲的世界宣教士更相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宣教运动来自一个拥有封闭和控制政府的国家，而韩国、印度以及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基督教不受控制且宣教机构合法的国家。中国宣教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我与知名人士的对话，许多从中国差派的宣教士主要来自农村和贫困的家庭教会团队，并且没有接受过初中或高中以上的正规学校教育学校。然而，尚未确定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

在分析数据时，对于让受访者留在宣教工场而没有过早打道回府最重要的因素包括：

- 11 of 25：上帝亲自呼召他们去宣教；
- 11 of 25：关注当地文化中人们的属灵需求；
- 10 of 25：宣教机构的支持；
- 7 of 25：队友的支持；
- 7 of 25：家庭教会的支持；
- 7 of 25：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
- 4 of 25：导师的支持和指导。

三、研究意义

1、正规教育与跨文化效能的关系

受访者的一个特点是，25名受访者中有11人没有接受过初中或高中以上的正规学校教育。虽然这些宣教士的正规学校教育水平较低，但他们可能接受过广泛的神学教育或宣训练。不知道我对中国宣教士的研究结果是否支持“接受更多正规教育的人在宣教工场的跨文化适应更得心应手”的观点？”如果有的话，至少基于我采访的中国宣教士的有限样本，这些接受采访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宣教士中的大多数与ReMAP II书中的内容相似；他们类似于来自尼日利亚的宣教士：他们缺乏正规教育，但在跨文化宣教中仍然有效 (Abimbola 2007, 62)。

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似乎在学好当地语言以及有效地与当地建立密切跨文化关系方面同样得心应手。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在工场也都面临类似的挑战。例如，教育程度较高和

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都在努力应对在宣教工场拥有合法平台、工作和足够薪水的挑战，以便自给自足。关于宣教机构与正规学校教育背景的关系，13名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受访者中有9名属于国际宣教机构；没有中学以上学历的8名中有7名属于中国宣教机构。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在语言能力、留任或跨文化成功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2、协助宣教士履行孝道义务的需要

一个观察与中国的孝道如何影响中国宣教运动和潜在的中国宣教士的现实有关。洪写了中国基督徒如何因履行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而不敢进入宣教工场(2007, 78)。

洪建议中国家庭教会协助照顾宣教士的父母，可以解决潜在的中国宣教士因对家庭的责任感而无法前往宣教工场的问题(2007, 78)。M-9-10提到了他的沮丧，因为他的宣教机构没有让他每年都回来看望家人。他说：“中国人关心家庭。我们很难每年都回国看望父母，如果父母年老体弱，而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对我们这些在中国以外的服侍的人来说是有压力的，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因为这些压力而离开了这个工场。”在分享的最后，M-9-10补充说：“我们的家庭教会并不关心我们的父母。”因此，M-9-10的挑战和压力被放大了，因为他在中国的家乡教会没有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而在洪看来，这种方式是最理想的。如果他的家乡教会能够承担部分照顾M-9-10父母的重担，M-9-10就可以在外地服侍，而不会因将父母单独留在中国而感到内疚。

与M-9-10的情况类似的是F-13-7的挑战，她描述了她在父亲去世后感受到的压力。当她考虑搬到东南亚时，阻碍她的主要影响是她担心谁来照顾年老体弱的母亲。F-13-7谈到了中国文化中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并讨论了离开父母的中国女性如何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道。这对F-13-7进入工场起到了威慑作用，因为她希望避免让家人失望。尽管如此，她之所以能够安心前往宣教工场，是因为她的姐姐告诉F-13-7，她会充分照顾她们的母亲，这就是让F-13-7能够毫无愧疚地进入战场的原因。

对于中国宣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人在国内帮助照顾他们留下的年迈父母。M-9-10在中国缺乏对年迈父母的照顾，这增加了他在宣教工场的压力；然而，另一方面，F-13-7能够毫无愧疚地生活在宣教工场上，因为她有一个人可以照顾她

年迈的母亲——她的姐姐。正如洪所写的那样，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国家，有必要让国内的人帮助照顾宣教士年迈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这让原本可能因离开父母而感到内疚的中国宣教士能够自由地在宣教工场上服侍，而不会受到如此大的持续干扰。由于孝道也是一种社会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也是对基督教的不良见证。洪描述了中国家庭教会帮助照顾宣教士年迈父母的必要性。对于中国宣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国内的人积极协助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这个看护人可能是另一个家庭成员或兄弟姐妹，或者，这个看护人可以是宣教士母会的人，特别是当宣教士的家庭缺少一个人来承担照顾父母的重担时更需要。

3、通过工作技能培训提供足够的财务支持

差派中国宣教士的中国宣教机构或国际宣教机构在宣教准备工作上做一些调整是有利的。差派中国宣教士的宣教机构需要在培训方面做出最明显的调整，就是更好地准备中国宣教士在当地就业和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机构可以建议候选人在前往工场之前接受特定领域的职业培训，这样这项工作就可以落实。宣教机构可以获取有关中国人在特定事工所在地的具体工作机会信息，然后可以建议候选人接受适合该地区的适切的职业培训。M-12-12 是唯一确认接受过此类培训的受访者，他谈到了这种培训对他在工场上的生活多么有益。关于他们希望接受但没有得到的培训问题，25 位受访者中有 11 位提到了职业培训。他们补充说，这样的培训可以让他们为找工作、有稳定的收入、获得稳定的签证、开辟事工机会以及在宣教工场提供合法身份做好准备。稳定的收入，一种在外地工作的产物，将使这些宣教士能够自己赚钱，从而减少对国内家庭教会经常不稳定的经济支持的依赖。

许多受访者谈到，他们之前在中国唯一的工作经历是在家庭教会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商业或其他工作经验，因此，特别是在离开前没有接受任何岗前技能培训，他们在某些限制下进入宣教工场。他们可以持学生签证全日制学习两到三年的语言，但是当他们在宣教工场停留更长时间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们不能长期持有学生签证，为了续签旅游签证，他们的全家每隔几个月离开他们的服侍国家是不切实际或不可取的。他们需要在该工场的真正工作，不仅为他们提供签证，而且为他们提供收入和社会中的合法地位。理想情况下，该工场的这个工作最好不要只是纯粹为了获得签证而挂羊头卖狗肉的商业平台（如 M-10-8）。

这些宣教士将受益于在宣教工场获得合法就业的装备。部分受访者兼职或全职教授中文，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工作签证。对于在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泰国）服侍的中国人来说，学习汉语的需求更高，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可以在那里教汉语。然而，在远离中国的国家，如中东或非洲，学习汉语的需求较少，因此教授汉语的工作将是稀缺的。为中国宣教士提供多种工作机会会很有帮助。

为了装备中国宣教士在外地赚取收入和获得签证，什么样的技能或商业培训实际上是有效的？M-12-12 即使接受了前场职业培训，仍然难以在中亚经营有利可图的业务。理想情况下，让受训者了解未来工场具体的工作情况将是有价值的。在到达工场之前，他们应该确定该国家/地区有哪些类型的工作可作并且需求量很大。如果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很大，那么学员，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学员，可以在上岗前做好准备。可以接受对外汉语教学培训，取得汉语教学证书。

如果学员具有特定的专业背景（例如工程、医生、商人或女性），他们有可能在国外找到这些专业的工作，从而有资格获得该工场的工作签证。这可能类似于通常所说的“营商宣教 (BAM)”。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创业商业技能的中国人可能会在该工场开展有利可图的业务，然后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来做事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可能很少有机会成为专业人士或在当地教授中文。同样，在宣教士前往工场之前，需要了解当地人的背景。但是，对于以前没有经商经验的中国宣教士，建议在他们前往外地之前进行长期培训。这可能包括：学习如何开展可持续的业务并盈利；确定哪些工作最适合他们移居的国家；根据他们的个人经验确定他们有资格从事哪些工作；并获得技能培训和适当的证书（例如厨师；中文或英文老师；理发师）。

在异国寻找工作机会时，最重要的是避免面临 M-5-15 的挑战，他们只有中学教育，没有接受额外培训。刚开始传道时，他没有来自中国的经济支持，不得不在工厂全职工作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在他的工厂里工作这么辛苦和长时间工作，他没有时间或精力学习当地语言或结交当地朋友。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但对于没有受过特殊培训、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宣教士来说，这样的工作可能是唯一可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宣教士来说，为开办营利性企业或商店做好适当的准备如此重要。

理想情况下，中国宣教士可以找到工作或开始有利可图的企业，而不是通过在该工场创业而赔钱，这可以避免他们继续依赖中国教会的经济支持。

25 位受访者中有 9 位提到他们的差派教会或机构提供的财务支持不足或不可靠。这种财务压力表明，宣教机构更需要为他们的中国宣教士在前往宣教工场之前接受职业培训制定方法。他们需要准备好在工场找到一份工作，赚取收入，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另一种选择是差派教会在更现实的层面上支持他们的宣教士。然而，这可能无法像工作技能或创业那样帮助宣教士获得签证。

4、工场行前跨文化准备的重要性

中国宣教士需要两种类型的场前跨文化准备。**第一种涉及一般的跨文化适应和生活技能。**这可能是通过短宣旅行来实现的，许多受访者都是这种情况，威廉·泰勒和史蒂夫·霍克在《全球宣教手册 (2009, 107)》中也提出了这一建议。乔纳森·英格比 (2007, 108) 建议体验式跨文化宣教实践，通过长时间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体验各种跨文化的长期挑战调整 (食物、语言、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时间观念、团队冲突)。建议不仅要这样做几个星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至少要这样做几个月。还建议模拟工场生活，其中包括处于团队环境中，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生存和外展的共同任务。

所需的第二种跨文化准备是了解中国宣教士可能面临的更具体的挑战。中国宣教士培训的调整将是教给他们中国宣教士最主要的跨文化适应困难。这种准备工作可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宣教士可以了解其他人已经面临的共同挑战，并能够在他们到达工场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文化冲击。面临的最常见的跨文化挑战是：

- 25 个中的 11 个：难以适应食物和饮食；
- 25 个中的 10 个：语言学习困难；
- 25 个中的 9 个：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困难；
- 25 个中的 6 个：难以适应当地人对时间的感知；
- 25 个中的 6 个：团队冲突困难。

可用于这些工场培训的资源是林根费尔特和梅耶斯的《跨文化事工》。学员了解各国在时间、判断力、处理危机、目标、自我价值和脆弱性等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将是有益的 (2016, 19)。这样做可以帮助未来的中国宣教士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差异，从而帮助他们更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进入宣教工场时的调整过程。除了威廉·泰勒和史蒂夫·霍克编辑的著作《全球宣教手册 (*Global Mission Handbook 2009*)》外，其他用于培训中国宣教士进行跨文化事工的有益资源包括：

- 《培训宣教士：原则和可能性 (*Training Missionaries: Principles and Possibilities*)》，作者 Evelyn Hibbert(2016)；
- 《从亚洲语境培训跨文化宣教士 (*Training Cross-Cultural Missionaries from the Asian Context*)》，作者 David Tai-Woong Lee(2008)；
- 《整全事工培训：设计和评估 (*Integral Ministry Training: Design and Evaluation*)》，由 Robert Brynjolfson 和 Jonathan Lewis 编辑 (2014)。

同样有益的是宣教机构为中国宣教士准备其他常见的跨文化挑战，这些挑战是以前的中国宣教士在适应当地人们或文化时所面临的。例如，有 6 人回答说，当地人对诚实有不同的价值观。关于挑战的其他常见反应是：当地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 (3 人)；当地警察腐败 (3 人)；当地人在交流中的不敞开心扉 (2 人)；以及当地人如何看待财务问题比如借贷 (2 人)。

5、国际宣教机构与中国宣教机构的合作

通过比较国际宣教机构和在中国宣教机构的受访者的经历，可以进行比较并得出启示。如前所述，大多数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属于国际宣教机构，而那些没有接受过初中或高中以上正规学校教育的人通常属于中国宣教机构。一些中国宣教士可能更愿意加入以中文为交流语言的中国宣教机构。对于那些属于国际宣教机构的宣教士来说，英语通常是团队和机构内部使用的主要语言。无论国际机构还是中国机构通常都同属一个团队，这两种机构中的许多人都有积极的团队经验。虽然在国际机构内部提到的团队冲突较多，但中国机构内部也存在一些团队冲突。与中国机构的 2 名单身男性相比，那 8 名从属于国际机构的单身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国际机构和在中国机构内部都面临着资金不规范和资金不足的挑战，两类机构的受访者都很难在工场找到工作或创业平台。

国际机构人员的经历与中国机构人员的经历有很大不同，国际机构人员的经历大多伴有导师和具有宣教经验的人，可以为宣教士提供事工和其他指导。另一方面，属于中国机构的人员普遍缺乏可以带领或辅导他们的具有宣教经验的导师或领袖。在提到缺乏经验丰富的导师或领袖的 10 人中，大多数都属于中国机构。

大多数国际机构都拥有经验丰富的人员和整体更强大的基础设施。这些发现表明，国际机构与中国机构之间的一种合作形式可能是有益的，国际机构可以帮助在中国宣教机构内为中国宣教士提供导师或宣教关怀。由于与大多数国际机构相比，中国宣教机构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中国机构缺乏成熟的结构。国际机构不仅可以通过提供会员关怀或指导等支持来帮助中国机构，而且国际机构还可以指导中国机构领袖在自己机构内形成类似成员关怀或其他结构。

6、发掘在安全约束和风险下工作的创新方法

中国宣教运动与大多数其他亚非拉世界宣教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宣教士是从基督教受到严格控制的压迫性政治环境中派来的。所有这些中国宣教士都是从中国的家庭教会派来的，这在技术上是非法的，并且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逼迫。在宗教自由的国家，与中国不同，可以有公开的宣教会议和宣教组织，可以进行详细而精确的研究。然而，这种宣教的开放性对于中国宣教运动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境内不能存在公开宣教会议或组织，宣教机构领袖们不能彼此公开合作，任何关于中国宣教运动的研究或著作都是口传的和不准确的。

卢大卫声称，中国拥有最大的新兴宣教运动，而且起源于一个严格控制基督教的压迫性政权 (Ro 引自 Zylstra 2016, 21)。接受采访的中国宣教士重复的主题是中国敏感的安全如何影响他们。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中国政府对中国宣教士回国时对其进行了严厉审讯，但这些案件仍然是少数。然而，越来越多的逼迫和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监视对中国宣教运动产生了如下所示的影响。

F-6-4 谈到了她对中国的支持可能会因为中国西北地区家庭教会的关闭而被切断。她说：“现在我们在中国有教会支持，但现在中国家庭教会有困难，而我在西北的老家教会更难聚会，有时我们的财务支持会中断。由于他们的处境，他们不能完全支持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一份新工作来养活自己。”

F-6-6 和 M-5-15 解释说，由于中国现在基督徒的敏感环境，他们在与中国基督徒的通信必须小心。F-6-6 说：“我的家乡教会有一位姊妹受指派经常与我交流，我和她分享，然后她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告诉别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因为现在发送此类信件或电子邮件是不安全的。” M-5-15 说：“我们过去经常与支持的教会互动，以前比现在更多。以前我们每个月都给他们写一封祷告信，

现在因为中国的安全问题，我告诉牧师，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我们不会联系他们，这是为了他们和我们的安全。”

因此，无论受访者是否明确提及，中国政府最近对家庭教会和宣教士的限制增加都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加强监视意味着中国的家庭教会更难定期向他们汇款。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后方支持的教会警察分成更小的团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家庭教会会众突然分裂，使他们更难延续正常的财务向教会或其宣教士奉献。这种压力迫使中国宣教士减少与教会代表接触，就像 M-5-15 的情况一样。此外，中国宣教士每次回国都倍感压力。他们可能会担心政府是否会逮捕或审问他们，或没收他们的护照并禁止他们返回宣教工场。政府对中国家庭教会的逼迫越来越严重，是中国宣教士需要准备和装备在宣教工场自力更生，从而在经济上独立于教会的另一个原因。

7、促成中国宣教士留任的其他因素

分析其他有助于留住中国宣教士的因素，机构内部的支持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有助于这些受访宣教士留在宣教地的因素。6 人提到其国际机构的全面支持，其他人指明国际机构主要协助资金和其他需求，而不是在事工中提供指导。至于中国宣教机构内的人，有 4 人表示，他们得到所在机构的全面支持。尽管在中国宣教机构有负面经历，还是有其他人提到他们从中国机构获得的属灵支持和教导。有 2 例相对独立的宣教士似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独立而在他们的事工中受到很大的阻碍，一些受访者在他们的国际或中国宣教机构中有负面经历。尽管如此，还是建议那些与中国宣教士有关的人敦促有志向的宣教士加入宣教机构。理想情况下，宣教机构可以为这些宣教士提供重要支持，从而帮助他们留任。

加入宣教机构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成为团队的一员。7 位受访者评论了队友的支持如何帮助他们留在工场上。虽然有受访者提到在工场经历团队冲突的压力，但仍然建议差派中国宣教士的宣教机构将他们的宣教士放在团队中，最好在同一个城市一起服侍，并经常见面。通过这样做，这些宣教士可以相互鼓励和支持，有助于提高学习当地语言有效性、相互鼓励提高留任率并与当地人建立深厚的关系。

许多受访者还指出，宣教机构提供一名有宣教经验的导师，可以提供成员关怀和工场指导，这很重要。4 位受访者指出，有导师可以助于留住受访者。另

一方面，关于受访者希望得到但没有得到的实地支持，10位宣教士表达了他们希望他们的机构中有宣教经验的人来指导他们或给予他们宣教关怀。此外，对于接受采访的10位单身宣教士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拥有一位可以定期与之交流的导师对于他们的留任至关重要。许多通过中国宣教机构差派的宣教士指出，他们所在的机构缺乏具有宣教经验的领导，可以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工场支持和指导。此外，F-8-10表示，国际机构并不总是知道如何照顾中国宣教士。因此，建议差派中国宣教士的宣教机构努力寻找有宣教经验并能为单身和已婚的中国宣教士提供宣教关怀和指导的导师或领袖。

留住中国宣教士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教会的支持。10位受访者谈到了他们从中国教会得到的支持。其中7人得到了他们家乡教会的全面支持，这为他们的稳定状态做出了贡献。其他人提到他们的宣教机构如何将他们介绍给中国的一个教会，该教会“领养”了他们，为他们提供经济和祷告支持。无论是通过宣教士家乡教会的支持，还是宣教机构介绍的其他教会的支持，重要的是每个中国宣教士都能得到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致的属灵、祷告和(如果需要)经济支持。中国教会的这种支持不应该只针对宣教士在外地的最初几年，而且应该持续下去。得到这种稳定的支持不仅有助于留住宣教士，而且中国的教会也可以通过他们对这些宣教士的持续支持和关系得到属灵的造就。

在分析留住中国宣教士的其他因素时，11位受访者提到上帝对个人呼召的重要性。因此，应鼓励宣教机构在候选过程中讨论中国宣教士候选人对宣教的呼召。最初的ReMAP研究中也提到了这个因素。缺乏呼召被认为是可避免的流失的主要因素(Brierley 1997, 94)。此外，11位受访者指出，对当地文化中人们属灵需求的关注是使他们留在工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促成因素。由于这非常重要，宣教机构可以在招募新宣教士和寻找家庭教会以资助宣教士时强调当地文化的属灵需求。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本章将介绍研究的主要结论。此外，它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建议。这项研究首先以相关的研究问题入手。第一个研究问题涉及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如何在跨文化关系中取得成功或挣扎。第二个研究问题分析哪些出行前经历和工场经历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工作者在工场的留任。

这项研究得出了四个关键结论。首先，数据和分析表明，**财务是中国宣教士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宣教士中的许多人从中国的家庭教会那里得到了一些经济支持。然而，这种财务支持往往不足以满足外地宣教士的需要。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教会对中国宣教士的贡献较少。也意味着许多受访者从中国获得了不稳定和不一致的财务支持，这对中国宣教士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压力。关于中国宣教士财务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最近对中国家庭教会的逼迫加剧，对中国宣教士造成了经济上的影响。如果中国警方试图关闭支持宣教士的家庭教会，宣教士可能会被中国切断经济支持。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是一个与留任宣教士有关的问题，因为一些宣教士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务支持，可能需要永久离开宣教工场。

该研究的第二个关键结论是需要进行实地职业培训。如上所述，中国宣教士因缺乏足够的资金在工场上生活而苦苦挣扎。25名受访者中近一半表示，他们希望自己在职业培训领域接受过工场准备。宣教士很难在宣教工场赚取收入，这不仅对那些受过正规学校教育较少的宣教士，而且对那些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宣教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这些宣教士能在地赚取收入，他们就可以少依赖中国教会微薄的经济支持。此外，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宣教士在地赚取收入，还能获得长期工作签证，在当地社会中保持合法地位，并为此目的与当地建立关系。

第三个关键结论是孝道对中国宣教士的影响。25位受访者中有7位指出，家人的支持是他们留在宣教工场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她的家人不支持她去做传道工作对她来说是多么困难。对于中国宣教士来说，家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一发现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孝道为中心的社会。在中国，每个人都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中。毫无疑问，家庭长辈的支持将成为中国宣教士最初进入该地区并继续留在当地的主要因素。孝道的这一因素与宣教士的留任有关：获得家庭支持有助于留任，而缺乏支持则对留任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个关键结论是教育成就与跨文化有效性之间没有相关度。与我的预期相反，数据表明，与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受过较少正规教育的人在跨文化调整和实地建立关系方面的效率并不低。在这项研究中，许多只有中学教育的人在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学习当地语言和跨文化适应方面在取得不菲成功。此外，一

些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似乎在建立跨文化关系和在该工场进行调整方面遇到了困难。25名受访者中有11人仅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有13名至少拥有学士学位。但是，如前所述，宣教士的正规教育背景与他们在宣教工场的跨文化适应和语言学习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此外，宣教士的正规教育水平似乎对他们的留任没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中国宣教士未来研究的可能性比比皆是。在中国宣教士培训中心可以进行一项田野调查，分析培训的动态、优势和劣势。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研究中国宣教士培训的具体细节，而是试图呈现中国宣教士经历的广阔图景。进行进一步研究，深入研究中国宣教士培训的各个具体方面，并关注中国宣教士培训模式的有效性，包括可以修改或添加的内容，将是有利的。考察中国宣教士在宣教工场所参与的不同类型的事工，这在本文中并没有涉及。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中国家庭教会如何准备和支持他们所差派的宣教士，包括他们如何从家庭教会网络中的教会为他们的宣教士筹集资金。同样有益的是在更大的样本中进行定量研究，以发现我的研究发现的因素对中国宣教士的普遍性。另一项相关研究是研究与羞耻和荣耀相关的因素。可能的问题可能包括：害怕羞耻会让中国宣教士留在外地吗？提早返回的宣教士会不会感到羞耻？另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是属于国际宣教机构的中国宣教士的经验。

根据传闻，中国宣教士在跨文化关系和与当地人的交流方面存在困难，本来可以避免的流失率很高。这项研究没有检验这种关于中国宣教士流失的说法，因为它只研究了坚持不懈且没有过早回国的宣教士。就像来自其他国家的宣教士一样，一些留在战场上的人在跨文化方面挣扎，并遇到了许多跨文化关系方面的挑战。然而，这些受访者中的大多数似乎与当地人的关系密切，强调学习或使用当地的语言，并且具有以相互信任、关心和相爱为特征的关系。

本研究首次在跨文化调整和宣教士留任方面对中国宣教运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前所述，经验证明中国宣教运动中采访的宣教士的调查结果与宣教文献和亚非拉世界宣教文献中的发现一致。尽管如此，中国宣教运动确实有其独特的方面，与中国的压迫政府带来的额外挑战有关，以及与大量中国宣教士在初中或高中之后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也有关。中国宣教士的其他一些独特因素与孝道、支持不足或不一致导致的经济困难以及中国人在其他国家面临的偏见有关。

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能够更好地告知参与差派中国宣教士的人员，从而为这些宣教士提供出色的工场行前培训和工场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有益于宣教机构领袖们提高中国宣教士在跨文化调整和留任方面的有效性。中国宣教运动的领袖需要注意更好地准备中国宣教士在当地就业，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少对教会经济支持的需要。此外，中国宣教运动的领袖需要鼓励家庭教会协助宣教士照顾留在中国的宣教士年迈父母。 ●

中国宣教士在中东的 跨文化挑战与突破

文 / Joshua Sun

撮要：我是一名在中东宣教的宣教士，曾经在国内牧会、做宣教动员，接受各种技能训练、拿各种主内外的证书和学位。直到进入禾场，发现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咿呀学语，重新社会化。曾经幻想自己是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结果是地球领养了一个外星婴儿——道成肉身式的进入另一个文化。犹如重新开始另一个人人生，让人极其谦卑，又犹如天父赐予的崭新礼物，让人极度喜悦。本文试图从理论结合个人实战经验谈中国宣教士在中东的跨文化挑战与突破。

关键字：文化比较 穆斯林文化 面子荣誉 文化习惯

一、为何要进入文化？

这个问题更深层的提问应该是一个宣教士是如何向人宣教的？或者一个非信徒是怎么变成信徒的？我发现当我们过多执着于策略和模式的时候，往往容易看不清楚事情的本质。我想请您闭着眼想想您是怎么信主的？您认识的人是怎么信主的？能否总结出一套“怎么给一个人传福音”的公式？您最多可以说出几个触发一个人信主的点，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把握说：“你只要按这个套路做，他就一定会信主”。我个人也经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一个地方呆几年没带一个人信主，出去学习几个月倒是意想不到带了一个和我目标群体完全不搭边的异教徒信了主，至今还保持远程牧养。因为一个人信主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不管是上帝恩典的拣选还是他个人信心的回应，这两件事我们作为传递福音的人都没有决定权。我很喜欢这几年在宣教士群体中流行的一个定义：我们宣教士是催化剂。大家知道两个物质之间是否会产生化学反应和催化剂是没有关系的，催化剂只是加快或减慢了反应的速度。我们必须谦卑承认我们决定不了一个人是否信主，但是当我们顺服那位差派的主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充当催化剂的作用，加快一个人信主，门徒再生门徒，植堂运动的速率。

所以，作为催化剂，我们唯一有把握的就是提高我们接触面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催化可能的反应。不管采取什么宣教策略，比如直接在大街上给人讲福音，商业宣教，祷告寻找平安之子，动员当地教会，培训当地门徒给当地人传福音、做门训、推动植堂运动，这些从技术上来讲其实都是与人接触与沟通的问题，都需要进入语言和文化才能做得，或者说才能做得长远、持续、有影响力。关于语言的重要性，我在“学当地语作为当前中国宣教运动的瓶颈”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都到他们国家了，自然就是进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了呀？”其实不是的，除了宣教士这种有意而为之的群体，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是靠近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化群体，所以全世界才会有那么多唐人街、中国城。因此，进入语言、文化绝对是需要突破自己舒适圈、有意而为之的行为。

另外，语言、文化作为福音的载体，往往会决定了福音的流通方式。就像一个婴儿，你教他用筷子还是刀叉吃饭，他以后就是这么吃的，他有了孩子也会是这么教孩子吃饭的。如果福音从一个宣教士传到当地，不用当地文化的表达方

式，自然就是宣教士自己原本领受的文化表达方式。我们所传达的东西是不会超过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神学理解、宗派传统、信仰表达习惯、传福音的方式等等都会全部倾倒在当地人身上。如果再加上不学当地语，需要用翻译的话，这种文化距离感就会更强，我老家的阿姨们听那种讲一句英文翻译一句中文的讲道就很费劲，费劲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里面的举例、文化逻辑、情感的起承转合都跟他们一辈子输入的东西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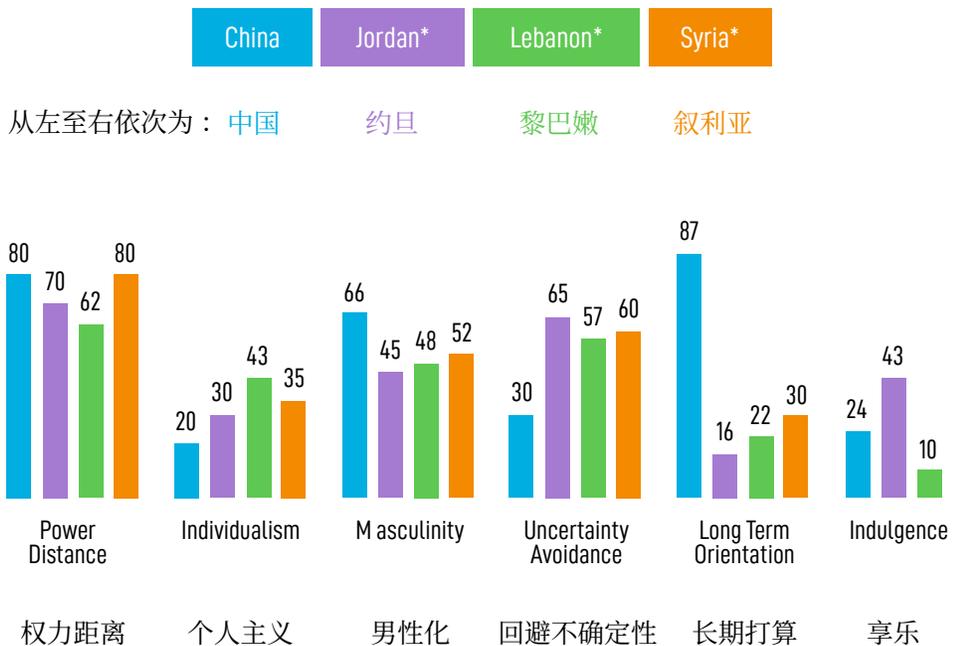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和爸妈看一个美国福音剧，他们硬是一个小时看不进去，“这到底要表达什么啊？”我爸问我，我一时语塞。如果拿其他地区举例不好理解，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福音传播，传播最快的一定是“筷子的福音”，而不是“刀叉的福音”。最让中国信徒感动的是基督的受苦，而不是得荣；中国信徒最享受的是即使家人朋友都还不信主，却愿意和一群主内弟兄姐妹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听上一两个小时的道，最好结束还能一起吃饭聊天，而不是走进宽敞的教堂里听上半个小时的讲道，准时站起来走人；中国信徒跪着流泪祷告才是敬虔的表达，而不是强调身体放松接近主，睡地上也可以的祷告；在中国教会传唱度最高的是小敏的诗歌，而不是 Hillsong……如果您能对以上说的感同身受，那也一定会承认在中东的这些信主的穆斯林，也一定有属于他们本文化，最触动他们的有效福音传播。

所以，进入语言、文化其实是考虑福音的长期果效和影响。很多开展事工的人只关心眼前的事工成效和规模，不学语言、不用本土的方式表达福音，结果是确实能看到有人信主、产生门徒，可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会遇到卡带，因为外来的东西始终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水土不服，甚至遇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反弹，反而成了福音的阻碍。这几年到世界各地见到的新教教会，遗憾地发现敬拜的讲台设置都是那么熟悉，你在国内城市新兴教会看到的樣子，大概也就是全世界的样子，那个投影，那个讲台桌子，那把吉他……也难怪这几年主外学术界大力反殖民主义，常常把宣教士的影响纳入其内，虽然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偏见，但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辜的——至少在植入外来文化这件事上。我发现就算在殖民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甚至都讲英语、法语的地方，他们还是极力保留他们本来应该有的文化，谈起被殖民的历史，也是一脸的无奈和痛苦。他们对于本来的文化还是深深地认同，福音如果能着陆在他们心底的语言、认同感上，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传播。当然每个文化都有需要被基督更新救赎的地方，我们需要让基督文化进入当地文化，而不是用另一种文化强势取代当地文化。

接下来请允许我把范围缩小到中东，因为这是我实战的地方，我会从国家文化、一些重要的文化因子对比中国和中东文化，最后也会给出一些跨文化的建议。

二、国家文化比较

在这里我借用一位荷兰学者 Hofstede 的六个维度的国家文化比较模型，选了中国、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做了个数据比较如下¹：



1、权力距离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这几个国家的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都很大。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都承认并接受不公平的社会层级，尊重权威、长者、父母。这些也成为“关系”和 wasta (可以简单理解为阿拉伯版的“关系”) 的社

¹ 该表格引用自网站 <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country-comparison/>.

会基础。就像没有“关系”就会在中国社会寸步难行一样，没有 wasta 也同样没法在阿拉伯世界行走。我每天都感受到 wasta 的威力，简单的菜市场买菜，卖的人有没有把我放入他的关系网里，价格都不一样。尤其如果我的 wasta 在该社区是有影响力的，事情处理起来完全不一样。曾经我的队友被当地人骗走了苹果的平板，结果我找邻居一位老者帮忙，他的年纪在该地区有一定威望，我又一直为他儿子治病，有恩于他，于是他让他儿子动用人际关系就快速要回了平板，都没警察什么事。如果我们的福音对象、门训对象刚好处于权力的中心，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果效，比如另外一位宣教同工的事工就是，他的核心同工是当地社区的一位领袖，能不断为他招揽不同的慕道友。

2、个人主义

中国和这几个国家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数值都很低，这意味着我们都是集体主义社会。在这些社会里喜欢用“我们”代替“我”，强调彼此照顾，在集体压力底下看重名声和面子过于事实的真实性。我刚到中东的时候，队友甚至告诉我：“在这里名声就是一切。不要在大街上和女人说话，不然你会在这里留名的。”后来我发现西方的团队都在这点上做得很极端，比当地人还保守，主要是穆斯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太深，认为西方人都是性开放、混乱的。不过名声的压力是真实的，那个骗走我队友平板的当地小伙，就是被我邻居动用各种亲戚网络人肉搜索，最后他自动把东西送回来的，他大概不想从此在这片土地无法立足。有时候我走在路上，有小混混见我是个老外想找麻烦，我走进商店和店主打招呼，他们就不敢造次，因为那可能是他某个远亲或同一个部落的人。

虽然在数值上中国比他们还集体主义，但是阿拉伯人近距离、高频率的互动恐怕是中国人也需要时间适应的。就是他们生很多孩子，每天很多时间呆在家里，永远都环绕着人，一周至少要拜访亲戚一次，几个要好的朋友几天几天地见面。加上伊斯兰宗教本身要求对亲人朋友之间要彼此照顾，这种照顾主要表现在经常性的串门。对我们来说有点密度太高了，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日常。我们进入他们的高频率互动好友里，那其实就是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同时是时间的代价。如果哪天他们走远了，就会感觉很孤独，因为那些每天环绕的人都不在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建立关系分享福音的好机会。

3、男性化

关于男性化（Masculinity），中国比这几个中东国家都高。男性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于成就的追求，而相对的女性化（Feminine）社会则更看重彼此照顾和生活的品质。中国人对于成就的追求从小时候就开始，深入骨髓，生活里一切都很实际。不像阿拉伯人，在路上问路一定不会拒绝，甚至他不知道也能给你指挥一番，有时候会带着你走十几分钟到目的地。阿拉伯人再穷也要把家收拾干净，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享受一起的时间，而不只是一味地赚钱。有一次我去一个阿拉伯国家，早上 11 点到街上商店还关着门，我队友说 12 点才陆续开门，我说：“这怎么做生意啊？做生意关键是要赚钱啊！”我队友说：“对他们来说关键是要休息。”我不得不承认互相照顾和注重生活品质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只是对于看重成绩、业绩的我们，是否能调整我们的频率，适应他们的节奏？

4、不确定性

回避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是中国和这些中东国家的主要差别。中国的数值低表示中国人对不确定性很包容。汉字本身就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涵义，我们讲究“话留三分”、“事到五分”，讲究留白的美，“差不多就行”。阿拉伯人对不确定性就没那么包容了，往往一见面就问年龄，而且你说三十几还不行，还要说具体数字。问工作，问收入数字，结婚了没有等等，有时候让人挺尴尬的。而且他们还经常当着你们的面做比较：“你来两年了，他才来一年，可是他的阿拉伯语说得比你好！”简直就是一标准社死现场！说实话，我一开始挺受伤的，因为我真的很用功学语言，然后要承受当地人这样当面的评价，后来我和我们队长吐槽，她告诉我当地人对自己亲生女儿都是这样的：“这个漂亮，这个丑！”我心想这得在那个丑的女儿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面积啊？不过他们好像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有什么就直白地说出来。

他们问我们要钱的时候也是一点不婉转，“我小孩要上学，我已经交了 700 了，你能否帮我交剩下的？”“能否借给我一千块钱做生意，一个月之后还给你？”当然“借”往往是个体假的概念，你懂的。他们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也表现在对规则的心理依赖，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就是要知道得清楚，所以伊斯兰的那些条条规规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心理空缺。甚至在他们信主之后，我发现他们也经常是问关于信仰规矩的问题。

5、长期打算

另一个中国和这些中东国家的巨大差别是长期打算 (Long term orientation)。中国人在这个维度上在全世界都是出类拔萃的，甚至 Hofstede 就是研究中国员工才多出这么个维度的。中国人真是超级会做长期打算，从几岁就开始为长大之后做教育投资，没有几个中国家庭不存钱的，存钱上学、存钱结婚、生子等等。这个和阿拉伯人真是鲜明对比，感觉他们就是今天赚今天的钱，明天再说，很多人明明穷得叮当响，但感觉他们好像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继续生一堆孩子，有时候都想不明白他们怎么活下来的。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ربوبي الله** (安拉掌管)。我大部分阿拉伯朋友都是赚短期的钱，今天这里有钱就在这里赚，好像没有像咱们有各种职业规划。我发现这个不做长期规划的习惯也存在教会里，比如当地牧者在一天内就开始一个事工，然后就交给我，也不提前和我商量；另一个同工提前一天告诉我让我带查经，他还同时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运作几周之后告诉我可能要关了，因为钱不够。

6、享乐问题

关于享乐 (Indulgence)，中国和这些中东国家都数值偏低，意味着我们都是强调控制自我欲望的国家。不过我发现中国人对自我欲望的控制是基于功利性的自我实现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阿拉伯人的自我欲望控制更多是出于宗教原因，出于对安拉的敬畏和积累功德的需求。过多的宗教条规约束就需要相对的放松出口，各种场合的跳舞，一起吸水烟、吸烟，私底下偷偷喝酒，就成了他们稀释宗教规矩高压的常有活动。

Hofstede 的六个维度的国家文化比较能在整体上让我们对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有个概念，不过这也有它的局限，有学者批判这些概念把所有人放在一个篮子里，忽略了个体差异，过于简单、静态化。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探讨其他有用的文化因子。

三、孔夫子 VS 伊斯兰

孔子文化讲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纲五常，注重血缘关系，而这一切在生活中以维持和谐为中心，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大概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而伊

伊斯兰在中东的影响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不是穆斯林也逃不掉它的影响。其中一个每天都在区分的事情就是什么是 Halal（宗教上允许的，中文翻译成清真），什么是 Haram（宗教上不允许的，非清真）。大部分中国人只知道猪肉是非清真，其实猪肉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国内穆斯林群体中异常敏感是有它的历史政治原因的。在中东因为基本也见不到猪，所以它并不是我们日常的重点。

日常最常见的 Haram 是关于浪费食物、浪费别人时间、剥削别人等等，比如他们每天吃的那个大饼 Hobeza 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会说“Haram”。还有就是有一次我买两公斤苹果，小贩没给足，旁边一个大哥说了句“Haram”就帮我苹果满了。男女互动过了界限也会用这个词，比如问女生要手机号码、facebook、whatsapp 等，如果对方是保守穆斯林，也会说一句 Haram，就不给你。这个词也成了日常吵架利器，比如排队不耐烦互相怼对方 Haram，急了再送你一句 Allah esmahak（安拉赦免你，意思你犯了大罪了。）这里面完全不会考虑和谐不和谐的问题，宗教上的清真与否大于人际关系和谐。

当然我现在已经完全习惯这些宗教用语了，还觉得挺好用的，其他语言有时也没有完全对应的翻译，有时候还是救场的灵丹妙药。比如那句万能的句子 Alhamdulillah（感谢主）就是我不想回答的时候就说这句话堵别人的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Alhamdulillah！”“你喜欢某某某吗？”“Alhamdulillah”，“你对……怎么看？”“Alhamdulillah！”……还有就是他问：“你结婚了吗？”我回答：“Allah Karim（安拉是慷慨的）”，然后他下一句就只能接“Amin（阿们）！”屡试不爽。他问：“你可以做……吗？”我答：“InshAllah（如果安拉愿意的话）。”

另外一个和我个人冲突比较大的是关于清洁和厕所礼仪，这个对穆斯林的影响极其深远，即使他们信主了，还会继续遵守。因为孔子文化以勤俭朴素为美，加上中国家庭教会潜意识里欣赏吃苦耐劳的服侍者，我的不修边幅在国内一度被认为是美德。我记得大学还没毕业准备到国外宣教前的训练，我和一群农村传道人住在一起，一位牧者见我穿着破了洞的裤子，竖起大拇指“一个大学生有这吃苦精神，佩服！”但是在这里我的不修边幅却成了负面的评价。

我曾经和一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一家住在一起，发现虽然他们很穷，却每天都要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的衣服几天洗一次他们觉得我不洁净，加上他们对味道还有要求，我不得不重新学习怎么用香水，现在我出门必喷香水。还有

进洗手间一定要换鞋，不能把水杯、锅等带进厕所，所以我要勉强改掉往洗手间倒粥汤的习惯，厕所在穆斯林看来就是一个极度肮脏，还隐藏精灵的地方，似乎一进入厕所门的那条线就不洁净。另外我用卫生纸也不行，他们会觉得那会滋生细菌，所以我现在都是用他们厕所专门的水龙头冲洗，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抱怨，后来发现是我们不习惯而已，其实挺干净方便的。在什么人里做什么人嘛，我发现自己在一点点地改变。重新社会化的困难就是连我们从小认为的美德都可能被重新定义，我在学习从吃苦耐劳的道德标准转变为以外在清洁判断内在品格的伊斯兰文化标准。

四、面子 VS Sharaf

中国和这些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是荣辱文化（Honor and shame culture）很强的国家，西方人往往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荣辱文化以维持和谐为中心，所以“面子”就是一个核心概念，“给别人面子”、“留面子”、“赏脸”等等都表现在语言和做事的尺度上。而阿拉伯人每天都在识别的是什么是 Eib（羞耻）的事情，比如坐着的时候脚底对着别人就是 Eib，我经常能见到家长当面告诉孩子 Eib，然后把他的脚收回来。还有女孩子穿着暴露是 Eib，保守的地方男孩子裤头短于膝盖也是 Eib。最让我困惑的应该是对于睡衣的定义，因为他们没有像国内这种长袖睡衣，就把我定义为运动装的长袖定义为睡衣，于是我穿着走到大街上就听到有人说 Eib。

这些其实都还好理解，离我们最远的应该是关于 Sharaf 的概念，直接翻译过来是荣誉的意思，但其实它大部分时候直接指的是家里的女人们——母亲、姐妹、女儿，和外面的男人互动可能带来的对家族的名声耻辱。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概念，一些阿拉伯连续剧看起来就会莫名其妙。比如很久以前一个叙利亚连续剧（顺便提一句，战争前的叙利亚连续剧真的拍得很好看）叫做 Zeman Alaar（耻辱时代），里面提到一个女儿和邻居发生了关系，逃到外面，落魄回家时，她父亲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她哥哥进厨房拿刀直接要把她砍死。中国人可以理解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亲生女儿，自己的妹妹，至于把她杀死吗？这个叫做荣誉谋杀，连续剧演的可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现实发生的事情，我这条街上个月刚发生一起荣誉谋杀，一小伙当场被捅死，据说是他和这家人的女儿发生了

关系，估计那个女儿也被家人除掉了。我问当地人，杀人者会怎么判刑，他说如果确定是荣誉谋杀的话只是入狱半年。

据联合国调查，全球每年有大约 5000 名女子死于荣誉谋杀，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问题是很多时候男女并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只是猜测，然后特别是女子的哥哥弟弟血气一上头就会干冲动的事情。最容易发生误会的应该是邻居之间。所以导致了我这里同一栋楼的邻居之间都不怎么走动，只是见面简单打个招呼，避免可能有的 Sharaf 的问题。同一栋楼有个信主的穆斯林姐妹上来送我食物都要带着女儿，以免别人误会她一个人和我单独相处，然后拜访他们刚好男主人不在，她们就需要把大门打开。因为国内男女界限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来了要遵循的文化界限，不然会出事的。虽然咱们是外国人他们相对在这个问题上宽容很多，每个区域的保守程度也不一样，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过度保守会失去可能与人接触的福音机会，太粗线条容易踩到文化红线。

五、中国习惯 VS 阿拉伯习惯

还有很多纯地方性习惯的因子，我就挑我实战感受最深的来分享吧。

1、肢体语言

第一是肢体语言的丰富性。就像阿拉伯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字母发音中文是没有的，因为他们把口腔大部分肌肉都用上了。同样的，他们说话时也是全身都用上。我的第一个女老师是个戴着头巾的保守穆斯林，结果上课时我问她一个问题，她眉毛往上一翘，嘴唇给我个吱声的飞吻，表达的是“不”的意思，这种反差萌真是瞬间把我萌翻了。请人帮忙时他们会拿手指在眼前点两下，很容易误解成英文的 watch your back (开玩笑说小心你背后，我会偷袭你)，但其实是“在我眼里”（也就是“包在我身上，一定帮你搞定”的意思）。还有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表示“等等”的意思，转一下手心手背表示“什么”的意思，举手到胸前表示“就这样”的意思，打 OK 手势晃动表示“我会宰了你”的意思。我们开玩笑说不说话也能用表情手势完成一场社交，这项新技能我也算 get 到了，感觉还挺好用的。

他们肢体语言的丰富性也表现在舞蹈上。和中国人的拘谨相反，阿拉伯人似乎每个人都能跳上一小段舞蹈。从院子里小女孩在家人的围圈中转动起舞，到婚礼上的集体舞蹈，到邀请外国人和他们一起跳简单的舞步，舞蹈似乎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每个民族的舞蹈风格也有差别，比如贝都因人喜欢挽着胳膊肘向下拍掌，发出“吼吼吼”的声音，粗狂而原始。库尔德人喜欢勾着小拇指，踏着小步转圈，简单而优雅，他们婚礼上能这么跳上几个小时。我的前室友是库尔德人，他放松的时间就是这么放着自家叔叔婚礼上的录像带，在家里一个人扭动着小舞步。

和舞蹈同步的是音乐，不得不说音乐是跨文化里比较难进入的一环，因为你很难真心欣赏那些和你差距太远的节奏和旋律。中东音乐从节奏、旋律到咬字停顿，还有乐器的演绎方式，都有别于东方音乐和西方流行音乐。问题是一和当地人一起出游，尤其是库尔德人（信主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库尔德人），他们都从头唱跳到尾，他们的婚礼、聚会都是又唱又跳，再怎么不会跳也要学扭动一下，拍手附和一下，不然无法融入他们。另外教会的赞美诗除了翻译的和流行风的，很多深入人心的都是中东风格的，所以还是要学习适应他们的节奏类型。

2、关于饮食

另一个传统跨文化难题是关于吃的。相对西方人，我觉得中东饮食对中国还是容易接受的，日常的有大米、大饼、橄榄、奶制品、西红柿黄瓜等，还有各种菜包肉菜的做法，主要是我个人还没学会做，但是很喜欢吃，一点都不勉强。难适应的应该是吃饭的时间点。他们没有正餐要吃在餐点上的概念，感觉像在不同的时差之间游走，胃酸都不知道什么时间点要分泌。早餐在9-12点不定，午餐在下午2-4点不定，偶尔有晚餐8-11点不定，晚餐常常也没有。我刚和当地信主的一家穆斯林住的时候，感觉就是每天被迫禁食，我都担心会吃出肠胃功能混乱。除了猜不到吃饭的点，还有就是难民的话他们吃的量也不够，每天看到他们只是输入一些大饼（Hobez），也没有太多别的，依然长得牛高马大的，不可思议，不过经常看到他们嘴唇泛白就是了。吃不够和时间混乱确实对我自身身体损伤很大，我最终在平衡身体健康和跨文化之间选择了健康，我的逻辑很简单，病倒了就无法宣教了。这是我目前比较难处理的跨文化难题，说实话没有最佳答案，或许未来会找到更好的出路。

3、健康观念

这其实也暴露了他们的健康观念问题。不得不说他们真的不注重身体健康。每天熬夜到两三点是很正常的，早上没工作的话会睡到中午，所以也不吃早餐，喝茶喝咖啡每杯都放好几勺白糖，日常糖果是送礼常态，可乐大罐大罐的喝，把雪碧当作万灵神药。是穆斯林的话每年都有一个月吃和睡黑白颠倒。所以早期我接到的针灸病人，超过四十岁的，十个有八个都有糖尿病。他们的女人很多早婚的，从十几岁开始生孩子一直到三十几，一身的疾病。有了病也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往往就是硬拖着。中国人相对注重健康，而且有很多中医治疗办法。我发现他们对针灸还是很接受的，就是没有需要扎很多次的概念，我需要和他们解释。每次治疗一个病人都是一次建立关系的机会，他们对大夫很尊重，我在针灸之前会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问能否为他们祷告，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徒，一般都不会推辞，因此也常常有机会给他们讲福音。他们也有拔罐的传统，据说是从默罕默德那时候下来的，拔的都是血罐，因为有宗教加持，他们倍加推崇这种治疗方法。

4、休闲方式

和健康间接相关的是他们的休闲方式，阿拉伯人的休闲方式比较单一，基本的逻辑就是和认识的人坐到一起，也不需要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活动，基本就是抽抽水烟，在家里的话往往会躺在地上，把电视打开让它一直放着，每年的斋月期间连续剧会几乎 24 小时都有。上个月一个难民朋友家里的冰箱和电视烧坏了，他欲哭无泪，我才知道冰箱和电视在这里有多重要。冰箱是因为来了客人要给冰的东西喝，电视还有一个功能是对付小孩子。因为很多家长都不放心让小孩在外面跑，所以一放学都把他们困在家里，除了看电视也没有别的什么活动可以做。所以其实有很多探访的机会可以做福音的工作，阿拉伯人上门探访也不需要提前打招呼，只需要敲门就行，同理，他们来你家也是说来就来。

阿拉伯人不会说不，尤其在探访这件事，你问他可不可以，他一定告诉你“随时欢迎”，不管他是不是在忙别的事情。所以怎么判断他们的意愿就是一门艺术。比如如果你们提到某个活动，他礼貌性地邀请你，之后就没影了，大概就是客气而已，如果坚持邀请，就是真的想你去。如果他加上一句“InshAllah”（如果安拉愿意的话），安拉通常是不愿意的。除非他就是习惯口头禅这么说，所以还要判断他说时候的语气。

六、基督教文化 VS 伊斯兰文化

因为我们是来宣教的，除了自带的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相通的是我们都是一神论的亚伯拉罕宗教，如果你告诉这里一个穆斯林你是基督徒，他大概率的反应都是“咱们是弟兄”、“咱们都一样”。真的，作为基督徒，我很多队友表示有时候感觉穆斯林比很多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和我们更有共同语言，咱们在国内都是信主之后才开始查经，但是在这里可以直接和还没信主的穆斯林查圣经，因为很多伊斯兰的先知故事和圣经都是相通的，例如约瑟的故事几乎百分百一样，只是多了对他美貌的惊艳描述，说是女子见到他的时候拿着刀的手都不小心被划破。有时我都有点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们是抄我们的吧？”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我知道我们的逻辑不一样，说了除了冒犯他们，也没有别的效果。他们也接受耶稣作为先知，但是很难接受他作为神或者神子的身份。大部分信主的穆斯林都是因为异象异梦、神迹奇事、信仰见证、圣经本身等先接受的基督信仰，然后才慢慢处理这个神学问题。

1、说谎

关于说谎的问题，是基督信仰实践和伊斯兰信仰实践的巨大差异。基督信仰强调“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5：37）。所以真的信主的人对说谎这件事心里是有责备的。而在古兰经里，安拉是善于欺骗的，尤其对非信徒。穆斯林也被允许用欺骗的方式对待非信徒。我以前只是听说这个，现实生活比我想的还要严重。我常常发现我的穆斯林朋友，甚至信主的穆斯林朋友，告诉我的关于他的整个故事都是假的。这个有点颠覆我的三观，因为一般中国人说谎是一段谎言，也会有相对的愧疚感。可是他们对说谎这件事似乎完全没有愧疚感，更在乎的是荣辱的问题，只要不带来名誉损失，说谎就跟真的似的。难怪圣经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实战出真知，哪个信仰真实一目了然。就算他们信主了，这个毛病要被基督更新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2、嫉妒

还有“嫉妒之眼”的事情，几乎每个穆斯林都有自己的“见证”，说得神乎其神的，说是如果某人说了某样东西或人不好、或者称赞了某样东西或人，就有

不好的事情发生。什么说了车一句话，第二天车就坏了，什么一楼女人嫉妒二楼女人有孩子，第二天二楼女人就掉楼梯流产了。而且这个说法还有古兰经经文支持，所以就让人更深信不疑了。日常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称赞的话都要加上一句“MashAllah”（按神旨意发生了），还有直接把这句话贴车上的。还有就是不符合伊斯兰信仰，但是非常流行的民间做法，在家里挂蓝眼睛，说是这样可以驱走嫉妒之眼。阿拉伯人不喜欢用手指一个地方或人说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最近当地朋友终于给我解释，那是因为他们要是哪家被偷了，就会说那是因为那天你在路上指了我房子导致的。

嫉妒之眼的深入人心，即使一个人信主了，依然深信不疑。比如那家冰箱和电视烧掉的家人，就告诉我说那是因为嫉妒之眼，有人对他们家说了什么，因为他们信主了，还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给他一个符合圣经价值观的解释：嫉妒之眼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是中国有其他的東西，比如有人相信某个鬼神的力量可以附在人身上，于是就真的会发生，看鬼片也一样，撒旦会根据每个文化有的东西符合在我们相信的东西上，目的是让人远离真神。但是耶稣超过所有的这些灵界力量，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些东西就不会再发生作用了。

3、起誓

还有关于起誓的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穆斯林用安拉的名起誓就像吃饭一样随便，随口就是 *هلللاب مسقى*（我向安拉起誓），*هلللاو*（wallah，以安拉之名）。这句 wallah 真是无处不在，我感觉都可以取代“是吗？”“真的吗？”的意思了。反正这些词已经滥用得让你对安拉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了，连我们找到的小偷都是一通说 wallah，加上 *allahaleazim*（安拉伟大，通常也是带着起誓的意味）。他们信主了也很难改这些口头禅，有一次一个刚信主的穆斯林姐妹随口一句 wallah，教会的老姐妹开玩笑告诉她，要是再说就要罚钱了。虽然你可以反驳说这已经成为文化，不用较劲宗教含义，可是我还是无法平安地说这些词，至少我要让我的穆斯林朋友知道，当我提到安拉、耶稣的名字时，我是认真的。有一次我的信主的穆斯林朋友和自己儿子吵架，想利用我给他们出钱解决，于是和儿子打赌只要让我为他祷告就可以，我毫不客气反驳：“请不要利用耶稣的名，祷告是让我们顺服耶稣的心意，而不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仆人！”

还有他们对宗教条规的心理需求也会从伊斯兰转移到基督信仰里，我看很多时候查经都在探讨什么要遵守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把背诵古兰经的精神部分移到新的信仰，不过教会要教导恩典胜过个人累积功德就是一个不断被提上日程的任务。

七、中国人在中东的形象

进入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也很重要，即使有些刻板印象来得莫名其妙。我走在路上就经常被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他给我的还是选择题。有时候我干脆开玩笑：“我来自阿勒颇（一个叙利亚城市）！”然后给他送上一句地道的地方方言，就把对方逗得很开心。然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就会说一句“Sin qiangchong”，据说这是中文。这句话的影响力真是非同小可，每个人都知道，后来我发现二十年前的叙利亚连续剧里已经在说这个句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有的说是因为李小龙的电影里这么说，可是不管普通话还是粤语都对不上啊。反正很好玩儿就是了。

不过他们对东亚人的长相认可度逐日加增，尤其在十几、二十岁的群体里，主要是因为韩剧的火爆，还有最近也有一些唯美古装中文剧被配上阿拉伯字幕，他们也挺喜欢的。孩子们对韩剧的痴迷度简直不减当年我身边的中国女生们，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幻想来自星星的你，结果抬头见到邻居一张东亚的脸，即使比不上都教授，但那维持一周的好奇好感足以让我赢得一个新的朋友，借此认识他的家人们，为福音铺路。还记得多年前在咱们铁哥们的国家看到一家韩国宣教士开的饭店用中国的国旗，因为提中国人好使，似乎现在是在还人情债。

八、一些跨文化的建议

首先，如果您是准备做长宣的，我建议您前面两年半到三年先全力专注在学习阿拉伯语。语言是文化的窗口，没有一定的语言能力，是无法深入理解文化的。另外阿拉伯语在各类语言里是第一阶梯的难度，只有全力以赴，两年半到三年才能达到口语的正常交流。

第二，放下姿态，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在上禾场之前，我们可能是教会的带领人，某个事工、机构的领袖，有的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地位。来到禾场，我们要进入文化就需要重新社会化，用重新做孩子来形容毫不夸张，学说话、学吃饭、学上厕所、学礼貌规矩。道成肉身就是要放下自己，万王之王的耶稣甘愿成为软弱的婴孩出生在马槽里。

第三，降低期待，不要期待快速看到成果。如果后方教会、机构给的事工期待压力太大，至少和他们商量给个2到3年的安心学习期。我发现我们最容易失去耐心去学习语言文化的时候是我们目标导向太强，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不耐烦。

第四，提高自己接受不确定性的事物的能力，以及同理心、换位思考的能力。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就有很多摸棱两可的语法，现实口语表达很多不按规矩出牌，对于不完全明白的事物不要马上下判断，以学习的心态进入了解，很多事情都是行动在先，头脑后来跟上的。当我们抱怨当地人的时候，想想你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一个老外这么说、这么做，你会有什么反应。比如我觉得想放弃精进语言时，就会想起在国内听老外用蹩脚普通话讲道对我是一种什么折磨，我就知道我必须把语言再弄好一些。当我觉得当地人对讲阿拉伯语没有耐心时，我想起我在国内对老外也是一样，总是把他们当练英语工具，我就知道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委屈，因为我也曾经把同样的委屈给了别人。

第五，提高正确收集信息的能力，重视当地人的反馈。跨文化交流误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有效的做法是找当地人做反馈，比如重复当时的场景，然后告诉当地人你是怎么解读的，问当地人他是怎么解读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解读完全是错的，也会学到意想不到的新知识。

最后，我很佩服那些即使不喜欢这里，也因着使命过来的工人。我很感恩，我是真的很喜欢阿拉伯人，他们的眉毛一翘就能把我萌翻，喜欢充满人情的叙利亚连续剧，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那种浓浓的温馨，喜欢听他们讲耶稣向他们显现的见证，甚至连他们的苦难都让我着迷，恨不得能在最困难的时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想是基督把这些放在我里面，是耶稣无条件的爱让我真正有学语言和跨文化的勇气和坚持。●

从《路加福音》的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ιλλω 探讨古今宣教策略

文 / 保罗 (Paul)

撮要：本研究，基于《路加福音》这卷书的信息，从《路加福音》的神学、宣教、和原文三个角度，以一个新的视角，做研究并进行思考。本文具体的进路和方法有四方面：路加的神学、路加本人及其故事、路加的著作和“差遣”这个字的研究。众所周知，从一个国家的短期五年经济增长计划、或跨国公司长期的规划发展、或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年度事工，或到我们每个人每天做任何事，都需要计划、步骤次序和方法策略。同样，我们也计划从《路加福音》的引言（路1：1-4），观察路加写作的目的、方法和策略。按照 Robertson 的观点，这个引言里包括了这卷书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的重要性、写作的方法论、作品呈现的对象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¹ 但我们会选择其中有两个关键字就是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ιλλω 入手来进行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路加福音》按照次序 打发 差遣 宣教策略

1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页 15。

引言

新约路加的著述，一直以来都是被大家喜爱。从取材于《路加福音》的福音且被用来传福音的电影《耶稣传》、和取材于《使徒行传》的福音电影《保罗》，我们就更加知道他的作品，在传福音和宣教这一领域提供了太多的资源和信息，比如差遣的三一神、差遣的策略和方法等，非常的重要。²

本文旨在从《路加福音》的原文、宣教两个角度探讨古今宣教方法和策略，希冀各位对今天在各处的宣教同工有一些启迪和鼓励。具体而言，从《路加福音》的路加的神学、路加本人的经历、路加的著述和路加的宣教这四个方面探讨宣教的方法和策略。

众所周知，在《路加福音》的引言（路 1:1-4）有个字 καθεξής。它是个副词，由介词（κατα）和名词（εξής）组成。εξής 则是指“在一个系列中的下一个，或下一个位置”，³但也和“相继、连续”有关，⁴也和“顺序”有关系。而该字本意用于时间，也是个副词，译为“挨次地、照次序地”。特别是关乎时间、空间或逻辑上顺序的，⁵但伯克认为“可能”不是时间性的次序，更多的是有关“耶稣一生的主题”的合理方式。⁶在和合本圣经里常常译为“第二天”（参路 7:11, 9:37; 徒 21:1; 25:17; 27:18）。但在和合本《路加福音》圣经里这个字被译为“按照次序”。这是路加向他的直接的对象，原读者提阿非罗大人指出，他写《路加福音》的方法，即他介绍如何写他的福音书。从此我们可知这就是路加的方法，是路加写作的方法，使用就涉及到写作的方法论，当然涉及到了宣教的方法和论。

καθεξής 这个字在路加的著里述出现了 5 次（路 1:3; 8:1; 徒 3:24; 11:4; 18:23）。按照《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这个字以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εν τω καθεξής），被译为“过了不多时日”。联系下文介绍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

2 本文来源于 2023 年 6 月份一次针对在西南各处宣教工场同工和领袖的讲座。

3 鲍尔编：《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译者：麦陈惠惠（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9），页 535。

4 罗念生、水健馥编：《古希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页 414。

5 同上。页 752。

6 达雷尔·伯克：《路加福音》，译者：古志薇、蔡锦图（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6），页 40。可以参考可 6:1-6 与路 4:16-30 的不同，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字和时间、空间即逻辑性的顺序有关系。

神国的福音的事迹。从路加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耶稣当年在加利利全境的教训、传福音两大事工，必定是有计划的。而这计划不单涉及到文字表明所提到的时间因素，也一定涉及到行进路线、各乡村取舍的对象之次序以致整个地区的覆盖。

后来，耶稣差遣十二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去，也是基于前面耶稣自己的加利利福音事工和那个时段的宣教旅行历史，当然也就再一次涉及到门徒们的宣教旅行和福音事工计划、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καθεξης* 这个字基本上和计划有关。然后，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探讨路加写作的计划和方法，因为这两个要素和宣教有关系。

另外一个字 *αποστελλω*，译为“差遣、打发”，⁷ 其实这个动词的名词就是使徒。⁸ 英文的 *apostle* “使徒”就是来自这个字。*αποστελλω*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 133 次，而《路加福音》则共出现了 49 次。⁹ 按照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为“奉差、差遣、托、打发、派；差派、赐、送、叫人过去、和传给”。其中“差、差遣和打发”的翻译居大多数。据此我们可知这个字与宣教、宣教神学有极大的关系。

下面，让我们从希腊文的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这两个字开始，一起领略和感受《路加福音》所显明的各个宣教元素。

一、《路加福音》的神学

首先，我们从有关《路加福音》的神学开始入手，探讨宣教方面的一些概念和论述，以致从中让我们有一些借鉴。

莫里斯(Leon Morris)，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担任 Ridley College 院长，澳大利亚新约圣经学者，曾经的新约神学泰斗，在《认识新约神学》里的《路加福音》卷这样说：“神在基督里的行动是《路加福音》这卷书的信念。”¹⁰ 同时，

7 鲍尔编：《新约及早期基督文献希腊文大词典》，译者：麦陈惠惠（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9），页 185。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派遣某人，差遣或出。

8 戴德理：《新约希腊文中文辞典》，王正中译（香港：浸宣出版社，1986），页 75。*αποστολος* 本来是指海军远征军队，或它的指挥官。其他翻译为代表、特使和大使等。

9 戴德理：同上，页 74。

10 莫里斯：《认识新约神学》（台湾：校园书房，2000），页 259。

他更强调神也“在信徒里面行事。”¹¹他认为，“路加强调受苦的人子，因为祂是基督。”¹²“因为他的受苦带来拯救。”¹³

马歇尔说《路加福音》的主题为救主神的作为是为祂的百姓带来了一位救主，也是拯救的角。¹⁴就宣教而言，马歇尔的总结认为耶稣生涯的特色最好的总结是“宣教”，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¹⁵

德席尔瓦认为路加强调耶稣的死带有赎罪祭和赎价的意义，¹⁶而这一点和救恩历史有极大的关系。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路加使他的读者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是重要的；神在人的事上是活跃的；且以一直令人着迷的方法显明神引导祂子民的真理。¹⁷按照这一观点如果我们应用在宣教领域各个层面的事工，也非常合适、恰当：祂的身份和受苦的过程乃至十字架事件，是有时间上的计划、和进程中的计划和次序。

根据莫里斯的结论，圣灵一直在耶稣的身上，他全部的事工都是圣灵同在的结果。¹⁸同样，德席尔瓦认为路加是圣灵的神学家。¹⁹他说路加显明圣灵如何从开始引导了基督徒及其所有的事工和圣工。对我们而言，生活和事奉都不是孤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还这样说，路加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如何关怀那个时代社会中的边缘人士：穷人、妇女、小孩和罪犯等。

《圣经神学辞典：路加福音》的作者，Julius Scott 认为，外邦人路加，强调耶稣的事奉是关乎所有人的——犹太人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会指出事件中人物的种族和国籍的背景。按照他从五个方面的归纳如下：²⁰

11 同上。页 259。参考徒 19：11。

12 同上。页 282。

13 同上。页 283。

14 马歇尔。《马歇尔新约神学》。译者：潘秋松。美国：麦种。2006。页 132。

15 同上。137。

16 德席尔瓦：页 365。

17 同上。页 558。

18 同上。页 332，页 559。

19 德席尔瓦，页 366-367。圣灵出现或提及的次数不下于 70 次。路加强调耶稣仍然以肉身和门徒同在，而《使徒行传》耶稣升天后加倍突出，意义重大。如赐下喜乐（路 10:21）和安慰（徒 9:31）、赐下力量和引导信徒领袖和开展服事（徒 13:1-4）。圣灵和门徒同在、和宣教的关系密切。

20 j. julius scott, 《证主圣经神学辞典》。香港：福音证主协会，2001。页 155。

首先，是救恩历史：神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祂的救恩计划、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本身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神那广阔悠久的启示和救赎历史中，路加所记载的事件只是当中的一部分——具体地刻画了神在这时空中的作为。其次，在路加眼中，耶稣的一生并非只是救恩历史中的一件事，耶稣的一生根本就是救恩历史的最重要的事件。第三，他论到救恩的日子，包括那日子（徒 2：28）。其次是救恩的使者：耶稣、祂门徒，以及所有传扬祂的所是所做及其意义的人；第四是救恩的信息。这样有七个要点。包括旧约应许的时代已经来临和应验、弥赛亚已经降临；这一切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而教会是这些事的见证；因为耶稣已经被高举且升到天上父神的右边，成为新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被称为“主”；在教会中圣灵成为基督的印记来证明祂现今的能力；耶稣将要再来且会审判和复兴万事；故凡听见的人都必须悔改和受洗才能得着赦罪（徒 16：31）最后是救恩的普世性。对此他论到了救恩信息本身没有界限。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虽为神儿女但只关心他们的民族，耶稣坚持事实并非如此；也论到救恩并非局限于每个特定的文化群体；第三方面，他讨论了信徒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扬救恩。²¹

所以，Morris 和 Scott 这两位博士所论述的内容，也是按照次序在写作、讲论《路加福音》所告诉启迪我们的知识，且这些都和宣教、福音事工的内容忧戚相关。

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引言，和合本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三至四节如下：“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κατηγήθης）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至于 αποστειλλω，让我们从所有的作者受感、拿起笔写作“被神感动和差遣”这个角度来理解，也是十分恰当的。

这使得很多神学家从神学的角度都关注《路加福音》关于宣教、差传等主题内容，相信这会帮助今天众教会和各宣教机构获益匪浅。

21 同上，页 156-158。

二、路加本人的故事

路加, Λουκᾶς, 路加其意为“发光者”。²² 按照圣经的传统, 我们可以知道名字和神的作为有关系, 比如伯特利、以便以谢、耶路撒冷这些地名, 再比如挪亚(安慰)、亚伯兰和亚伯拉罕(多国之父)、摩西(从水里拉出来)、西门和彼得(磐石)、耶稣(救主、以马内利)等。所以路加的名字再次表明福音临到他之后在他身上和生命生涯中对神对人的意义。

路加这名字很显然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再者, 我们参考《歌罗西书》四章十一和十四两节经文, 路加也很可能是外邦人。据说, 他生于叙利亚的安提阿, 母亲是犹太人, 父亲是罗马人。

根据《罗马书》一章十四节,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人”, 然后提到一个次序, 先是犹太人——神的选民, 后是希利尼人——外邦人。如今这位叫路加的, 居然成了福音书的作者之一, 而且写了下《使徒行传》。²³ 这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他, 然后成为基督徒、保罗的宣教同工。这是神迹, 神所应许和拣选的神迹, 因为耶稣临到了普世的人。这必然是宣教神学的课题和传福音的对象。

路加这个名字在整本圣经里出现了三次, 如下: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西 4:14)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或译:服事我)的事上于我有益处。”(提后 4:11)

“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也都问你安。”(门 1:24)

这四次出现路加名字的地方, 多多少少都和宣教有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和使徒保罗的宣教团队有关系。当然, 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路加这个名字也以“我们”的形式出现在《使徒行传》(徒 16: 10-17; 20: 4-15; 21: 1-18; 27: 1-28: 16)。

22 白云晓:《圣经人名词典》, (北京:中央编译社, 2002), 页9。

23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 2000), 页2。关于路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学者的意见不一致。对于他是外邦人基督徒, 提供了四个证据。

这里面有三次，从歌罗西教会的建立到牧养，再到使徒保罗和提摩太和腓利门这样第二代的同工的亲密关系和牧养事工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宣教所结出的丰盛果实。

众所周知，是路加在公元 61-62 年间写了著作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所以他必然受过良好希腊教育。作为一名医生，喜欢并习惯记录。他使用了三百多个医学术语，体现了他作为医生诊断医治病人的分析过程和谨慎态度；²⁴如同医生般准确地查看一切的事、且按着次序。作为医生，也表现在《路加福音》的开头详细地描写了两个重要婴孩的诞生（路 1:5-25, 57-66；26-38, 2:1-7），更难怪路加会侧重对基督同情人、怜悯人的描述。

另外，路加不是犹太人作者，但他使用流畅的希腊文写作，而且被公认他的文笔典雅；也因为路加也是旅行家所以他见多识广，故只有他称呼加利利为湖不是海。所以，路加以历史学家的缜密头脑和医生的济世心肠和胸怀来写作。

同时，在《路加福音》里他记载了六个神迹和十二个比喻，更重要的事是，这些内容是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及的。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叙述，另外三分之二是谈话。本书是福音书中最长的，但在这两卷书中从未提及路加、自己的名字。这一点真实令人可敬可爱。

第二，让我们研究路加的写作对象和收信人，θεοφιλος（提阿非罗）。这一名字由 θεο（神）和 φιλος（喜欢或喜爱）复合而成，翻译出来意有下面几个意思，如“为神的朋友”，或者“爱神的人”²⁵再或者是“神爱的人”。这是个普通的名字也是令人羡慕高贵的名字。

路加对他的称呼，加上了 κρατιστε，“大人”意为最尊贵、最可敬，通常称呼比说话者官阶较高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参路 23:16；24:3 和 26:25）。²⁶因为是呼格，这称呼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首先大人这称呼肯定是对一个人尊称、敬称，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所以他也就代表了一个群体。在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群体是再传福音的潜在对象，即一个宣教的潜在对象。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个群体可能是归信的基督徒，很可能他们是寻求和渴慕真理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既然不断追求也就需要人提供“专业”教导。因为已经有人教导过他基督的信息。

24 A. T. Robertson, 同上, 页 6。

25 A. T. Robertson, 同上, 页 20。

26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页 2-4。

这是因为在《路加福音》一章四节，有一个“学”字 ιωστουχτεδ，带给我们的这字词被译为英文是 catechumen，作为术语其意为：“某个正被教导基督信仰基本要义的人”。第三，“大人”这称呼，说明这个群体还代着表一个满有宣教使命的团体。所以当这个团体获取了真理的系统的教导，一定会再接再力不断地传下去。这从路加的各种关系略见一斑。

首先，是路加和提阿非罗的关系，密切的原因是因为福音或基督的救恩，也可能基于他们互相需要。这种关系，继续延伸观察一个事实，路加作为医生在使徒保罗的宣教事工团队里有了很多专业性的贡献，如提摩太的胃不好、屡次患病（提前 5：23）；使徒保罗的眼疾等（徒 13：11；参加 6：11）。

还有，路加和提阿非罗的关系不限于这种医患的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在他们不断的接触、理解当中，路加对他和他所属团队的信仰有了负担，更重要的是，很可能提阿非罗对路加的事工也有帮助。

第二，路加和保罗的关系也是非常不一般。保罗称他为密友（西 4：14）、医生、同工（门 24）。路加在小亚细亚与保罗同行（徒 16：6-11）那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有学者认为路加就是保罗梦中的“马其顿人”（徒 16：9）。同时被保罗留在腓立比（徒 17：1）。在第三次保罗宣教旅行他再次同行（徒 20：5），最后陪同保罗去往耶路撒冷和罗马城、且坐监狱为囚犯（提后 4：11）

第三，路加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从在路加借着《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家谱和所引用的旧约经文、从显明耶稣弥赛亚身份，可以看出，耶稣和以色列历史的关系。耶稣祂怎样把福音实实在在带给社会每一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传到万族，弥赛亚的救赎工作不断开展。

今天，这些关系促使我们也同样需要思考所属的团队、那些和我们相关的人。谁是你的提阿非罗？谁是你的好同工？你有几位密友般同工？这都是神的恩赐，是我们福音事工的资源。为此，你可以好好感恩、好好地长期计划、然后有系统地行动起来。另外，你可以继续鼓励你的好同工好好服侍。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得思考，下一代的同工是怎么出现的？或怎么产生的？而路加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

纵观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同工，如夫妻同工、兄弟同工，也有专业或职业同工，渔夫们，制造帐篷的同工，保罗和百基拉夫妻，服侍或恩赐配搭的同工等。这必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和帮助。

说到各种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特别的“同工”关系。而同工这个字在旧约是 $\kappa\alpha\tau\iota$ (出 31:6)，意思是“在一起、同工、助手”；而在新约是 $\sigma\upsilon\nu\epsilon\rho\gamma\omicron\upsilon\nu\tau\omicron\varsigma$ (可 16:20；罗 16:3)，出现了 13 次。意思是“一起做事、一起同工、帮助。”²⁷

最重要的考虑是，这些同工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同工是如何产生的呢？圣经的方法，一是神指定、神分派、神预备；方法二是一同学习、一同做事；方法三是不断发现、常常拣选、继续培养。在此，我们又可以思考 $\kappa\alpha\theta\epsilon\zeta\eta\varsigma$ 和 $\alpha\pi\omicron\sigma\tau\epsilon\lambda\lambda\omega$ 所带给我们的启迪。

二、路加及其两卷著作

前面我们提到也知道，路加本人是医生，也是历史学家，还是神学家，²⁸ 德国学者龚色曼 (Conzelmann) 说路加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神学家。韩尘 (Haenchen) 在他的《使徒行传注释》中说路加不但是一位历史学家，或神学家，实际上也是一位布道家或宣教士。²⁹ 当然，也有学者说是耶稣基督的使者(约瑟·斯的译本，路 1:1)。大家关注的重点是路加所撰写的两卷著作的核心、重点。

伯克认为路加的两卷书是在论述神的计划，以犹太人的盼望开始，挑战我们回应耶稣是谁。这其中有一个过程或进程使得读者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³⁰ 德席尔瓦认为是神在基督里为何及如何把福音带给许多人。³¹ 而这信息为何及如何抵达世界之都——罗马。³² 史瑞纳认为《使徒行传》的主题信息就是神以无上主权成就他的计划，在救赎历史的洪流中实现了他的计划。这包括了时间元素、民族元素，但核心因素是耶稣的受苦受死这一神荣耀的计划。³³ 但我们

27 戴德理：《新约希腊文中文辞典》，王正中译（香港：浸宣出版社，1986），页 621。

28 莫里斯对此讨论和总结说，泰勒认为路加主要不是神学家，但他以贝克的评论是路加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他引用邓雅各的话认为路加是新约三位主要神学家之一。页 249-250。

29 此处思想引自张爱光：《路加福音》讲义，页 12。

30 达雷尔·伯克：《国际释经系列：路加福音》，译者：古志薇、蔡锦图（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6），页 15。

31 德席尔瓦：《21 世纪新约导论：7 顺从父神的心》（台湾：校园书房，2013），页 327。他的结构是，《路加福音》讲的是前往耶路撒冷，而《使徒行传》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广传的次序和目的。

32 同上，页 383。参考其中的路加地理学的内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事工的方法或策略，是圣灵的带领，但宣教士个人也好机构也罢都得学习跟从圣灵的引导。

33 史瑞纳：《史瑞纳新约神学》译者：李洪昌（南帕萨迪纳：麦种出版社，2014），页 185。

研究《路加福音》，其内容从《使徒行传》一章一至二节可以总结为“耶稣所行所教训”这两点（徒 1:1）。无疑，这对我们审视《路加福音》这卷书由极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从《路加福音》里的三种希腊文文学风格探讨一下与宣教的关系。³⁴前面我们提到路加自由地使用希腊文书写，但本卷福音书的希腊文文学修养，居四福音之冠。路加采用不同的希腊文风格，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路加运用起来，挥洒自如。³⁵比如开头引言（1：1-4）采用古典希腊文，表达自己的写作目的。到了叙述耶稣的诞生（1：5-2：52），则采用了七十士译本希腊文，其语言风格显示耶稣的诞生和旧约弥赛亚的应许和神的国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和宣教有关系。其后直到《使徒行传》，作者采用共通希腊文，且希伯来文色彩越来越少，而希腊化的希腊文告诉我们所记录的是福音传遍天下。所以，这种精心铺陈排列，既反映出了作者的文学造诣相当精湛；也反映了καθεξης和 αποστειλλω所展现出来神宣教大使命之旨意和计划的顺序性和次序性。

按照《新汉语译本圣经》所介绍的大纲，³⁶我们继续研读耶稣的神迹和耶稣的教训，都和教导有关系，当然也和καθεξης和 αποστειλλω有关系且有待我们来发现。

- 1、序言（1：1-4）
- 2、耶稣诞生和预备（1：5-2：52）——30年，神迹与教导
- 3、耶稣传道的预备（3：1-4：13）——神迹与教导
- 4、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奉（4：14-9：50）——神迹和教导
- 5、耶稣在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事奉（9：51-19：27）——神迹和教导
- 6、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奉（19：28-21：38）——教导
- 7、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难（22：1-23：56）——教导
- 8、耶稣基督复活与升天（24：1-53）——教导

34 此处思想引自张爱光：《路加福音原文讲义》，导论。

35 汉语圣经协会：《新约全书：新汉语译本》（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11），页125。这方面的内容和信息，可以参考很多原文解经的书籍。

36 汉语圣经协会：同上，页127。

所以，从这大纲，我们需要关注教导这个核心教导及其教导的内容，也帮助大家关注教导的核心信息。下面，让我们再浏览和研究活泉系列的大纲³⁷如下：

- 1、序言（1:1-4）
- 2、婴孩时期（1:5-2:52）
- 3、预备时期（3:1-4 : 13）
- 4、加利利时期（4:14-9 : 50）
- 5、耶路撒冷之旅（9:51-19 : 27）
- 6、在耶路撒冷的事工（19:28/45-21 : 38）
- 7、受苦、受死与复活（22:1-24 : 53）

我们关注时间和耶路撒冷之旅这两个表述，再次可以发现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ιλλω* 无处不在，时间方面的发展线轴；地理位置方面的扩展；旅行路线与天国福音扩展、及弥赛亚身份渐渐被显明与世人、及救恩事工之十字架成就和成全之顶峰复活这一事实。宣教和差遣事工的内容和方法都囊括其中有待我们去不断发掘。

现在我们研究威尔斯比韦尔斯比的大纲。³⁸ 他的大纲为两大部分：好怜悯（1章-13章）——上；无所畏惧（14章-24章）——下。特别使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人子的诸多旅程，整卷书所表达这些旅程的主题目的、计划：“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落的人”（路 19 : 10）。所以，这个寻找和拯救的过程，就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ιλλω* 有密切的关系。

威尔斯比继续说，见证不是我们为主做的事而是我们若被圣灵充满，主借着我们做的事。³⁹ 这些事不外乎下面六方面的内容：

- 1、表达、宣扬福音的方法：写作？宣讲？一切的福音行动。
- 2、已经参与的有效的行动。
- 3、期待将来能参与的行动。

37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页 8-9。

38 威尔斯比：《仁者无惧：路加福音》（香港：福音证主出版社，2007），页 7-8。

39 威尔斯比：同上，页 102。作者说这是基督徒在世的使命。同上也是我们最大的特权和喜乐——遵行神的旨意。

4、表达、宣扬、发明福音的方法——众信徒、或宣教士等。

5、教会如何参与？

6、差会如何继续参与？

我们如何发明福音？我们如何宣讲福音？如果要找到答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路加福音》所提供的几处经文的内容研究：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太 13:35）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绑），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西 4:2, 3）。

所以，就方法论而言，这两处经文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路加福音》里出现的传福音这个字做研究和探讨，回答上面如何发明福音、传福音的问题。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路 3:18）

Πολλά μὲν οὖν καὶ ἕτερα παρακαλῶν ἐὺηγγελίζετο τὸν λαόν. 。

ἐὺηγγελίζετο 这个传福音是一个字，这动词的过未，表明传福音这个动作，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生活事奉常态——不断且不停地传福音。⁴⁰ 自然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放不开的密切的关系。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

¹⁸ πνεῦμα κυρίου ἐπ’ ἐμὲ οὐ εἶνε κεν ἐχρῖσέν με εὐαγγελίσασθαι πτωχοῖς, ἀπέσταλκέν με, κηρύξαι αἰχμαλώτοις ἀφ᾽ εἰς καὶ τυφλοῖς ἀνάβλεψιν, ἀποστείλαι τε θρασυμένους ἐνάφῃσει, (Luk 4:18BGT)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路 4:43）⁴³ ὁ δὲ εἶπεν πρὸς αὐτοὺς ὅτι καὶ ταῖς ἐτέραις πόλεσιν εὐαγγελίσασθαι με εἰδείτην βασιλείαν τοῦ θεοῦ, ὅτι ἐπιτοῦτο ἀπεστάλην. (路 4:43BGT)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 7:22）

40 傅约翰：《简明共通希腊文教程》（上海：交大出版社，2009），页 49、101、107。

καὶ ἀποκριθεὶς εἶπε· ναὶ τοῖς πορευθέντες ἀπαγγείλατε Ἰωάννη· αἰεὶ ἵδεται καὶ ἡκούσας·
εὐφλοῖ ἀναβλέπουσιν, χολοὶ περιπατοῦσιν, λεπροὶ καθαρίζονται καὶ κωφοὶ ἀκούουσιν,
νεκροὶ ἐγείρονται, πτωχοὶ εὐαγγελίζονται· (动, 现被)

所以，我们观察这些经文里传福音这个字，就传福音的对象而言，有百姓、贫穷人、别城人、施洗的约翰等。而以上几处经文都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计划有次序密切的关系。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动，现关分）（路 8:1）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ἐν τῷ καθεξῆς καὶ αὐτὸς διώδεν ἐν κατὰ πόλιν καὶ κώμην κηρύσσων καὶ εὐαγγελιζόμενος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ἰδὼ δεκάσυνά τῷ,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路 9:6）ἐξερχόμενοι δὲ διήρχοντο κατὰ τὰς κώμας εὐαγγελιζόμενοι καὶ θεραπεύοντες πανταχοῦ.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路 16:16）Ὁ νόμος καὶ οἱ προφῆται μέχρι Ἰωάννου· ἀπὸ τότε ἡ 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θεοῦ εὐαγγελίζεται καὶ πᾶσις αὐτὴν βιάζεται. (动, 现被)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路 20:1）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ἐν μιᾷ τῶν ἡμερῶν διδάσκοντος αὐτοῦ τὸν λαὸν ἐν τῷ ἱερῷ καὶ εὐαγγελιζόμενου ἐπέστησαν οἱ ἀρχιερεῖς καὶ οἱ γραμματεῖς σὺν τοῖς πρεσβυτέροις

上面几处的经文里面有几次用了传福音的分词，表达的持续的动作，⁴¹ 同时都提到传福音不但和门徒有多种的关系，也和圣殿这地点有优先次序关系，这当然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计划有次序密切的关系。根据《路加福音》，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如何宣讲福音？

我们若深入研究，建议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选一个神迹，或选一个比喻，或选一个讲论或教训来研究其中的方法。这样，路加的福音和“你的”福音和神的福音就有了关系。

41 傅约翰：《简明共通希腊文教程》（上海：交大出版社，2009），页 102。

三、路加的宣教面面观

耶稣诞生的故事与宣教，其关系密切。这四首颂歌分别是西面的颂歌（路 2:29-32）、马利亚的颂歌（路 1:46-55）、以利沙伯的颂歌（路 1:42-45）、撒迦利亚的颂歌（路 1:67-79）。我们从其中可以窥见《路加福音》中的宣教，有在五个方面给我们提供探讨的内容。一是宣教内容；二是宣教地域之向度；三是宣教民族之向度，四是宣教人种之向度；五是宣教方法及策略之向度。

这其中，我们得思考主对门徒看神对我们的呼召。就其种类而言有普通的呼召（καλεω）、有效的呼召（προσκαλεομαι）和特殊的呼召。就耶稣的福音事工计划，从地理位置的变迁就可以知道祂的事工离不开一个计划。

1、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

让我们看看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神的旨意和计划，就是借着祂的事工的代理人耶稣的作为，将救恩带给犹太人，也带给外邦人。而我们的救主耶稣承担起了先知和弥赛亚的功用。在《路加福音》里的耶稣，是个先知，其信息强调救恩的层面。

其次让我们看看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奉（4:14-9:18/50），就地理位置而言，首先是拿撒勒，然后是迦百农。其中路加告诉了我们九个有关神迹的记录；也告诉了我们九个教训的记录。

再其次，《路加福音》让我们关注门徒和使徒这两种不同的称呼及其身份。门徒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 268 次，⁴²《马太福音》69 次、《马可福音》42 次。《约翰福音》出现了 73 次、《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分别是 36 次和 26 次。如此可知，路加是使用门徒比较少的福音书作者。对比一下“使徒”这个字，作为名词在合并圣经里共出现了 79 次，⁴³而且只出现在新约，但根据原文汇编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分别出现了 6 次（路 6:13, 9:10; 11:49; 17:5; 22:14; 24:10）和 28 次。反观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只出现了 1 次（太 10:2）、《马可福音》出现了 2 次（可 3:14; 6:30），《约翰福音》也是一次（约

42 戴德理：《新约希腊文中文辞典》，王正中译（香港：浸宣出版社，1986），页 383。

43 戴德理：同上，页 75。

13:16, 这里翻译成了“差人”)。从中可知路加以使徒称呼门徒, 大大过其他福音书。所以, 和宣教关系及其意味非常的浓厚。

关于福音的内容, 就今天来看和耶稣的受难有关, 在《路加福音》耶稣最少有两次预言自己的受难(路9:22; 17:25)。还有一次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对两位在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讲解的时候说的(路24:7)。这里出现了和计划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delta\epsilon\iota$ 。⁴⁴ 因为这个字既和神的计划有关系, 也和宣教的内容、神的救恩有关系。

关于耶稣的福音事工的方法, 按照《路加福音》的策略来看, 开始是耶稣亲力亲为, 同时带着使徒让他们耳闻目睹、领悟经历, 然后到了时候祂就开始差遣使徒。开始是十二人(路9:6), 然后是七十人或七十二人(路10:1,17);⁴⁵ 按照《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耶稣复活以后继续差遣门徒。这差遣的叙事其实就是在强调宣讲福音的方法即宣教的策略。其重要性既包括耶稣的计划也包括了祂的方法。其中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这两个数字, 暗示福音的对象是对犹太人和对外邦人。

当然, 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会关注听众对耶稣和祂所讲神的国的回应: 耶稣要求所有人得有回应, 不只是罪人, 不只是以色列人。这个对象虽然有先后之分, 但就是神拯救世人的旨意。所以, 这一切都和 $\kappa\alpha\theta\epsilon\zeta\eta\varsigma$ 和 $\alpha\pi\sigma\tau\epsilon\lambda\lambda\omega$ 有计划有次序密切的关系。

2、在“路上”对门徒的教训及其事奉

前面我们分析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然后就是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9:51-19:27)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篇幅不短, 有十一章圣经。在这条路上, 耶稣所关心的就是门徒, 所显明的即使祂弥赛亚的身份和祂十字架拯救之路。其中就是祂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内容, 包括了以下三方面。

44 这个字出现了101次, 而在《路加福音》出现了18次, 都和耶稣的使命、福音使命和宣教事工有各种关系。如应当以父的事为念(路2:49); 必须在别的城传福音(路4:43); 赐患者人安息(路13:16); 必要住在撒该的家里(路19:5) 必须前往耶路撒冷(路15:32); 受苦和受难及受死的预言(路13:33; 17:25; 22:37, 47; 24:7); 有关耶稣的话必须应验(路24:44), 耶稣必须进入祂当得的荣耀(路24:26)。

45 72这个数字, 到底是70人还是72人, 是因为希腊文《路加福音》抄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难题。两个数字可能都正确, 但稍好的抄本都倾向72个人。重点是他们和12使徒的使命相同。

首先是耶稣的恩言 (Words), ἐπὶ τοῖς λόγοις τῆς χάριτος, 这显明耶稣的福音使命。然后是祂的恩行 (Grace), 告诉我们耶稣救恩的范围, 涉及到人心灵和身体的救恩。耶稣的这些行为 (Activity), 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也都和救恩 (Salvation) 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耶稣所带出来的恩果 (Result), 当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记述里看到每个当事人命运发生逆转, 或他们的生命被翻转, 这正是恩果, 更是救恩 (Salvation) 的最终目的之一。

我们研究完了耶稣的福音事奉的内容, 现在研究一下与耶稣的具体差遣行动相关的记录。其中从 ἀπέστειλλω 和 πεμτω 这两个动词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事实。但 ἀπέστειλλω “差遣”这个出现了 130 次、《路加福音》就出现了 25 次, 《使徒行传》是 24 次, 和 πεμτω 在新约出现了 78 次相对比, 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分别出现了 10 次和 11 次。虽然次数较少, 但因为是同义词和近义字, 所以比起其他新约的作者, 我们知道这是路加喜欢和强调使用的两个字眼, 目的是为描述和强调神救恩的作为。我们看字典所给出的意思就可以知道这一点。ἀπέστειλλω 为要达成某目的而派遣某个人,⁴⁶ 而 πεμτω 则强调派遣某人或超然存在体, 且通常是为了传递信息。⁴⁷

让我们先浏览一下《路加福音》里 πεμτω 这个和神的救恩、宣教有关系的钥字。《路加福音》提及以利亚的奉差 (路 4: 26), 耶稣两个两个地打发或差遣门徒 (路 7: 19), 在耶稣的拉撒路的比喻 (路 16: 24, 27) 和仆人 (路 20: 11—13) 两个比喻里提到打发人。所以和神的作为有关, 和神的拯救有关, 和耶稣基督的福事工有关。

现在, 我们借着研究《路加福音》里出现的 ἀπέστειλλω 这个和宣教有关的钥字, 思考和评估对我们的提醒和帮助。

首先, 神差遣天使和使徒到自己的百姓那里 (路 11: 49; 参路 13: 34); 在《路加福音》一章九和二十六两节提到神差遣天使加百列两次传报好消息。在路四章十八节和七章二十七节耶稣亲自引用旧约经文显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同样, 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耶稣再次提到自己奉差是为了传神国福音的这一使命。

46 鲍尔编辑:《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 译者: 麦陈惠惠 (香港: 汉语圣经协会, 2009), 页 185。

47 鲍尔编辑: 同上, 页 1210。

同样的，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八节提到父差遣了祂来而且耶稣与父是同等地位，即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天父；同理弃绝耶稣的就是弃绝差遣耶稣来的天父（路 10：16）。

耶稣常常差遣门徒，或打发门徒去耶路撒冷，⁴⁸如《路加福音》9：52 “καὶ ἀπέστειλεν ἀγγέλους πρὸ προσώπου αὐτοῦ.” 其实之前，门徒们是在耶稣的前头先去撒玛利亚村里，到了在橄榄山耶稣又打发两个门徒在自己前头去耶路撒冷牵驴驹子（路 19：29，32）、耶稣打发彼得约翰去耶路撒冷预备宴席（路 22：8）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耶稣说祂要将天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路 24：49），好得着那里完成祂见证人的使命和任务。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耶稣的差遣行动和作为。首先耶稣又差遣（路 9：1，2）十二人。

καὶ ἀπέστειλεν αὐτοὺς κηρύσσειν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ἰᾶσθαι [τοὺς ἀσθενεῖς]，之后就是差遣宝训。

第二处是耶稣差遣（10：1，3，16）70 人。

Μετὰ δὲ ταῦτα ἀνέδειξεν ὁ κύριος ἑτέρους ἑβδομήκοντα [δύο] καὶ ἀπέστειλεν αὐτοὺς ἀνὰ δύο [δύο] πρὸ προσώπου αὐτοῦ εἰς πᾶσαν πόλιν καὶ τόπον οὗ ἤμελλον αὐτοὺς ἔρχεσθαι

这里使用了简单过去式态，证明了差遣的历史性，而且关键还是两个两个地差遣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路加强调是在自己的前面要去的各城。所以就差遣的方法、打发门徒的策略、前方要去地方的计划密切相关。至于耶稣差遣 70 人这个数字，也有古卷说是 72 人，⁴⁹ 这表明宣教是对万国的宣教的象征。总结来说，这一切差遣行动都和 καθεξῆς 和 ἀποστελλω 有计划有次序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看福音或救恩对象的终极范畴，外邦人是包括在内的。而且以圣殿作为开始（路 1：9）和结束（路 24：53）；开头是祭司按照班次在敬

48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页 297。《路加福音》又四次提到耶路撒冷，分别是路 9：51-13：21；路 13：22-17：10；17：11-18：14；救恩所及的某些范围，路 18：15-19：27。这里都充满了耶稣去往耶路撒冷之旅行及其重要的教训。

49 关于 72 个人的译法，可参考和合本 2010 的译本、新译本和吕振中三个译本。到底是 70 人还是 72 人，是因为希腊文《路加福音》抄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难题。两个数字可能都正确，但稍好的抄本都倾向 72 个人。重点是他们和 12 使徒的使命相同。

拜服侍神、结束时是门徒们在敬拜赞美神。⁵⁰但这一切都和耶稣是中心分不开，也和众教会的福音事工和宣教密切相关。

路加在其福音书里预言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 2:32）；“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路 3:6）；再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七章一至十的“罗马的百夫长”，及《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九节的“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还有《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万邦”，这些都说明了宣教福音使命这一点。

关于和宣教密切相关的，还有登山变相事件（路 9：28-37），我们注意是和耶稣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有关系。从中也可以明白神的计划和方法。耶稣的诞生和受难，被视为不同于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的另外一次出埃及旅程。⁵¹因为在三十一节说“耶稣将要成就的事”，即 ἡνῆμελλεν πληροῦν ἐν Ἱερουσαλήμ（路 9:31），耶稣“去世”那件事。或译为耶稣“离去”的那事。在原文所用的字词是 τὴν ἔξοδον αὐτοῦ，可以直接翻译为祂的那“出埃及”。耶稣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那事，即十字架事件，⁵²借此应验成就了旧约的应许，所立的约促成了新的一次出埃及。而且这一次比摩西所领导的更伟大，因为基督拯救的不单是以色列人，更是万族万民。联系到我们自身，在个人经历和认知上，其实也是第一次“出埃及”，走出旧的世界观，进入全新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宣教和福音事工的终极目标。所以，这一切都和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计划有次序密切的分不开的关系。

3、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

按照次序，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大多数内容是耶稣教导和教训。耶路撒冷这个地点，在路加的两卷书里占的地位很高。按照卡森的观点，耶路撒冷是路加两卷书的焦点，因为《路加福音》突出朝向耶路撒冷的行动，而且多于其他福音书，但《使徒行传》则是描写离开耶路撒冷的行动。这是神应验祂计划的基

50 马歇尔：《马歇尔新约神学》，译者：潘秋松（南帕萨迪纳：麦种出版社，2006），页 137。

51 A. T. Robertson,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页 283。这里的去世，也出现在提后 4：6 和腓 1：23，和使徒保罗盼望离世见他荣耀的主有关系。

52 此处思想引自张爱光：《路加福音讲义》，页 14。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认定耶稣是受苦之义仆的重要性包括两方面：1) 十字架拯救的重要性（很清楚地与救赎有关系，赛 53）2) 耶稣普世宣教的重要性（路 2:32, 参看赛 46:6）。

地,⁵³ 按照神的计划, 而外族人最后终究领受福音, 这是《路加福音》的贡献之三。⁵⁴ 而耶稣的教训地点主要是在圣殿进行。⁵⁵ 其中也记载了耶稣对祂门徒讲论那位寡妇与她的奉献。耶稣和这位寡妇所行, 这一切其实都和爱神都有关系。这岂不是宣教的目的之一吗?

在耶稣的讲论当中, 主要核心内容是满有盼望的末世论与充满希望的未来。所以这都涉及到神的救恩历史及其过程。

最后, 我们分析一下逾越节事件。其中耶稣让门徒预备逾越节的羔羊, 其实今天我们回头看耶稣自己就是神所预备的那只逾越节的羔羊。在耶稣最后的一周时间里, 祂与门徒们一直在一起, 在礼拜四晚上亲自设立了圣餐, 一起祷告, 然后经历了受审、被定死罪、被钉十字架等, 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宣教的主要核心内容, 也是宣教对象要明白的基本内容和信仰基础。所以, 如何宣教如何传福音, 在计划各个层面,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有计划有次序是我们思考的方向。

4、耶稣复活后的事工

最后, 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一时间持续了四十日之久, 是也是复活以后祂的显现, 赋予祂的门徒见证人这一使命、命令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差遣门徒、升天……这正是所有宣教士们最喜乐的内容: 传扬复活的耶稣再临、服事复活的耶稣、敬拜复活的耶稣。就宣教和传福音的目的来说, *καθεξη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作为按着次序和计划做事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也有最终的目的, 即敬拜神和事奉神。

总之, 我们还要强调, 福音的本质和核心内容正是《路加福音》里的祷告和祷告神学与宣教的关系。这一点和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团体的祷告与圣灵及其后来的宣教有密切的关系(路 3: 21, 22; 10: 21)。按照路加和《路加福音》, 我们的福音事工遵行神的旨意成就祂的救赎计划, 也必须基于效法耶稣的祷告, 在

53 卡森、穆尔:《21世纪新约导论》(香港:天道出版社, 2009), 页 179。

54 卡森、穆尔:同上, 页 197。

55 马歇尔:《马歇尔新约神学》, 译者:潘秋松(南帕萨迪纳:麦种出版社, 2006), 页 137。

很多方面是我们宣教士事奉、宣教的榜样。下面是《路加福音》就祷告为今天宣教工场的各位所提供给我们的，以供大家思考：

第一次，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他从水里上来开始祷告（路 3：22），就有圣灵降下，开始了祂自己在地上三年半的福音拯救事工；第二次是当耶稣差遣十二门徒，之后他们回来述职报告的时候（路 10:21-24），耶稣因着圣灵就祷告、赞美。其上下文也是和差遣有关系。

《路加福音》十一章里记载了另外一个“主祷文”的祷告（路 11：1-4），就宣教而言其内容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系，当然和宣教、差遣有关系。

第三次，有关祷告的三个比喻（路 18：1-8；9-14；）；第一个半夜来朋友为他祷告的比喻，强调迫切祷告的重要。第二个祷告是寡妇的比喻的上文末世论有关系，也就自然和差遣、宣教的终极目的有关系，强调不懈怠祷告的重要。至于第三个祷告（路 18：9-14）比喻强调谦卑的重要。谁是义人、谁是罪人，认罪的祷告才是称义的开始，也是传福音对象蒙恩的开始，当然祷告是耶稣福音事工的榜样，自然和宣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路加福音》中，门徒们明确地要求主教导他们祷告（路 11:1-4），可见祷告的角色何等重要。而祷告的救恩历史背景，使得我们知道，若要明白路加的祷告神学，一定要明白祷告与救恩历史的关系。通过祷告耶稣才能完成他的救恩事工。耶稣生平中最重大的几件事是和祷告相关的。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被指定是基督（路 3:21-22）；只有通过祷告，耶稣承担了他在救恩计划中的职分；在拣选和任命十二个门徒之前，耶稣做祷告（路 6:12-16）；耶稣通过祷告逐渐意识到苦难的需要（路 9:18-22）；通过祷告，耶稣设立圣餐（路 22:17）；耶稣为彼得的悔改祷告，换句话说，救恩历史靠着耶稣的代祷而被确定（路 22:32）；通过祷告耶稣能确认与面对他救恩的工作（路 22:41-42）。《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教会继续弥赛亚的拓展神的救恩工作，直到地极。教会通过祷告参与救恩的历史。当教会祷告时，圣灵就临到教会中（徒 1:14;2:4;4:31;同时参考 9:11,17, 10:2,44）。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路加的神学是祷告的神学，是宣教的神学，是祷告宣教的神学。这里也和 καθεξής 和 αποστειλω 作为按着次序和计划做事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戴德生的名言和经验这样说“一个宣教士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就是规律、持续、伴以祷告的读经。撒但可以找出任何比读经更重要的事来做，即使那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只有与神的旨意一致的祷告才能蒙垂听。”“神的工作通常

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了’。”⁵⁶这也是宣教士们如伯格理在中国西南苗族等少数民族当中服事十七年后“第一祷告,祷告,恒切祷告;第二绝不,绝不,绝不放弃”这样的经验和经历,⁵⁷同时也是富能仁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当中六年事奉后“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教导”这样的事奉的经验和经历。⁵⁸他们都注重祷告和借着祷告这样传福音的经历,这是我们当思考的次序和方法这两个重点。

另外,我们得关注宣教有三件事,宣教的信息是主的道;是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如何成为对神盼望和盼望的根基和中心。我们都要思考如何回应这一点。⁵⁹而宣教的执行者是使者,即主的门徒,或使徒;但宣教的方法是主耶稣的方法,这在路加的著述里有清楚的记载和描述。路加的宣教论,在告诉我们教会及其所有门徒,主要的责任是为主作见证(参路 24:44-48;徒 1:8)。门徒不但要跟从主,也要为主作见证。所以,路加要给读者保留一个准确与可靠的耶稣记录与他的信息。这一点对理解和把握路加的神学思想很重要。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宣教和圣灵的关系,圣灵是宣教的神,⁶⁰在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里,神的灵是宣教之灵,圣灵赐能力使门徒传福音。⁶¹因为圣灵赐能力(路 4:18),还因为圣灵施行管理(徒 13:4;参路 16:6,7)。最重要的原因是,圣灵的工作在宣教的各个层面都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只能单单地相信和依靠。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神学、路加本人、路加著述和路加的差遣等关键字动词四个方面分析、论述、探讨了《路加福音》的宣教方法和策略。对今天的我们,必有借鉴。每次的回忆和讲论的结束,其实是新的一个开始。《路

56 戴德生:《戴德生嘉言录》,编者:海恩波(台北:海外基督使团,1991),电子书。

57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22),页173-174。

58 艾琳·克蕾斯曼:《山雨:富能仁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页185。富能仁(1886-1938),宣教士与傣族的故事。他的事工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教导-祷告,变成了祷告-教导。他说,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还是祷告,第四才是教导。他说,坚实而持久的宣教工作,是由我们的双膝所成就的。

59 达雷尔·伯克:《路加福音》,译者:古志薇、蔡锦图(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6),页15。

60 林安国:《差遣之道》(香港:华福出版,2011),页60。

61 此思想来自张爱光:《路加福音》讲义,页26。

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他的宣教、他的著述、他所在的团队，他所记述的讲论，是主耶稣的同工也是他的同工。其核心内容是耶稣门徒 / 使徒这一群体，如何蒙召如何回应祂的呼召的历史。从十二人再到七十人被装备、教训然后被差遣出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这一门徒团队群体，到《使徒行传》里和新约书信里所显明出来使徒保罗传福音宣教同工团队。这里充满了 καθεξή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 所表现出来神的福音事工计划和各种的次序。

如今，教会领袖，或者教会里承担宣教的领袖，或者有志于训练宣教士的领袖们，必须明白这一思想和方法，我们的福音事奉依托和根基就是寻找神的教会和次序。

最后，在此预祝各位同路人，借着 καθεξής 和 αποστελλω，常常思考琢磨路加做事的方法，效法父神、子神和灵神他们在宣教和差遣方面的方法和策略，期待我们的福音差传事工凡事有计划和次序、不断重复差遣与被差，常常有新的开始、随时踏上新的征程。如此我们的差传福音的事奉就是常常喜乐充满赞美的。因为按照《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结束之际就是门徒们“在圣殿里”敬拜赞美，⁶²等待新的开始；同时《使徒行传》的结束记载了在罗马监狱里，使徒保罗也持续地接待和宣讲……。

参考书目：

1、圣经类

汉语圣经协会：《新汉语译本》，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11。

傅约翰编著：《新约希腊文读本》，南帕萨迪纳：麦种出版社，2014。

《路加福音》希腊文摘自：《Bible Works 8》BGT 版。

62 达雷尔·伯克。《路加福音》，译者：古志薇、蔡锦图（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6），页 672-673。在《路加福音》的开始和结束，都出现了圣殿及在其中的敬拜和服事。伯克为此总结了三点：一生在祂显现的时候发出对教会要向世人传福音的使命、以敬拜作为对福音顺服的回应、完成这使命的关键是圣灵的工作。

2、字典类

- 罗念生、水健馥编：《古希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 白云晓编：《圣经人名词典》，北京：中央编译社，2002。
- 福音证主编：《证主：圣经神学辞典》，香港：福音证主协会，2001。
- 傅约翰编：《简明共通希腊文教程》，上海：交大出版社。2009。
- 戴德理编：《新约希腊文中文辞典》，王正中译。香港：浸宣出版社。1986。
- 鲍尔编：《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译者：麦陈惠惠，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9。

3、《路加福音》其它书籍

- 达雷尔·伯克：《路加福音》。译者：古志薇、蔡锦图，香港：汉协。2006。
- 德席尔瓦：《21世纪新约导论：顺从父神的心》，台湾：校园书房，2013。
- 卡森、穆尔：《21世纪新约导论》，香港：天道出版社，2009。
- 林安国：《差遣之道》，橄榄山编委、林许佩珠，香港：华福出版，2011。
- 马歇尔：《马歇尔新约神学》，译者：潘秋松，南帕萨迪纳：麦种，2006。
- 莫里斯：《认识新约神学》，台湾：校园书房，2000。
- 史瑞纳：《史瑞纳新约神学》，译者：李洪昌，南帕萨迪纳：麦种。2014。
- 威尔斯比：《仁者无惧：路加福音》，香港：福音证主出版，2007。
- 张爱光：《路加福音讲义》，2018。
- Robertson, A. T.：《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路加福音》，香港：基道，2000。

4、宣教士传记

-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22。
- 艾琳·克蕾斯曼：《山雨·富能仁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 戴德生：《戴德生嘉言录》，编者：海恩波。台北：海外基督使团，1991。

教会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 亚非拉世界¹

文 / 华勇

撮要:几乎在整个多数民族世界(亚非拉世界),即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MENA),基督教曾经被称为“白人的宗教”。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教会已经在整个少数族裔世界爆发了。在本文中,我想看看基督教在全世界的这种转变,以及它对全球教会,特别是对我们亚洲教会的影响。

本文作者的目的是不是要强调西方教会的弱点,也不是要颂扬亚非拉世界地区教会的成长。相反,作者希望这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以便我们能更有成效地在亚洲范围内为福音的发展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帮助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 亚洲基督教 超自然 神学教育 身份 世界观
亚非拉世界教会

¹ 本文是在2021年10月11日至14日举行的亚洲2021在线大会“亚洲教会的大趋势”上作为全体会议之一发表的。本文中的部分材料发表在一个小型的小册子(Hwa 2019),主要在学生界有限性的发行。本文已重写,加入了新的材料。

全球基督教的转变

在前 15 个世纪的不同时期，教会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不同地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到了公元 15 世纪，教会的大部分力量已经基本集中在欧洲，现代宣教运动首次从这里向世界其他地区展开。天主教宣教士于 1493 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领导下开始，新教宣教士于 1705 年在德国虔诚派领袖奥古斯丁·赫尔曼·弗兰克的领导下开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标志着福音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宣教进展，从西方到其他国家。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的教会，即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会，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亚非拉世界的教会处于从属地位。但在二十世纪教会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迅速扩张。最让人吃惊的是，到 1980 年左右，教会的“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亚非拉。1900 年，大约 83% 的基督徒生活在西方世界，17% 生活在亚非拉。今天，这两个数字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基督徒生活在亚非拉地区。² 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转变，西方基督教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衰退。比如说，在欧洲，每周去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使许多教堂空无一人。另一方面，美国应该是更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有相对较高的教会出席率。然而，即使在那里，基督教也同样受到了现代性和世俗主义的破坏，尽管方式不同。因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天主教徒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将对美国基督教问题的分析命名为“坏宗教”。³ 他说他认为这是“传统基督教的崩溃和各种破坏性的伪基督教的崛起”的结果。⁴

他的结论是什么？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异教徒的国家。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西方的自由派基督教一直在急剧衰退。但如果我们认为只有自由派陷入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西方大部分基督教面临的危机，包括福音派。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之一是美国福音派的大部分人与右翼政治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不幸的联系，这对福音的全球形象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 这里给出的数字按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划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在后者中（尽管不在亚非拉世界中）。基督徒在世界基督教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全球北方，82.4%（1900 年），41.0%（2000 年）和 33.1%（2020 年）；全球南方，17.6%（1900 年），59.0%（2000 年）和 66.9%（2020 年）。主要国家的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8.7%（1900 年），23.0%（2000 年）和 25.2%（2020 年）。亚洲基督徒占大陆总人口的比例：2.3%（1900 年），7.5%（2000 年）和 8.2%（2020 年）；2020 年亚洲的基督徒总数估计为 3.79 亿。

3 Douthat（2012：3）。

4 Douthat（2012：6）。

作为亚非拉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将永远对过去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宣教士负有不可估量的爱的责任，他们常常以巨大的代价为我们带来福音。此外，西方基督教中仍有很多东西是好的、高尚的，值得我们效仿。尽管如此，鉴于西方教会的现状和对其未来的总体负面预言，亚非拉世界的教会必须认真考虑长期影响是什么。

但遗憾的是，亚非拉世界的许多教会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西方教会的附属品和延伸在运作。在组织上和财政上，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但在神学、思维方式、服事教会和宣教方面，他们仍然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的模式和答案。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亚非拉世界的许多教会是通过西方宣教运动诞生的，其中许多领袖接受过西方方法论和神学的培训。这也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如此的压倒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阻碍了亚非拉世界的许多基督徒对他们信仰的另一种理解和叙述，这些理解和叙述一方面坚定地扎根于圣经，另一方面又对文化敏感，与背景相关。这种未能或无法在其各自的文本中阐明另一种基督教叙事的情况，显然对亚非拉世界中教会的持续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将主要讨论这些后果对亚洲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问题、挑战和前进的道路

在全球基督教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重要问题？它们给亚洲基督教带来了什么挑战？在下文中，我想简要地讨论六个问题及其相关的挑战。但这个清单并不详尽。

世界观和智力挑战

西方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由此产生的世俗主义。人们常常认为，这些也是亚非拉世界的主要关注点。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亚洲产生了影响，但大部分影响都是表面的。原因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而启蒙运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塑造了西方世界。但我们亚洲人不是启蒙运动的孩子，只是因为那不是我们知识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社会仍然是前现代社会。现代的概念，只有逻辑和科学，但没有伦理和神学。

在亚洲社会中，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而后现代的思想也不是亚洲社会的知识范式。主导亚洲许多社会的仍然是各自社会中的宗教框架，无论是佛教、中国宗教哲学思想、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是简单的原始世界观，以及各地的传统文化。由于我们的神学院和教会用于培训的大多数基督教资源都来自西方，我们的基督徒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被忽视了，或者最多就是处理得不够。只要我们的培训和神学培养主要扎根于西方的框架内，就不能帮助亚洲基督徒应对我们自己文化中的挑战。

请允许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我在英国学习神学时，我们必须在宗教哲学课上研究上帝存在的证明，包括支持和反对的论据。但当我回到家乡开始在神学院教书时，我发现几乎没有人问上帝是否存在，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知识分子。在亚洲的大多数社会里，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相反，问题是当有这么多相互竞争的宗教主张时，我们怎么能知道谁是真正的上帝。

那么，亚洲基督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样子呢？我的第二个例子更令人不安。几年前，在与一位来自印度、拥有英国神学博士学位的基督教学者的谈话中，我问他印度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印度，有一些非常能干的印度教思想家和记者，他们经常攻击基督教。在公开场合的信仰。我问我的印度博士朋友：“你能想到印度有哪些基督教学者能够与这些哲学家和记者站在一起，公开反驳他们的攻击吗？”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想不出来。”

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印度朋友是错的。但他的回答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亚洲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认真对待，除非我们做必要的神学功课，否则我们所在的教会将永远无法以充分解决我们各自背景下提出的艰深的知识问题的方式来宣扬福音。

亚非拉教会的增长和超自然的恢复

在提到福音在他工作中的进展时，保罗说到：“基督藉着我所成就的，使外邦人顺服——藉着言语和行为，藉着神的神迹和奇事的能力……”（罗 15：18）。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亚非拉世界教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罗所说的“神迹奇事”所推动的。这包括从恶魔的力量中解救出来和医治，神迹和预言，梦和异象等等。应该强调的是，这并不代表尽是受到了美国从阿苏萨街开始向亚非拉世界进军的五旬节派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本土信徒认真对待圣经，

并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或者是圣灵在复兴中降临，向教会彰显他的可怕力量。正如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等学者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对记录进行全面而仔细的检查会一再证明这一点。⁵

印度次大陆许多部族教会的成长、亚洲大部分地区部落群体中的福音突破，如富能仁在傈僳族中的工作、1964–1970年的印尼复兴、过去50年的中国复兴、今天穆斯林群体中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突破，等等，都是如此。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韩国长老会牧师金益斗（1884–1950）的强大医治事工。他的工作带来韩国的长老会改变了一项信仰条款，从“后使徒时代没有神迹”改为“有神迹”。⁶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基督教在现代要么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把超自然现象当作过时的迷信来拒绝，要么把神迹当作过去发生但今天不再发生的事情。因此，西方教会的大部分人都未能充分解决这整个问题，无论是关于神迹、圣灵的工作或世界上的恶魔活动。正如富勒教授查尔斯·卡夫所描述的那样，其结果是“启蒙的基督教是无能为力的。”⁷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重大缺陷——它被反对超自然的启蒙主义世界观所俘虏。这种对精神领域的盲目性会不会是西方基督教衰落的一个关键原因？既然如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肯定是亚洲教会如何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中恢复超自然的维度，而不至于过度，并将神迹视为基督徒生活中的自然和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注重人力管理的事工和宣教与依靠圣灵的关系

拉美神学家塞缪尔·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批评了20世纪后期福音派教会的一种趋势，特别是与教会增长有关的趋势。学校和AD2000和Beyond等运动。他把这称为“管理性的宣教学”，并把它描述为“努力把基督教宣教减少到一个可管理的企业”。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实被简化为可理解的画面：“宣教行动因此被简化为一项线性任务，在目标管理的过程中被展开为逻辑性的步骤。”⁹因此，举例来说，宣教士的目标是由赢得的皈依者数量来量化的，或建立

5 詹金斯（2011）可能是他最知名的书。6 李（2009:46）。

6 卡夫（1989年：37–49）。

7 Escobar (2007: 216)。

8 Escobar (2007: 216)。

9 Plueddemann (1999年：156–160)。

教会，并制定战略计划以实现预期结果。整个工作是基于世俗的战略规划方法，建立在产生了我们的技术时代的科学方法之上。

我想说的是，埃斯科巴对管理型宣教学的批评是现代教会中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许多想法是否已经屈服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方法来服事教会和宣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如训练有素的人员、资金、适当的战略规划和健全的管理，教会就会不断发展，我们的使命目标就能在人类的时间框架内顺利实现？

归根结底，这种方法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我们的宣教目标主要缩减为数量上的衡量，即有多少人归主，有多少人建立教会，这与基督“使人作门徒”的命令相差甚远。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当我们只瞄准可以衡量的目标时，我们就忽略了品格、门徒训练和圣洁等最重要的我们无法预测或量化的目标，否则会陷入律法主义，冷淡的教会是这种流水线思维的结果。”¹⁰

第二个问题是，《新约》和教会历史都一再证明，福音从来都不是单靠人的努力就能进步的。相反，我们所发现的是，教会的复兴和重大进步无一例外地是两种强大的相互交织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神圣的一面，我们看到圣灵的主动性和力量，而在人的一面，我们看到一些不太明显的因素，如完全的圣洁、普遍的祈祷、顺服和牺牲。这些因素，而不是人的管理和战略计划，是基础的。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凡从圣灵生的人也是这样。（约翰福音 3:8）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在亚非拉世界的宣教进展中反复看到了这一点，例如，非洲人如先知哈里斯和西蒙·金班古在二十世纪初的事奉。以及近几十年来五旬节教会在拉丁美洲的惊人增长。在亚洲，正在进行的中国复兴是这方面的最佳例证之一。20世纪上半叶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福音派和复兴派是宋尚节，他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优秀博士。1927年，他回到中国后发现，尽管宣教士付出了巨大而神圣的努力，新教教会的发展却很缓慢。在他的祷告中，上帝向他揭示了问题的核心。西方宣教士带来了数以千计的宣教士和大量资金，并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最好的孤儿院、医院、学校和大学。而西方和中国的领导人都在依赖这些人力资源，而不是圣灵来促进发展。在1944年去世前的某个时候，宋尚节透露，上帝向他显示，一场伟大的复兴即将降临中国。但首先所有

10 Schubert (1976: 65–66)。另见 Sung (2012: 79, 197f, 210, 231, 369 & 383)。

的宣教士必须离开。¹¹正如他所预言的，在他死后不久，随着1949年共产党的接管，所有宣教士都必须离开中国。西方宣教士所带来的一切都被一个敌对的政府所征服。然后，在强烈的迫害下，除了上帝之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复兴到来了。¹²正如他们所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不幸的是，亚洲教会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学到这个重要的教训。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借鉴西方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基于西方老师所模拟和教导的管理性宣教学思想，而没有根据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人力资源、良好的管理和战略规划在教会的使命中都有其适当的位置。但是，要使福音得到发展，最终我们必须依赖神，而且只依赖他。这一真理如何重塑并推动我们在未来几年的宣教工作？

浅层门徒训练或名义主义的挑战

基督教在亚非拉世界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在亚非拉世界的许多地方，唯名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各地教会的领导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在韩国，尽管教会疯狂增长，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但从1990年左右开始，那里的新教教会一直面临着逐渐衰落的危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促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包括教会不团结、缺乏社会参与、过度强调大型教会、教牧监督不足以及教牧领导的失败。

整个亚洲的教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例如，许多城市教会正在为年轻人在日益增长的现代化压力下渐行渐远而苦恼。基督徒在圣洁的生活中挣扎，因为教导不足和缺乏榜样。各种形式的成功神学教导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城市里的大教会。所有这些都是造成亚洲教会门徒训练浅薄的原因。

显然，在亚洲教会的许多地方，基督教的基本要素没有到位，特别是在委身、圣洁和性格形成方面。但更严重的是，在自由主义神学的内部影响和世俗主义的外部压力下，今天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学门徒训练质量也在下降，这一点与之并列。浅薄的门徒训练问题显然是对整个全球基督教的一种威胁。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亚洲教会将永远无法正常成熟，无论其人数增长多么惊人。正是在这一

11 不可能说复兴何时开始。最好的说法是，它是在1950和60年代的迫害下悄悄地孕育出来的，在1970年代获得了发展势头并为公众所知。

12 引自 Stock 和 Cunningham (1981: 33)。

点上，亚洲的基督徒需要问一问，他们能从教会历史上最高的属灵培养传统中学到什么教训。这些必须包括伟大的圣经教导、最好的修道院灵性、清教徒的牧养、路德宗的虔诚主义、卫理公会的小团体及其圣洁议程，以及授权宣教的激进顺服和昂贵的献身。门徒训练没有捷径。

神学教育和牧师培训

谈到神学教育和对男女牧师的培训，亚非拉世界的几乎所有教会都借鉴了西方的学术模式，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是不可取的。其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下。

许多神学教育的内容是西方的，因为所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是在西方背景下编写的，解决的是西方问题。显然，我们需要在亚洲背景下编写针对亚洲问题和现实的教科书。该方法的各个方面都遵循西方学术模式。例如，为了帮助学生发展批判能力，向普通学生介绍了对圣经的历史批判研究。但这样做的问题是，许多学生最终对有关圣经的批判理论的了解比对圣经本身的了解还要多。

在牧养事工的实践方面，有太多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其结果是，受训者在经过3-4年的神学院学习后，往往被抛入深渊，在讲道、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培养门徒等方面举步维艰。以医生的培训为例，我们需要的是课堂学习和实地教育之间更紧密的结合。

一个不得不问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受训者在离开神学院时，是否成为祈祷的男女？西方的模式是否过于注重思维的训练，以至于性格的形成和祈祷的生活因此而被忽视？有趣的是，方济各·阿西西（1181/2-1226）虽然不反对学习，但据说他允许……只要不“破坏祈祷的习惯”，就可以让他的神父接受神学教育。¹³

以上只是一些比较相关的问题。在亚洲神学教育界，这些和类似的问题已经被反复提出。¹⁴但在那些从西方神学院模式开始的人中，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人与之有了重大的突破。但为什么不情愿呢？

13 作为例子，Kohl和Senanayake（2002）和Harkness（2010）。

14 魏格尔（2005：esp. 54-68）。

对基督福音的信心

今天，西方的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已经过时，陈旧，无关紧要。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的衰落和活力的丧失。这种丧失部分是由于教会内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弱点。天主教会中广泛存在的性虐待事件以及类似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的报道，以及大型教会牧师和电视布道者的权力滥用，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但活力的丧失也是西方教会受到日益激进的世俗主义压力的结果。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普遍存在着对任何基督教观点的敌意，既隐蔽又公开。例如，如果一位基督教领袖公开表达反对 LGBT+ 议程的圣经立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媒体会对他进行严厉打击。在欧洲，这种公众对基督教的敌意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在 2004 年关于新欧盟宪法的辩论中看到的。争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是否应该被引为欧洲文明的来源之一。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主张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不仅与公共生活无关，而且是世俗欧洲发展的障碍。与所有的历史证据相反，后基督教时代欧洲的激进世俗主义者似乎执意要否认基督教对欧洲社会的福祉做出了任何重大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导致西方教会对福音“上帝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的大能”（罗 1:16）丧失了信心。这一点在教会的自由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宣教，理由是宣教是宗教帝国主义，破坏了皈依者的文化，支持宗教多元化，与基督的独特性形成对比，并倡导拒绝圣经伦理，特别是在堕胎、结婚和离婚以及 LGBT+ 问题上。

但这种对福音和圣经特性的信心的丧失，现在甚至在那些自称为福音派的人中也开始出现了。例如，在我个人的交流和观察中，我发现一些西方福音派教徒不愿意在 LGBT+ 问题的圣经立场上采取坚定的立场。但问题其实更深。许多西方福音派教徒已经抛弃了《圣经》中关于离婚和再婚的明确教导，但他们却想在同性问题上坚持圣经的权威。但这显然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你不能妥协……在圣经教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划清界限。借用地缘政治的一个形象说法，这就好比在柏林墙裂开后，还想保持铁幕的完整。然而，尽管西方教会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对福音的信心，但这并不是亚非拉世界中的相同情况。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和北非的许多社会和文化中，与基督相遇是最近的事，对其效力和能力的体验是新鲜和自由的。在亚洲，想想数以千万计的人已经从对恶魔力量和邪灵的古老恐惧中获得了自由。想想印度的达利人，他们在作为亚人的下

层阶级存在了数千年之后，已经从文化和社会政治压迫中解脱出来。或者，想想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上看到了明确的证据，即基督的福音为建立一个基于自由、正义和公平真正的社会提供了唯一适当的基础，其他例子很容易让人想到。

因此，亚洲的许多基督徒被一个建立在基督福音上的新世界的愿景所驱使，这个世界对现在和永恒都有希望。他们对福音的拯救力量充满信心和兴奋。这种对基督福音的新鲜体验和对其转化能力的确信，如何能帮助振兴今天的全球基督教？特别是这些经验如何能够被用于鼓励和加强西方的许多基督徒，他们认真地致力于圣经的权威，但却在与强大而激进的世俗主义作斗争，后者有可能压倒那里的教会？

为什么这些问题很重要？

在上述内容中，我探讨了与基督教的人数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亚非拉国家有关的六个方面。从西方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为全球教会带来四个相关的积极结果。

首先，它将使亚非拉地区的基督徒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清晰和明确的本土身份，而不是不断地从西方教会那里寻求他们的身份。

第二，发展成熟的基督教身份和神学，也将为西方神学提供必要的纠正，特别是在西方基督徒被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蒙蔽的地区。

第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教会和亚非拉世界的教会之间才能有真正的互助和成熟的伙伴关系。

最后，这样的成熟将使亚非拉世界的基督徒有能力满怀信心地与西方基督徒一起在世界宣教中工作，包括重新向西方传递福音。大约四十年前，一位亚洲基督徒在伦敦攻读神学研究生课程时，受到已故约翰·斯托特牧师的盛情邀请，前往他家。他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约翰·斯托特对他说的一句话让他永远不会忘记：“随着西方教会的不断衰落，我们正期待着非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来领导我们！”早在那时，约翰·斯托特就能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当时就已经在他代表西方教会呼吁我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北非地区的

人去帮助振兴西方基督教。亚洲的基督徒将如何回应这一呼吁？我们是否会有忠心和勇气去迎接上帝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请允许我以两个最后的挑战来结束。如果我们要完全接受上帝为全球基督教指定的责任和命运，我们需要记住两件事。

第一，抵制向西方移民的诱惑，除非我们有上帝明确的呼召，让我们向西方移民。如果我们因为西方更高的经济标准和更好的职业前景的吸引而移民，我们就会失去成为神对亚洲教会美好目标一部分的呼召。

第二，如果亚洲基督徒要忠实地履行我们服务全球教会的呼召，我们必须从西方宣教史中吸取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神的国度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昂贵的牺牲。这种牺牲包括亚洲教会为教会和宣教服务奉献我们最好和最有能力的儿女。亚洲教会的一大弱点是，我们几乎把所有最好和最聪明的人都送去从事有利可图的职业，如医学、法律、金融、工程和商业咨询。但是很少，太少，像以前的小撒母耳一样被奉献给神。如果不把我们最好和最有天赋的人奉献给神，让他在教会和宣教中服务，亚洲的基督徒最多只能产生发育不良的教会，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我们将无法为领导力作出贡献。在今天的全球教会中，迫切需要这样的领导力。亚洲教会将如何回应神的呼召？

参考文献

Douthat R (2012) *Bad Religion: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异教徒的国家*。New York: 自由出版社。Escobar S (2007) Managerial missiology. In: Corrie J (ed) *Dictionary of Mission Theology: 福音派的基础*。Nottingham: Intervarsity Press, pp.216–218.

Harkness A (ed) (2010) *Tending the Seedbeds: 亚洲神学教育的教育视角*。奎松市: ATA 公司。

Hwa Y (2019) *Shifting currents: 全球基督教的问题、挑战和未来之路*。新加坡。福音派学生联谊会。

Jenkins P (2011) *The Next Christendom: 全球基督教的到来*。第三版，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Johnson TM and Zurlo GA (eds) (2020)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3rd ed.Edinburgh: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Kohl 亚非拉世界 and Senanayake ANL (eds) (2002) *Educating for Tomorrow: 亚洲背景下的神学领导*。班加罗尔。SAIACS。

Kraft C (1989) *Christianity with Power: Your Worldview and Your Experience of the Supernatural*.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Lee Y-H (2009) *The Holy Spirit Movement in Korea: 它的历史和神学发展*。牛津大学。Regnum. Plueddemann J (1999) SIM 的恩典革命议程。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23: 156–160.

Schubert WE (1976) *I Remember John Sung*. 新加坡。远东圣经学院出版社。
Stock D and Cunningham L (1981) *Saint Francis of Assisi*.New York: Harper & Row.

Sung J (2012) *The Diary of John Sung-Extracts from His Journals and Notes*. 李维编纂。新加坡 :Genesis Books.

Weigel G (2005) *The Cube and the Cathedral: 欧洲、美国和没有上帝的政治*。纽约。Basic Books.

The Shift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Church from the West to the Majority World¹

Hwa Yung

Abstract

Almost everywhere throughout the MajorityWorld (MW), that is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and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Christianity used to be called the ‘white-man’s religion’. But that is the case no more—the church has exploded all over the MW.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look at this shift in Christianity worldwide, and what implications it has for the global church, and especially for us in Asia. My purpose here is not to highlight the weaknesses of the Western church and to glorify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es in the MW. Rather my hope is that this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before us so that we can labor more fruitfully for the advance of the gospel in the Asian context. In the process I will also raise questions which hopefully will help point the way forward.

Keywords

Asian Christianity, supernatural, theological education, identity, worldviews, majority world churches

1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one of the plenaries at the online Asia2021 Congress, “Megatrends in the Asian Church,” 11–14 October 2021. Part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a small booklet (Hwa 2019) with restricted circulation mainly in the student world. This paper has been rewritten with new material incorporated.

The Shift in Global Christianity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first 15 centuries, the church has had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various parts of Africa, Asia and Middle East. But by the fifteenth century AD, the bulk of the church had become largely centered in Europe, from which the modern mission movem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first launched. Catholic missions began in 1493 under Pope Alexander VI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in 1705 with the German pietist leader Augustine Hermann Francke.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arked the great missionary advance of the gospel in the world,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churches in the West, that is Europe,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largely dominant and those in the MW subservient. B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w a rapid expansion of the church outside the West. What took most by surprise was that by about 1980,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church had moved out of the West into the MW. In 1900 some 83% of all Christians lived in the Western world, with 17% living in the MW. Today, the figures have been completely reversed, with approximately two-thirds of all Christians living in the MW.²

Along with this global shift, Western Christianity has seen decline in other ways. For example, in Europe weekly church attendance has dropped sharply, leaving many churches empt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is supposed to be much more religious, with comparatively higher church attendance figures. Yet even there Christianity has similarly been undermined by modernity and secularism, though in different ways. Thus, Ross Douthat, a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and a Catholic, titled his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d Religion*. He argues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and the rise of a variety of destructive pseudo-Christianities’.³ His conclusion? America is ‘not a Christian country, but a nation of heretics’.⁴

Most of us are aware that liberal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has been in sharp decline. But we would be deeply mistaken if we think that only liberals are in trouble. It is a crisis facing much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including evangelicalism. One of the clearest evidences of this is the unfortunate link between large sections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with right-wing politics and Donald Trump, which has seriously and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image of the gospel globally.

As Christians in the MW, we will always owe an incalculable debt of love to the missionaries who brought the gospel to us in the past, often at great cost to themselves. Moreover, there is still

2 Johnson and Zurlo (2020): 4. Figures given here are divided between Global North and Global South, wit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cluded in the latter (though not in the MW). Percentages of Christians out of the total world Christian population: Global North, 82.4% (1900), 41.0% (2000) & 33.1% (2020); Global South, 17.6% (1900), 59.0% (2000) & 66.9% (2020). Percentages of Christians ou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MW: 8.7% (1900), 23.0% (2000) & 25.2% (2020). Percentages of Christians in Asia out of the total continental population: 2.3% (1900), 7.5% (2000) & 8.2% (2020); the total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Asia in 2020 is estimated at 379 million.

3 Douthat (2012: 3).

4 Douthat (2012: 6).

so much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that is good, noble and worth emulating. Nevertheless, given the present state of Western churches and the overall negative prognosis about their future, churches in the MW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what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are.

But regretfully, many churches in the MW still function as appendages and extensions of the churches in the Wes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Organizationally and financially, they may be independent. But in terms of theology, ways of thinking, doing church and mission, they still adopt Western models and answers uncritically. The problem is not only because many churches in the MW have been birthed through Western missions or movements, with many in the leadership trained in Western methodology and theology. It is also because, globally,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ominance of the West have been so overwhelming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factors have combined to hold back many Christians in the MW from articulating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and narratives of their faith that are firmly rooted in Script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and contextually relevant on the other.

This failure or inability to articulate alternative Christian narrativ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ntexts clearly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continuing growth of churches in the MW. For the rest of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focus primarily on what these consequences are for Asian Christianity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

Issue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What are some important issu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this shift in global Christianity? What challenges do they pose for Asian Christianity? In what follows,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discuss six issues and their related challenges. But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Worldviews and th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Western academia 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the resultant secularism.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these are also the primary concerns of the MW. That is not so. Although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have affected Asia, much of the impact is largely surface. The reason is that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grew out of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has shaped the Western world fo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But we Asians are not children of the Enlightenment, simply because that is not part of our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fact, many societies are still pre-modern. The modern concept that only logic and science, but not ethics and theology, can be considered truth and, further, the post-modern idea that all truth is relative are not the controlling intellectual paradigms of Asian societies.

What continues to dominate many societies in Asia are the religious frameworks found within the respective societies, be they Buddhism, Chinese religious-philosophical thought, Hinduism, Islam or simply primal worldviews, together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s everywhere. Because most Christian resources in apologetics, biblical studies, ethics and theology used for training in our seminaries and churches are drawn from the West, many issues faced by our Christians are simply ignored or, at best, dealt with inadequately. So long as our training and

theological formation are rooted primarily within a Western framework, they will fail to help Asian Christians address the challenges in our own cultures.

Allow me to give two simple illustrations. In my th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Britain, we had to study the 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ou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lasses, both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But back home when I started teaching in the seminary, I found that almost nobody asks whether God exists, except for Marxists and some intellectuals. That simply is a non-question in most societies in Asia. Rather,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we know who the true God is when there are so many competing religious claims. What then would an Asian Christian apologetic look like?

My second example is more troubling. In a conversation some years ago with a Christian scholar from India, with a British PhD in theology, I asked him about a problem facing the church there. In India there are some very able Hindu thinkers and journalists who regularly attack the Christian faith in public. I asked my Indian PhD friend, ‘Can you think of any Christian scholars in India who can stand toe to toe with these philosophers and journalists, and rebut their attacks publicly?’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then replied, ‘I can’t think of any.’

I sincerely hope that my Indian friend is wrong. But his answer raises an urgent concern which Asian churches as a whole must take seriously. Unless we do the necessary theological homework, the churches from which we come will never be abl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in a manner that adequately addresses the hard intellectual questions posed by our respective contexts.

The Growth of Majority World Churches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

In referring to the advance of the gospel in his work, Paul speaks of ‘what Christ has accomplished through me to bring the Gentiles to obedience—by word and deed, by the power of signs and wonders,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of God’ (Rom 15:18f).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r so, the rapid growth of churches in the MW has been driven largely by the same ‘signs and wonders’ that Paul speaks of. These include deliverance from demonic powers and healing, miracles and prophecies, dreams and visions, and the lik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primarily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 from Azusa Street making inroads into the MW. In many cases it was simply indigenous believers taking the Bible seriously and acting on its teachings, or the Holy Spirit coming in revival and manifesting His awesome power to the church.

A comprehensive and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records will bear this out again and again, as clearly shown by scholars like Philip Jenkins.⁵ This is true of the growth of many grassroots church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evangelistic breakthroughs among tribal groups throughout much of Asia, such as James Fraser’s work among the Lisu, the Indonesian revival from 1964–1970, the Chinese revival in the last 50 years, the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and ongoing breakthroughs among Muslims people groups today, and so forth. A most interesting

5 Jenkins (2011) is probably his most well-known book.

illustration of this is the powerful healing ministry of the Korean Presbyterian pastor, Kim Ik Doo (1884–1950). His work le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Korea to change an article of belief ‘from “there are no miracles in the post-apostolic age” to “there are miracles”’.⁶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We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era has either rejected the supernatural as outdated superstition, as with liberals, or treated the miraculous 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no longer today. Consequently, much of the Western church has failed to address this whole subject adequately, whether it is about the signs and wonders of the Spirit or demonic activity in the world. The result, as Fuller Professor Charles Kraft describes it, is that ‘Enlightenment Christianity is powerless’.⁷ Herein lies a major flaw in Western Christianity—its captivity to an anti-supernaturalistic Enlightenment worldview. Could this blindness to the spiritual realm be one key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Be that as it may, surely one of the challenges before us is how Asian churches can recover the supernatural dimension in our Christianity today without going into excesses, and to treat the miraculous as natural and normal in the Christian life and not a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Ministry and Mission by Human Management versus Dependence on the Spirit

The Latin American theologian Samuel Escobar, has critiqued a trend within evangelical missiology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sociated especially with the Church Growth School and movements like AD2000 and Beyond. He calls this ‘managerial missiology’ and describes it as ‘an effort to reduce Christian mission to a manageable enterprise’.⁸ To achieve this, reality is simplified into an understandable picture: ‘Missionary action is thus reduced to a linear task that is unfolded into logical steps to be followed in a process of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⁹ Thus, for example, mission goals are quantified by the number of converts won or churches planted, and strategic plans are laid to bring about the desired results. The whole exercise is based on secular strategic planning approaches, built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which produced our technological age.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Escobar’s critique of managerial missiology is part of a much wider problem in the modern church. Is it not the case that much of our thinking have succumbed to modernity’s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doing church and mission? Do not most of us assume that if only there are sufficient resources such as suitably trained personnel, money, proper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ound management, the church will invariably grow and our mission goals achievable without fail within our human time frame?

Ultimately, there are two major problems with this approach. The first is that reducing our mission goals primarily to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how many converts are made and churches planted falls far short of Christ’s command to ‘make disciples’. As one writer puts it, ‘When we

6 Lee (2009: 46).

7 Kraft (1989: 37–49).

8 Escobar (2007: 216).

9 Escobar (2007: 216).

aim only at what we can measure, we ignore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of character, discipleship and holiness, which we cannot predict or quantify without falling into legalism ... Lukewarm churches are the results of this assembly line mindset.¹⁰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at both the New Testament and church history have demonstrated again and again that the gospel never advances by mere human effort alone. Rather, what we find is that revivals and major advances of the church are invariably the result of two powerful intertwining forces at work. On the divine side we see the initiative and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on the human side we find less tangible factors such as radical holiness, prevailing prayer, obedience and sacrifice. These, and not human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re foundational. '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shes ... So it is with everyone born of the Spirit' (John 3:8).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e see this repeatedly in mission advances in the MW, with such examples as the ministries of Africans like Prophet Harris and Simon Kimbangu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Pentecostalism in Latin America in recent decades. One of the best illustrations of this in Asia is the on-going Chinese revival. The most notable Chinese evangelist and revivalist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John Sung, a brilliant American-trained PhD. On returning to China in 1927, he found that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were growing only slowly despite the great and sacrificial efforts of the missionaries. As he prayed God revealed to him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Western missions had brought in thousands of missionaries, plenty of money, and built many of the finest orphanages, hospital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leaders were depending on these human resources and not the Holy Spirit for growth. Sometime before his death in 1944, John Sung revealed that God had shown him that a great revival was coming to China. But first all the missionaries must leave.¹¹ As he predicted, shortly after his death, every missionary had to leave China with the Communist takeover in 1949. All that the Western missions brought were confiscated by a hostile government. And then, under intense persecution and left with nothing but God, the revival came.¹² As they say, the rest is history.

Unfortunately, many in the Asian church have not learnt this vital lesson. Instead, the tendency for many of us is to draw on Western approaches based on managerial missiological thinking, modelled and taught by our Western teachers, without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them in light of scriptural teaching and the Spirit's leading. Human resources, good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ll have their proper place in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But for the gospel to advance, ultimately our dependence has to be on God and on Him alone. How can this truth reshape and drive our mission efforts in the coming years?

10 Plueddemann (1999: 156–160).

11 Schubert (1976: 65–66). See also Sung (2012: 79, 197f, 210, 231, 369 & 383).

12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en the revival began. The be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it was quietly birthed under persecutions during the 1950s and 60s, and gained momentum and became publicly known in the 1970s.

The Challenge of Shallow Discipleship or Nominalism

The rapid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n the MW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w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MW nominalism is a serious challenge and leadership problems persist in churches everywhere. 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 in spite of the wildfire church growth, especially in 1950s to the 1970s, Protestant churches there have been facing a crisis of gradual decline beginning around 1990, especially among youths. Contributory factors include church disunity, lack of social engagement, overemphasis on megachurches, inadequate pastoral oversight and failures in pastoral leadership.

Similar problems are facing churches throughout Asia. For example, many urban churches are struggling with young people drifting away under the growing pressures of modernization. Christians struggle with holy living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teaching and lack of modelling. Prosperity teaching in various forms abound, especially in the megachurches in the cities. All these and more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shallowness of discipleship in Asian churches.

Clearly in many parts of the Asian church,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re not in place,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commitment, holiness and character formation. But what makes this even more serious is that this is now parallel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Christian discipleship in the West toda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theology from within and secularist pressures from without. The problem of shallow discipleship is clearly a threat to global Christianity at large. Unless this is addressed, Asian churches will never properly mature, however spectacular their numerical growth may be.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Christians in Asia need to ask what lessons they can learn from the highest traditions of spiritual formation found in church history. These must include great biblical preaching, the best of monastic spirituality, Puritan pastoral care, Lutheran pietism, Methodism's small groups with its holiness agenda, and the radical obedience and costly sacrifice which empowered mission advances. There are no short cuts in discipleship.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Ministerial Training

When it comes to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men and women for ministry, almost all the churches in the MW have borrowed the academic model used in the West. But increasingly this is being found wanting. Among the major issues raised are the following:

- (a) The content of much of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s Western because the textbooks used are largely written in Western contexts, addressing Western questions. Clearly textbooks written in the Asian contexts and addressing Asian questions and realities are needed.
- (b)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ethodology* follow a Western academic model. For example, to help the student develop his critical faculties, the average student is introduced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study of the Bible. But the problem with this is that many students end up knowing more about the critical theories about the Bible than the Bible itself.
- (c) Too much is taken for granted concerning the practical side of pastoral ministry. The result is trainees are often thrown into the deep end after 3–4 years of seminary studies

and struggle in preaching, evangelism and church planting, disciple-making, and the like. Using the training of doctors as a comparison, what is needed is a much closer integration between classroom learning and field education.

- (d) A crucial question that has to be asked is, do our trainees leave our seminaries as men and women of prayer? Is the Western model centered so much on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hat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the life of prayer get neglected as a result? It is interesting that Francis Assisi (1181/2–1226), whilst not against learning, is reputed to have given permission for his monks to be taught theology ‘as long as it did not “extinguish the habit of prayer”’.¹³

The above are merely some of the more pertinent questions. Within Asi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circles, these and similar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repeatedly.¹⁴ But among those who started with the Western seminary model, I do not yet know of any that has made a major break with it. But why the reluctance?

Confidence in the Gospel of Christ

Many in the West today consider Christianity outdated, stale and irrelevant. Thi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and loss of vitalit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This loss is also in part due to the inner spiritual and moral weaknesses of the church. This has been further aggravated by the revelations of widespread sexual abus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similar reports of sexual and financial scandals, and power abuse of megachurch pastors and TV evangelists.

But the loss of vitality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pressures on the churches in the West from an increasingly militant secularism. In every area of public life there is a prevailing hostility, both subtle and open, towards any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If, for example, a Christian leader expresses publicly a biblical position against the LGBT+agenda,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the national media will come down hard on him. In Europe, one of the clearest examples of this public hostility towards Christianity was seen in the debate over the new EU Constitution in 2004. The row was over whether Christianity should be cited 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Many intellectuals and academics argued against it because they treat Christianity not only as irrelevant to public life, but an obstacle to the evolution of a secular Europe.¹⁵ Against all historical evidence, militant secularists in a post-Christian Europe seemed bent on denying that Christianity made an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ell-being of European society!

All these have contributed to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gospel a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Rom 1:16) in the Western church. This is most clearly seen in the liberal wing of the church which has effectively abandoned mission on the grounds that

13 Cited in Stock and Cunningham (1981: 33).

14 As examples, Kohl and Senanayake (2002) and Harkness (2010).

15 Weigel (2005: esp. 54–68).

it is religiously imperialistic and destroys the convert's culture, affirms religious pluralism in contrast to the uniqueness of Christ, and champions the rejection of biblical ethics, especially over abortion,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LGBT+issues.

But this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gospel and biblical distinctives is now beginning to be seen even among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evangelicals. For example, in my 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observation, I find some Western evangelicals unwilling to take a firm stand on the biblical position on LBGT +issues. But the problem actually runs deeper. Many Western evangelicals have jettisoned the Bible's plain teachings on divorce and remarriage, and yet they want to assert scriptural authority on the same-sex issue. But that clearly is a losing battle. You cannot compromise on one aspect of biblical teaching and draw the line on another. To borrow an image from geopolitics, it would be like trying to keep the Iron Curtain intact after the Berlin Wall had cracked!

Nevertheless, whilst many in the Western church has lost confidence in the gospel, that is not the same story in the MW. In many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and MENA, the encounter with Christ is rec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its efficacy and power is fresh and liberating. In Asia itself, think about the tens of millions that have been set free from the age-old fear of demonic powers and evil spirits. Think of the Dalits in India who have been lifted out from cultural and sociopolitical oppression after thousands of the years of existence as a subhuman underclass. Or, consider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who see clear evidence in history that the gospel of Christ offers the only adequate basis for building a new society based on genuine freedom, justice and equity. Other examples easily come to mind.

Many Christians in Asia are therefore driven by a vision of a new world founded on the gospel of Christ which holds promise for both now and eternity. With them there is conviction in and excitement over the saving power of gospel. How can this fresh experience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and confidence in its transforming power help revitalize global Christianity today? In particular, how can these be channeled into efforts to encourage and strengthen many Christians in the West, who are seriously committed to biblical authority but are battling against a powerful and militant secularism which threatens to overwhelm the church there?

Why Are These Issues Important?

In the above I have looked at six areas that pertain to the shift of Christianity's numerical center from the West into the M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s in the MW, and in Asia in particular, I believe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constructively will lead to four related positive outcomes for the global church.

First, it will enable Christians in the MW to develop clear and confident indigenous identities of their own, and not be constantly looking to Western churches for their identities.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mature Christian identities and theologies in the MW will also provide a needed corrective to Western theology,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Christians in the West had been blindsided by their own histories and cultures. Third, only if that happens can there be true mutuality and

mature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churches in the West and those in the MW. Finally, such a maturity will empower Christians in the MW to work with full confidence alongside Western Christians in world mission, including the re-evangelization of the West.

Some forty years ago, while doing graduate theological studies in London, an Asian Christian was graciously invited by the late Rev. John Stott to his home. Upon his arrival, the first thing that John Stott said to him was something which he would never forget: 'As the Western church continues to decline, we are looking to Christians from the non-Western world for leadership!' Way back then, John Stott could see clearly what was happening worldwide. Already then on behalf of the Western church he was calling on us in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and MENA to go and help revitalize Western Christianity. How will Christians in Asia respond to this call? Will we have the faithfulness and courage to embrace our God-given task for this generation?

Allow me to close with two final challenges. If we are going to embrace fully our God-appointed responsibility and destiny for global Christianity, we need to remember two things. Firs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migrate to the West unless we have a definite and clear calling from God to move there. If we emigrate because of the attraction of higher economic standards and better career prospects in the West, we will lose our calling to be part of God's wonderful purposes for the Asian church.

Second, if Asian Christians are to live out faithfully our calling to serve the global church, we must learn one important lesson from Western mission history. It is simply that the adva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costly sacrifice. This sacrifice includes Asian churches giving our best and most able sons and daughters for service in church and mission. One of the great weaknesses of the churches in Asia is that we send almost all of our best and brightest into lucrative professions such as medicine, law, finance,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consultancy. But few, too few, are given to God like little Samuel of old. Without consecrating our best and most gifted to God for His service in church and mission, Christians in Asia will at best produce stunted churches which can never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We will fail to contribute to the leadership that is desperately needed in the global church today. How will the Asian church respond to God's call? 🌐

References

- Douthat R (2012) *Bad Religion: How We Became a Nation of Here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Escobar S (2007) Managerial missiology. In: Corrie J (ed) *Dictionary of Mission Theology: Evangelical Foundations*. Nottingham: Intervarsity Press, pp.216–218.
- Harkness A (ed) (2010) *Tending the Seedbeds: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Asia*. Quezon City: ATA.

- Hwa Y (2019) *Shifting Currents: Issue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for Global Christianity*. Singapor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 Jenkins P (2011)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3r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TM and Zurlo GA (eds) (2020)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3rd ed.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 Kohl MW and Senanayake ANL (eds) (2002) *Educating for Tomorrow: Theological Leadership for the Asian Context*. Bangalore: SAIACS.
- Kraft C (1989) *Christianity with Power: Your Worldview and Your Experience of the Supernatural*.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 Lee Y-H (2009) *The Holy Spirit Movement in Korea: Its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Oxford: Regnum.
- Plueddemann J (1999) SIM's agenda for a gracious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3: 156–160.
- Schubert WE (1976) *I Remember John Sung*. Singapore: Far Eastern Bible College Press.
- Stock D and Cunningham L (1981)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New York: Harper & Row.
- Sung J (2012) *The Diary of John Sung—Extracts from His Journals and Notes*. Compiled by Levi. Singapore: Genesis Books.
- Weigel G (2005) *The Cube and the Cathedral: Europe, America, and Politics Without God*. New York: Basic Books.

教会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 亚非拉世界：回应¹

文 / 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 刘明德译

撮要：本文是对华勇关于《教会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亚非拉世界》论文的回应。它反思教会过去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可以从西方教会的优势及其弱点和失败中镜鉴的教训。本文涵盖西方教会历史的三个重要时期：主后 30 年到主后 330 年的初代教会、十六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宣教拓展以及随后西方教会的衰落。

关键词：亚非拉世界基督教 初代教会 16 世纪宗教改革
现代宣教运动 西方基督教的衰落

1 本文是对 2021 年 10 月 11-14 日在线亚洲 2021 大会“亚洲教会大趋势”全体会议之一的回应。

正如华勇所说，在过去的 100 年中，全球福音派教会的构成发生了巨变。一个统计数字足以证明这一点：1910 年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上，95% 的与会者来自西方教会，只有 5% 来自亚非拉世界；2010 年 11 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一次类似的全球会议上（第三届洛桑会议，作者时任会议的国际主任——译者注），我和华勇都出席了，与会者来自世界 198 个国家，其中 65% 来自亚非拉世界，只有 35% 来自西方世界。这表明在短短的 100 年间，全球福音派教会的重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完全同意华勇在其发言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作为回应，我以历史学家所能做的最有帮助的评论也许是反思教会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发展的原因，并建议我们如何学习教会的长处，以及我们的弱点和失败，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我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欧洲教会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期来简要实现这一目标：

- 主后 30 至主后 330 年，初代教会
-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
-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宣教拓展与衰落

一、主后 30 年至主后 330 年，初代教会

德国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在回答“初代教会是如何从一个受人鄙视的少数群体发展成为四世纪中叶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时说：“简而言之，是教会活出了生命并在异教徒中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换句话说，教会之所以发展壮大，是因为他们将敬虔的生活与建立有吸引力的社区结合起来，同时清楚地捍卫福音的奇妙、独特和大能，与其他异教世界观相抗衡。他们同时强调**福音的宣讲和活出生命**。

罗德尼·斯塔克教授在过去 20 年中出版了一本题为《基督教的兴起》² 的开创性著作，其中精辟地追溯了教会发展的原因。这些原因围绕着福音信息的独特性、力量和真实性，以及初代教会与周围文化中人群的接触。斯塔克特别指出：初代教会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在疫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主后 150 年和主后 250–265 年左右，可能是麻疹首次传入欧洲的

2 斯塔克（1996 年）。

时期。在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大城市中，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疫情。然而，信徒们向受苦受难和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援手，其中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就连异教徒罗马皇帝朱利安也表示，如果异教徒不能在对病人、受苦者和垂死者的同情方面与基督教信徒相提并论，那么教会就会接管异教徒的世界。许多教会的长老和领袖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和护理病人，以致在接触疫病时丧生。在这两次疫情期间，教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高峰。这或许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

此外，斯塔克还认为，教会所传递的信息对妇女特别有吸引力。这些早期信徒至少在四个与妇女有关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堕胎习俗的盛行；因重男轻女而杀害女婴；强迫青春少女嫁给年长成熟男子的习俗；以及当时的文化接受丈夫去世后，其家人尤其是其兄弟，可以优先于其遗孀和子女，自由接管其所有财产的观念。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能理解使徒雅各的劝诫：“真正的宗教是照顾寡妇和孤儿”（雅 1：27）。教会领袖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这使得许多妇女，无论是出身高贵还是贫穷，都被福音信息所吸引。

与基督徒之爱的表现相辅相成的是，上帝兴起了许多有天赋的福音捍卫者，他们能够在公共场合阐明福音的真理。他们包括波利卡普（Polycarp）、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爱任纽（Irenaeus）、亚他那修（Athanasius）、奥古斯丁（Augustine）以及其他在欧洲和北非服侍和生活过的人。我想起了华勇的观点，即教会要想成功，就必须既根植于圣经（并随时准备捍卫圣经），又要与文化相关。

因此，对福音的捍卫以及与文化的结合被证明是初代教会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宣讲和活出生命是初代教会使命的特点”。今天，许多人会称之为“整全宣教”。有时，我们可能倾向于从与世界的接触中退缩。但初代信徒并非如此。我想起了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所说的“对教会的呼召是既要在道德上与众不同，但又不能被社会隔离。”——有时我们却把这两者混淆本末倒置了。

二、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到十六世纪，我们就能看到所谓的宗教改革时期对教会发展和欧洲文化转型的影响。在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领导下，我认为十六世纪的欧洲教会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首先，他们**重新发现了基督教福音的精髓**。尤其是备受忽视的“因恩典称义”、“圣经的可靠性”和“信徒皆祭司”等教义，而这些教义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传统中都被掩盖了。

其次，这一重新发现带来了**欧洲文化的改革**。因为路德和加尔文都传授了基督教教义，并力图将圣经真理和基督的主权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视觉艺术、科学等领域，这带来大学教育的大幅扩展、妇女教育的大幅扩展、新的天职观、自由民主的诞生、宗教宽容的发展等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加尔文对欧洲银行系统的创立贡献巨大。

他们提出了“基督教思想”的概念，即试图将圣经真理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领域。他们通过将福音传播到他们所知的地极（主要是欧洲），同时也将福音传播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思想领域，从而展现了对扩大基督主权的关注。他们既宣讲福音，又发展圣经世界观，试图将圣经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教义与实践——教义、实践、参与和宣教——之间没有分离。因此，他们的继承者之一亚伯拉罕·凯伯尔（Abraham Kuyper）认为，“在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域中，基督作为一切的主宰，没有一寸不在呼喊：‘这是我的’。”³ 宗教改革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带来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宗教改革塑造并创造了现代欧洲。

第三，他们对自身文化之外的**传福音和宣教有了更新的异象**。这一点常常被许多教会史学家淡化和忽略。但如果我们以加尔文为例，在他的事工下，法国的福音派信徒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在 2000 万人口中增长到至少 200 万。路德的教义从德国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东欧。散居各地的宣教士从维滕堡和日内瓦出发，足迹遍布整个欧洲，有些甚至前往巴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者的教导对威廉·克里及其在印度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回答“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在欧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持续数百年之久”这个问题时，我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改革者们在**重新发现福音的本质、改革文化和恢复宣教异象**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三者相得益彰。⁴

3 Van Til (1972:117).

4 我在《进入世界：路德和加尔文的宣教愿景》一书（布朗，2021年）中追溯了这一切。

因此，我们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看到了宗教改革和复兴。三者必须齐头并进，如果我们只关注教义，教会就会变得内卷化和奄奄一息。如果我们只注重把福音传到地极，而没有把圣经真理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扎根于正确的教义，我们的信息就会变得肤浅。如果我们只是试图改革文化，而没有圣经教义、基督教世界观和传福音的心志这三者来支撑，我们就会失去方向和根基。宗教改革的影响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是因为这三足鼎立的重点共同作用。

我希望亚洲也能如此！

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宣教拓展与衰落

最后，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到 19 世纪，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个大扩张的时期，也是现代宣教运动的开端。在许多方面，它起源于约翰·卫斯理及其支持者的宣教活动。19 世纪是新教宣教士从欧洲到地极宣教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从 1850 年左右开始衰落的苗头。

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启蒙运动”，它从根本上把上帝从欧洲思想的中心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人本主义。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世俗主义观点，试图描绘没有主宰上帝的存在或介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一些信徒甚至受到这种观点的诱惑，导致上帝被去超自然化，对圣经失去信心。

针对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开始形成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一种观点源于《圣经》，主张在《圣经》为有限的人类提供的框架内提供自由；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人类应不受任何约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也不能提及上帝。在伟大的宣教事业中，基督徒也为废除奴隶贸易、工会的诞生、劳动法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做出了贡献，但教会却面临着启蒙世俗主义世界观日益严峻的挑战。可悲的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即使是在欧洲内部宣教活动大力扩展的时期，许多教会领袖非但没有直面新出现的世俗世界观，反而从世界退却出来龟缩到敬虔主义的角落里。

我们本应从初代教会的护教士那里，以及从路德和加尔文那里学到，在大学、媒体和所有其他社会领域公开宣讲福音和阐明圣经世界观的优越性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却背道而驰。结果，在一段时期内，当《圣经》受到攻击时，我们在捍卫《圣经》方面做得很差，我们接受了另类的批判性世界观，退回到敬虔主

义。于是很快地，政治界和其他领袖就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在周日做礼拜，但要把它当作私事，你们在社会的其它领域或工作场所不可与我们说这些。”我们很晚后才后知后觉，在公开场合揭露其它世界观的弱点和不足是很重要的，当门打开时，要向真空中宣讲福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从初代和宗教改革时期信徒们所做的贡献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既阐释了圣经世界观，又宣讲了福音，以应对当代知识界的挑战。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华勇的报告准确的话，在许多亚洲国家，能够宣讲福音和阐明圣经世界观的公共护教士似乎很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建议你们要振臂而起应对这一挑战，以避免你们在国内和更远地方的宣教工作脱轨。请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公共领域自信地阐述和捍卫圣经福音和圣经世界观是教会被呼召的核心。当我们努力忠实于这一呼召时，请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会为你们祷告。🌐

参考文献

Brown L(2021)《进入世界：路德和加尔文的宣教愿景》。Fearn, Ross-Shire: Christian Focus.

Stark R (1996)《基督教的崛起：晦涩、边缘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内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宗教力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Van Til HR (1972)《加尔文主义的文化概念》，第2版。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

作者简介

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 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现代史，在巴黎学习神学。他有幸在学生界事奉主超过 40 年，其间曾担任国际福音派学生团契 (IFES) 国际秘书长和洛桑运动 (Lausanne Movement) 国际主任。他曾参与 120 多个国家的学生聚会并发表演讲。

The Shift of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the Church from the West to the Majority World: A Response¹

Lindsay Brown

Abstract

This is a response to Hwa Yung's paper on the shift of the centre of the gravity of the church from the West into the MajorityWorld. It reflects on the reasons why the church grew in theWest, particularly in Europe, in the past and suggests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strengths of theWestern church, as well as its weaknesses and failures. Three periods of Western church history are covered: The Early Church from AD 30 to AD 330,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an Reformation, and the modern missionary expans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nd the subsequent decline of the Western church.

Keywords

Majority world Christianity, early Church, 16th century reformation,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decline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1 This paper was a response to one of the plenaries at the online Asia2021 Congress, "Megatrends in the Asian Church," 11–14 October 2021.

As Hwa Yung says, there has been a huge shift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lobal evangelical church. One statistic to demonstrate this will suffice. At the World Missions conference in Edinburgh, Scotland in 1910, 95% of the participants came from the Western church; only 5% came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At a similar global conference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in November 2010 at which both Hwa Yung and I were present, together with participants from 198 countries in the world, 65%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and only 35%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his demonstrates the enormous shift in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globally in only 100 years.

I am in wholehearted agreement with many of the points which Hwa Yung has made in his presentation. By way of response, perhaps then the most helpful comments I can make as a historian are to reflect on the reasons why the church grew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in Europe, and suggest how we might learn from the strengths of the church, as well as our weaknesses and failures in the hope that you don't repeat them. I aim to do this briefly by looking at three key periods in European church history:

- AD 30 to AD 330, the Early Church
-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issionary expansion and decline

AD 30 to AD 330, the Early Church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did the early church grow from a despised minority to a significant force by the mid fourth century?' one great German historian, Adolf Harnack, said simply that it grew because the early church out-lived and out-argued the pagans. In other words, it grew because of a combination of their godly lives allied to the building of attractive communities alongside an articulate defence of the wonder, uniqueness and power of the gospel over against alternative pagan worldviews. They emphasised both the *proclam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gospel.

A seminal book published in the last 20 years entitled,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², by Professor Rodney Stark brilliantly traces the 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They revolved around the uniqueness, power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gospel message, allied to the engagement of the early church with people in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Stark argues in particular that the Early Church proved to be attractive for at least two major reasons. Firstly, in the context of a time of frequent pandemics most notably in the periods around 150 AD and 250–265 AD, possibly when measles first came to Europe. Perhaps as many as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in most of the major c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di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s. However, believers reached out to the suffering and dying, many of whom responded by embracing the gospel. Even the pagan Roman Emperor Julian stated that if the pagans could not

2 Stark (1996).

match the believers in their compassion for the sick, suffering and dying, that the church would take over the pagan world. Many elders and leaders of churches died as they gathered sick people and nursed them, risking their own lives as they came in contact with the pandemics. There was a huge spike in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during the time of those two major pandemics. That perhaps has a lesson for us today.

In addition, Stark argues that the message of the church proved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women. These early believers took a firm stand on at least four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abortion; the killing of female children as male children were preferred; resistance to the practice of young adolescent girls being forced to marry much older mature men; and the acceptance in the cultures of the time that when a husband died his family, especially his brothers, were free to take over all his possessions in preference to his widow and children. In this contex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Apostle James' exhortation that 'true religion is to care for the widows and orphans' (James 1:27). Church leaders took a strong stance on all of these things, which led to many women, both high-born and poor, being attracted to the gospel message.

Allied to this demonstration of Christian love was the fact that God raised up many gifted defenders of the gospel who were able to articulate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se included Polycarp, John Chrysostom, Irenaeus, Athanasi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ho served and lived in Europe and in North Africa. I'm reminded of Hwa Yung's view that to succeed, the church has to be both rooted in Scripture (and ready to defend it) as well as being culturally relevant.

So, a defence of the gospel allied to engagement with the culture proved to be decisive contributory factors in the growth of the Early Church. You could say that '*proclamation* and demonstration characterised the mission of the early church'. Today, many people would call that 'integral mission'. Sometimes we may have a tendency to retreat from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This was not the case with the first believers. I'm reminded of John Stott's words 'the calling of the church is to be morally distinct without being socially segregated' – and sometimes we have confused the two.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an Reformation

If we fast forward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what became called the Reformation period on both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cultur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rtin Luther and John Calvin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an church succeeded in three ways.

Firstly, they *rediscovered the essence of the Christian gospel*, especially the much-neglected doctrines of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cripture and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all of which had been obscured within the Roman Catholic tradi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econdly, this rediscovery led to the *Reformation of European cultures* because Luther and Calvin both taught Christian doctrines and sought to apply biblical truth and the Lordship of Christ in every sphere of life including in the worlds of education, the visual arts, science, which led to the vast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great expansion i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 new view of vocation, the birth of liberal democracy, the growth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so much more. Some historians have even argued that Calvi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Europe.

They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Christian mind, by which I mean an attempt to apply biblical truth to every sphere of life, including the realm of ideas. They exhibited a concern to expand the Lordship of Christ both through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s they knew it, which was mostly in Europe, but also to every sphere of life, including the realm of ideas. They espoused both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blical worldview as they attempted to apply scripture to every sphere of life. There was no separation between doctrine and practice-between doctrine, praxis, engagement and mission. One of their successors, Abraham Kuyper, as a consequence argued that ‘There is not an inch in the whole area of human existence of which Christ, the sovereign of all, does not cry: “It is Mine”.’³ The impact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was profound and it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Reformation shaped and created modern Europe

Thirdly, they had a *renewed vision for evangelism and mission* outside of their own culture. This has often been minimised and missed by many church historians. But if we take Calvin as an example, under his ministry evangelicals in France grew to at least 2 million out of a population of 20 million soon after his death. Luther’s doctrines spread from Germany to Scandinavia, England and Eastern Europe. Diaspora missionaries went out from Wittenberg and Geneva all across Europe, and some even travelled to Brazil. Some historians argue that the Reformers’ teaching, profoundly impacted William Carey and his work in India.

Therefore,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Reformation have such a profound impact in Europe lasting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my answer would be that it was because the reformers had a beautiful balance of rediscovering the essence of the gospel, reforming the culture,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missionary vision. All three came together.⁴

Hence, we saw Reformation and revival in many parts of the continent. All three must come together. If we only focus on doctrine, the church can become inward looking and moribund. If we only focus on taking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ithout applying biblical truth to every sphere of life and without having the rootedness of sound doctrine, our message can become superficial. If we only try to reform a culture without the undergirding of biblical doctrine, a Christian worldview, and an evangelistic heart, we will lose direction and rootedness.

3 Van Til (1972: 117).

4 I have traced all this in my book *Into All the World: the Missionary Vision of Luther and Calvin* (Brown 2021).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lasted so long because these three emphases came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 hope this will happen in Asia too!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issionary Expansion and Decline

Finally, if we fast forward to the 1800s, we can see that it was again a period of great expansion and the initiation of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many ways it had its roots in the ministry of John Wesley and his supporters. The 1800s was a period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 wit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ravelling from Europe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However, even during that period we can see the seeds of decline from about 1850 onwards.

Powerful alternative views began to be expounded as a result of that period which came to be calle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which essentially moved God 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an thinking to the periphery – to be replaced by man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 secularist view began to be developed which sought to portray what life could be like without the presence or intervention of a sovereign God. Some believers were even seduced by this view which led to the de-supernaturalisation of God and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Scriptures.

Two competing views addressing the desire for human freedom began to develop. The one, issuing from the Bible, argued for the provision of freedom within the framework provided by the Scriptures for finite human beings; the other argued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be free of all constraints without any restrictions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and certainly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God.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missionary enterprise therefore, which also led Christians to contribute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the birth of trade unions, labour laws and so much else, the church was faced by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ecularist Worldview. Sad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00s, even during a period when there was considerable missionary expansion within Europe itself many church leaders, instead of confronting the emerging secular worldviews, retreated from engaging with it into a pietistic corner.

We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early church apologists, and from Luther and Calvin of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both proclaiming the gospel in public and articulat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iblical worldview – in universities, media and all other spheres of society. We did not. As a consequence, ov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the Bible came under attack, we did a poor job of defending it, we embraced alternative critical worldviews, retreated into pietism, so that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political and other leaders began to say to us: ‘You can worship on Sunday, but keep it as a private affair,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ay to us in other spheres of society or the workplace.’ We realised rather late that it’s important to expose the weaknesses and inadequacies of other worldviews in public and, as the door opens, proclaim the gospel into the vacuum. In this sense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 contribution which believers made in the early centuries and during the Reformation in expounding *both* a biblical worldview an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in response to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It is somewhat disconcerting, if Hwa Yung's reports are accurate, that there appear to be few public apologists who are able to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articulate the biblical worldview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If this is the case, I recommend you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urgently in order to avoid your missionary endeavours being derailed at home and further afield. Pleas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The confident articulation and defence of the biblical gospel and the biblical worldview in the public sphere is central to the calling of the church. Please pray for us as we seek to be faithful to that calling as we will pray for you. 🌍

References

- Brown L (2021) *Into All the World: The Missionary Vision of Luther and Calvin*. Fearn, Ross-Shire: Christian Focus.
- Stark R (1996)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Obscure, Marginal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Religious Forc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a Few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n Til HR (1972)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uthor biography

Lindsay Brown studied Modern History in Oxford and theology in Paris. He has been privileged to serve the Lord in student world for over 40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he has served as 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Secretary of IFES, and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He has enjoyed visiting and speaking at student gatherings in over 120 countries.

《中国宣教学刊》 征稿启事

《中国宣教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Mission) (半年刊) 是专注于宣教研究, 以及中国教会宣教与普世教会宣教关系与协作的专业学术期刊, 由宣能集 (Synergy China) 主办并出版。

宣能集由“亚宣 2020”联结的十几位中国教会宣教领袖共同成立, 为中国宣教领袖的团契, 海内外宣教机构的联结与协作平台。目的是共同为中国教会宣教提供公共服务, 以促进中国教会更加健康、规范、有效地参与普世宣教。

“中国宣教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Mission) 为了解宣能集之对外窗口并重要事工途径。

学刊强调并坚持: 神学性、宣教性、专业性、原创性、思想性、学术性、研究性、国际性、事工性、指引性、前瞻性、开放性、长期时效性等特性。

栏目设置包括“主题文章”、“普世宣教”和“差传研究”。本刊诚挚欢迎海内外宣教同路人赐稿。

本刊采用匿名审稿制, 编辑部保留处理稿件、决定发表与否, 以及文字编辑、加附注、回应和技术修订的权利。凡在本刊发的文字, 版权归属宣能集所有。作者在本刊发表文章, 须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文责自负, 一切立论, 不代表宣能集及本刊立场。

本刊不欢迎一稿多投, 来稿中英文皆可。本刊接稿后将在二个月之内向作者反馈审稿意见, 未刊未用稿件恕不退回。如果在其它刊物发表, 请及时告知。

一、文章选题

本刊长期关注和刊发中国宣教、亚洲宣教与普世宣教相关领域之重要宣教议题思考和研究成果。以下为重点关注的部分重要宣教议题：

- 1、近现代中国宣教历史策略研讨
- 2、近现代中国教会宣教运动研究
- 3、当代中国教会宣教现状分析
- 4、当代中国教会宣教运动思考
- 5、当代中国教会少数民族宣教事工
- 6、当代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经验
- 7、当代中国教会少数民族教会与宣教
- 8、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训练
- 9、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工场发展
- 10、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士关顾
- 11、当代中国教会之本土差会建设
- 12、当代中国教会之文宣事工
- 13、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研讨
- 14、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士述职退休基地
- 15、当代中国教会之宣教士子女教育
- 16、当代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宣教合作
- 17、当代中国教会与国际差会合作
- 18、当代中国教会宣教资源中心建设
- 19、当代中国教会之健康宣教观
- 20、当代中国教会福音机构之发展
- 21、当代中国教会之社会关怀事工经验
- 22、中国宣教工场之分布与事工发展
- 23、普世宣教趋势与宣教策略
- 24、“处境化宣教”模式探讨

- 25、“营商宣教”策略模式探讨
- 26、穆宣推动、研究与合宜策略思考
- 27、当代中国教会宣教士关顾者之培养与训练
- 28、当前中国教会宣教现状分析与宣教进路
- 29、中国少数民族宣教现状分析与宣教策略
- 30、健康宣教模式探讨
- ……

二、稿例要求

来稿字数要求在 6000–20000 字之间为宜，因文章需要也可以考虑酌情增减文字。请在正文前附上“内容提要(200 字之内)”，“关键词(2–5 个)”，以及“作者简介（作者认为比较方便介绍自己的名字、资历等）”。文章末尾须呈现“参考文献”或“资料来源”。以下为范例：

侯宣道。《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之宣教神学》。广州：国际华夏使团，2017。

三、注释规范

来稿须符合本刊注释规范要求，采用页下脚注形式，统一编码。首次引用时请将文献详细信息按照作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等要素顺序注明；再次引用时，只需注明作者、文献名和页码即可。以下为范例：

侯宣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之宣教神学》（广州：国际华夏使团，2017），页 57。

侯宣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之宣教神学》，页 110。

引用文献资料时，切记直接引用不能超过四行半文字，以免落入抄袭嫌疑。如果必须较多引用，需要自己重新组织文字表述。互联网资料尽量慎用、少用，必须引用时请选择官方权威网站资料，并注明作者、文献名及确切网址等。外国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约定成俗的除外，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应在中文译名后括号内附注原文。●

投稿邮箱：synergycbulletin@protonmail.com

祝主恩永携！

《中国宣教学刊》编辑部

2023年10月

作者介绍

王再来

宣教动员者，中国未触之民协调员。

牧宣

中国家庭教会资深牧者，某宣教事工负责人。

亚伯拉罕

宣教士、牧师、博士、文宣事工工作者。

守道

资深宣教士。前海外华人某国际差会创办人之一。

金但以理

“宣教中国2030运动”倡议人及共同发起人。

铭贤

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士。《差传研究》主编。

泰伯·劳克林 (Tabor Laughlin)

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哲学博士。

刘明德

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宣教学博士在读。

Joshua Sun

中国教会宣教士。目前在中东地区宣教事奉。

保罗 (Paul)

牧师，圣经原文研究学者，某神学院院长。

华勇 (Hwa Yung)

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名誉主教和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

林赛·布朗 (Lindsay Brown)

国际福音派学生团契(IFES)国际秘书长，前洛桑运动国际主任。



宣能集 (Synergy) 徽标诠释:

代表全世界，上帝的普世宣教心意，众教会之宣教联结、聚能与协作，及上帝荣耀的同在。
鱼逆流而上表示，众同工蒙圣灵的引导，沿教会宣教传承之路，合一参与宣教，破浪前行。